

0048783

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川藏茶道的市场与社会
——以明清四川雅安水东乡为中心

The Marketing and Society on the Tea Road of Sichuan-Tibet Trade

---- Ya'an County Shuidongxiang from Ming to Ch'ing Dynasty

指导老师：陈春声教授

申 请 人：陈志刚

专业方向：中国社会经济史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刘正刚

委员：

吉国心 李 强
张 强 刘 强

2010年6月6日

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陈志刚

日期：2010年6月6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中山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院系资料室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复印、缩印或其他方法保存学位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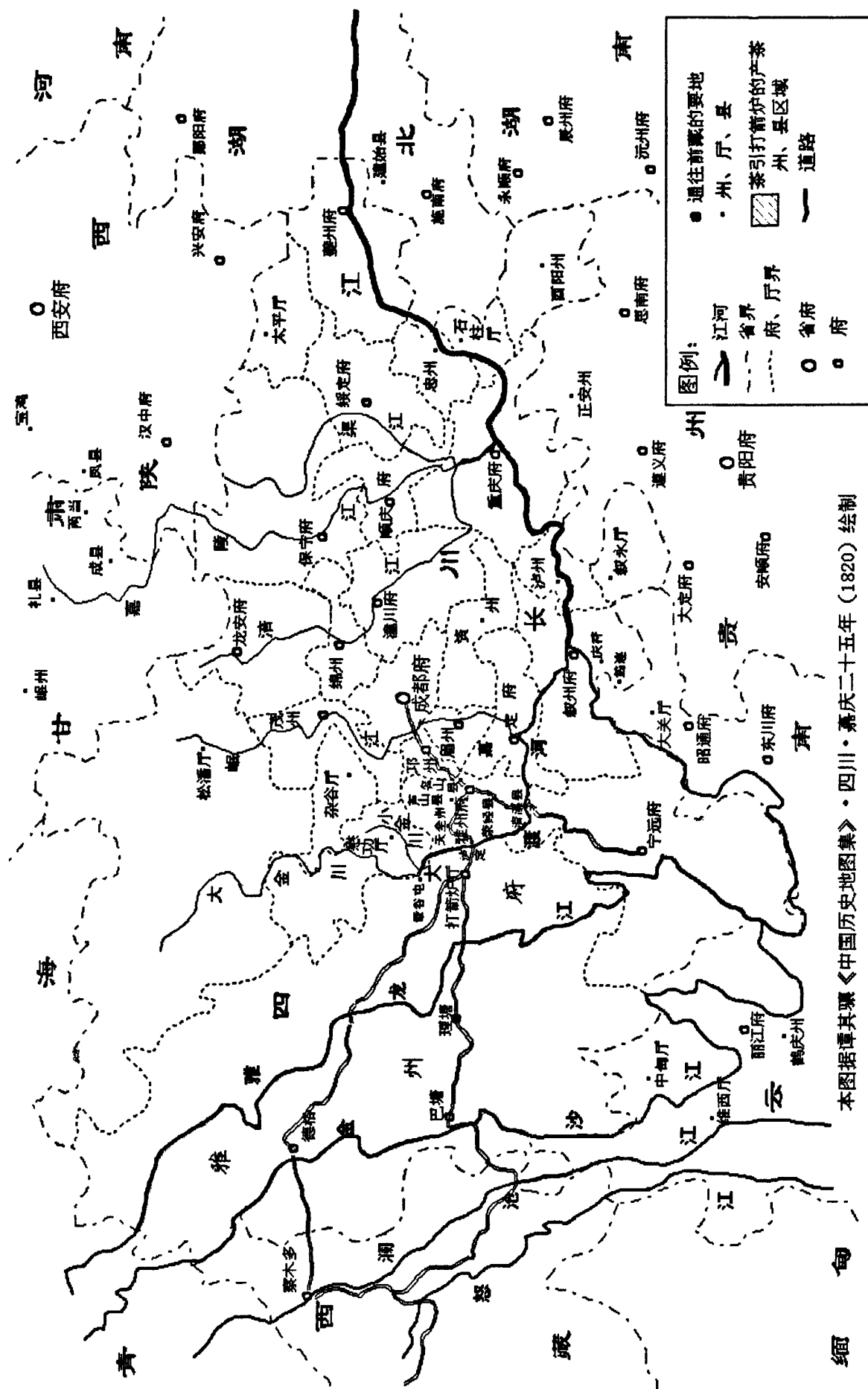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陈志刚

导师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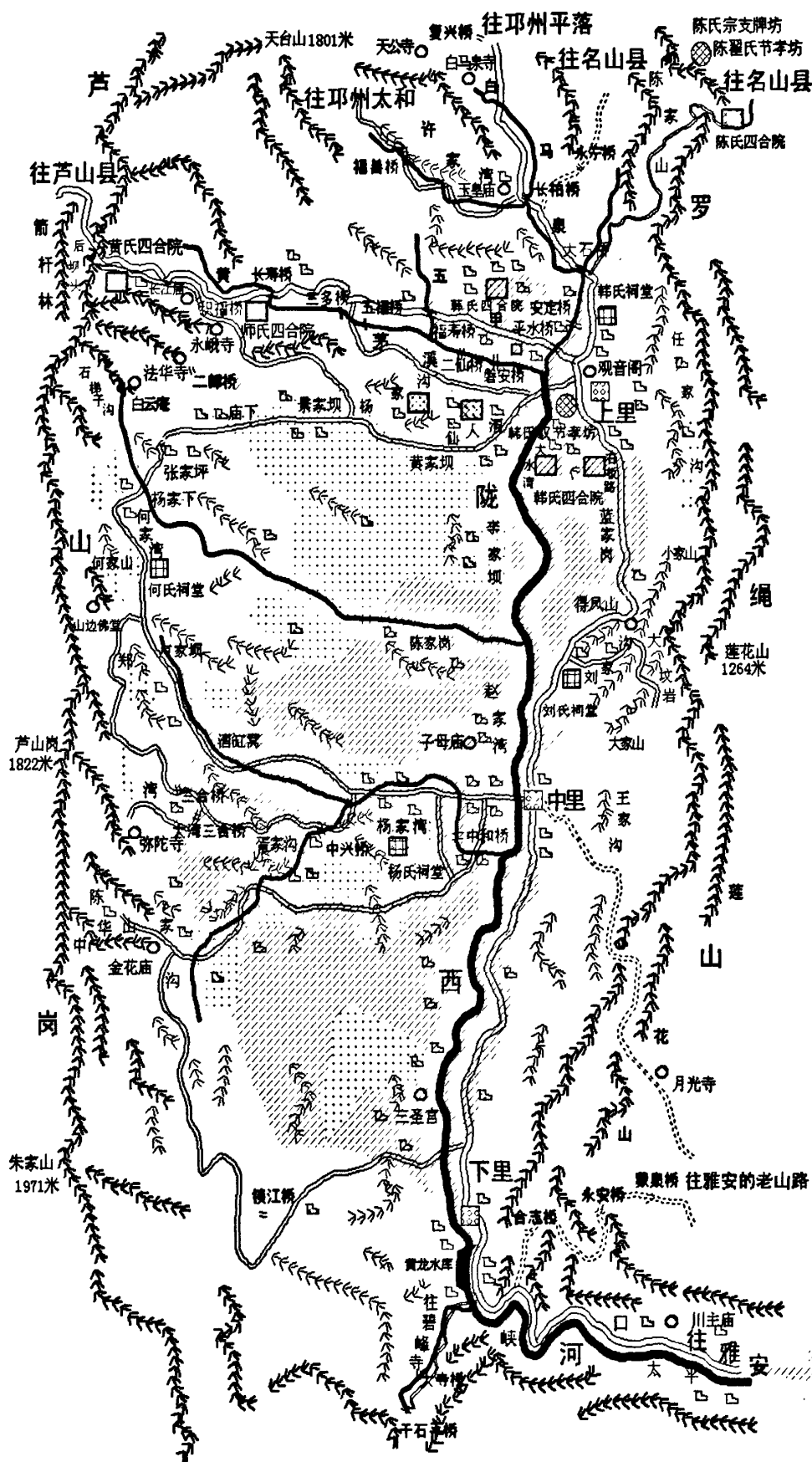


日期：2010年6月6日

日期：2010年6月6日



本图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四川·嘉庆二十五年（1820）绘制



图例:

— 河流	= 桥梁
≡ 山脉	▣ 大地名
— 道路	▤ 祠堂
▨ 旱地	▥ 四合院
▩ 水田	▧ 房屋
▫ 山区	⊗ 节孝坊
◼ 水库	○ 庙宇

北
东

0 2 公里

水东乡 (今上里镇、中里镇、碧峰峡镇) 舆图 (2010年)

摘 要

本文的研究地点为四川雅安水东乡，时代从明末到民国初年（少量内容涉及到现在），试图探讨一个明代以来的川西地域社会，在清代如何被纳入到川藏贸易格局之中，考察川藏贸易对四川相关产茶地域社会的影响。

明清鼎革之际，中里八甲杨氏获得大片无主土地，成为清初水东乡最大的地主和茶树种植者。小金川战役以来，五甲口场通过漫长的茶道与茶叶总市场打箭炉联系起来。五甲口场范围内茶园经济蓬勃发展，各山头的寺庙都有很多茶园，新兴商人家族乃至宗族相继产生，这些大族引入新的生活观念，开始申请建立节孝坊来宣示自己在地方的特殊社会地位，其它明以来的老姓人群则采用重构祖先世系的办法来进行文化竞争，一般农民则充当茶叶背夫。在长期相对稳定的对藏茶叶贸易的经济环境里，水东乡生员阶层逐渐形成，四民社会结构相对稳固，共同的祖籍传说在水东乡广泛传播，成为水东乡社会共同性的显著特征之一。直到民国初年，地方大族势力和生员一直维持着水东乡的地方秩序。这是川茶源源不断入藏的基本社会机制。

水东乡庙宇众多，本文主要以金花庙为例，探讨金花庙会复兴过程中反映的地域人群分裂重组关系。本文还以箭杆林村为例，探讨了水东乡村落的一般形态。

关键词：

川藏贸易 打箭炉 湖广填四川 宗族

Abstract

The locality of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is at shuidong xiang of ya'an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late Ming dynasty to earlier Republic of China(some contents relate to now).The article tries to argue the process that a local society in the west of Sichuan Province how to be brought into the structure of Sichuan—Tibet Trade in Ch'ing dynasty.

The people of Zhongli Bajia Yang gained many derelict fields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and became the biggest landholder and tea planter. The Wujiakou Market was connected with Tachienlo(daqianlou) by the long tea road after the war of Xiao Jinchuan.The tea garden on the hill around the Wujiakou Market became flourishing. New commercial kin and lineage came into being who introduced new idea about life into Shuidongxiang.They apply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the Jiexiao Fang to show the special status in Shuidongxiang. The people whose ancestors settled down Shuidongxiang in Ming dynasty began to construct the new descent. On the other hand, poor peasants served as the tea porter. The elite estate and the Si Min social structure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teady Sichuan—Tibet Trade.The legend about common original family home was transmitted broadly in Shuidongxiang.The lineage and elite maintained social order till earlier Republic of China.

Because there are many temples in Shuidongxiang, it is difficult to the discuss all of temples.The article argues that regional people divide into smaller group or organize bigger group depended on the Jinhua temple. The example of Jian Gan Lin Village show that temple is the center of village, which is the common village form in shuidongxiang.

Key words:

Sichuan-Tibet trade Tachienlo huguang tian Sichuan lineage

目 录

绪 论	7
问题和学术史.....	7
材料、方法和意义.....	16
第一章 明清鼎革与秩序重建	21
第一节 历史沿革和自然地理.....	21
第二节 团练自保与奉永历正朔.....	24
第三节 士家大族八甲杨氏兴起.....	35
第二章 农业社会里的族与国	48
第一节 陈氏、韩氏进入上里场.....	48
第二节 各老姓人群树立宗支碑.....	52
第三节 即宜忠亲与圣谕十六条.....	65
第三章 川藏贸易与五甲口场的崛起	70
第一节 雅州地区地位的凸现.....	70
第二节 五甲口场的崛起.....	81
第三节 陈氏引入生活新观念.....	93
第四章 茶道、市场与宗族成长	104
第一节 芦山岗茶道初步发展.....	104
第二节 僧人建桥及葬法改变.....	108
第三节 韩氏宗族的商宦之路.....	116
第五章 族权象征与世系重构	134
第一节 势力之家申建节孝坊.....	134
第二节 世系重构中的洪武现象.....	143
第三节 不同世系的联结与再造.....	147
第六章 生员、大族维系的四民社会	154
第一节 文字格式和文人祭祀权.....	154
第二节 公共事务与生员阶层.....	162

第三节 “麻城县孝感乡”的传播..... 184

第四节 清末地方秩序开始崩溃? 195

第七章 乡村建筑与民间信仰..... 211

第一节 桥梁、道教和建桥组织者..... 211

第二节 金花庙、子母庙和玉皇庙..... 219

第三节 箭杆林村的一般结构特点..... 239

结 论 244

论文参考资料 247

照片目录

照片 1 杨秀玉后人和杨氏宗碑	62
照片 2 原碣拓片	64
照片 3 五甲口场东头平水桥	81
照片 4 五甲口场西头福寿桥	83
照片 5 陈云吉和陈氏宗支牌坊	94
照片 6 陈永晖亭子碑	96
照片 7 芦山岗箭杆林茶道, 往芦山县方向	104
照片 8 长寿桥, 往五甲口场方向	106
照片 9 慧鉴和尚“塔”	113
照片 10 连五穴墓	114
照片 11 左如凤和尚碑, 右慧鉴和尚“塔”	115
照片 12 大水湾韩氏四合院主天井	124
照片 13 长柏桥处拐子窝, 往五甲口场方向	127
照片 14 陈家山陈翟氏节孝坊	135
照片 15 韩氏双节孝坊	141
照片 16 中和桥碑记和将军箭	215
照片 17 左四陈荣海、金花太子、左六陈国郑	221
照片 18 金华太子的尖脚花布鞋	234
照片 19 摩崖观音像	241

图表目录

图表 1 韩氏早期婚姻关系图	52
图表 2 上里张氏世系表	55
图表 3 苏洵《苏氏族谱》世系表	55
图表 4 杨氏宗支碑世系表	59
图表 5 杨氏宗碑世系表	62
图表 6 杨氏宗碑世系表 2	63
图表 7 打箭炉茶叶出口长期走势图	80
图表 8 韩氏世系表	122
图表 9 石板路韩氏四合院结构图	125
图表 10 名山县吊水沟陈氏宗支碑世系表	138
图表 11 郑氏宗支序所及迁徙路线简图	151
图表 12 韩腾蛟未分家前结构图	168
图表 13 韩述文后人世系表	171
图表 14 山边佛堂诸神格局图	219
图表 15 金花庙地理位置图	220

图表 16 金花庙会组织结构图	224
图表 17 金花庙建筑及诸神格局图	226
图表 18 箭杆林村 1、2、3 队地理位置图	240

表格目录

表格 1 八甲杨氏历次获得土地表	37
表格 2 康熙至乾隆朝水东乡士人统计表	68
表格 3 中央和地方出资表	75
表格 4 中央和各地区承担战费表	75
表格 5 各地区出资比列表	76
表格 6 南路、中路台站列表	78
表格 7 南路、中路接收军米表	78
表格 8 磐安桥与藏字石库出资比较表	176
表格 9 嘉庆朝以来水东乡士人统计表	184
表格 10 磐安桥、中兴桥出资人数比较	202
表格 11 中兴桥出资人姓氏结构表	203
表格 12 水东乡供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庙宇一览表	214

绪 论

问题和学术史

本文想通过考察明清四川雅安水东乡地域社会历史来进一步认识清代川藏贸易格局的形成过程。茶叶贸易是清代川藏贸易的核心，西藏消费的茶叶大部分来自四川省雅安、名山县、荥经县、天全、直隶邛州。大渡河以东的这五个州县是向西藏供给茶叶的主要地区，茶叶交易地点则在大渡河以西的打箭炉。

汉藏（番）间的茶马贸易源远流长。就明代来看，以茶易马主要在西北地区（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甘州、庄浪）和四川地区（黎州、雅州、碉门）进行。洪武年间碉门一度是以茶易马的重要地点，其地位与西北地区的河州相当。永乐以后，明政府的军用马匹逐渐主要来自西北地区，碉门虽也以茶易马，但马匹质量不如西北地区，加之番商辗转路途太远，马价过高，马匹数量非常有限。四川西部地区茶叶主要“易红纓、毡衫、米、布、椒、蜡以资国用”¹。

明政府使用的大量战马，需要用茶叶去换取。茶叶价格高低成为明政府军马购买力强弱的问题，严格控制私茶贸易，限制茶叶贸易规模，以求维持相对强的军马购买力，这基本上是明代茶马贸易的一个特点。明代的官方文献里有大量禁止茶叶走私的纪录，嘉靖年间四川雅州地区私茶盛行，连四川东部建始县的茶叶都溯长江而上，这导致官方一而再、再而三的禁止。这些情况表明，乌思藏方面的茶叶需求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供给，明代雅州地区茶叶生产并不旺盛。明代茶马贸易的特点限制着茶叶贸易的发展，在官茶与商茶、禁与弛的政策上，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清代对藏茶叶贸易重心在西南地区。顺治皇帝接受黄教，迎接五世达赖喇嘛于北京，以便降服信仰黄教的蒙古部落。清王朝控制疆域扩大后，四处设置马厂牧场，基本解决了军用马匹供应问题。与此同时，清王朝在西南地区进行征服战争，确定西南打箭炉这个新的茶叶贸易地点。中央王朝与青海蒙古诸部落、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深刻变化后，清王朝茶叶贸易不再与战马供给挂钩，这也是清代四川对藏茶叶贸易的基本特点。这种特点就决定了清王朝在四川地区保持着一种积极对藏茶叶贸易姿态，鼓励对藏茶叶贸易发展。

¹（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〇，志第五六，食货四，盐法、茶法，中华书局，1974年，第1948页

近代以来,关于清代川藏贸易研究成果丰硕。民国时期,傅嵩林《西康建省记》²、杨仲华的《西康纪要》³、任乃强的《西康图经》⁴、李亦人的《西康综览》⁵提及到川藏间的茶叶贸易。以《新亚细亚》⁶、《康藏前锋》⁷、《康导月刊》⁸、《西康经济季刊》⁹、《边政公论》¹⁰等刊物为代表,集中了一些研究四川边茶贸易的文章¹¹。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紧密围绕历代王朝如何治理边疆和如何维系边疆这个主题。谭英华先生对民国时期康定县城锅庄的经营形式作了详细探讨,指出康定县的锅庄主在汉藏茶叶贸易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¹²。建国以来,冯有志《西康史拾遗》¹³和雅安本地人有多篇关于民国时期边茶生产销售情况的回忆文章¹⁴,他们对茶叶收购、制作、运输诸环节多有介绍。这一时期较多地围绕汉藏民族具有悠久往来历史、茶叶贸易促进了汉藏民族关系发展这一主题¹⁵;有关茶树种植、茶叶生产和加工程序也有了专门的讨论¹⁶。回顾这些研究,它们多强调茶叶贸易制度,茶叶贸易对西藏的重要性,茶叶贸易对汉藏民族友好往来和王朝国家维系统一版图的重要性。近年来在省际旅游竞争和旅游开发

² 傅嵩林:《西康建省记》,《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094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³ 杨仲华:《西康纪要》,《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096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⁴ 任乃强:《西康图经》,《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第四辑,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7年影印版

⁵ 李亦人:《西康综览》,中正书局,1947年

⁶ 《新亚细亚》,月刊,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1930年南京创刊,后迁上海出版,1937年曾停刊,1944年7月复刊

⁷ 《康藏前锋》,月刊,南京康藏前锋社,1933年9月在南京创刊,1938年5月迁四川巴县,出战时特刊

⁸ 《康导月刊》,成都康导月刊社,1938年康定创刊,后迁成都出版至1944年

⁹ 《西康经济季刊》,月刊,康定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室,1937年1月创刊,1937年8月停刊

¹⁰ 《边政公论》,季刊,南京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1941年8月四川巴县创刊,原为月刊,1946年7月迁至南京出版,改为季刊

¹¹ 马裕恒:《川茶之概况及其对川康贸易之重大关系》,《康藏前锋》3卷4期,1935年12月,徐方子:《历代茶叶边易史略》、姚在藩:《有关经边大计之南路边茶》,分别载于《边政公论》第3卷11期,1944年11月,第4卷9—12期,1945年12月;白宗润:《边茶沿革简述及当前改进问题》,《西康经济季刊》13期,1946年8月

¹² 谭英华:《说“锅庄”》,《边疆通讯》,第一卷,第二期——第四期;或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川大史学专门史卷三,民族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8-251页。

¹³ 冯有志编著:《西康史拾遗》(上、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3年再版,内部报刊准印证甘孜字第103号

¹⁴ 刁车五:《雅安边茶概况》,《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内部发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1985年;雅安市民建、工商联:《雅安边茶的经营管理、制造和销售》,《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内部发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1985年;余孟荪遗稿:《南路边茶纪实》,《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内部发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1985年;

¹⁵ 四川省志民族志编辑组:《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1964年;曾文琼、杨嘉铭:《打箭炉锅庄考略》,《西藏研究》,1989年4期;鲁子健:《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1990年3期;贾大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2期;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西藏研究》,1995年2期;任新建:《论康藏的历史关系》,《中国藏学》,2004年4期

¹⁶ 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

背景下,“茶马古道”研究热使传统川藏茶叶贸易(以及滇藏贸易)研究得以延续¹⁷。李旭重走马帮路线去勾勒沿路风土人情与有关历史片断¹⁸。马存兆访问老人而撰写云南马帮马锅头的口述史¹⁹。杨绍淮、汪海鹰采访民国年间雅安地区至康定茶道上充当背夫的老人,对四川雅安等地茶叶背夫有较详细介绍²⁰。

以上研究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毋庸讳言,我们对四川相关产茶地区的地域社会了解甚少。从清代茶法的条文、打箭炉这个地点的商业贸易情况、茶叶生产制作的角度,或者重走一遍过去的“茶马古道”,是很难较全面认识川藏贸易的。四川相关产茶地区的茶叶不会自动跑到打箭炉去。抵达打箭炉的茶叶,至少要经过茶树种植、茶叶买卖、茶叶加工、茶叶包装、茶叶运输等几个主要环节。这些环节并不是由一类人(如茶叶背夫)就能完成的,人们也不会走相同的茶道(大渡河以西除外)。这些环节实际上是长年累月的生产与再生产、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过程,它是由四川相关产茶地域社会的人群共同完成的,包括农业人群、手工业人群、商业人群等等。而且,这些环节组成的社会运动过程也不会是产茶地域社会运动过程的全部。因此,从产茶的源头地区出发,在四川相关产茶地区选择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域社会进行微观考察,是本文考察明清雅安水东乡地域社会历史的基本理由。

地域社会研究首先是一种微观研究取向。所谓“微观研究取向”,主要是重视历史细节的讨论,而且这些历史细节常常不是有关帝王将相或者相对多的人知道的历史大事件,而是一些不见经传的人和零零碎碎的事,地方也不是大家熟知的大城市、大地方,而是一些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小地方、小地名。这样的历史细节的意义何在?在于它们能回答一些宏观性的问题!

采取整体史的眼光,才能让微观研究的历史细节回答一些宏观问题。本文之所以想强调“整体史的眼光”,在于它要求研究者要对自己所确定的时空范围有相当的熟悉和把握,需要仔细地梳理地方性知识及其内在联系。这种梳理过程,

¹⁷ 代表性的文章有: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3期;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4期;任新建:《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12月;代表性的著作有:沈生荣主编、赵大川、马晓俐编著:《图说晚晴民国茶马古道》,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刘勤晋主编:《古道新风——2006茶马古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他诸多文章及书籍,恕无法一一列举。

¹⁸ 李旭:《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¹⁹ 马存兆编著:《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²⁰ 杨绍淮:《川藏茶马古道》,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年;汪海鹰:《南路边茶及“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昌都部分)茶俗文化研究》,西南农业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是一种非常细节化但又需综合分析的工作：具体时间、地点、人物的某些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我相信，只有进行了这些梳理工作，我们才能看得清楚一个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才能够回答宏观问题。

基于地域社会研究的取向和理念，我们得考虑以下具体问题：四川相关产茶地区的茶叶生产者在哪里，这些茶叶生产者只种植茶树吗，市场在哪里并如何形成，通往打箭炉的茶道在哪里并如何形成，茶叶商人在哪里并如何形成？这些人群形成的地域社会在历史上是具体如何运转的，其延续性和变化性在哪里，形成了怎么样的地方秩序、乡村结构和民间信仰，其维持地域人群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共同性又是如何形成并表现？王朝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利益通过何种渠道在这些地域人群里有效互动？

这些相关问题前贤作过杰出研究，现做简要回顾。

关于市场的研究，加藤繁开启了研究中国清代市场的先河，他按省级行政所辖州县来区分市场，利用中国地方志对清代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村镇的定期市场做了专门讨论，他注意到州县地区市场数量与人口密度之间的关系，市场的空间地理距离、市场开市的日期，市场与附近村落数量之间的关系，市场中的交易物品和人，市场中的管理环节的牙行、斗秤人役以及课税征收问题，市场的设备和设立²¹。山根幸夫沿着加藤繁开创的道路，又对华北地区明清时期的市集做了考察，指出明代市集的设立者，城集和乡集多为知县，另一些乡集则由当地的绅士和实力人物设立，从管理上来看，城集由胥吏收税，乡集从本地实力人物中选出集头或集市老人管理，从收税与否来看，有官集和义集之分，市集的弊害——市棍、牙侩，市集上最大的实权者是豪劣、衿役（生员）以及他们的家仆，他们通过控制乡村上的商品流通而从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²²。

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施坚雅与日本学者研究市场采取分环节解剖式分析方法不太一样，他对四川成都部分地区作过连续多年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他更多地把市场结构（marketing structures）作为空间与经济体系（spatial and economic systems）以及社会与文化体系（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s）²³。关于中

²¹ （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64-100页

²² （日）山根幸夫：《明及清初华北的市集与绅士豪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册，明清，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1-370页。另外，（日）森田明：《清代湖广地区的定期集市》，《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雷国山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268-288页。

²³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文世界里的“市场”，在英文世界里，施坚雅使用 marketing 而不是 market，这提示我们，施坚雅更注重社会行为的分析研究，而不只讨论单纯的物理空间结构。在施坚雅看来，买卖行为所形成的市场结构，是处于这种结构中的地域社会其他社会行为的重要基础，它规定和塑造着市场范围内的社会组织，使大量的农民聚落形成单一的社会体系。施坚雅的市场层级理论认为，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ing）、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ing）、中心集镇（standard marketing town）、较高层次中心地（higher-level central places）是四个主要市场层级，从商品流动方向来说，在从上往下的商品流动中，农民所需的商品，一直会到达基层市场，地方上层人士需要的一些商品只会流动到中间市场，不会再下到基层市场，士绅官宦需要的一些奢侈品和工业品则只能在中心集镇里买到；在从下往上的商品流动中，农产品一旦进入基层市场，则由一直往上流动，这是施坚雅空间与经济体系思想的展开，它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省、府、州县行政架构的市场网络结构的观察方式。农民的婚姻关系多处于同一个基层市场，同一个宗族人群因为处于不同基层市场而可能走向分解，哥老会以基层市场为单位，庙会人群和游神也在基层市场之内，包括方言、传说，都有同一个基层市场的特点，这些看法正是社会与文化体系思想的展开。施坚雅在观察方式上并不排斥传统中国的行政架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层范围（middle range）的社会结构往往混合着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²⁴。

人口、土地、白银、商品，是清代市场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学术脉络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创刊）²⁵和《食货》（半月刊）（1934年创刊）²⁶。梁方仲先生和傅衣凌先生分别作为这两种刊物的撰稿人之一，代表了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既重视史观，又重视史料；既强调王朝典章制度研究，又重视地方社会研究；方法上重视经济学、社会学对历史研究的借鉴和利用²⁷。梁方仲先生较早注意到明

24, No. 1. (Nov., 1964)

²⁴ 同上，P43

²⁵ 193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²⁶ 关于《食货》的研究，请见阮兴：《〈食货〉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6月，TN15096；王文军：《食货学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以〈食货〉杂志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²⁷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代国际贸易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的大量白银流入闽粤地区²⁸，这是明代一条鞭法在南方迅速推广赋役折银和定量化的基本经济条件，其社会意义影响深远²⁹。傅衣凌先生注意到没有产生绅士的乡村社会，乡族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乡族”，乡即地域关系，族即血缘关系，乡族则是地域与血缘的关系³⁰。

道路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合社会的重要通道，亦是国家版图的重要维系物。以清代入藏为例，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藏程纪略》到清末的《炉藏道里最新考》、《三省入藏程站纪》³¹，从乾隆末年的《卫藏通志》到光绪十二年（1886）的《西藏图考》，无不关注入藏以及藏内的道路路线。过往史家亦大多重视道路的研究。从文献的角度，全汉升先生（1943）认为唐宋帝国的兴亡与运河有密切关系，提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命题³²；蒙文通先生（1958）考证，秦灭蜀前四川就有通往南中（交趾）的古道路，分别从成都至临邛（邛崃）出邛都（西昌）和从成都经犍道（宜宾）至南中³³。严耕望先生（1985）则专文研究唐代交通，指出唐代雅州西通土番的路有三条，灵关、碛门、始阳³⁴。从实地考察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任乃强先生（1939-1940）考察了川康间大渡河要冲泸定县，对川西经泸定过大渡河至打箭炉的路段考证较详细：

川康间之交通，分为两道，北自雅州经碛门（天全）<上山下严>州（岚州）瓦斯沟入打箭炉。有时亦自<上山下严>州渡烹坝，由大冈入炉，曰雅州路。南自汉源逾飞越岭经化林坪、沈村、咱威、磨西面、雅加埂，为黎州路。中间唯自瓦角渡紫牛，为自南路斜合北路之小道。沈村、紫牛、烹坝三渡，称为泸河三要津，此外皆非要冲，安乐坝僻在一隅，无人注意。³⁵

邓少琴先生（1944）以大小金川沿河的碉楼、风俗和语音作为证据，认为清代从木雅乡搬至打箭炉的明正土司，是西夏国王族后裔。³⁶李范文先生（1980）

²⁸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梁方仲文集》，刘志伟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²⁹ 刘志伟：《梁方仲文集》导言，刘志伟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³⁰ 陈春声教授课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一讲课堂笔记，2007年9月16日

³¹ 请参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³²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稻香出版社，第265-391页

³³ 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路线考略》，《蒙文通文集》·第四卷·《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第184-195页

³⁴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 山剑滇黔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第1259页

³⁵ 任乃强：《泸定考察记》，《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³⁶ 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下册），巴蜀书社，2001年，第752-767页

亦对西夏遗民迁徙路线作了长途实地考察。³⁷以上研究,无不对历史上的道路、路线充分重视并基于此展开讨论。

市场研究采取区域研究取向方能深入。研究历史采取分区域进行,较早由陶孟和先生、汤象龙先生提出。³⁸高王凌先生在加藤繁开辟的研究范围内对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作过考察³⁹,其考察的范围为“川江流域的十六个府州、一百二十个州县(成都府、邛州、眉州、嘉定州、资州、叙州府、泸州、重庆府、顺庆府、潼川府、绵州、龙安府、保宁府、绥定府、忠州、夔州府),大体上相当于地理上的四川盆地”⁴⁰。施坚雅(1985)认为,中国历史存在一种“结构”,那就是经济中心在中国几大经济区域里流转,对每个经济区域而言,也就存在波浪式起伏的周期,这种有周期的几大经济区域构成的整体,就是中国历史兴衰的“结构”⁴¹。王永年先生、谢放教授对近代四川市场进行讨论⁴²,相对重视长江水系作为商品运输网络的作用,着重考察重庆开埠对四川地区商品流通和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在施坚雅开辟的研究范围内,王笛教授对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市场网络”⁴³也做过考察。陈春声教授根据广东粮食总产量与总需求的差额,来讨论清代广东省与闽、赣、湘、桂的省际米粮贸易及省内米粮运销形成的社会机制⁴⁴,这一研究并不囿于地理地形范围与行政区划,并逐渐重视历史上的社会机制问题。刘志伟教授对明代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开辟了制度史研究的新道路,那就是重视制度在社会中具体如何运转,其变革的社会原因、依赖的社会资源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又是怎么样的⁴⁵。

以上研究为本论文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理论和具体研究的典范。在川藏贸易研究方面,我们对茶引制度规定下的川西茶道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官方规定的雅安县经荣县过泸定至打箭炉这条官道上,以及天全碛门过大渡河至打箭炉这条传统茶道上。尽管我们也知道大渡河以东存在很多四通八达的小道,但是我们对这种

³⁷ 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0-278页

³⁸ 陶孟和、汤象龙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二卷二期,明清档案专号,编者导言:“学者便不得不分工,各从事于限定的区域、年代或专题的研究。”

³⁹ 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0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⁴⁰ 同上,第74页。这段引文把原文中的脚注内容加入到相应位置,特此说明。

⁴¹ G. William Skinner: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4, No. 2 (Feb., 1985), pp. 271-292

⁴² 王永年、谢放:《近代四川市场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1期

⁴³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第四章

⁴⁴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⁴⁵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较小茶道的形成和状况了解甚少。在市场的研究中，商品流通的研究份量很重，即使有商人方面的研究，但我们对某个具体市场和商人所在的地域社会情况了解较少。

把市场置于其所在地域社会来讨论，这种趋势既有民国以来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又有近二十年来乡村研究者和地域社会史研究者带来的新启示。

山田贤对清代四川东部地区（云阳县）的社会历史脉络进行过相当地梳理与研究，他探讨了白莲教在川东爆发的社会机理⁴⁶。山田贤主要以云阳县为例，考察了清初大规模移民进入云阳县后，这些移民经历了获得土地并定居、形成了同姓村落、同乡联结——会馆、同族联结——宗祠、地域社会的联结——镇等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的分化，白莲教通过客贩小商人四处赶集来秘密传播与组织动员，白莲教在下层民众中开始广泛传播。山田贤把白莲教的爆发，部分归因于人多地少的现实情况。黄国信教授对湘粤赣交界地区的食盐贸易研究表明，尽管有食盐专卖制度的规定，但其在民间社会实际运行远比条文复杂得多，特别是关于“区域”的观念，是一个地域社会运转和历史建构的过程⁴⁷。张应强教授对贵州清水江流域的研究表明，地方木材市场形成区域市场网络以及这个市场网络被纳入到全国性市场体系的过程，既是王朝国家势力渐次进入“苗疆”的过程，又是“苗疆”社会相应应对而迅速被纳入到王朝国家体系之内的重要动因⁴⁸。

宗族是传统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素为史家所重视⁴⁹。科大卫教授（1986）对香港新界的乡村研究表明，以祠堂、庙宇、土地神为中心的集体崇拜（collective worship）都是地域联盟的标志，不同村落人群虽各有侧重地围绕不同中心活动，但是祠堂、庙宇、土地神都是地方组织赖以活动的重要载体⁵⁰。乡村中区分人群的方式就是通过哪些人有份能参加哪种中心的活动。乡村能否发展为市镇，则在于外来者能否获得乡村入住权⁵¹。在逐渐重视乡村庙宇的基础上，郑振满教授对莆田江口平原研究显示，江口神庙（村庙）由明代里社演变而来，它既是宗教组

⁴⁶ （日）山田贤：《移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5年

⁴⁷ 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承蒙黄国信教授惠赠，特此感谢。

⁴⁸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

⁴⁹ 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5期

⁵⁰ David F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⁵¹ 同上，p30-44

织，又是社区组织⁵²。陈春声教授对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表明，神庙的建立、更替与巡游，实际反映了人群势力的消长，是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以及社会心理的多重叠加⁵³。

基于儒家祭祀礼仪的改革，明代以祠堂为标志的宗族形态开始扩散于江南、江西、福建和广东等地⁵⁴。郑振满教授认为，应把这一社会变迁放入到宋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即宋明礼仪变革的历史中来考察⁵⁵。在这一长时段中，陈春声教授注意到“宋代的潮州乡村，基本上是一个以佛寺为中心的社会”⁵⁶。科大卫教授同意竺沙雅章的看法，宋代平民不建庙来祭祀祖先，而把祖先的画像、泥塑像或神主牌供奉在佛寺里，科大卫还注意到，从宋到明，在广州祭祀李昂英的祠堂从官方修建祭祀，后来演变到李氏宗族修建与祭祀，这一过程是家庙式祠堂演变历程的一部分⁵⁷。刘永华教授注意到明清时期的礼生，在王朝各种礼仪场合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儒教通过王朝礼仪向民间礼仪渗透的重要渠道之一⁵⁸。科大卫教授试图通过宗教拜祭的仪式，去探求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他提醒研究乡村社会历史的研究者一定要打破文字资料的限制，注意口述资料、风俗乃至乡村的建筑所遗留的历史变迁痕迹⁵⁹。

如果把以上研究作一个概括的话，刘志伟教授提出的“地域社会是一个文化结构过程”⁶⁰，是一个恰当的总结。传统王朝国家通过至上而下的、由北而南的军事征服与道德教化，这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地方人群如何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文化符号（词语）进行开发与控制土地、构建宗族以在竞争中获得有利位置、地方神明信仰和仪式展演如何体现王朝政治秩序以获得生存、发展并维护地方秩序等等。这是一种站在地方社会的历史现场至下而上的思考和观察方式。地域社会的文化结构过程则是这两方面的复杂互动。

⁵²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1期

⁵³ 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清史研究》，1999年2期

⁵⁴ 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⁵⁵ 郑振满：《宋明礼仪变革与乡村社会研究》，《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研究讲义》（草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8年1月

⁵⁶ 陈春声：《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⁵⁷ 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研究讲义》（草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8年1月

⁵⁸ 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2008年，第245-257页

⁵⁹ 科大卫：《神、鬼和祖先：从香港新界乡村调查所见明清乡村社会的演变》，《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研究讲义》（草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8年1月

⁶⁰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1期

本文尝试在四川相关产茶地区内选取了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在众多而又漫长的茶道中选择了一小段茶道及其地方市场,再把道路和市场组成的“道路——市场网络”放入到地域社会里来观察。

材料、方法和意义

清末革命思潮涌动以来,梁启超先生相继于1901年、1902年发表了《中国史叙论》⁶¹和《新史学》⁶²两篇文章。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里说,“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⁶³。在提到新旧史学的区别的时候,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列了四个方面,前两个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⁶⁴显然,梁启超先生主张从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叙述,转向叙述大众的历史、“群体”的历史。此种主张尽管带有改造当时现实社会的政治目的,不论后世史家是否同意其主张,但多数近代史学史的书籍都会提到他的这两篇文章和相关话语⁶⁵。所以,近代史学的新与旧,便以梁启超为

⁶¹ 《清议报》,1901年9月3日、13日

⁶² 《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⁶³ 《中国史叙论》,第一节,史之界说,《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48页

⁶⁴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737页

⁶⁵ 对梁启超先生持不同主张的,如钱穆先生。他在《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5-6页)序里,说,“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为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曰‘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曰‘考据派’。”钱穆先生虽未点名,但以其标准衡量,梁启超先生无疑是属于革新派的,也就是宣传派的。而钱穆先生批评革新派“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将束高阁,覆瓿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也”。钱穆先生这样的批评,正是针对梁启超先生主张用新史学,以培养国民性的论点。梁启超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后钱穆先生也集结出版一部同名然而主旨不同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其用意似在纠正梁启超先生以来的某些主张。对梁启超先生持相同主张的,如王玉璋先生。他在《中国史学史概论》(1944年版,第142页)“近世以来,我国史学界,以受东西方文化接触之影响,呈一新局面。此新局面之中,历史观点之改变,为一重要事态。且为促进史学之重要动力焉。考此改变之情势,可得较为重大者数端,分陈之于下。第一前此旧史仅为供少数人群之读,应改为足供全民之读也。梁启超先生于其历史研究法中曾论之曰‘私家之史自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如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1941年最早出版,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5-366页)中,在论述清代史家之成就时,把清代史学分为三期,“第一期多治现代史,以研讨明代事迹为本位,如黄、万、全、吴、潘诸氏皆是。……治史之士不敢再谈现代,于是第二期转而治前代史,有为文字之考订者,如钱大昕是,有为典制之阐发者,如王鸣盛是,有以史证史而为属辞比事之学者,如赵翼是,有就书籍部次而为著述校讎之业者,如纪昀是,而研治之史,多属古代,而自宋以下则不甚详言也。泊乎嘉道以后,中国多故,外患日深,远识之士,引以为虑,于是第三期又移其考前代之,转而治边疆史,如徐松、张穆、何秋涛、丁谦、曹廷杰、洪钧、屠寄皆其著者。诸氏初则究心西北史地,继乃覃及东北,更进而治蒙古全部之史。凡此皆随时人之好尚,世势之推移,而异其治史之的。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不惟清代如是,古代亦莫不然。”金毓黻先生论及新史学时,说“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

界限，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⁶⁶。王汎森教授注意到《新史学》里重视四个在传统中国很少出现的词汇：国家、国民、群、社会⁶⁷。“不管国粹派或立宪派，不分‘无史’论者或‘有史’论者，他们最后都隐然认定历史应该是‘民史’，是‘公史’，是‘社会史’，是群体的历史，这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关键的影响。”⁶⁸随后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先生也主张“平民的眼光”。王汎森教授认为胡适先生的主张“其重点由过去的精英文化变成历代平民百姓日用习闻的东西”⁶⁹。

梁启超先生使用近代日本的词汇“社会”（其背后有一整套社会学理论⁷⁰）来提倡“新史学”以来，史学从观察对象到叙述对象的转变，非常明显。对中国社会历史考察与研究，对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乃至他们的感情世界的了解与叙述，是新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社会史大论战、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讨论⁷¹以来，目前我们依然处于社会史学的潮流之中。

在此史学潮流的影响下，本文所用的材料多来自水东乡实地调查收集，包括宗谱、匾额、碑刻、石刻塑像，民间礼仪文书、歌谣、乡民口述。水东乡历史文献（除宗谱、匾额之外）主要有三个保存地点：桥梁、墓地、庙宇，其质地多为石料。

就宗谱而言，本文主要使用了中里八甲《杨氏宗谱》（以杨桂芳为起祖），上里《韩氏宗谱》（咸丰版）。按照明儒陈白沙的标准，这两部宗谱应为“良谱”，它们的内容较为详实，分别涉及到明末清初和乾隆以来的重要历史转变，这是本论文叙述时间能够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基本原因。中里《郑氏总宗谱》、上里《杨氏宗谱》（以杨银炉为起祖）和上里《陈氏宗谱》，则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轨迹。

也……至梁氏所谓新史之创造，基本条件有三，一曰史以生人为本位，二曰史应近于客观性，三曰史学范围应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第386-387页）吴泽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1989年版，第495-525页）里亦提到晚清以来国势衰微，面临亡国灭种的现状，梁启超先生重提龚自珍、魏源的“经世致用”口号，主张新史学。

⁶⁶ 尽管对近代史学史有不同划分标准和评价标准，但梁启超作为某个坐标的地位，都无法忽视。持不同标准的以以下两本书为代表。然而他们依然绕不过梁启超。《中国史学史纲要》一书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真正开端，应以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的刊布为标志”。（第361页）

《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说：“在这两部著作中（注：指《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对他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提出的‘新史学’理论，作了完善和补充，大大丰富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影响极为深远。”（第276页）

⁶⁷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⁶⁸ 同上，第30页

⁶⁹ 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⁷⁰ 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期

⁷¹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6期

有的宗谱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清末民国的革命和社会混乱、解放后文化大革命而能保存至今，弥足珍贵。保存于乡民手中的宗谱是活着的文献，它们与乡民血脉相通，翻阅这些文献总感到它们会呼吸，会说谎，会骗人，有喜怒哀乐。民间礼仪文书能够保存流传下来，亦为不易。我在翻阅这些文献的时候，心里常常充满了敬畏之心，对保存这些珍贵文献的乡民表示万分感激之情。

本文使用了较多的墓碑、宗支碑的材料，并多按原墓碑文格式加以引用。其原因在于，水东乡历史文献的保存地点，更多的是在墓地。我考察了上里陈氏、上里许氏、上里韩氏、上里张氏、上里杨氏、墓碑的质地、造形、图案与地点所透露的重要信息，有时远远大于刻于墓碑之上的几行文字（如白马泉寺僧人葬法的改变），而墓碑上的文字格式变化，可能也是时代变化的一种生动反映（如宗支碑的出现）。墓地里的每一件文字材料，基本都是对应着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这些藏于深山僻处的坟墓，虽然或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或在杂草丛生的荒林，远离人世，静静伫立，墓碑满身青苔，字迹湮灭，甚至只剩残碑断碣，然而它们又与现在的人群密切相关。墓地材料也是与各家宗谱互证并讨论人们重构历史记忆的第一手材料（如“麻城县孝感乡”的传说）。

在水东乡，文字还存在于匾额和摩崖石刻之上。水东乡保存至今的匾额分两种，一种是木制匾额，镶嵌（或挂）于木结构房屋正门上，一种是石质匾额，出现于墓地。这些匾额可以成为我们判断房屋建筑时间，并能据此探讨拥有匾额的人家与匾额题字人之间的某些关系（如孙士毅题字）。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认识水东乡的社会经济变化。水东乡的摩崖石刻，基本上分布在寺庙周围以及茶道沿线。摩崖石刻上的文字并不是摩崖石刻的主体，它们是附属于摩崖石刻的神像。因此，引用摩崖石刻文字时，我加入了相应的摩崖石刻照片，以便于较全面理解这些文字（如箭杆林村摩崖观音像）。

歌谣本是口耳相传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心声表达，这些歌谣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反映，是理解乡民日常生活和情感的重要钥匙，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水东乡山歌非常之多，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很多并不识字）能够开口就唱，还能现场编唱当代山歌。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辈学人主持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学收集工作，雅安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仔细收集了雅安市范围内的歌谣，并注明了这些歌谣由谁唱，唱者性别、年龄和居住乡

村地址,以及收集者的姓名。水东乡相当多的重要歌谣被收集进了这部油印册子,成为了可供流传和研究的文本。这些歌谣是我们了解过往时代生活的重要资料,本文亦有限地使用了这次收集歌谣的成果(如《三更五点树发丫》)。

乡民口述资料的研究价值,差不多与民间歌谣相当。其不同之处在于,民间歌谣本身不是为收集者而创作的,乡民口述(包括故事和叙述)部分是针对倾听者叙述,其叙述者针对倾听者的主观意识较浓。不过,乡民口耳相传的故事,其对我们认识过往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作用,比如上里韩氏关于其祖先搬入水东乡的故事,这是仅凭现存文字材料无法探明的问题。乡民针对倾听者的叙述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纪录,如中里金花庙的复兴过程。本文亦相当程度地利用了乡民口述资料。

在水东乡,我们对茶道和市场的认识,有赖于讨论庙宇碑刻、桥梁和市场范围内的民居建筑形态及其他建筑形态(如节孝坊)。桥梁所处的地理位置、桥梁的规模、结构和外观,与记录于建桥石碑上的文字同样重要,这是本文引用桥梁文字时尽可能提供桥梁照片的原因(其它建筑形态同样如此)。本文尽量保持水东乡原始资料的完整性,引文尽量呈现资料的全貌,如桥梁碑记一并抄录部分捐资建桥者名单。通过这些完整的材料我们能看到人群间的关联性(如黄天星既参加修平水桥,又参加修长寿桥;长寿桥与复兴桥为同一石匠所修,这无疑反映了商业社会的蓬勃建设事业)。因为人群的活动,区域史不仅仅是地方史,本文亦注意到同时期水东乡以外的相关资料的运用。⁷²

材料的收集和获得,与研究方法差不多互为因果关系。材料的类型会影响到方法的选择。另一方面,方法的选择又会影响到材料的类型。

“地域”概念的提出者森正夫(1992)在反省地域社会论时,指出“缺乏历时性的研究以及作为‘场’的一环国家问题的具体检讨不足”⁷³。陈春声教授指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⁷⁴。“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应努力把传统中国社会研究中社会历

⁷² 黄国信教授在学术探索历程中有过关于“地方史”和“区域史”的长期思考,本文亦深受他转引刘志伟教授话语的影响:“区域是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的”。(黄国信:《“鸡零狗碎”、学术对话与其它》,《博览群书》,2007年3期)

⁷³ 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⁷⁴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8期,第8页

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学术风格结合起来,通过实证的、具体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尽量回到历史现场去。”⁷⁵这种“内在脉络”,正是森正夫“历时性”一词更为完整的理论表达。黄国信教授、温春来教授、吴滔副教授就如何观察和研究“历史的内在脉络”作出了具体理论表述,提倡“既强调时间与过程,也重视空间与结构,既讲究史料的分析考辨与校释,也注重‘参与体验’,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以及历史现场感,并强调分析各阶层、团体的不同历史表达”⁷⁶。这种历时性叙述与结构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主张,是在总结了近几十年市场研究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可行的理论方法。正如科大卫教授所言:“以这种方法书写中国历史,不知还能维持多久,时间恐怕不多了。明清时期的社会建构的伟大成就,还有痕迹保留至今,还能让当代历史学家看见。当代历史学家应该感到幸运,把握这个机会,写出明清时期的社会建构的历史,应该是当代历史学家的责任。”⁷⁷

本论文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之际四川本地人群并没有中断的社会样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源源不断的川茶入藏的社会机制,有助于我们观察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对四川本地人群的影响过程。

⁷⁵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或见于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丛书总序,第2-3页

⁷⁶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5期,第59页

⁷⁷ 科大卫著、卜永坚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第一章 明清鼎革与秩序重建

本文选择的研究地点为四川雅安水东乡。雅安在大渡河以东、邛崃山脉以西的青衣江上游，在成都以西 415 里（按照清代官方道路计算⁷⁸），在打箭炉以东 630 里⁷⁹。本文所及的水东乡主要是目前的上里镇、中里镇和下里镇（今改为碧峰峡镇。为行文方便，上里镇、中里镇、下里镇统称水东乡）。目前上里镇的人口为 11701 人、中里镇 12750 人、下里镇 10933 人⁸⁰，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里场、中里场和下里场，场期分别为公历 1、4、7 赶中里场，2、5、8 赶上里场，3、6、9 赶下里场。

有必要先对大渡河以东的王朝历史以及水东乡的历史沿革和自然地理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节 历史沿革和自然地理

唐代以来，内地与吐蕃的茶马贸易逐渐开始兴盛，大渡河是汉番之间的天然界线。宋代在雅州和黎州（时为黎州汉源郡）进行茶马互市交易，《蜀中广记》中记载了一条宋太祖“玉斧画河”的传说：

宋初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嶲，藝祖以玉斧画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为黎之极边。昔时河道平广，可通漕船，自玉斧画后，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瀑，从空而落，舂撞号怒，波涛汹涌，船筏不通，名为噎口。殆天设险以限中外也。⁸¹

建隆三年为公元 962 年，到了政和（1111—1118）末年，有人又建议在大渡河以外设置城邑，黎州知州宇文常以太祖画河为界的故事来阻止了这个建议⁸²。“玉

⁷⁸ 曹抡彬、曹抡翰纂辑：《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十三，西藏路程，《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二十八号，成文出版社，1969 年影印，第 330 页

⁷⁹ 曹抡彬、曹抡翰纂辑：《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二，疆域，打箭炉，《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二十八号，成文出版社，1969 年影印，第 48 页

⁸⁰ 据 2008 年统计数据。赵志雷主编：《雨城年鉴 2008》，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政府，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年，第 351 页、366 页、374 页。承蒙赵志雷局长惠赠《雨城年鉴 2008》，特此感谢。

⁸¹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591 册，第 457 页

⁸² 刘大谟等：《四川总志》（嘉靖二十年），卷十五，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2，史部，地理类，第 290 页；“宇文常，政和末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访常。常言，太祖观蜀地图，

斧画河”的传说在后来被广泛引用⁸³。无疑，这反映了宋代的实际管辖范围没有越过雅州以西和黎州附近以南（均以大渡河为界）的事实。1253年忽必烈自甘肃临洮（今甘肃临洮县）出发，率领中军进入今四川阿坝草原，沿着大渡河南下，征服了大渡河沿岸的地方，并在这里设置了土司⁸⁴。明代与乌斯藏的茶马贸易，仍在黎州（黎州安抚司及大渡河守御千户所所在地）⁸⁵互市，另一个互市地点，则从雅州（直隶上南道，茶马司所在地）西移到了天全碛门（茶课司所在地），在碛门建立茶仓互市。洪武二十一年（1388）互市地点再往西移到了岩州，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茶叶的价格，降低马价⁸⁶。洪武二十二年（1389）甚至有人提出把雅州的茶马司移到岩州，但并没有得到批准⁸⁷。从唐代到明代洪武时期，茶马互市地点不断西移，反映了王朝势力不断西进的历程。

雅安在明代称为雅州，雅州“洪武四年归附，降司，仍为雅州，省严道县入州，隶四川布政司，属川南道”。⁸⁸不过，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雅州也被称之为雅安⁸⁹。水东乡在雅安的东北面，距雅安县城约50里。

水东乡最早有文字纪录的地方在今天的白马泉寺。白马泉寺里最早的碑文为南宋乾道元年（1165）的石碑。这通碑文显示，今天白马泉池的泉眼在南宋绍兴（1131-1162）初年被赐爵为“渊泽侯”，“渊泽侯”属于名山县管辖，雅州到“渊泽侯”的道路必须经过名山县，“渊泽侯”附近的“天公院废已久”。明代永乐八年（1410）僧人慧明在天公院的庙基上又重新修立寺院，取名为“天公寺”。弘治十八年（1505），雅州知州到白马泉求雨，灵验后在白马泉池旁树碑一通，时人已把这片土地叫作“罗绳”⁹⁰。

水东乡成立的准确时间不详，据法华寺道路旁的摩崖石刻显示，正德十五年（1520）已出现“四川雅州水东乡罗绳上里”⁹¹。嘉靖十年（1531），水东乡全里人户在里正杨景茂的带领下，在白马泉池旁树立一通《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

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邑，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乃止。”

⁸³ 如（乾隆）《雅州府志》、（嘉庆）《四川通志》

⁸⁴ 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年版，第51—54页

⁸⁵ 刘大谟等：《四川总志》（嘉靖二十年），卷十五，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2，史部，地理类，第287—288页，黎州安抚司，“宋属成都路，元属吐蕃等处宣慰司。洪武八年省汉源县，改为黎州长官司，十一年升黎州安抚司，并置大渡河守御千户所，隶四川都司，属川南道。”

⁸⁶ 《明实录》（太祖实录，四），卷一百八十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2824—2826页

⁸⁷ 《明实录》（太祖实录，四），卷一百九十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2950页

⁸⁸ 熊相纂修：《四川志》（正德刊刻嘉靖增补本），卷二十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善本

⁸⁹ 请见附录《雅州罗绳白马泉渊泽侯碑文》

⁹⁰ 请见附录《雅州罗绳白马泉渊泽侯碑文》

⁹¹ 请见第三章，第二节，正德十五年法华寺摩崖石刻

梵刹碑记》，这通碑文中共刻有 24 个僧人名字，90 个俗人名字，杨姓占多数，其中两个杨姓家庭的名字列了出来。白马泉的信仰影响范围已经很大了，“自古嘉、眉、邛、雅近属县疆□□□□祈祷”。万历三十三年（1605），天空寺（即天公寺）僧人重修殿阁庙宇，新塑佛像，又刻一通石碑，僧人名字共有 24 个。可见，明代天公寺是一个大寺院，僧人名额为 24 人。目前保存于白马泉寺的明代僧人舍利塔共有 60 余座⁹²。

乾隆初年，“水东乡辖里十五，河北、包陈、七盘、上黄村、中黄村、下黄村、上里头、上里二、上里三、上里场、中里头、中里二、中里三、中里四、中里场、下里头、下里二、下里三、下里四、下里场”⁹³。民国十二年（1923），水东乡已被分成了两个区，“水东乡今改二区，北一区其著于籍曰太平乡，分太平场、河北、包城、沙湾、七盘、上黄、下黄、中黄，为村集者凡八。北二区其著于籍曰中里乡，分三益场、中里场、五甲口场、下里一、下里二、下里三、下里四、中里一、中里三、中里四、上里一、上里二、上里三，为村集者凡十二”。⁹⁴也就是说，民国十二年中里乡的范围，相当于明代水东乡的范围，民国十二年（1923）的中里乡和太平乡的范围，相当于清代水东乡的范围。

中里乡和太平乡部分地区在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曾短暂地（三个月）当过张国焘所率红四方面军的补给地⁹⁵。中里乡在红四方面军控制期间，各处留下了大量的红军标语。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二十二日，刘文辉率西康建省委员会成员迁至康定（即打箭炉），民国二十八年（1939）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⁹⁶。中里乡隶于西康省雅安县。

水东乡的主要地域范围四面环山。水东乡西面的芦山岗，从北到南绵延约 40 余里，其山峰海拔在 1786 米至 1971 米之间⁹⁷，山凹部分的海拔约在 1300 至 1400 米；水东乡东面的罗绳山从北到南绵延约 40 里，最高峰为 1440 米⁹⁸。芦山

⁹² 《雅安第一禅林——白马泉寺》，曹宏、赵彤撰：《雨城古刹》（金风寺当家真勇惠赠）（笔者注：无出版信息），第 59 页

⁹³ 曹抡彬、曹抡翰撰：《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之三，乡里，《中国地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廿八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年影印，第 72 页

⁹⁴ 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一，村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4 册，第 303-304 页

⁹⁵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年，第 243 页

⁹⁶ 冯有志：《西康史拾遗》（上、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3 年再版，内部报刊准印证甘孜字第 103 号

⁹⁷ 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00 页

⁹⁸ 同上

岗与罗绳山之间相距约 20 里，中间的平原地带的海拔在 800 至 900 米。翻过东面的罗绳山，就逐渐进入成都平原。从地理地形来说，水东乡处于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过渡的横断山区的东部边缘地带⁹⁹。

水东乡所在地域位置的年平均气温在 13℃ 至 16℃¹⁰⁰，一月份的平均温度在 4℃ 左右，七月份的平均温度在 21℃ 至 24℃ 之间¹⁰¹，全年无霜期在 250 天左右¹⁰²。水东乡一年四季多雨潮湿，秋绵雨和夜雨率非常突出¹⁰³。据我访谈所知，当地人群的地方病为风湿病和关节炎，农历的四五月份（有时是七八月份）有阵性大风。

第二节 团练自保与奉永历正朔

让我们把视野重新拉回到明代末年，看看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动乱如何波及到水东乡的，水东乡人又是如何应对这些社会动乱的。

崇祯七年（1634），陕西流民进入四川东北境内，巴州、云阳等州县民人开始聚众起义。崇祯十年（1637），李自成入蜀，活动于四川东北广元一带¹⁰⁴。处于川西偏远山区的水东乡依然太平。崇祯十一年（1638），水东乡僧人普慨树立了一座土地祠¹⁰⁵，并刻碑¹⁰⁶如下：

神来。开山十子普慨，发心乃于崇祯拾壹年七月初七日巳时，笠本山土地祠一所。石匠成都府 民

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十余万人在川东巴州、巫山、梓潼活动。雅州地区俨然是稳定的大后方，还不断给成都供应粮食。李蕃记载：“崇祯庚辰十三年，流贼昌炽，州侯陈士献莅任，发预备仓谷米，运粮省城交纳，士民苦之”¹⁰⁷。

⁹⁹ “邛崃山位于岷山之西南，亦大致南北向，是大渡河与岷江的分水岭，南接大凉山，构成横断山区（广义）北部的最东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横断山区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33 页）

¹⁰⁰ 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06 页

¹⁰¹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横断山区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3、44 页

¹⁰²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横断山区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9 页

¹⁰³ 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10 页

¹⁰⁴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五，中原群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6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974 页

¹⁰⁵ 这座土地祠就是白云庵的前身

¹⁰⁶ 2009 年 2 月 15 日拍照并抄录

¹⁰⁷ 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 090 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9 页。李蕃，雅州文生，明末清初亲历种种磨难，《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是他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追纪而成。据该书记载，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李蕃参加贵州孙可望开科取士的考试，科场设于嘉定州，李蕃入学。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李蕃参加清政府设于保宁府的乡

崇祯十四年(1641)张献忠出川入楚,后“会闯贼于河南”¹⁰⁸。这年正月成都开始民变。费密记载:“成都民变,变始于彭县,新繁效之,后遂遍各州县”¹⁰⁹。雅州也随之骚乱,“辛巳十四年,打衙毒。百姓各执枪棒进城,拆毁衙役房屋,打死蠢役数十人,上南州县处处皆然。州县官惟闭署坐,上司委上南道和解之”¹¹⁰。“上南州县”,即上川南道各州县,“嘉、眉、邛、雅为上川南,嘉接叙,雅接大渡河所至建昌五卫”。¹¹¹雅州城内发生直指衙门衙役的暴动,“州县官惟闭署坐”。崇祯十五年(1642),“流贼聚数十万众到白水,调雅所官军,并董卜御寇。雅千户所廖死之”¹¹²。董卜,即董卜韩瑚宣慰使司,《四川通志》载:“永乐间建立董卜韩湖等宣慰使司、杂谷等安抚司,于吐番境内以统番部,其俗尚异端。”¹¹³明末四川动乱,四川周边土司都打着支持明王朝的旗号。

杨秀玉武装保卫水东乡

崇祯十六年(1643),上川南道各地针对府州县衙役的骚乱,逐渐转向劫掠那些本地为官、敛财暴富的“富户”。李蕃记载,“打衙毒之风渐炽,因岁饥,转掠富户。凡土官之积厚者,皆被其害,如邛州之杨天官,毁其厅堂,掠其财物,如山之富,不待贼至而乌有矣。由是调董卜剿杀,掳掠之苦,洪雅为甚。董卜,土官也,以蛮夷而杀百姓,世运可知。州侯王国臣,凡董卜掳掠之子女男妇,尽

试。康熙五年(1666)、八年(1669)、十一年(1672),李蕃参加乡试。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蕃“无科场之志”。李蕃在培养地方后学方面贡献突出,光绪十八年(1892)《名山志》有其传,其内容来自李蕃“家谱”,与《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核对,大部分内容相符。《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版本和流传情况不详,中山大学图书馆五楼古籍部收有抄本。该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内容涉及到明末清初各地武装力量在雅州地区的争夺,包括张献忠谋杀四川应试士子、雅州士子因郝孟旋中途拦截解救而幸免于难的纪录。任乃强先生当年做《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一文时,收集了上百种史料,但他也没有提到这部书(请见《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119页)。

¹⁰⁸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五,中原群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983页

¹⁰⁹ 费密:《荒书》,《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大学图书馆编,成都:巴蜀书社,第29册,第484页。《荒书》为清初费氏家藏秘籍,据费密长子费锡琮言,徐学乾亦辗转托人求看此书,费密“别以纪奢寅乱蜀事与之”。(《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大学图书馆编,成都:巴蜀书社,第29册,第498页)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费密字此度,清初诗人,与孙星衍、王渔阳等以诗文相敬重。家为新繁大姓,父子皆名士,任侠,为乡里所重。《荒书》有康熙六十年席帽山人史照序。这是作者自记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资料,这类史料属于第一手资料。(《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113页)

¹¹⁰ 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090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¹¹¹ 费密:《荒书》,《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大学图书馆编,成都:巴蜀书社,第29册,第480页

¹¹² 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090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¹¹³ 黄廷桂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雍正七年始修,雍正十三年完成),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560册,第13页

数追取发回原籍，此亦仁人之善政也。”¹¹⁴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北京被攻破的消息一时还没有传到四川来。八月，张献忠攻破成都，国号大西。省城成都被攻破后，四川陷入一片兵乱之中，并很快就波及到雅州。据李蕃载：

甲申十七年

冬，（明）洪光元年（清顺治元年）（贼）大顺元年。是岁贼兵到雅，止发土户钱粮助饷，地方尚未残破。我祖母张氏告终，尚行丧礼。遭西昌盛三才勒营发饷，我祖母也银二千余两。

甲申秋八月

张献忠破城都。献贼号八大王，入城都，僭王。土司高济太启衅雅州，献遣贼将张能奇称四千岁攻之，无功而反。……张能奇兵至平羌渡，日事杀戮。州城四贼，内外交残，雅之刳手刳鼻割耳大辟者，流血数十里，尸填羌江。继入土司界，一无所获。至冬十月，督兵归城都为西京。……

乙酉

（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蜀）大顺二年。

是年二月，张能奇率众贼将领兵到雅，肆行杀戮，自雅至名山、邛州营垒重重焉。黎城吐蕃司招土军与贼反复厮杀，下与總岗山土豹等，或与金鸡关土地了打阵，或与名山县打仗，且逐日千万兵丁发募义乡，名山地方打粮，少壮御为营兵，妇女御去舂米，老幼尽杀，牛只尽宰。而總岗之土豹，反谓坝下人投贼，虽不能与贼抗敌，然烧尽房屋乱杀无辜，与贼兵无异矣。……¹¹⁵

“土司高济太启衅雅州”，是指天全土司高跻泰，据《天全州志》载：“高跻泰，崇祯九年袭父职，十七年张献忠据成都，以兵来招降，跻泰固守不服。后闻大兵将进，跻泰不忍民残家破，自诣贼营乞降。因患病，跻泰惧辱祖母，乃使弟登泰

¹¹⁴ 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090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¹¹⁵ 同上，第9-12页

赴成都伪降，求还祖母。跻泰既得祖母，简兵练甲，率众攻贼。登泰骂贼而亡。贼亦寻败”。¹¹⁶张献忠占领成都之后，也力图控制四川西部的土司地区，因此招安各土司是其重要政策之一。他对付这些不投降的土司的办法就是质押其亲人，这套中国战国以来惯用的人质策略颇有效果，高跻泰被迫投降，但他使用弟弟换回成都的祖母之后，高跻泰摆脱了“不孝”的罪名，开始与张献忠在雅州地区进行争夺战。张献忠则派遣张能奇（张献忠养子之一，本姓艾，平南将军¹¹⁷）到雅州来攻击各路不臣服的兵马。雅州成为各方兵马反复争夺的地区之一。

水东乡正好处于这片地区之中，它也没有逃过明末这场战乱。然而，雅州地区多山，地形复杂山路陡长，它并不象成都平原地区那样一马平川而容易被征服，各路乱兵也没能那么轻易地劫掠到人畜和财物，这也给雅州地区的地方社会的自保带来了地理的优势。

水东乡这时产生了一位重要人物——杨秀玉。杨秀玉为今天上里庙坪杨氏族人的祖先。杨秀玉墓志¹¹⁸载：

钦命督师阁部、加升游击团练、镇抚名山县事务公讳秀玉，号翰宇者，其先世楚人，避乱入蜀，卜居雅州水东乡。公派为长，（旁注：谓万生祖公为长房也）业创罗纯实家焉。世习耕读，忠孝为本。公曾祖讳尚政，生祖讳廷鸾，祖母李、赵氏，生五人焉。公父讳滔，行五，娶任氏，乃公之生母也。勤俭起家，资至殷富。父性至善，惟胼手胝足自食其力，较晴量雨之外，非输税未尝入城市。杨母性喜浮屠，好施舍济人，至老不衰。生长子秀伦，里政也。次子秀采，省察也。公实其三也。伦、采俱以蹈贼不屈，死于王事。（顶格空白处批：墓志撰于顺治四年。查张献忠屠戮四川在甲申，崇祯既崩之后，不与此事相涉。）

公幼而聪慧，习文墨，应避殲趋，公以守掘不见售，遂未成于衿业。

于是慨然曰：“大丈夫生当为万户侯，岂碌碌事毛锥乎？”练习弓马，于

¹¹⁶ 陈松龄等修纂：《天全州志》（咸丰八年），卷四，人物宦绩，《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辑 65》，1992年，第622页

¹¹⁷ 费密：《荒书》，《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大学图书馆编，成都：巴蜀书社，第29册，第485页

¹¹⁸ 道光二十六年杨立程重修《杨氏宗谱》时，抄录了该墓志，他对墓志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注释，以上引文中括号里的内容，则为杨立程的注。尽管杨立程的注释中有一些错误，如“崇祯十年李自成犯四川，破雅州”，但为阅读和理解方便，我按照《杨氏宗谱》的格式，全文抄录如上。据杨世松2006年给道光六年重立墓志拍照的照片，可知杨立程当年抄录的这通墓志时产生了一个别字，即“先世楚人”，道光六年重立墓志为“先世楚人”。在本引文中已作此修改，特此说明。

孙吴韬略之书，无所不读。公盖逆知天下之乱，志欲旗聚义兵，奈蓉城、雅州望风投矣。贼兵长驱入雅（注：崇祯十年李自成犯四川，破雅州），罗纯三里营垒屯扎，供其屠戮焚刺。人人皆随贼拜呼也，公独弃家挈母逃之芦阳，州人相从者接踵，继而如故。公因思朝廷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我辈岂肯入贼党乎。奋臂一呼，揭竿而起，遂同原任户部郎中郑公大举义师，屯兵于总岗山，捐措牛米，自饷行粮，与贼众相打交战。贼惧，远遁三里，哀鸿渐复。（顶格批注：查雅志，顺治元年八月川北举人郑廷爵与天全土司杨之明、明宗室朱倬伊起义师，拒献贼飞仙关，战败，倬伊被斩于雅州，郑廷爵逃至总岗山，收兵再战，亦殁于阵。则郑公疑即此也。）

曾我师恢雅，当事监军范公、总镇曹公闻公之义，授以督师签事书衔，公固夷然不屑也。公惟率三里之民开垦荒芜，年事农耕，有功于人。而当事公道难掩，以公之功，上督师，进公加衔游击，公亦夷然不屑也。继以名山荒残久，当事者莫能救。（旁批：查雅志崇祯十四年辛巳名山民变）绅衿难民见罗纯耕桑如故，庆公抚绥捍卫有方，共请当事屈公为招抚计，爰有团练名山之命。（旁注：崇祯十三年始有团练之法）公自目击凋残，捐措牛种给民开种，名邑渐有起色，食公之禄者，不止一二世已也（注：顶格批注：查崇祯十年洪承畴平贼。洪承畴平贼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罗汝屡犯四川。然只在川东川北等处生事，而川南流贼亦遂有乘机扰乱者。所以官兵往往不及救援。）

公事母至孝，杨母每闻鞭声，之戒，方命驾名山任，而公之莅民，初不刑一人，其奉母至谨也。公善遇乡人，三尺童子不肯狎视，而乡人敬公如畏神明，凜然不敢犯也。（顶格批注：此墓志在顺治四年，故余于志内兵燹多主崇祯存日论，而不及顺治二三年以后之事。若论雅州之遭兵燹，则直至康熙二十年则太平无事）公性淡泊，一切征求无所利于乡之人，而乡人曾奉养之，无有吝者焉。公配顾氏，继娶李氏。顾氏生子二，女三。子大任为雅州名士，女长适刘，次在家侍亲承业，更名杨二哥，三适晏孝廉之子

铭曰 蒙山葱兮羌水清，英雄崛起兮，挺生公侯。干城为国之桢，

振振麟趾，载好其音。

明隆武丁亥三年孟冬吉日蒙邑崇正九年丙子科举人钦考知州通家眷弟晏炜撰，功授阁札都司签书衔盟弟范应乐书。（旁批注：顺治二年乙酉，明太子唐王自立于福州，号隆武，在位一年，奔顺昌而亡。其弟聿键继立，号绍武，在位两月。时雅人奉隆武年号，不忘本也。）

杨秀玉的这通墓志立于上里庙坪，墓地距离上里场约8里路。“明隆武丁亥三年”即顺治四年（1647），墓志由杨秀玉的亲家晏炜撰。晏炜所说“贼兵长驱入雅，罗纯三里营垒屯扎，供其屠戮焚刺，人人皆随贼拜呼也”，当就是李蕃记载的：“（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蜀）大顺二年。是年二月，张能奇率众贼将领兵到雅，肆行杀戮，自雅至名山邛州营垒重重焉。”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张能奇的军队到了雅州之后，驻扎在雅州通往邛州的沿线。水东乡正处于这条线路之上，“罗纯三里”即是水东乡的上、中、下三里。张能奇的这些以陕西人为主的军队，驻扎在水东乡的上里、中里、下里，必然要吃要喝，稍有不从，可能遭到“屠戮焚刺”。

杨秀玉带着老母亲逃到水东乡西面芦山县的山里去了，水东乡的一些人也跟着跑了。这一部分人有水东乡的大户，他们具有相当资财，足以跑路逃命。水东乡一般无知乡民，也只有如其他地方之人一样，任人宰割，“人人皆随贼拜呼”。幸亏张能奇的军队在水东乡呆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撤出了水东乡，所以水东乡“继而如故”，这才没有对水东乡社会造成太大伤害。杨秀玉逐渐认识到逃命不是办法，投贼更不可行，水东乡需要组织人马保卫自己的家园。于是杨秀玉振臂一呼，召集水东乡人组织武装，“遂同原任户部郎中郑公大举义师，屯兵于总岗山，捐措牛米，自饷行粮，与贼众相打交战”。杨秀玉与李蕃提到的“土豹”是什么关系，由于资料限制，目前无法知晓。

总岗山，在水东乡东面约120里左右，《洪雅县志》载：“总岗山，县西，一名可募山，或作岢募山，又名长秋山，崇峰峻岭，盘折蜿蜒，其首为县，其阳为丹稜，其阴为雅安名山蒲江诸县，山产茶及黄柏五倍子诸材木，公私资之。按，山与蔡山相距，中隔雅水，不联属也。省志旧志谓与蔡蒙接，误。又总岗可募为二山，亦误”¹¹⁹。总岗山实乃上川南地区的重要战略要地，它既是洪雅、丹稜、

¹¹⁹ 王好音修、张柱等纂：《洪雅县志》（嘉庆十八年），卷二，舆地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辑

雅安、名山、蒲江等县的分界山脉，又是控制这几个县的居高临下之处。它崇山峻岭蜿蜒数十里，是一个攻可守，退有路的形胜要地。杨秀玉依靠着水东乡的人力物力，在总岗山与贼打仗，把他们赶跑，使得水东乡再也没有外来流寇骚扰。总岗山成为上川南地区难民避难的最佳场所。

杨秀玉随后回到水东乡组织团练，“率三里之民开垦荒芜，年事农耕”，加强农业生产，以保证粮食供应。“杨母每闻鞭声，之戒”，这反映了杨秀玉还有一支武装队伍，这足以维持水东乡社会的正常秩序。杨秀玉奉南明正朔，接受南明政权的领导，故“爰有团练名山之命”，“驾名山任”，他短暂地统治过名山县。名山县多数地方的民人在仓促之间则不知如何团结自保，地方也无法产生众人信服的领导人，地域人群不知以何种方式团结起来，只得逃离故土，四处奔散，一盘散沙的流民既无法有效抵御三五成群的流寇，又不能就地农耕，即使不被流寇逐个残害殆尽，也会在随后的岁月里沦为饿殍俱填沟壑。杨秀玉靠着水东乡这片大本营大后方，给名山县民提供粮食、牛种，以恢复他们的再生产。

杨秀玉本人虽没有功名，但他的儿子杨大任为雅州的“名士”，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名山县（即“蒙邑”）举人晏炜的儿子，杨秀玉的家庭算是士绅家庭。水东乡地理地形相对封闭，再加上杨秀玉领导的武装自卫、团练自保，他在水东乡有相当势力和威望，足以震慑人心，维持社会秩序，因此水东乡其他姓氏较少有人堕落为残害本地乡民的盗贼，即所谓“乡人敬公如畏神明，凜然不敢犯也”。水东乡其余人等得以专事农耕，不致粮食匮乏，整个水东乡社会才得以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保存下来。

我们再把费密对这两年四川其他地方的记载以及雅州李蕃在这两年里的经历拿来作一个对照：

丙戌，大清肃王入四川保宁府，杀张献忠于西充县凤凰山。¹²⁰

丙戌

（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贼）大顺亡。

是年大饥。我父自总岗山归，复买牛只耕种。此时曹兵尽赴西道劫

38》，1992年，第249页

¹²⁰ 费密：《荒书》，《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大学图书馆编，成都：巴蜀书社，第29册，第489页

掠，地方州境无兵，遂获安处无恙。再筹运来春事。○献贼既诛，曹范之兵犹逗留雅州，逐日搜刮民粮，已播谷种亦漉来作食，斗米银十两，且无买处。木皮芹菜草子土蕨，俱用充饥。兼曹兵有左臂白耳吐番，凡塗间有碗米者，杀而夺之。……¹²¹

所谓“曹范之兵”，即曹勋与范文光的军队，他们属于郝孟旋领导，在顺治二年（1645）开始奉明正朔。丁亥（顺治四年，1647）清军进攻嘉定，杨展守之。清军退守保宁。

丁亥

（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自丙戌之冬，曹兵复驻雅，雅州昼夜劫掠，我父仍率耕仆三人，耕不辍，尚有贳本，斗米纹银十两，荞麦每斗四两，从州城易买，顾筏至关底坝以为食。种谷四石，至成熟时止尝新米一餐，遭曹兵左臂焦英率兵数百，尽数抢劫，牛只尽杀，耕夫亦死。我父携家逃往沟下杨宅住歇。又有食人盗贼活绑人杀到新家沟，拿数人去。自胡溪屯至总岗山，渺无人烟，我继母叶氏杨宅告终，送回安厝，无碗米□□无衣衾棺槨，用□板安厝。至今悲痛难忘。……复有杨土司军、黎城吐蕃逐日劫掠乡村城中，卖人肉汤锅，村中无一噍类。¹²²

丁亥年“四川大饥，民互相食。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亦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雅州尚有大渡河所、越嶲卫接济，一斗米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保宁赖大清运陕西之粮，亦有十余两。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¹²³任乃强先生认为，四川成都平原人口大规模死亡，当就在顺治三年、四年（1646-1647）¹²⁴。尽管雅州是成都残民逃难之地，但雅州也非常惨烈，亦出现人相食的情况。

¹²¹ 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 090 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3 页

¹²² 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 090 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4 页

¹²³ 费密：《荒书》，《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大学图书馆编，成都：巴蜀书社，第 29 册，第 490 页

¹²⁴ 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8 页。承蒙辛旭副教授惠赠，特此感谢。

李蕃家庭非常富裕，刚开始动乱时，他家被西昌盛三才勒索军饷二千两白银，其后乱兵横行的危险日子，李蕃父子东奔西逃，跟随他们的，不过几个耕仆。如此富有的家庭，却不能成为地方的领袖，组织地方民人武装自卫，这可能与李氏过去没有领导过地方民众从事公共活动有关，李氏也无法在仓促间得到他所在住居地民人的领袖认同。象李蕃这样的富户，兄弟之间尚不能在乱世中相互照顾，其没有血缘关系的乡民之间，更谈不上团结互助。永历元年（即隆武丁亥，顺治四年），李蕃继母叶氏过世，“无衣衾棺槨，用口板安厝，至今悲痛难忘”。同年，杨秀玉去世，水东乡杨氏安葬了他并立碑一块。

杨秀玉与李蕃父子的对比表明，在明末社会动乱中，在乡士绅承担起地域责任，组织和领导乡民，乡民团结在士绅的周围，形成自保的武装，并结合本地有利的地理地形，乡民和士绅在乱世中都有可能活下来。如果乡民与士绅分离，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最先死亡的是乡民，士绅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与同时代的山西阳城县陈氏相比，水东乡人还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来建设可容百家、可御万人的堡垒¹²⁵，这说明明代末年水东乡整体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相对落后。

新津蓝氏避难落业水东乡

明末大乱，成都平原地区的一些难民向四周山区逃避战乱，如费密所载，川西雅州是民众避难的重要去处。其中，新津县蓝氏一路辗转，举家逃到了水东乡。据上里蓝氏嘉庆丙子年（二十一年，1816）重立墓碑的宗支序载：

始祖孟海公、曹氏，原系江南人氏，特受天官之职，弟兄四人，长曰东海，次曰孟海，三西海，四北海，移入四川成都府新津县白林乡花桥子创业。孟海公、曹氏，生世恩。孟海公与曹氏墓葬新津。世恩公、黄氏由新津迁居雅州府雅安县慕义乡草坝场大同寺简家沱。世恩公墓即葬于草坝。后又迁居水东乡罗城上里白家场，今之玉宝山也地分。今有黄氏祖婆墓焉。世恩公黄氏生三子。长子蓝田玉，次子蓝田璧，移中里

¹²⁵ 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2期

场，尚有十余家。三子蓝田奇，被夷人抢去。¹²⁶

蓝氏的这段记录并没有明确提到明末清初动乱之事，然而蓝世恩的三子蓝田奇在雅安县被“夷人”抢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雅安县并不是“夷人”长期活动并能随便抢掠人口的地区。蓝世恩葬于慕义乡草坝场（即今草坝镇），他的妻子却葬在水东乡上里，这么近的地方夫妻两人却不能合葬。这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稳定状态。该宗支序记录的蓝氏字辈派行：“海世田春玉，如维启宗炳。廷映国兴荣，光明泽有本。”蓝氏第五代“玉”字辈的“蓝玉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作为中里八甲杨氏的“秤户”出现在“李连秀叠控八甲杨氏田粮案”的状纸之中。蓝玉逯的祖辈即为蓝田玉、蓝田璧、蓝田奇。目前蓝氏人群多聚居于上里镇四家村蓝家岗，他们第十三代“国”字辈的人多是70岁左右的老人。

以此推算，明末蓝世恩和曹氏以及三个儿子从新津逃出，到了雅安县慕义乡草坝场避难，住了一段时间后蓝世恩在草坝去世并葬在草坝。在这段逃亡避难的过程中，三子蓝田奇“被夷人抢去”。据李蕃记载，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黎城吐蕃司招土军与贼反复厮杀，下与总岗山土豹等或与金鸡关土地了打阵，或与名山县打仗，且逐日千万兵丁发慕义乡”。从这年开始，内地军人勾结周边土司军队（黎州安抚司），在雅州争战。这些“左脅白耳”的“吐蕃”人（李蕃语）连续几年在雅州活动，四处抢人抢物。估计蓝氏所谓的“三子蓝田奇被夷人抢去”即是在慕义乡为被这些“左脅白耳”之人抢去。曹氏和两个儿子逃出慕义乡，翻过莲花山，经中里到上里，在“玉宝山”落业。“玉宝山”在今天四家村与共和村交界之处地名“大水湾”的地方，即今天蓝家岗附近，距离上里场3里路。曹氏去世后，也无法与一山之隔的蓝世恩合葬，蓝家两兄弟只得将其母葬在玉宝山上。蓝氏从此在水东乡落业生根。

明末清初的水东乡，作为雅州地区相对安全的地方，接纳的各地逃难民众应不止蓝氏一家一姓。

大明的最后身影

¹²⁶ 2009年1月3日拍照

从甲申之变，到清王朝在全国确立统治地位的这段时期里，有关残明势力的历史，后世史家称之为“南明”¹²⁷。就水东乡的情况来看，这里处于打着南明政权旗号的地方武装控制。永历五年（辛卯，顺治八年，1651），中里郑氏建坟立碑一块。此碑只有“祀男”，没有象崇祯十年（1637）的墓碑（同一墓地）出现第三代。其碑文¹²⁸如下：

日 山 向	运 大明世寿 考郑友卿 妣丁氏大人墓	金 春秋 祀男郑世荣 奇魏氏
永历辛卯孟冬望七日丑时立		
祀奠		

永历八年（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上里许氏建坟立碑两块，其碑文¹²⁹如下：

向巳 山亥	永历□□山丁	甲午年	明显大隐国祿号近楼许公之墓
-------	--------	-----	---------------

春秋祭祀	明显延德正贤许公之墓	皇明永历甲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
------	------------	----------------

两碑连“祀男”也没有出现，这点微小变化，也许透露了当时水东乡人的某些心态。水东乡人心里可能会泛起一丝凉意：“明”字当头，还能在墓碑上站立多久呢？碑文又显又隐，此种矛盾的表达，可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水东乡人内心普遍的悲伤愤懑与压抑情绪。然而不管怎么样，此时的水东乡人活着尚能“大隐”，

¹²⁷谢国桢：《南明史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¹²⁸ 2009年2月7日拍照并抄录

¹²⁹ 2009年2月8日拍照并抄录

死后还有葬身之地，他们比起成都平原那些死于非命而曝尸于野的无辜难民，则已幸运得多了。

第三节 士家大族八甲杨氏兴起

在明清鼎革的乱世，水东乡还算是一个尚能保命的地方。中里八甲杨氏与领导团练的杨秀玉这支杨氏属于同一个祖先（乾隆年间开始这样说），他们居住在杨家湾并没有逃亡，这里距离中里场 2 里路，距离杨秀玉的墓地约 12 里路。这期间中里八甲杨氏也产生了一位重要人物——前明八甲里长杨環。杨環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亡于康熙十二年（1673），享年 88 岁¹³⁰。不过，杨環的重要性并不是对整个水东乡而言，而是相对于八甲杨氏而言。下面，让我来看看他是如何变得重要的。

明末清初杨環土地扩张

原来，杨環在明末清初的这段时间里大量地获得了水东乡的田地，这对其后人来说自然非常重要。杨氏后人指出，杨環中年当水东乡八甲里长，“运粮米进建昌，解运皇木进京”，历尽千辛万苦，逐渐积累资财，才得以购买如此众多的土地。为了教育后人珍惜家业，他们就把杨環“置业之艰”的情况一一整理和叙述，并记录于《杨氏宗谱》。这一整理叙述工作由杨登贤于雍正十年（1732）完成。杨環至杨登贤的世系为：杨環，生秀翹，生朝经，生登贤。这里先把杨環获得土地的情况逐一摘录如下：

一、屋后自鹅项岭起，至罗家园、庙子岗，三契系与高、杨、罗三姓买明。

一、买右边杨启林茶园一分。

一、买胥姓茶园一分。

一、买高姓大林一分。

一、买任姓蛇皮风山地一分。

一、买胥、高二姓山地作阴宅，至纲儿岗一大转一分。

¹³⁰ 请见下文杨環墓碑

一、买文世堂刘家沟白夹林子茶地一分。

一、买罗俸宇前山罗家园下半分（其上半分系祖业）。

一、买逯初山田地一分。

一、买小马鞍山一分（加补数次，分于秀胜名下，其婿朝顶卖与陈奇团，去訖杨君仲备价取回，舍于悟德寺。）

一、买前山小沟龙奔坡山地一分。

一、买前山大河边茶地一分。

一、买大河边对门山茶地、河边田、马头田、干岗子等处，与本里陈嘉照所买一分。

一、买文世远对门山蓝靛沟茶地一分。

一、买杨宏轩莲花山桂花园一分。

一、买李应付蜂桶岩茶园一分。

一、买石龙溪龙家山田一分。

一、买后山人家岗房屋三间，山地茶园一段，水田一分，大小三十五坵，大地一块。

一、买当门大路田一分。

一、买文绍周长田一分，大小四坵。

一、买当门文世纲大田一分。

一、买茶园一段，坐落后盐溪余家宅后，地名孙家园，价银三十两，舍于蒙顶山。以上官茶每年恁帮课银三钱，入月光寺和尚称收。遗有上山坡大路边连山石碑记，买契当时烧于 龙神面前，家下并未存留字帖，恐子孙生异心。

一、与本处周道山买明周家坡山地一段，价银十二两，舍于东岳庙，其买契烧于 灵官案前。

表格 1 八甲杨氏历次获得土地表

购买次数	卖方	田土山茶	地点	备注	价银
1	高姓		鹅项岭		
	杨姓		庙子岗		
	罗姓		罗家园		
2	杨启林	茶园			
3	胥姓	茶园			
4	高姓		大林		
5	任姓	山地	蛇皮风		
6	胥姓				
	高姓	山地	纲儿岗		
7	文世堂	茶地	刘家沟白夹林		
8	罗俸宇		前山罗家园		
9	逯初山	田地			
10			小马鞍山	舍于悟德寺	
11		山地	前山小龙沟奔坡		
12		茶地	前山大河边		
13		茶地	大河边对门		
		田	河边		
		田	马头		
			干岗子		
不详	陈嘉照	不详	不详		
14	文世远	茶地	对门山蓝靛沟		
15	杨宏轩		莲花山桂园		
16	李应付	茶园一分	蜂桶岩		
17		田一分	石龙溪龙家山		
18		房屋三间			
	后山人家	山地茶园一段			
		水田一分大小三十五畝			
		大地一块			
19		田一分	当门大路		
20	文绍周	长田一分大小四畝			
21	文世纲	大田一分	当门		
22	胥南吾	荒田	世循祖茔		
23		茶园一段	地名孙家园，后盐溪余家宅后	舍入蒙顶山	价银30两
24	乐静庵	山茶			
25	周道山	山地	周家坡	舍入东岳庙	价银12两

杨環共买地 25 次，把山地分别舍于悟德寺、蒙顶山、东岳庙 3 次。其中没有卖方姓名的有 4 次，有姓无名的有 6 次，以地理位置指称的有 1 次，有姓名的 11 次。这 25 次中，只有两次有明确的“价银”。至少有 11 次杨氏后人都不知道“卖方”具体为谁，这些可能并无地契。有姓名的只有 11 次，这 11 次可能是有地契的。从卖方的姓氏来看，高姓有 2 家，罗姓 2 家，文姓 4 家，胥姓 3 家，杨姓 3 家，李姓、陈姓、逯姓各 1 家。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八甲杨氏只要向统治水东乡的各路军阀当差纳粮，基本就可以保住这些土地了。

顺治十八年（1661），雅州的永历年号就不再传了，三月，清军水陆并进，统一上南各州县¹³¹。清政府在雅州建立其统治秩序的标志，就是向管辖地区征收

¹³¹ 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纪》，《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总 090 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3 页

赋税。征税之前的工作就是初步统计各地现有土地。在雅州，清政府重新清丈土地开始于康熙二年（1663）（据李蕃语，实应为康熙元年，1662，见于李连秀叠控八甲杨氏田粮案）。

癸卯，康熙二年。雅州知州余国谱，秋七月奉行履亩而税。谱，伟人谨厚，知丈田原非善政，虽亲临四乡踏丈，不过微示其意，如田多者，每亩纳粮银四钱，以充部费，即不载册。¹³²

雅州知州余国谱“履亩而税”，对水东乡民而言，则是天大的事情，因为这是新王朝重新确定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水东乡民向雅州官府申报哪些当差纳粮的田土，这些田土就将成为申报者所有。杨环在这次向清王朝政府登记田土的时候，取得了这些土地的所有权。

李连秀叠控八甲杨氏田粮案

如果没有李连秀的出现，也许我们对杨环获得的这些土地不会有更多的看法。但是，李连秀的出现让我们猛然看到了更为复杂、更为真实的历史面相。雅州生员李连秀和八甲杨氏怎么会扯上关系，还打起了“叠控”官司的呢？

原来，李连秀的父亲是雅州衙役差头李堂，李堂于明末在水东乡买了很多土地。康熙九年（1670）李连秀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雅安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这些在水东乡的土地。李连秀发现这些土地大多被中里八甲杨环及其五个儿子占有，于是开始了一场历时近二十年的叠次（共十二次）控告、找补地价的官司。

康熙十年（1671）十月，李连秀第一次向“雅州张大老爷”告状：

具告状李连秀 为虎里悖旨欺孤横霸事。福星临雅士民安，堵寒谷生春啣冤。抱恨之日转而为扬眉吐气之时矣。情因生父李堂于崇祯十三年备银一百六十两，买明水东乡四甲高显仁、纲水田一十三顷、瓦房三间、山场一面，自生输租应差一代。继而兵戈之后，卖主已绝，生犹招

¹³² 同上，第24页

人输租如故。于庚子顺治十七年劫贼肆变，苦遭水东八甲杨秀翔弟兄五人乘机假借粮餉，串同水四甲排年指一派十，多端寻害，将栽田户威逼逃走，将生田地房产尽行霸占。今已奉文汰革里排，则此产仍当归生管业。而渠恶违悖 圣旨，仗才仗势，横霸一方，号山虎藪，狼心不悛，犹然以里排行事，强行霸占，负隅之势，莫之敢撓。不惟欺压寒儒，则将藐视宪谕矣。天理王法安在哉！告经 仁廉，恳恩垂怜懦弱，严行鞠究，照单退偿历年租谷，以充军需，斧断归生，殄除党恶，以彰纪律，以靖地方，则生啣结世世顶焚，望光上告。

计开霸占田种一十三顷，每年租谷四十四石，今已十二年，共该谷五百余石，瓦房七间，山场一面，每年豆麦八石，共该九十余石。

康熙十年十月

日递

李连秀状告“杨秀翔弟兄五人”（即杨環的五个儿子），他主要围绕“十三顷水田、瓦房七间、山场一面”提出产权主张，其证据是他父亲李堂留下来的“古契”（见下文）。李连秀指涉的这些田地的具体位置如下：

○有一分坐落白夹林，沟田上两坵，上齐大方田，山地帮左边一转，与杨胜莪相连，岗顶墙坎湾环转中嘴岗。

○有一分坐落小沟子，上与彭宅岗顶墙坎相连，田两坵，沟下齐杨登万家田为界，右边岗半截与登万相连。

○有一分坐落漆树沟绵花地，顶与文宅墙坎相连，转至白子岗一岗，柴山地房基后圆岗、石碾岗、高家岗皆是。

○有一分房基、田一段、坵沟子一段，下齐岩板田；裤裆田一段，下齐花秋田；高家岗一分；打蒿田一分。

○有一分，河这边，自沙田、干嘴、门門田、醯耳田、鹅母田、大千田，上至四老爷家屋后，除文宅与英才之田，都是。

○有一分，后底河上，坎湾田大小数坵，后沟四坵，高显地沟一坵在内。

据李连秀的状纸可知，清政府在重建地方税收秩序时，在雅州作了一个重要

改革，那就是“汰革里排”，这是革除明末里甲制度弊政的重要措施，清政府征收税赋不再依靠里甲轮排制度。

雅州知州“张”接到这份状纸之后，做出如下处理：

州主张大老爷批，仰本州儒学确查报

时差李服来唤吾祖，诉恳添唤四甲排年杨明义、杨奉学、杨仲朝、杨悝纪等进城，立写退约如左

立退约归还原主。水四甲排年杨奉学等因有本州李连秀之父李堂昔年与高宅买种一分，坐落中里，因兵燹之后，有水四甲排年不问有无主造，轮流写与别人，迄今数年。李生方查的确，具鸣州主，蒙批发本学老爷差唤审讯，爰立退约，将此田退还李生，一应粮差，不得有累本里，退约为券。此约吾祖费银二两。

李连秀见此退约无染我祖，定要与他买明了方休。我祖在州借银承办，连酒席、谢官、衙内中证、书约画字，正价共去银七十两。

水东乡杨明义、杨奉学、杨仲朝、杨悝纪等人，把他们占有李连秀的土地退还给他，并立有退约。本段引文是杨瓌的曾孙杨登贤于雍正十年（1732）整理写成的，文中的“我祖”，即为李连秀状文中的“杨秀翔弟兄五人”。

关于李连秀的父亲李堂如何获得这些土地的，以及李连秀告状后，八甲杨氏如何“去银七十两”“买明了方休”的，杨登贤对此有如下回顾：

昔左降高姓，乃水四甲之花户，不幸遇劫逃亡，仅存高显仁、纲二人。叠遇雅州劫贼作变，门差难当，将此田付一分与雅州差头李堂，包免差役，价甚微少。又将一分付与雅邑小河子姜宗寔，又将一分付与本里杨明芳去讫。迨甲申兵变，田地荒芜，三家俱无人管理，其户名姜应龙遗在水四甲里长名下，代赔差徭之需。

本朝康熙元年壬寅，清丈之后载粮二斗九升七合，因此田与吾家相近，里长劝吾家佃耕纳租完差，并无贪业之意。忽于康熙十一年壬子岁，有李堂之子文生李连秀，以欺孤横霸等情，具控我祖秀翔公兄弟四人，在州主张台前批发，本州学罗老师确查具报，差役李服奉票来唤我

祖父上州诉明佃耕情由。现有历年租谷收帖可凭，四甲里长将田吐退与李连秀，去讫。殊李连秀指称田耕辽远，且游学在外，不便耕种，央中苦劝我祖接买。我祖以为李姓攫得之物，当官接买，谅亦无妨，并未下乡看界，统写三家言明，价银六十两，在州设席交价明白。罗学师批照云，李生以耕种不便，情愿出卖，一应价值交明，日后不得再三寻害，可也。

据杨登贤的记载来看，李连秀之父李堂能够获得十三顷水田房屋山场，实因李堂为明末“雅州差头”，高显仁、纲两家“门差难当”，才“将此田付一分”给李堂，以求李堂“包免差役”。李堂所花的白银，在杨登贤看来，不过是“价甚微小”。这显示了明末里甲赋役制度已经崩坏了，差役负担越来越重，民人开始相继放弃田土，以求免去沉重的差役。雅州衙门差头则趁机在这场乡民放弃田土潮中鲸吞土地。还有些无主的土地则放入到水东乡四甲里长名下，用来“代赔差徭之需”。这一事实表明，明末四川各地民人“打衙毒”而州县官闭署坐的现象并非没有社会根源。

“康熙元年壬寅，清丈之后”，这实际上就是清政府在雅州重新确定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措施。“吾家佃耕纳租完差”之说，不过杨登贤的隐讳之辞，实际上是杨环及其五个儿子通过清政府“清丈”获得了这些土地所有权。这是李连秀状告杨环一家的基本理由。李连秀第一次告状之后，杨环一家并没有把这些土地退还给李连秀，而是出了60两白银给李连秀（外加10两白银的酒席、谢官、衙内中证、书约画字费用），算是把这些田土买下来了。这是李连秀第一次告状的前因后果。李连秀其后的历次告状要求加补地价，则由八甲杨氏“四房均出”。

康熙十一年（1672），就在李连秀拿到这60两白银之后不久，吴三桂反清，雅州处于吴三桂政权的控制之下。吴三桂控制雅州地区整整十年。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王朝才又重新夺回雅州地区。这一重要历史纪录，保存于李连秀康熙二十九年（1690）以后（具体年份不详）的最后一次状词之中：

不料于康熙十一年逆贼猖獗（吴三桂之党），催粮伪官革去户首，复用昔年里排。因渠恶乃明初以来设立水东乡八甲里排，生恐罹于害，遂泯迹莫害。幸蒙二十一年大师恢复地方，奉哈总督大老爷行案明文内云：

“照得各省粮饷尽足，而蜀中粮饷甚微，总因伪将横民伯占民间田地、将粮隐匿。许被害之家首告。如不行告出，查出一并治罪。”此时，又用我朝设立之户首矣。生遂向户首理论，其粮止存一斗在册。因渠乃伪官之时，其侄与孙俱系户房经承，因此里应外合，遂将册籍改易。渠恶反以凶暴凌生，对生面言：“尔之田我买了，粮之多寡与尔何干？你来寻我，我是拳捶！”生以一人，实惧其恶，只得吞声而已。

吴三桂政权控制雅州后，在征税环节上“催粮伪官革去户首”，又采用了明末的“里排”制度。这种里排制度到明末已经弊窦丛生，极易被里长操控而欺压小户，李连秀“恐罹于害，遂泯迹莫害”。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王朝重新夺回雅州后，又废除了明末的里排制度，“又用我朝设立之户首矣”。从某种角度来说，康熙皇帝与吴三桂在西南地区的斗争，是在征税环节上的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

刘志伟教授研究清代广东图甲制中的“户”，对我们理解清代雅州征税制度的改革有一定帮助。刘志伟教授认为：“在明清之际里甲制中的‘户’的登记内容由人变为一定的田产税额，意味着土地财产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¹³³也就是说，清政府征收赋税不再依赖里甲轮排，而是直接针对“户”名下面的土地征收，拥有这些土地的“户”（人），直接向官府“自封投柜”¹³⁴。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十年（1671），以及康熙二十一年（1682）之后，雅州征税环节不再依赖明代里甲轮排（这也是康熙六年四川取消“包赔”制度的前提条件¹³⁵），这是清王朝政府重建地方秩序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

地方士家大族的形成

杨環及其子孙，在清王朝这次重建地方秩序中率先成为了水东乡的第一个士家大族：杨環和他的五个儿子占有了大量无主土地，通过清王朝新政府重新土地登记而获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是改朝换代的受益者，他们当然是新王朝的

¹³³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

¹³⁴ 同上，第268-274页

¹³⁵ 康熙六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把原四川总督李国英的《生聚拯救遗疏》上报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交户部议复，户部行文四川布政使，四川布政使提出其中一条即为：“欲恤见在残黎，莫如轻徭赋之输纳，除逃亡之包赔，罢腹里之汛守，裁不急之冗员，为可行耳。”请见：《四川总志》（康熙十二年），卷之十，贡赋，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

拥护者。当吴三桂反清时，八甲杨氏又采取“识时务”的态度，向控制雅州的吴三桂势力“当差纳粮”，当清王朝收复雅州后，他们又积极拥护清王朝新政府，继续“当差纳粮”。

杨環父子积累的产业，足以供养其后人读书识字，踊跃报考新朝下的科举，猎取功名，使之成为清代水东乡最早的士家大族。仅就杨環儿、孙、重孙辈来看，据《杨氏宗谱》“登贤记”载，杨環的长孙杨朝绅是八甲杨氏的第一个贡生，杨環的孙子杨朝经是八甲杨氏清代的第三个秀才，杨朝经的儿子杨登贤随后又考中秀才。

那么，康熙年间杨環及其儿孙是否可以被称之为“宗族”呢？让我们先来看杨環及其儿孙在本地的一些活动纪录：

附录月光寺古碑记¹³⁶

上写重修弘法庵碑记，先叫弘法庵，后改月光寺。（注：此句为杨清杰老人添加）

……

余辛未（旁钢笔字：康熙十四年）年岁游此，礼师了悟，庵有施主“杨環”（注：引号为杨清杰老人所加，下文同）系本州八甲里长，善于先祖“杨志刚”高氏，玄真父“杨廷富王氏”将主业置房屋、山场、茶园各一段，左齐乐净庵抵黄月明宅，原舍于蒙顶山，岗横河边沟直上山峰顶为界，右齐静室堂，直□岗地沟，横入香樟岩□底，伍宅房基两河口为界。约焚。“杨環父子”捻先人□□意，请僧开经往歇，照界捋理安生，每年认细茶拾斤，于本宗不得紊乱。师爷可福买明乐净庵伍宅茶园，约内递年认银一钱二分，在水十甲后詹仅，又具为马琴彩茶山一面，并与“黄应（残谱为：印）全、黄金蒲买明”，共拾荒山，左齐罗宅大坪师家岗，右沾马敬禄瑶色坟岗下，抵黄宅水沟为界，其中有麦粮五合，原

¹³⁶ 这篇碑记存在诸多文字不通顺之处，主要原因可能在辗转抄录。这篇碑记由杨清杰老人抄写，单独收录在杨清杰老人保存的《杨氏宗谱》（1992年版），我在杨清杰老人抄录本的基础上，又与光绪版《杨氏宗谱》残谱进行了核对。1992年版《杨氏宗谱》由杨清杰老人编，杨毓松毛笔书写。他们把这本毛笔书写的《杨氏宗谱》使用复印机复印了130本，发给杨氏宗亲。杨清杰老人保存的《杨氏宗谱》，则单独收录了老谱子（光绪年间版）里的这篇碑记。杨清杰老人在抄录这篇碑记过程中，他又添加了自己的一些注释（如年代）。杨永柱老人保存的光绪版《杨氏宗谱》已经被蛀虫舔食得无法卒读，其中有关《弘法庵碑记》的内容残缺不全，仅能就保存下来的残缺内容进行有限的核对。

月光寺所在的位置，在罗绳岗莲花山的东面（即今天的后盐），清代中里八甲杨氏聚居的地方在罗绳岗莲花山的西面，这两处地方相距约20里，中里场翻越罗绳岗莲花山去雅安县的道路，就要经过月光寺。

主马水忠普头收入，不得诈害等情。又与袁安君买明茶园一段，东至城王庙为界，与黄宅路坎小茶园尖咀岗和王居贞水沟直上中岗横路为界。于万历壬子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捨入（杨清杰抄录本：乐净庵）。常住每年认银一钱，在李应庭户内，由施主“杨環”先年买明师宅茶园一块，捨入寺内，每年认银一钱，又与“李克升名下师祖”买明，并捨明榜细茶△斤归常住，多年无紊。

僧念佛像飘零，殿堂颓扬。幸兹国运维新，许令修理，师徒建启韦驮，捐资同心募众，施置瓦片栋梁。今乙未年仲春竖立阁廊房，鸠工土石阶梯，请刻佛像天神，后建山中道路，一为蒙山世代之香火，复更为弘法庵之□园。凡□住此僧众，朝暮榆扬钟鼓，神昏礼节诵经，各守清规，勿犯戒律恐□等。不信因果狼毒，常一草一木，下山者令凭山界神祇立“许弘法垂教莲经二十四部”，生遭王法，死入阿鼻，如有僧俗紊乱荡费者，共领此原，暗有迦神兰巡山纠察护法，安僧普头十万，善男信女若见，以闻甘露祖师，世夕不失人身劫劫常蒙佛记速离苦海，早登菩提上祝。

□风永康，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 康熙万历三十三年壬子

（笔者注：原文如此）

这篇碑文为弘法庵僧人所写，这位僧人师承了悟，了悟的师傅为可福，可福的师傅为“本居甘氏之子”。杨環的父亲为杨廷富，祖父为“杨志刚”。早在明代中后期，“杨志刚”及杨廷富就相继把山场、茶园舍入弘法庵。弘法庵所在的山头基本是一座种植茶树、生产茶叶的茶山，茶山上有多所庙宇，弘法庵左为“乐净庵”，右为“静室堂”，东为“城王庙”，这些庙宇属于不同姓氏人群所有。八甲杨氏通过“买明”各姓茶园并“舍入”弘法庵的方式，来实现对这座茶山各处茶园兼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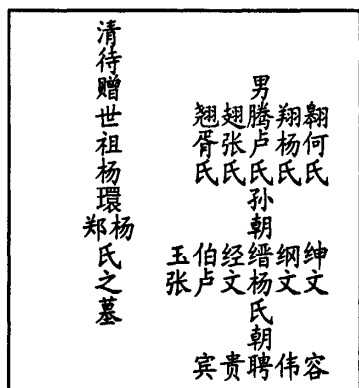
八甲杨氏有关“茶山与庙宇”的纪录提示我们，四川相关产茶地区山头的庙宇，可能是各姓农业人群控制和管理山头茶园的重要空间¹³⁷，其委托代理人则为这些庙宇里的僧人或族人（见下文杨九法的例子）。

¹³⁷ 光绪版《名山县志》的舆图中，蒙山顶上有非常多的“庵”，其管理茶园的机制可能就如八甲杨氏一般。这也是我们理解水东乡其他山头庙宇作用的一个重要参考。

有关八甲杨氏舍茶园山地到月光寺和其他庙宇的情况,《杨氏宗谱》载:

一、置大锣二面,将一面付与月光寺作申名钱,一面在家,付秀胜收管,去银八两,五房居闕。 铙、钵、铍、铎、钩、锣,秀翹收管,铜锣、铛子一付,纹银五两,秀翔收掌。锡香炉、花瓶、烛台一付,秀翹收管,耳环一队(重三钱),熨斗一把,以上各物俱五房居闕。 一、买茶园一段,坐落后盐溪余家宅后,地名孙家园,价银三十两,捨于蒙顶山。以上官茶每年恁帮课银三钱,入月光寺和尚称收。遺有上山坡大路边连山石碑,记买契,当时烧于 龙神面前,家下并未存留字帖,恐子孙生异心。 一、月光寺常住,原系杨志弘祖公家舍宅为庵,佳佛堂杨海龙、杨海潮二人常住,示寂于斯。厥后 世循祖公又买乐静庵山茶赔补,向来原认每年使费茶十斤,节礼银三钱,交与杨九法家轮流称收,有碑为记。 一、与本处周道山买明周家坡山地一段,价银十二两,捨于东岳庙,其买契烧于 灵官案前。 又于顺治十五年在庙沟外大河边建修 圣祖牌楼一座。至康熙四十九年,孙朝经、纬、朝缙,将后山田租一季,为主出资,重建立碑为记,并将祠内地土茶园界址列于碑上。

杨環墓碑¹³⁸正面(墓碑背面为众多子孙后代的名字,本文从略)如下:



公讳環,字世循,本里人氏。世居本里,为八甲里长,取司木铎,广行教化,乐于修善,喜好布施。生于万历丙戌,亡于康熙癸丑,身历二代,寿享九十。生有五男,派流四支,后裔繁昌,良有以也。

¹³⁸ 2009年2月12日拍照并抄录

兹因墓碑磨灭，敬为重建。窃以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蕃，一本不可不亲。凡属公之子孙，春秋拜扫，礼毋或缺；还当长相仁让，永敦雍睦，毋失一脉渊源之意。

皇清乾隆廿七年壬午三月十二日立

杨環生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分为五房，五房有公共财产（即大锣、铙、钵、饺子、钩、锣、铜锣、铛子一付、锡香炉、花瓶、烛台一付，耳环一对，重三钱，熨斗一把），这些公共财产一半是铜质乐器，还有祭祀用品，这些乐器和祭祀用品应用于月光寺佛教法事活动。月光寺是杨環祖上、杨環、杨環的儿、孙、重孙历次捐献茶园山地并招僧往歇的佛教寺庵¹³⁹。康熙十四年（1675），月光寺的名字还叫弘法庵¹⁴⁰。显然，月光寺是杨環后人公共活动的公共空间。

弗里德曼根据华南宗族研究成果，总结出宗族的几大要件：族谱、神主牌、祠堂、尝产、祭祀仪式¹⁴¹。冯尔康先生认为，“说到宗族、家族，应当注意到它的要素：①父系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②家庭为单位；③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④有组织原则、组织结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前三点是宗族、家族形成的基本条件，或者说是前提，而后一点才使得它得以成为社会组织。没有后一条，居于一地的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只是族的关系，而不成成为宗族、家族组织的成员，不构成社会群体。”¹⁴²刘志伟教授认为，只有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财产，共同的活动，共同的组织，共同的公共空间”的人群，才能被看作宗族。康熙年间杨環的儿孙虽然具有共同祖先、清晰的世系纪录、共同财产、共同活动空间和不定期的共同活动，然而他们还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组织，因此他们还不算宗族，他们只是水东乡最有势力的大族，他们的公共活动基本在佛教信仰中以及依托于佛教寺庵这个空间得以展开。

杨環及其儿子经历了明清鼎革的乱世，清初他们利用清政府重建地方秩序、登记田土的机会，一举成为了水东乡最大的地主。他们拥有广袤的田地，以及众多的茶园山林；他们也应是水东乡最大的茶树种植者和茶叶生产者，他们通过茶

¹³⁹ 中里镇建强村杨清杰老人在说到月光寺时，对我说：“月光寺是我们杨家的家庙。”我问：“什么是家庙？”杨清杰老人说：“月光寺是我们杨家修的，就像现在藏族每家都供奉菩萨一样。”（时间：2009年1月8日，地点：中里镇建强村）

¹⁴⁰ 弘法庵的名字何时改为“月光寺”，这篇碑记并未指出。

¹⁴¹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¹⁴²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山上的庙宇和“招僧焚献”、雇佣族人的方式来控制和管理这些茶园。杨環及其子孙的财产形态代表了水东乡一般农业生产者（农户）的生产资料形态：水田、土地、山林、茶园。这意味着，清代四川相关产茶地区的农业生产者（农户）是多种经济经营者，茶树种植和茶叶生产，只是其中之一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点认识对我们考察水东乡的农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只停留在茶树种植、茶叶生产这一方面。

第二章 农业社会里的族与国

明末清初雅州地区容纳了许多成都方向的难民，人口相对较多。康熙六年（1667）四川巡抚张德地提到：“上南如嘉、雅州县，户赋较之他属稍可”。¹⁴³乾隆四年（1739）《雅州府志》载，雅州共有 4 个乡，5 个场，其中水东乡就有 3 个场，它们分别是上里场、中里场和下里场¹⁴⁴。这说明水东乡是清初雅州人口最多的乡。清初的水东乡依然以农业为主（包括种植茶树），清初农业社会的水东乡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节 陈氏、韩氏进入上里场

康熙前半期，山外的民众还有陆续迁水东乡的，其中上里陈氏和上里韩氏的祖先也迁进来了。这两家的后人在清代中后期的水东乡中逐渐重要，因此先得对这两家的祖先来水东乡的过程做一个介绍。

陈天道进入上里

陈天道搬入水东乡定居的地点，为今天上里镇四家村陈家山，这里距离上里场约 10 里路。这个山头在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居住着十五户人家，主要以杨姓为主，并没有陈姓。陈家山保存至今的伍通神庙其文字¹⁴⁵如下：

伍通之神

维

大明国四川邛州人氏前来雅州水东乡上里奉
神发心竖立庙室保安信士张志奎妻任氏张氏
谨同男妇张思女杨氏

虎 用 德 正伦

耆老杨金口业主杨金文杨金山杨训 卢应香

楫 和 滔 侯伯田

闵正来 闵正乾

阴阳口前杨万良拾赘财信人罗 荣 钟还原

刘金山 闵伯正

¹⁴³ 《四川总志》（康熙十二年），卷之十，贡赋，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

¹⁴⁴ 曹抡彬、曹抡翰纂辑：《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三，乡里，《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二十八号》，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第42页

¹⁴⁵ 2009年2月9日拍照并抄录。此神庙如今早已荒废。

王 立 刘吉虎
皇明嘉靖肆拾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竖立匠人□□□□

韩森研究表明，伍通神是商人信仰的神，“五显的起源是徽州婺源县的五个人，具体为谁不清楚，自 9 世纪后期起显灵，1109 年每人都被封为两字侯，又称五通，或五显。”¹⁴⁶伍通神庙向各地扩散的过程，是婺源商人活动和影响的结果。因此，在嘉靖年间名山县经这座山头到水东乡的商道就开通了。

清代陈氏搬入这个山头后，“陈家山”的名字便流传下来了。关于陈氏搬入陈家山的时间，并无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陈氏的宗支记录和墓碑来推断。据陈家山嘉庆六年（1801）陈氏宗支牌坊载：

吾族自始祖兴宗，由楚入川，居名邑之五花堡陈家坝，历数传而迁于陈家湾。一代祖讳廷汉，妣周氏，二代祖讳奇贤，妣郑氏，三代祖讳九试，妣杨氏。高祖讳连节，妣赵氏，尊祖讳文恒，妣周氏，祖讳天道，妣刘氏。然则五世以前，自陈家坝迁陈家湾者，是廷汉为始祖矣。祖考迁居罗城，生伯考讳世瓚，妣杨氏，先考讳世业，妣杨氏，伯考仍迁于陈家湾。惟先考居此。然则自陈家湾迁罗城之祖，是讳天道者为始矣。¹⁴⁷

这段文字是我们认识陈家山陈氏的重要依据。陈天道是从陈家湾搬入陈家山的始祖。陈天道有两个儿子，长子陈世瓚，次子陈世业。

陈天道和次子陈世业的墓碑¹⁴⁸碑文如下：

¹⁴⁶ 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37 页

¹⁴⁷ 2009 年 2 月 9 日拍照

¹⁴⁸ 2009 年 2 月 9 日，陈家山的陈云吉带我去看了陈天道和陈世业的坟墓。陈云吉说：“这座坟是先埋后立的碑。它所在的地形是犀牛望月的地形，据说葬在犀牛的口上。有一年冬天，老先人（陈天道）出来散步，满山到处都铺满了雪。老先人走到这里的时候，忽然看到有一团地方没有雪，他觉得很奇怪，就往近走，想看个究竟。这时，一只麂子从那个地方跳了出来，一下子就跑开了。老先人觉得这个地方有灵气，于是把自己的坟选定在这个地方了。”看完陈天道的坟墓，陈云吉又带我去看了另一处的墓地。这处墓地是陈天道后人的墓地，从南向北一字排列，其坟墓坐西向东，共有 7 座。墓穴也是依山挖穴。十几年前，陈家怕盗墓贼盗墓，就在墓门前面用石条砌了一道厚厚的石墙，只留下墓门前的墓碑。墓碑前面是一溜平整的石板坝子，坝子边沿有石条护立。除了墓门前的石墙之外，其余的都是过去的规模。

清贈忠直陳公諱天道老府君之墓
清誥慈淑陳母諱劉氏太君之墓
乾隆叁拾五年

鄰庠生年家忝教弟李登岸頓首拜題
清贈彥厚陳公諱楊氏老府君之墓
清誥順正陳母諱楊氏太君之墓
祀男永暉昭楊氏孫尚亞祖希
昭楊氏孫向虞
紹宗肖
乾隆三十二年歲序丁亥孟冬月之吉

陈天道约在康熙年间（1662—1722）的前 30 年内随其父亲陈文恒搬到上里陈家山。

韩辅周、韩辅臣进入上里

康熙年三十二年（1693），陕西泾阳人韩辅周、韩辅臣两兄弟来到了水东乡上里场。韩辅周的长孙韩绍宗通过自撰墓碑碑文记录了这段历史¹⁴⁹。

克绳公亲撰碑文（康熙五十一年—乾隆五十二年）（1712—1787）

予弟兄祖籍陕泾花池头余家村人也。高祖讳霖安，曾祖讳可知，俱未入川。祖讳辅周公，父讳璉，于康熙三十二年春，与伯祖辅臣偕来斯里。越五年，叔父璉亦自陕泾来，同相沐雨栉风，竭力经营，立业于斯。后祖父昆仲髦年终天，卜葬上台，未能扶柩归秦与伯祖母祖母合冢。此予父子弟兄抱恨难释者也。叔璉娶婶魏氏，无出，相逝合葬祖侧。

父璉，娶妣曹氏于天全之忠孝乡，脉生子弟兄二人。弟名绍德，予名绍宗，后椿萱并谢，合厝于九曲水，立有碑记。宗结发刘，乃雅口城刘公嗣盛之次女也。倡随九载，中俎，遗一女，适陈氏。续娶罗，下里罗家坪文翰公之次女，未十年亦俎，遗一女，适杨氏。予乃抚名邑向氏子，更名璲，两配，二孙，心稍慰焉。后尤娶罗氏，中里头牌友志公之

¹⁴⁹ 据《韩氏宗谱》咸丰七年版

幼女也，诞子四，昭、晚、峻、旺，二女，一适刘，一尚幼。至弟德结发刘，本牌上湾正才公次女，八载俎，续娶藩，下里学敏公长女，诞子三，暉、曜、曙，女一，归刘门。

乾隆四十二年岁次丁酉应钟月上浣日命子昭敬书

康熙三十二年（1693），韩辅周与韩辅臣弟兄俩来到上里场，韩辅周还带着儿子韩琰。韩琰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亡于乾隆十四年（1749）。韩琰随父亲韩辅周来到上里时，只有15岁。韩琰20岁的时候，他的堂弟韩琬也从陕西泾阳县来到了上里，他们“同相沐雨栉风，竭力经营，立业于斯”。

关于陕西泾阳人韩氏最初来上里场作什么营生，《韩氏宗谱》以及韩氏历代墓碑均没有记载。据韩先府说：“韩家是从陕西汉中府泾阳县花池渡余家村来的。第一站是在自贡，把陕西的布贩卖到那里去卖，赚了一些钱。当地掘盐井的人看到韩家有钱了，他们有七口打不出卤水的井，他们却给韩家祖宗说，韩老夫子，我们有好井卖给你怎么样啊？韩家老祖宗觉得买盐井也不错，就答应了。就在他们写契约的时候，盐井突然开始冒卤水了。这时契约已经写好了，这几口盐井真正产盐了。韩家从此发家致富。第二站搬到了雅州府，然后才来到了上里这个地方。”¹⁵⁰据傅衣凌先生研究，明代陕西泾阳、三原等地的人们素有经商传统，而且多以贸布起家¹⁵¹。韩先府的说法，至少可以说明韩氏最早是贸布的陕西商人。

韩琰所娶的妻子并非水东乡人，而是“天全之忠孝乡”的曹氏。天全在雍正七年（1729）才改土归流的，之前由天全六番招讨使司管辖。¹⁵²韩琰取曹氏为妻的时候天全还属于土司“六番招讨使”管辖地盘。咸丰《天全州志》里并无“忠孝乡”，在“附场市”一节里有“忠义场，安乐村，二五八期”¹⁵³。韩琰妻子曹氏极有可能来自天全“忠义场”。

上里韩氏的第一桩婚姻关系距离水东乡很远，这可能是韩氏早期经商活动的范围。韩琰的父亲和伯父（韩辅周、韩辅臣）相继去世后也没有叶落归根，而是合葬于上里石柱坪上台。水东乡上里对韩辅周和韩辅臣而言是异乡。他们的子孙

¹⁵⁰ 韩先府（57岁）口述，时间：2008年12月26日，地点：上里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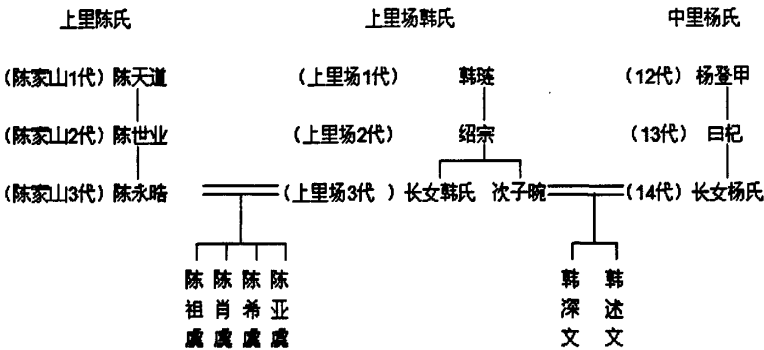
¹⁵¹ 傅衣凌：《明代陕西商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华书局，2007年，第154-167页

¹⁵² 黄廷桂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雍正七年始修，雍正十三年完成），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559册，第91页

¹⁵³ 同上

辈也以“未能扶柩归秦与伯祖母祖母合冢，此予父子弟兄抱恨难释者也”。但其后人则因为他们葬于此（从此有了祖坟）而逐渐成为了水东乡的本地人。

韩琰的两个儿子韩绍宗和韩绍德是水东乡上里土生土长的第一代，他们的婚姻关系则反映了韩氏入籍水东乡并与本地人缔结关系的过程。韩绍宗和韩绍德两兄弟入籍雅安县了，他们才能不断的续娶到当地编户在籍的女子（中里头牌、本牌上湾）¹⁵⁴。韩氏早期婚姻关系范围与他们的商业贸易范围和路线有着密切关系。韩氏兄弟所娶的女子，从雅安县城、名山县、到上里、中里、下里都有。



图表 1 韩氏早期婚姻关系图

第二节 各老姓人群树立宗支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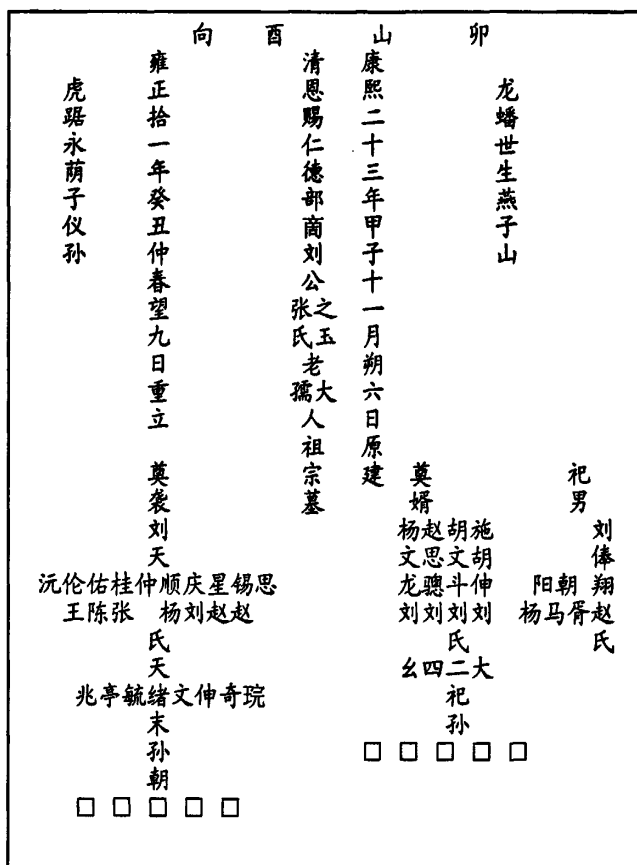
清初的水东乡还主要是农业社会，水东乡的老姓主要指明代以来就生活在水东乡的农业人群。随着社会长期相对稳定，这些老姓人群人口增长较快并开始了初步整理家族世系的活动——重立墓碑。这是水东乡各老姓人群重新确定各自的共同祖先以收族人的重要活动，是家族建设最初也是最基本的一步。

确认同一祖先

雍正十一年（1733），刘家沟刘氏在他们祖坟的坟垣里重立墓碑。上里刘氏居住于上里刘家沟，距离上里场和中里场分别为 7 里。刘氏所立墓碑是清代水东乡最早的一例超过三代的五代世系重立墓碑¹⁵⁵，其碑文如下。

¹⁵⁴ “十户为牌，牌有首，十牌为甲，甲有长，十甲为保，保有正。”（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二，户口，《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4 册，第 314 页）

¹⁵⁵ 2009 年 2 月 11 日拍照并抄录



刘之玉生有三子四女，儿子的字辈为“俸”；其孙辈有五人，孙子的字辈不详；其重孙（即“袭”）有十人，重孙的字辈为“天”；玄孙（即“末”）有五人，玄孙的字辈为“朝”。刘氏的五世字辈为“之俸□天朝”。这是清代水东乡目前看到的最早通过重立墓碑来确认同一祖先的例子。

“支”的出现

乾隆二十二年（1757），杨环的后人中里八甲杨氏在其祖先的碣前重立墓碑。这是水东乡最早的有确切证据（原碣本处从略）“重立”墓碑，其碑文¹⁵⁶如右。

据两块碑文来判断，“二支”的意思，应是以杨环排行为“次男”来确定的。也就是说，“二支众玄孙”的人群范围，是以二房

“杨环”为祖来确定，杨环的后人则同为“二支众”。

前明隆庆六年丁卯原建墓碑
男杨廷富孙杨环
明故待赠三世太祖杨志纲高氏之墓
二支众玄孙公立
大清乾隆廿二年丁丑春重立

前明万历三十年壬寅原建墓碑
明故待赠四世太祖杨廷富王王之墓
次男杨环孙□
大清乾隆廿二年丁丑春二支众玄孙重立

¹⁵⁶ 2009年1月8日拍照并抄录

“二支众”立碑者与杨環大约相隔几代呢？中里《杨氏宗谱》第六次修谱时间是乾隆廿七年壬午（1762）中秋日，由文生杨兆理录一次。杨兆理的自杨環以下的世系关系为：杨環，生秀翔，生朝纬，生登荣，生兆理。乾隆二十二年（1757）立碑时间与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六次修谱时间非常接近，我们可以认为是同一批人（杨兆理及其同辈之人）从事的这些活动，从杨環到杨兆理刚好五代。

乾隆二十二年（1757）杨環的后人以“二支众”的名义，又在五代的基础上多追溯了两代出来，认杨志纲为“三世祖”，认杨廷富为“四世祖”。这就是说，杨廷富其他四个儿子（杨变、杨珊、杨瑚、杨珠）的后代，都可以参加到“二支众”的这次立碑活动中来，这种人群范围，则比以杨環后代为准的范围大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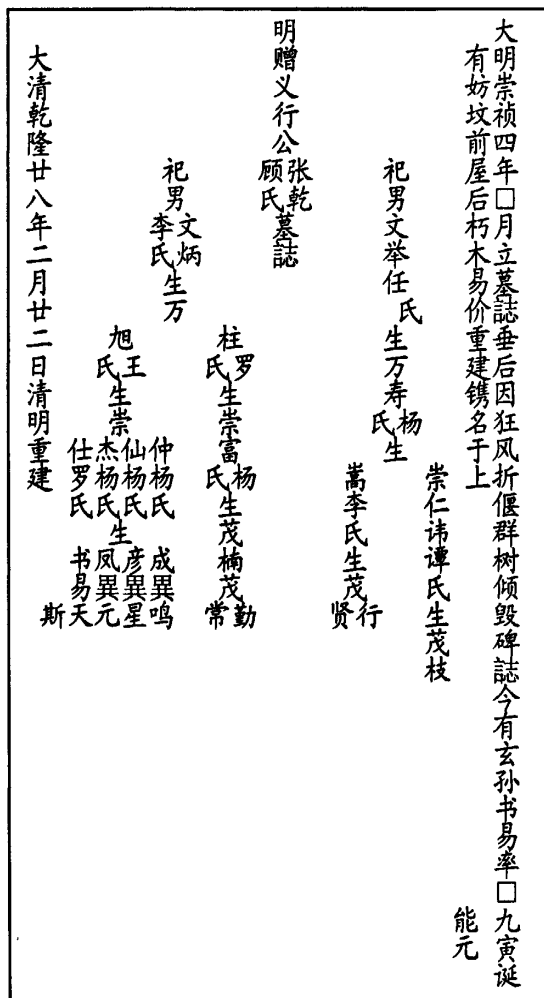
“支”的出现意味着追溯祖先不再受到五代的限制，以谁为祖，其后人则为一宗；一宗即为一支。从理论上讲，以此墓碑主人为主，即“别子为祖”，此墓碑主人的后代，即“继别为宗”，其后人自然成为一宗，一宗人群即是一支人群。这大约就是“宗支碑”名称的来历。

张氏重建“墓誌”

上里张氏分布在今天的张家坪、张家沟一带，这一带靠近芦山岗山脚，距上里场约 8 里路，张氏人群以农为业，五甲口场和中里场是他们交换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张氏与五甲口场、中里场约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乾隆二十八年（1763），上里张氏重建“张乾”墓碑，这是上里张氏最早的纪录世系的墓碑，其碑文¹⁵⁷正面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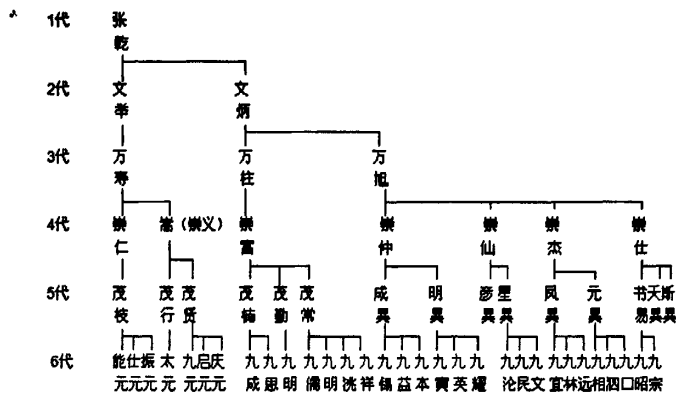
张氏声称崇祯四年（1631）立过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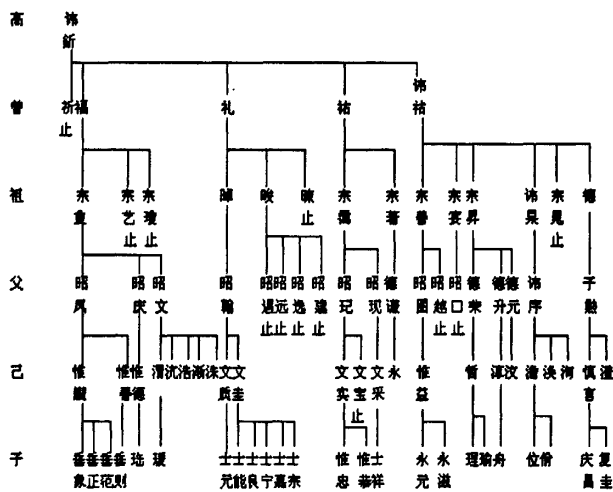
¹⁵⁷ 2009 年 1 月 2 日拍照并抄录

“墓誌”，后因狂风吹断大树¹⁵⁸，大树打毁了“墓誌”，张氏就把墓地附近的、房前屋后的树木砍伐并卖了，卖得钱文用来重新树立这通墓碑。这次活动是有组织的，张书易（即张书巽）率领张九寅、张能元等人主持这项树碑工作。

该碑背面还有一个世系，经过整理（见下表），这通“墓誌”背面碑文所要表达的世系关系，居然与苏洵当年创修的族谱相似，张书易在张氏世系表中的位置与苏洵在苏氏世系表里的位置相同。这说明乾隆年间，水东乡读书人相继开始学习儒家谱牒之学。



图表 2 上里张氏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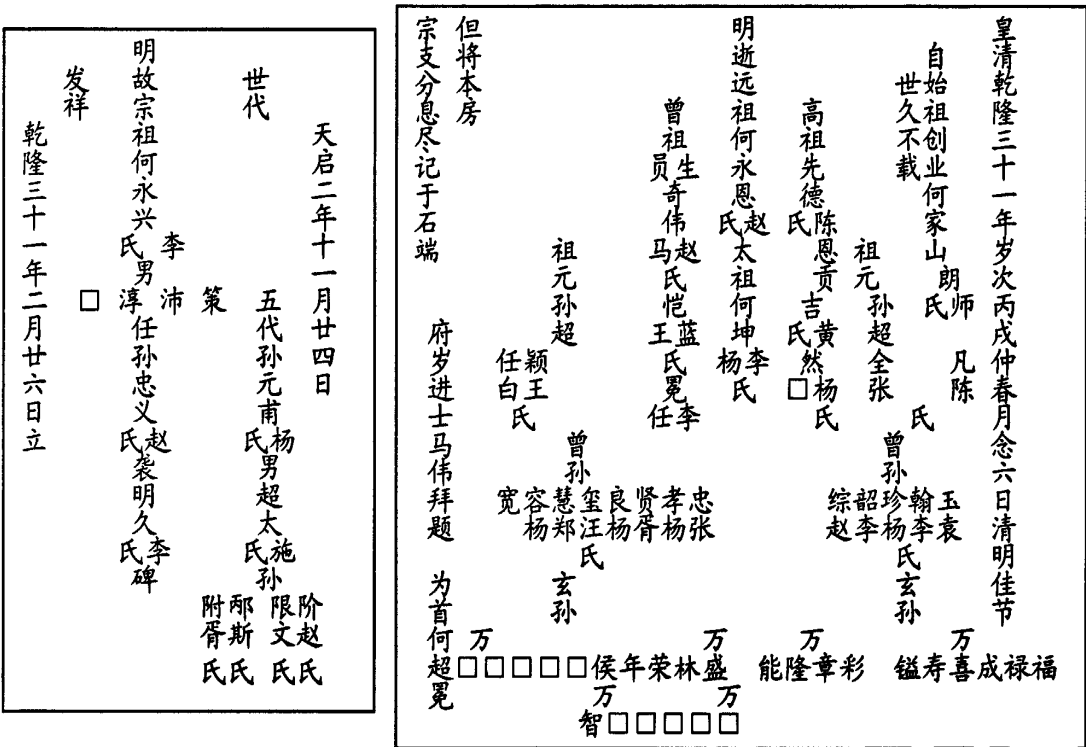


图表 3 苏洵《苏氏族谱》世系表

¹⁵⁸ 我向当地人问过关于吹大风的事情。杨正强说：“这里每年的四五月份都有阵性大风，有时风大的吓人，树子都要吹断，农作物也要受灾。”（杨正强口述，时间：2009年2月5日，地点：上里镇）杨世松也说过：“每年的五六月份，有时在七八月份，就会刮大风。”（2009年9月18日，电话采访杨世松）

该宗支碑文中省略号部分，属于泥土掩埋部分，无法辨识。这通宗支碑的背后紧贴一个圆头的石头，用手拨去地表的一层泥土，可以看到这个圆头是石碑的头。根据中里八甲杨氏在明代碣前重立墓碑的做法，这块圆头石头应是明代何永松的墓碑（崇祯四年，1631）。这通宗支碑的背面刻有“为首何超彦、楹，石匠何现造”。何超彦、何超楹作为“为首”之人，他们自然很清楚各自的父亲和儿子。但他们在书写这种世系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准确表达在宗支碑上，只是笼统书写成一排“男”，造成了现在无法把他们的上下世系搞清楚的局面。以下的三通宗支碑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现象似乎在提醒我们，在这些乡民眼里，准确无误的世系关系，并不是他们重点要表达的内容。他们想要确认的是，哪些人属于某一个共同祖先，哪些人应该在哪通宗支碑上。

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通宗支碑¹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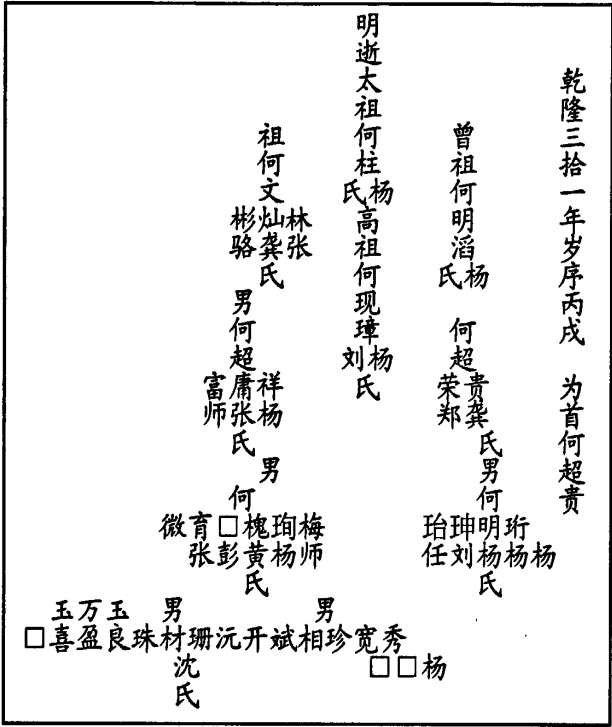
第二通宗支碑是以何永兴为“宗祖”，何永兴去世于天启二年（1622）。我们可以猜测这是以“何超太”为首的人群（四个儿子）所立的宗支碑。

第三通宗支碑以何永恩为祖，为首者何超冕。“自始祖创业何家山，世久不

¹⁶⁴ 同上

载。但将本房宗支分息尽记于石端。”这是以“房”为单位进行的宗支分裂。

我们再来看第四通宗支碑¹⁶⁵：



该宗支碑为首者何超贵把“太祖”确定为何柱，实际上他少算了一代，何柱的父亲就是何永恩，这个纪录保存在何家湾小地名叫李极岗（音）的宗支碑¹⁶⁶（乾隆五十二年，1787）。

四通宗支碑为首人分别是：何超彦、何超楹；何超太；何超冕；何超贵。这四通宗支碑的字迹显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题写的，也是由不同的人刊刻的，它们的费用（石碑及其制作）显然也是由各宗支成员承担。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何氏进入水东乡的时间。嘉靖十年（1531）《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¹⁶⁷中没有何姓人名。水东乡最早出现何姓人名的是《白云庵碑记》¹⁶⁸，共有 6 人，分别为：何□□，何□□，何魁、何坤、何柱，僧人普慨。何坤与何柱分别出现在了何氏宗支碑上，他们为堂兄弟。何永兴、何永恩、何永松与上里张氏进入水东乡的时间相近，大致是在嘉靖后半期万历前半期

¹⁶⁵ 同上

¹⁶⁶ 2009 年 5 月 4 日抄录并拍照，地点：中里镇何家湾

¹⁶⁷ 请见附录《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

¹⁶⁸ 请见附录《白云庵碑记》

这通宗支碑不象上里张氏与中里何氏在过去先人坟墓前立碑(至少他们认为立碑之处为坟墓),并以此先人作为宗支世系的起点。

该碑背面刻有“序”,这种石碑背面刻“序”的形式,也是水东乡的第一例。其“序”全文¹⁶⁹如下:

长发其祥

粤自太祖桂芳,原籍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扁人氏。明初升任嘉定,任满于崇庆州白塔山入籍,后移居雅州水东乡下黄村河北街龙门后入籍。故亦号曰白塔云。妻时、海氏,所生三子,长名万生,于洪武四年移居罗城上里老漕溪口,以至于今四百余年矣。其子孙蕃衍,支分派别,何止千户。欲溯源而析其流,非书有载志,户有谱牒,安能以家乘之大略昭示来兹也哉。

岁在壬寅,宗长荣春垂念家门有志族谱,因议勒碑。自太祖、高祖、尊祖以及远孙,逐依刻石,既命工,请序于予。予曰:“由太祖而上之,则渊源始于弘农。自太祖而下之,则统绪逮于近今。总自古初世口,不及子孙蕃衍。然太祖视之,则皆子孙也。后之人庶得阅碑而瞭然在目。凡载志谱牒,由此而传泽之不斩。宗法之不失于后世也”。

是为序。

石司王现

名邑庠生一十七代玄孙杨奇伟撰

这通宗支碑主要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石碑正面的世系纪录,一个石碑背面的祖籍来历。按照“序”的说法,杨桂芳原籍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扁,明初杨桂芳在嘉定做官,致仕于崇庆州白塔山入籍,后来又移居到雅州水东乡下黄村河北街龙门入籍。杨桂芳生有三子,长子万生于洪武四年移居罗城上里老漕溪口。这段迁徙历史是由十七代孙杨奇伟撰写的。杨奇伟在杨玉環以下世系里的代数位置,也与苏洵在苏氏族谱中的代数位置一样。杨奇伟所谓“非书有载志,户有谱牒,安能以家乘之大略,昭示来兹也哉”,透露出他的信息来源有两个,即“书有载志”和“户有谱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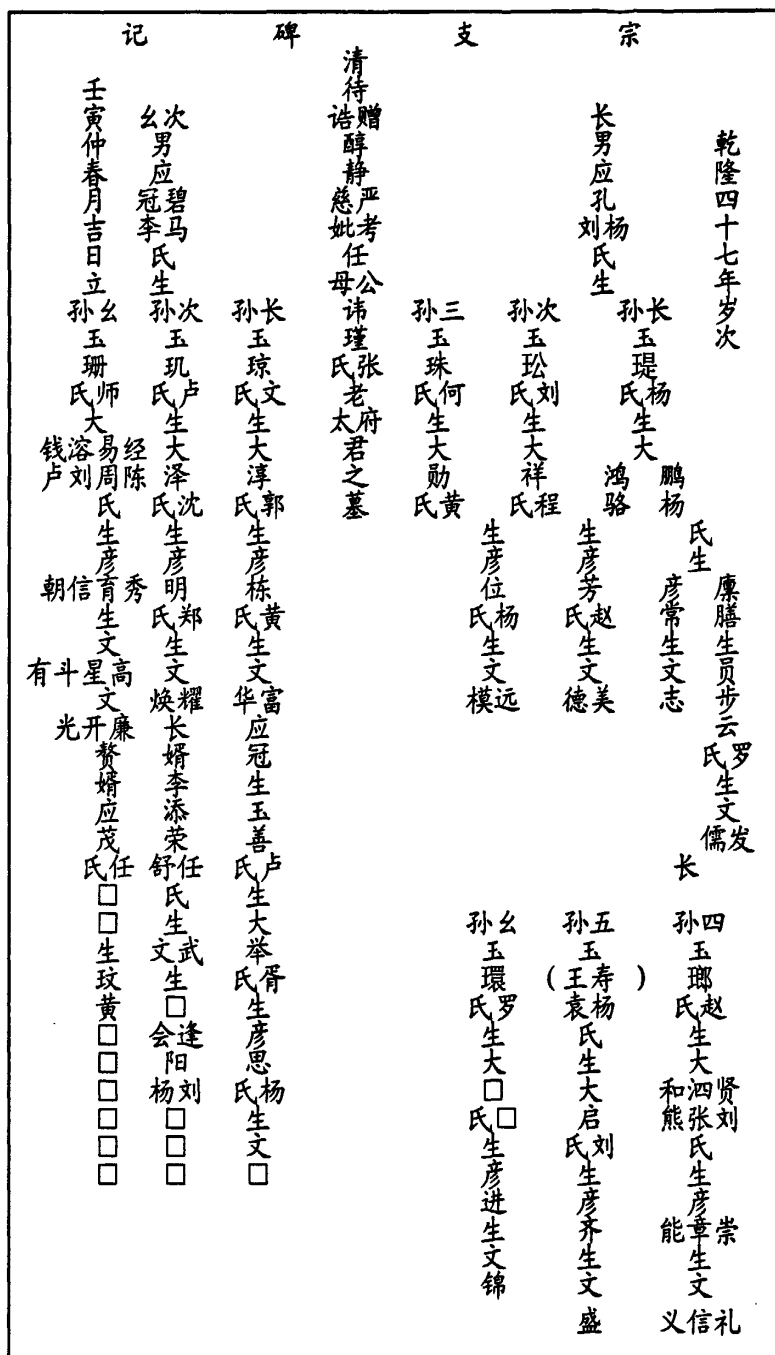
¹⁶⁹ 2009年2月13日拍照并抄录

任氏宗支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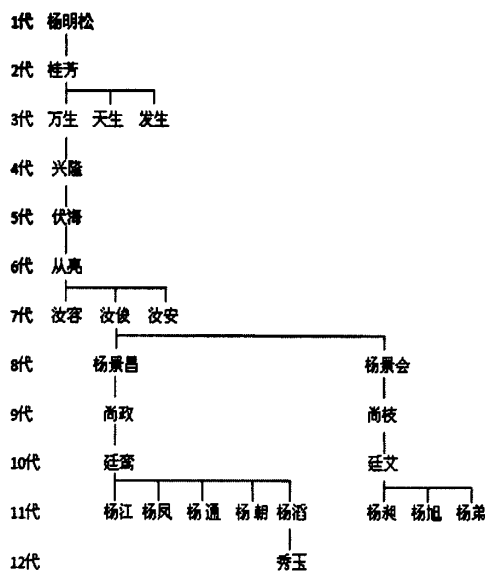
乾隆四十七年(1782)任氏树立的宗支碑，其碑文¹⁷⁰如右。

“康膳生员”任步云为整理世系和树立宗支碑的主持者，“步云”一名是他的学名，他甚至不愿意把自己宗支内部使用的名字写上去（属“彦”字辈）。这种采用与众不同名字的做法，反映了他高傲而自豪的心态。任步云在世系表中的代数位置，和苏洵修谱所在的代数位置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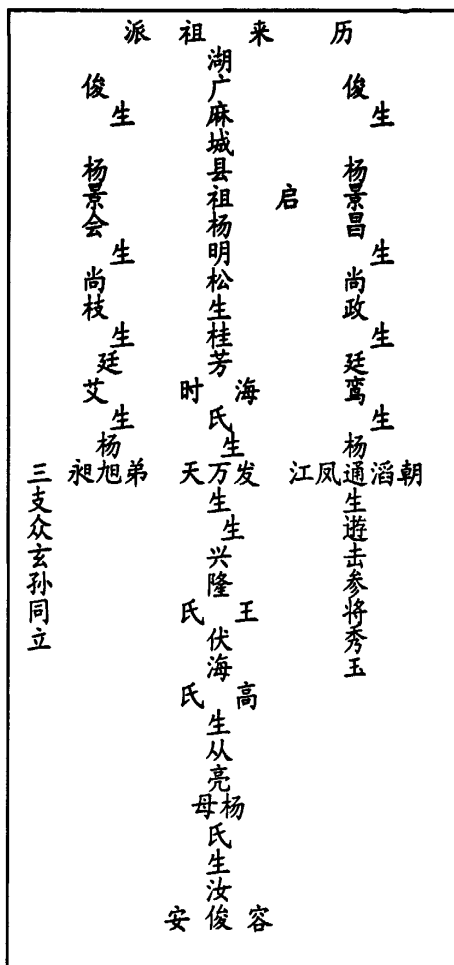
庙坏杨氏宗碑



¹⁷⁰ 2009 年 1 月 3 日拍照并抄录



图表 6 杨氏宗碑世系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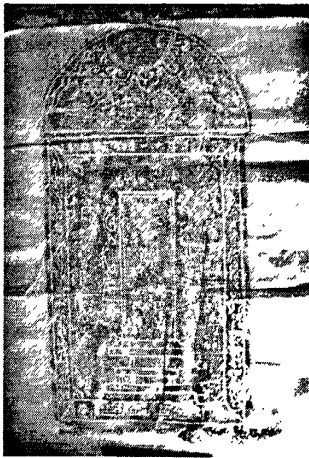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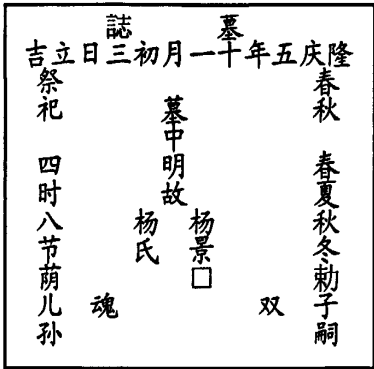


庙坏杨氏部分地继承了名山县杨奇伟的祖籍“麻城县孝感乡”和起祖“杨桂芳”的观念。综合两面世系碑文判断，“三支众玄孙同立”具体指的是以杨秀玉为祖的这支后人共同立碑。理由有二，一是宗碑背面最后一代（12）只有杨秀玉，二是据杨秀玉的墓志载，他排行为三。

庙坏杨氏从“汝”字辈以下世系是有血缘事实根据的。据嘉靖十年（1531）《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¹⁷²：“□□□塑粧信士 杨如安 男杨景茂 女杨妙福 孙杨尚仁 杨尚德 杨尚昱 孙婿胥尚才”。“杨如安”就是宗碑上的“杨汝安”，因为宗碑确定的太祖为“杨汝俊”而不是“从亮”（即乾隆四十七年杨氏宗碑的“崇亮”），所以“杨汝安”的这支世系并没有收录在宗碑里。杨景茂为嘉靖十年（1531）水东乡里正，那么杨景昌和杨景会也是同一时代的人。这通宗支碑

¹⁷² 请见附录《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

所在墓地里，有隆庆五年（1571）的碣，其主人为“杨景□”，其碣文¹⁷³如下：



照片 2 原碣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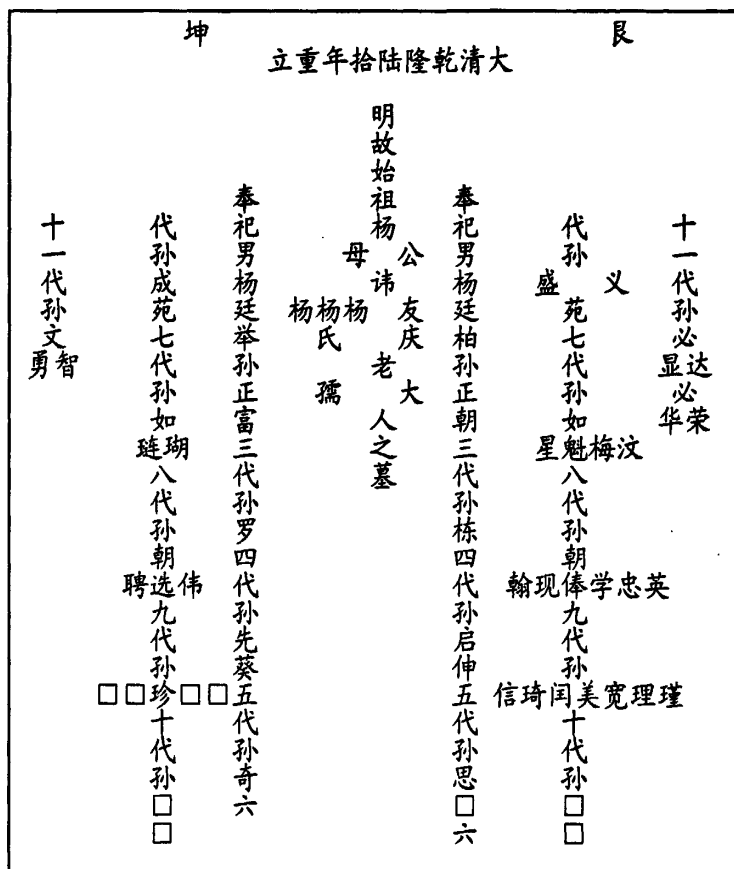
杨如安三代的字辈为“如、景、尚”，宗碑在没有收录杨汝安世系的情况下，其三代字辈也是“汝、景、尚”。显然，嘉靖初年庙坏杨氏的确存在字辈排行为“汝、景、尚”的人群。明末清初杨秀玉墓志表明，“尚”字辈下面是“廷”字辈。到杨秀玉的父亲，其名为单字“滔”，排行五，杨秀玉的父辈并非以字辈取名。杨秀玉的儿子杨连杰有墓碑（康熙五十年荣立，乾隆四十六年重建），杨连杰的儿子杨如瑛有墓碑（嘉庆十六年立，纪录到“文”字辈），杨如瑛的儿子杨宗仕有墓碑（道光二十五年）。

祖籍“麻城县”的观念最开始在水东乡人数最多、迁居史较久的杨氏人群中传播。这通宗碑的树立者主要以“体”字辈人群为主体。

上里杨氏宗支碑

上里杨氏（以杨银炉为起祖）居住于上里杨家沟，这里距离上里场 2 里路。上里杨氏没有留下一通明代的碣或者碑。乾隆六十年（1795）上里杨氏在斑竹林岗树立一通宗支碑，碑文¹⁷⁴如下：

¹⁷³ 2008 年 12 月 29 日拍照并抄录
¹⁷⁴ 2008 年 12 月 20 日拍照并抄录



这通宗支碑有关杨氏明代的世系纪录不太准确。据嘉靖十年（1531）《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载：“杨铎 男杨友庆 杨友金 孙杨廷礼 杨廷□ 杨廷权 性廷”¹⁷⁵。这通宗支碑的误差表明，乾隆六十年（1795）以“杨友庆”为宗的这支上里杨氏的经济文化水平不会超过庙坏杨氏和中里八甲杨氏。

第三节 即宜忠亲与圣谕十六条

回顾整个乾隆时代的水东乡，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农业人群有关“族”的建设轨迹。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各老姓人群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时候，相继在祖先墓地重新树立墓碑，资金来源有的来自族人捐资，有的来自公卖坟地树木，他们在墓碑上把共同祖先以下的世系刊刻出来，其后发展为树立宗支碑。共同的时间（清明节，9通宗支碑中7通立于清明节）、共同的空间（墓地）、共同的活动（祭祀祖先和树立宗支碑）、共同的财产（宗支碑），不固定的组织（从

¹⁷⁵ 请见附录《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

领导者的人数来看，上里张氏3人，中里何氏有2人的，有1人的，庙坪杨氏则没有相关记录，其宗碑还是请外姓庠生张际可题写，上里任氏则出了一名廩生），这是乾隆时期四川相关产茶地区农业社会“族”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经济条件较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组织形式相对松散的“族”的活动，其特点是：坟地是建设“族”的重要地点，坟地里的树木是重要的资金来源，清明祭祀祖先和树立宗支碑是收族的重要活动。四川雅安水东乡老姓人群并非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他们这些“族”的活动和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清四川乡村社会延续特点¹⁷⁶（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今天）。

乾隆时代四川雅安水东乡农业人群“族”的活动，在共同财产规模、共同活动的组织水平与活动频率上，都无法与同时代华南地区（如广东）的宗族相比。仅举一例，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广东巡抚王检奏：粤民多聚族而居，每族祠置祭田，名为尝租，大
户多至数千亩，小户亦有数百亩，租谷按支轮收，除祭祀完粮外，积至
盈千累万，资财丰厚，往往倚强凌弱，恃众暴寡，其势均力敌者，不能
取胜，则祠内纠众出斗，议定族中斗伤人，厚给尝租以供药饵，因伤身
故者，令木主入祠，给尝租以养妻孥，如伤毙他姓，有肯顶凶认抵者，
亦照伤故例。¹⁷⁷

王检还提到，因为宗族势力强大，“倚恃族蕃资厚，欺压乡民，甚至聚众械斗，牟利顶凶”情况在闽粤两省最为突出¹⁷⁸。四川省雅安水东乡与福建、广东两省的族群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地区间的族群形态也具有明显差异的，广东的宗族有祠堂、祭田，四川雅安水东乡的富有的族则有寺庵。在水东乡内部，族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性。中里八甲杨氏拥有宗谱，并把茶园山地捐献给寺庵，另一些经济水平相对低下的老姓人群，则在墓地树立宗支碑。

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变化又与王朝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雍正朝后期，水东乡开始重立墓碑，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各老姓人群树立宗支碑的热情高涨，宗支遍地开花。乾隆四十七年（1782），水东乡上里廩膳生员任步云在宗支

¹⁷⁶ 请见第七章有关中里赵氏子母庙的例子。

¹⁷⁷ 《清实录》一八，高宗纯皇帝实录（一〇），卷七五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358页

¹⁷⁸ 同上，第359页

碑上“宗派列叙碑后”写道：“圣朝恩同伏载，德媲陶唐，弘作君作师之任，广欲立欲达之心，育民以仁，摩民以义，我辈食恩载德，即宜忠亲。”¹⁷⁹这通宗支碑立于平时人迹罕至的山林墓地，任步云写的这些文字当然不是在谄媚朝廷，这应是那个时代水东乡士人的普遍心声。这期间的变化，不能不与最高统治者的良苦用心有关。

康熙皇帝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康熙九年（1670）：

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讐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¹⁸⁰

礼部就康熙皇帝的指示做出了部署安排：“礼部题：皇上弘敷教化，特颁圣谕十六条，以示尚德缓刑，化民成俗至意。应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¹⁸¹

这是圣谕十六条的大致来历。其第一条第一个提倡的就是“孝”。康熙皇帝努力提倡这种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伦理，实际是在主动承接中国文化传统，以继承文化的传统来获得现实统治的正统。圣谕十六条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伦理“忠君爱国”。明清君国变更，清王朝立国之初还没有如此高的宣传效率，能在短时间内让一般乡民在感情上忠此君而非彼君，爱此国而非彼国。圣谕十六条非常巧妙地把政治伦理“忠君爱国”融入到文化伦理里面，提倡一家一户敦孝弟与完钱粮。只要清王朝政府成功维持对一代人的统治，那么忠君思想就可以通过乡民“忠亲”行为得以实现。

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钻研圣谕十六条，“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

¹⁷⁹ 2009年1月3日拍照并抄录

¹⁸⁰ 《清实录》四，《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三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461页

¹⁸¹ 同上，第466页

《圣谕广训》，并制序文，刊刻成编，颁行天下”。¹⁸²雍正三年（1725），“礼部议覆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照条奏：《圣谕广训》一书，乃我皇上仰体圣祖仁皇帝觉世牖民之心，而推广其义。请令各省学臣转颁各州县教官，俾童蒙即加诵读，县府考覆试时，令其背录一条，方准录取”。¹⁸³从此《圣谕广训》成为儿童启蒙教育和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清王朝政府通过科举制度，首先在读书人（士）中推行这套“笃宗族”的理论和观念，通过士人在乡间的实践，从而实现全国各地的有效统治。

水东乡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士人人数的增长情况，仅以中里八甲《杨氏宗谱》和本文所引用的各姓墓碑、宗支碑为例，不完全统计如下¹⁸⁴：

表格 2 康熙至乾隆朝水东乡士人统计表

	水东乡产生的士人	所在姓氏	资料来源	资料地点	进入水东乡的士人
康熙朝	文生杨朝经	中里八甲杨氏	杨氏宗谱	中里镇建强村	
	贡生杨朝春				
	文生杨登舟				
	待选贡元张嵩	上里张氏	康熙五十八年墓碑	上里镇七家村张家坪	
雍正朝	文生杨登贤	中里八甲杨氏	杨氏宗谱	中里镇建强村	
	府学生员杨作泮	上里杨氏	乾隆八年杨毓柏墓碑	上里镇治安村杨家沟	
乾隆朝	文生杨兆尧，名锦	中里八甲杨氏	杨氏宗谱	中里镇建强村	
	正榜杨兆禹，名钧				
	副榜杨兆舜，名镇				
	文生杨兆汤，名锐				
	廩生杨兆尚，名钟				
	文生杨兆孔，名鏊				
	文生杨兆理				
	恩贡何元吉	中里何氏	乾隆三十一年宗支碑	中里镇复兴村何家湾	本府岁进士马伟题碑
	庠生吴经	中里吴氏	乾隆四十六年杨连杰墓碑	上里镇庙坪村	
		老漕溪口杨氏迁入名山县	乾隆四十七年宗支碑	上里镇治安村	名山县庠生杨奇伟撰文 雅州府学生员杨尚志题碑
	廩生任步云	上里任氏	乾隆四十七年宗支碑	上里镇四家村任家沟	
	岁进士杨调元	上里杨氏	乾隆五十年匾额	上里镇治安村杨家沟	
	国学生杨体富	庙坪杨氏	乾隆五十五年宗碑	上里镇庙坪村月儿坝	
	生员杨奇才				
	文生杨琦	中里八甲杨氏	杨氏宗谱	中里镇建强村	
	文生杨珣				
	己酉科经魁赵国栋	中里赵氏	嘉庆二十四年子母庙碑记	中里镇龙泉村	
	庠生张际可	上里张氏	乾隆六十年法华寺碑记	上里镇共和村	

士家大族中里八甲杨氏率先有人做官，他们引领了水东乡的潮流。据中里《杨氏宗谱》载，乾隆十二年（1747），正榜杨兆禹“丁卯科，实授邻水县教谕”，乾隆二十七年（1762），杨兆舜“壬午科第一名副榜，朝考八旗教习”¹⁸⁵。八甲

¹⁸² 《清实录》七，《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一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266页

¹⁸³ 《清实录》七，《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三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481页

¹⁸⁴ 嘉庆二十四年（1819）“培修子母庙建立宗支碑记序”中，还记录有“清秀士赵恩禹、廩生赵全鉴”；同治四年（1865）陈志裕墓碑还记录其高祖文生陈凯新、叔曾祖廩生陈思儒。想必水东乡还有许多目前我未看到的碑记纪录。

¹⁸⁵ 关于副榜，周询指出：“副榜又称副贡，不能应会试，亦无朝考，只能以教职及直隶州州判归部注册选用。但仍可应乡试”。（周询：《蜀海丛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0007，文海出版社，第119页）

杨氏培养出来的这两名官员，相继离开水东乡，他们在水东乡并没有留下重要活动的痕迹，然而他们在朝廷里取得的功名和社会地位的事实，应对水东乡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乾隆五十年（1785），上里杨氏在杨家沟建房，并立木刻扁额一道。这道扁额镶于房屋正门木结构的墙上，保留至今。其扁文¹⁸⁶如下：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署雅安县事昭化县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 孙 题
岁进士文林郎杨老爷讳调元 立

经明行修

撰典刘文耀 为
乾隆五十年岁序乙巳孟秋月吉旦

该匾额显示，杨调元是水东乡第一位“岁进士”。

国家与族的关系在水东乡更多的是协调与配合的一面。清王朝政府把“圣谕十六条”加入到科举考试之中，使各地读书人接受“笃宗族”的观念，各地在乡士人建设自家的“族”，宣扬“忠亲”思想。水东乡农业人群则以树立宗支碑、整理世系和收族的方式逐渐地实践着清王朝政府提倡的“笃宗族”的主张。国家权力得以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有效影响。

康雍乾时代水东乡相继有入学纪录的姓氏人群，多是明代延续下来的老姓人群。乾隆时期水东乡相继形成的宗支，也多是明代延续下来的老姓人群。水东乡在乡士人乾隆时期大幅增多，带动了各老姓人群相继树立宗支碑，这是清王朝国家权力的影响在水东乡加强的表现。

¹⁸⁶ 2008年12月19日拍照并抄录

第三章 川藏贸易与五甲口场的崛起

水东乡到乾隆年间各姓宗支相继形成，这是清王朝一百余年来“文治”的成就之一。乾隆末期水东乡的社会经济变化则需要放在更广大地域范围内的历史脉络里才能看得清楚。我们有必要先看看康雍乾时期清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历次“武功”，看看这些重要的军事政治活动如何影响到雅州地区，进而逐步改变水东乡这片地域的社会经济方向。

第一节 雅州地区地位的凸现

吴吉远对川藏贸易和打箭炉的产生做过很好的研究。他主要立足于茶叶总汇地打箭炉来论述川藏贸易，他指出：川藏贸易集散地的西渐过程，是中央王朝势力深入的结果。清以前川藏贸易集散地基本上在大渡河以东，贸易地点总是在黎州、雅州、碉门等地徘徊。明末清初之际，私茶贸易才开始西移至打箭炉。打箭炉的明正土司则充当了川藏贸易汉藏之间的经纪人。锅庄业、缝茶业、皮房业是打箭炉的三大行业。打箭炉的商人以陕商、川商、喇嘛商、土司商为主。茶帮为炉城中最大的商帮，分雅安、荊经、天全、名山、邛州五帮，但他们并没有联合组织。西藏方面的货物主要是黄金、麝香、虫草、贝母、知母、鹿茸、羊毛等，内地货物主要是茶叶¹⁸⁷。

本文想在此基础上把川藏贸易放到时间脉络里，梳理雅州府地区地位的凸现过程。通过这一梳理，我们会看到“川藏贸易”的内涵并非仅是商业活动，茶叶并非单纯的商品，打箭炉茶叶出口量持续增加或短暂回落，也不仅是商业活动的结果。这有利于我们理解水东乡五甲口场的崛起。

雅州升府：入藏基地的形成

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王朝军队第一次经打箭炉进入里塘、巴塘，就充分利用茶叶这种藏区的必需品，为其军事政治目的服务。“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里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具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酌量定发，许其买运。巴塘以

¹⁸⁷ 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西藏研究》，1995年2期

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¹⁸⁸

雍正元年（1723），清王朝军队打通了打箭炉经霍尔、甘孜一带进藏的道路¹⁸⁹。雍正三年（1725），清王朝取消了西藏方面对到打箭炉交易的番民收取贸易税的权力。作为交换条件，清王朝每年赏赐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茶叶分别是五千斤和二千五百斤¹⁹⁰，规定每年由荣经县置办这些茶叶，运至打箭炉¹⁹¹。

雍正七年（1729），由于西藏政局不稳，需要把七世达赖喇嘛保护好¹⁹²，朝廷决定在打箭炉西北的噶达地方修建一座寺庙，暂时安置七世达赖喇嘛。同年，打箭炉榷关做了调整，机构精减，部、院只派一名员外郎作监督，笔帖式由两员缩减为一员，而且不准干预税务，并撤销了钦差喇嘛一缺¹⁹³。打箭炉榷关监督拥有了管理地方事物的权力，他还开始征收茶叶以外的“杂货税”¹⁹⁴。

雍正七年（1729），雅州升为府。天全改土（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归流成为州，连同名山县、荣经县、雅安县，辖于雅州，雅州府同知（正五品）分驻打箭炉。雍正八年（1730），黎大所改为清溪县，属雅州府。打箭炉开始驻守户部榷关系统以外的地方行政官员（雅州府同知，正五品），这显示了打箭炉从单一的税关，逐步发展成承担更多政务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过程。至此之后，雅州府分驻同知（后来简称为“打箭炉同知”）与打箭炉关监督同处炉中，各司其职（乾隆十年打箭炉关监督把管理地方事物的权力移交给了打箭炉同知¹⁹⁵）。

随着清王朝对西藏控制的日益加强，打箭炉逐渐成为各类人员由雅州进入西藏的重要孔道。各种进藏物资都需在雅州采集办齐，再运于打箭炉储存，以备中转。从雅州到前藏有几千里的道路，如此漫长的补给线使得王朝军队的活动必须

¹⁸⁸ 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嘉庆二十一年刻），卷六十九，食货，茶法，《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一辑，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71页

¹⁸⁹ 《卫藏通志》，卷十三上，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事例、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卫藏通志》三种合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140页

¹⁹⁰ 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嘉庆二十一年刻），卷六十七，食货，榷政，《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一辑，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¹⁹¹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二十九年），卷一百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624册，第509页

¹⁹² 雍正五年（1727）西藏发生叛乱，噶伦阿尔布巴与公隆布鼐、台吉札尔鼐联合，杀了当时的藏王贝勒康济鼐，台吉颇罗鼐逃往后藏。当时噶伦阿尔布巴等人还准备再与新疆准噶尔人联合反抗清朝政府。雍正七年（1729）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在青海失败后，也逃到新疆，和准噶尔蒙古人结合，声势浩大。雍正皇帝为提防准噶尔人偷袭西藏，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到打箭炉附近，保护起来。（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三联书店，1963年，第30-32页）

¹⁹³ 赵殿最、诺穆图：《奏为敬陈管见稍补边疆事》，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嘉庆二十一年刻），卷十七，食货，榷政，《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一辑，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¹⁹⁴ 吴丰培辑：《打箭炉志略》（乾隆末年），关榷，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十三，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第15-16页

¹⁹⁵ 《清实录》一二，高宗纯皇帝实录（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92页

依赖沿路的乌拉差役，以便转运银粮物资。茶叶、布匹等开始成为雇募乌拉和赏赐各地大小头人的常备物资。清王朝军队在藏区活动，通常还会把茶叶作为重要货币支付手段之一。“凡遇有营官头人之处，例必更换乌拉，法宜先须赏需，如缎锦、绫布、哈达、银牌、茶烟等项，按其官役尊卑，逐名颁给，再按站程，差照题定脚价银两，当面亲自发给，务取蛮人领状存案。”¹⁹⁶

显然，打箭炉茶叶出口量与清王朝军事活动具有密切关系。《雅州府志》载：

本朝昔年西藏用兵，人多茶少，边腹额引不□□□其□□以愚民请增引额数□颁普及。及今平定已久，藏兵已□□□难销而部颁额定□□定为成□（笔者注：该处只有单人旁，疑为“例”字）逐（笔者注：疑为“遂”字之误）难开除。商民多受其累。守土之官以其恤商于后毋宁□□于始。¹⁹⁷

用兵西藏之时，“人多茶少”，茶叶需求量增加，茶商则“请增引额”，自然出现茶叶出口量的增加。一旦“平定已久”，茶商原来申请增加的茶引部分，短期内则出现了“难销”的局面。因为户部确定的茶引数额关系到茶税收入，户部一般只会同意茶商申请增加茶引数量，以形成“定额”，不会轻易同意茶商申请减少茶引数量。王朝军队一旦停止在藏区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就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茶商“难开除”先前增加的茶引部分，军事活动的减少，则立刻影响到茶叶的需求量，出现“商民多受其累”的情况。

随着清王朝军队对藏东各个地区的清理（如乾隆十年进剿瞻对），内地到西藏的补给线建设也步入正规化。乾隆十六年（1751），打箭炉至前藏沿路五千四百里，已形成了六个粮台，即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拉里、前藏¹⁹⁸。这些活动加深了内地与西藏地区的经济联系，同时也扩大的清王朝控制的地域范围，茶叶需求量持续上升，包括雅州府在内的茶园经济蓬勃发展。¹⁹⁹

¹⁹⁶ （雍正十年）王世睿：《进藏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74-76页

¹⁹⁷ 曹抡彬、曹抡翰辑：《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茶政，《中国地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廿八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第137页

¹⁹⁸ 《清实录》一四，高宗纯皇帝实录（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0页：“四川总督策楞等奏，西藏粮务台员，驻扎番地，三年一次更换。自打箭炉至西藏，共计六处。惟打箭炉与西藏粮务，例系递委同知、通判。其余里塘、巴塘、察木多、拉里四处，俱系于县丞、州同等杂职内派委。”

¹⁹⁹ 《清实录》一七，高宗纯皇帝实录（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页

进剿小金川战役：白银投放地

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王朝开始进剿小金川，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结束，历时五年多。雅州府在这次战役中地位亦很重要。当然，这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战役，乾隆皇帝在《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也指出了这一点：

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费帑不及三千万，成功不过五年。今两金川小寇，地不过逾千里，人不满三万户，而费帑至七千万，成功亦迟至五年，则以跬步皆险，番奴效命死守，故得迟至今日。²⁰⁰

既然乾隆皇帝自己都表了这个态，后世清代人则敢沿用“费帑至七千万”的说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魏源的《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²⁰¹。道光年间的清王朝海疆不守，魏源重提乾隆朝的武功，不过是激励当时人心而已。不过，魏源在清末学界影响大，经他转述乾隆皇帝的原话后，金川战役花钱太多的印象对后世的影响至深。1963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整理《金川案》过程中，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魏源的这篇文章（而没有收乾隆皇帝的《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

《四川古代史稿》认为，大小金川战役花如此多的钱，“四川作为这场持久战争的后援基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清王朝的军政官员却乘机贪污中饱，大发横财，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末，嘉庆初，四川地区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的确不是偶然现象”²⁰²。王纲也主要倾向认为大小金川战役是一场耗资巨大、得不偿失、穷兵黩武的战争²⁰³。彭焱陟认为“为剿灭金川，乾隆皇帝不惜用巨饷、重兵。……可见乾隆皇帝灭金川之决心”²⁰⁴，这种看法也并没有超出王纲的概括。

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金川真的有这么重要吗？花这么多银两只是为了灭金川吗？乾隆皇帝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切实地考察大小金川战役之后四川西部相关地域的社会经济变化，进行实证研究，这是较全面地看待和评价这场战役的关键所在。让我们先看看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的上谕。

²⁰⁰ （清）方略馆纂：《平定两金川方略》（上），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汉文文献编辑室，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第17页

²⁰¹ 魏源：《圣武记》，《续修四库全书》·0402·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19页

²⁰² 蒙默、刘琳、唐光沛、胡昭曦、柯建中：《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12页

²⁰³ 王纲：《清代四川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十、十一章。其书自然也指出了四点积极意义：四川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保障了川藏、川青交通的畅通；促使了清政府认真注意调整民族政策。（399-400页）

²⁰⁴ 彭焱陟：《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83页

上谕并灭金川

三十七年正月丙午

上谕军机曰：……果能并灭金川，实一劳永逸之计，朕亦断不惜费。昨岁已拨饷三百万两解川备用。将来并不防再添拨三百万两。现谕户部查议，另降谕旨。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万。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今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余，朕实不欲其多聚。若拨发外省，公事动用，稍减盈积之数，亦属调剂之一端。将此意亦令温福等知之。²⁰⁵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王朝财政收入充裕，户部库存白银多至八千万两²⁰⁶。面对如此多的库存白银，乾隆皇帝考虑的重点是如何进行财政开支，把库存的白银花出去。如何开支这些从全国各地聚集的白银呢？是花销于北京皇城翻新扩建，还是在各个省府建立宏伟建筑、广场以颂盛世？或是雇佣无聊文人戏子吹嘘盛世？乾隆皇帝选择的是通过战争形式开疆拓土，把这些白银“散”在西部地区，让这些多来自四川东部各省的白银，流动到辽阔的内陆西部地区去。“并灭金川”，则成为“拨发外省，公事动用，稍减盈积之数”的“调剂”方法之一。

据《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所列的“收支大总”，不完全统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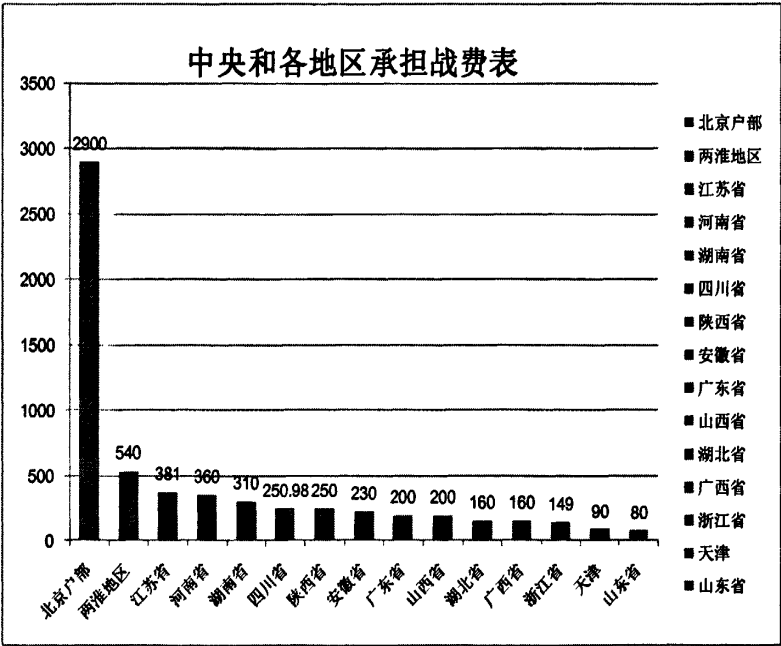
²⁰⁵ 《金川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年6月复制，第11-12页

²⁰⁶ 据史志弘研究，乾隆三十七年户部年末结存为7874万两。（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表格 3 中央和地方出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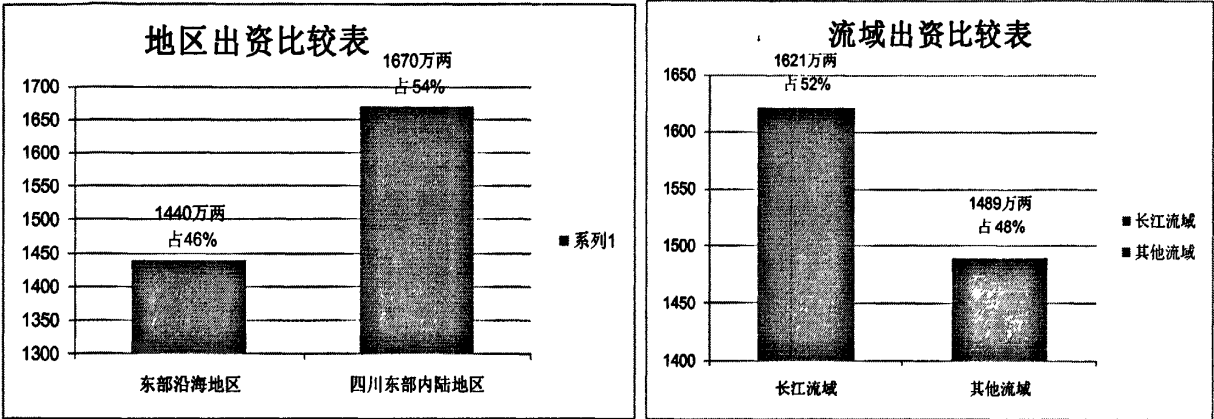
地区	明细	单位: 万两	
北京户部			2900
两淮地区	两淮	340	
	两淮盐商捐助	200	540
江苏省			381
河南省			360
湖南省			310
四川省	军需备贮及松炉库银	110	
	司库正杂钱粮	110	
	道库银	25	
	茶息银	5.98	250.98
陕西省			250
安徽省			230
广东省	广东	180	
	广东盐商捐助	20	200
山西省	山西	90	
	山西盐商捐助	110	200
湖北省			160
广西省	广西	120	
	广西盐商捐助	40	160
浙江省	浙江	49	
	浙江盐商捐助	100	149
天津	长芦盐商捐助		90
山东省			80
合计			6260.98

表格 4 中央和各地区承担战费表



在进剿小金川承担费用分配上，北京户部与地方财政差不多各自承担一半²⁰⁷。如果我们把北京户部和四川省的费用除去，分析全国各地承担白银费用相对比例，我们可以作以下两种分析。第一，按照东部沿海地区与四川东部地区的白银来源。第二，按照长江流域地区与非长江流域地区的白银来源。

表格 5 各地区出资比列表



据这份“收支大总”不完全统计，从东部各省流入四川省的白银多达六千余万两。这些巨额白银进入四川省之后，它主要通过军费各项（恩赏、恤赏、俸饷盐粮、料物价值、运饷运物、粮运价脚）开支出去，其流向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进入四川省的有满洲贵族、满洲官兵、云南官兵、贵州官兵、陕甘官兵、湖广官兵，有小部分白银会随着这些贵族、官兵离开四川省而流向以上各省。第二，大部分白银则通过采买各项军事物资而从省城成都流向四川各州县，如购买军米中，“三十九年及四十年青黄不接新谷未登场之时，省城米少价贵，奏明由下游嘉、叙、重、泸等处买至省城发运”²⁰⁸。制造火药的硝磺等物，则多来自川东重庆府属各县²⁰⁹。长江水系，是白银流动的主要线路。第三，还有相当部分白银，则通过支付各地转运军事物资的人夫脚价而投放在通往小金川的各条道路沿线的社会之中²¹⁰。

²⁰⁷ 史志宏认为，“金川之役军需的绝大部分不是靠动用银库库存，而是通过捐输等临时筹款办法来解决的”。（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6页），史志宏推断小金川战役6年，总共约收捐输等临时筹款2000-3000万两用于小金川战役（同上，第77页）。史志宏的这个估计太高了。据《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收支大总”，小金川战役总开支6820.98万两白银，其中各地盐商等商人捐助1120万两白银。

²⁰⁸ （清）郑棣山编纂，张羽新校注：《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119页。以下只注明书籍、页码，特此说明。

²⁰⁹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 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37-44页

²¹⁰ 转运军事物资，主要通过征发民夫劳役为主，补偿微薄的脚价银为辅。即使在通往小金川的运输道路上，也有四川东部、南部各州县的百姓被征发分配到这些线路上服役。如《荣经县志》载：金川用兵，粮台驻

通往小金川的军事供给线，先后形成了五条主要线路。省城成都至桃关，经桃关出口，为西路；省城成都经雅安县城至打箭炉，经打箭炉出口，为南路；省城成都至杂谷脑，经杂谷脑出口，为北路；省城成都经雅安县城至木坪，经木坪出口，为中路。省城成都至桃关，经桃关出口，分路至杂谷脑，经杂谷脑出口新路，称之为新西路²¹¹。其中，经过雅安县城的则有两条，即南路和中路。经各关口出发后，每条主要线路又有很多分路线通往小金川前线各驻扎军营。在这些军事供给线上，一般按照每三十里设置一个台站（根据山川地形的变化，台站之间的距离也有短至十五里，长至九十里不等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较少），各项军事物资（主要是军米）则按照台站计算人夫脚价的费用开支。

要准确计算到底有多少白银积淀在经雅安县城的南路和中路沿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可以计算的数据条件，我们可以粗略估算某些时间段里南路一段的搬运军米的脚价白银投放量，以及中路一段搬运军米脚价白银投放量。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这个时间点，是旧案与新案的分界线，之前的旧案，所有军米由官方组织运输，即所谓的“官运”；之后的新案，所有的军米由商人承包运输，即所谓的“商运”。“官运”和“商运”的运输价格有所不同：按照旧案官运，“自雅自炉每站银一钱五分三厘八毫四丝六忽。中路自雅至木坪，每站一钱五分三厘零”²¹²；按照新案商运，各路都从省城成都起程算起，不按站数算运费，而是按指定到达某站每石多少银两算，这是一种承包制的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中，中路则分成了三种计算方式，“中路，自省自灵关，每石脚价银四两，该站过商米三百余石；自省自木坪，每石脚价银四两，该站收过商米二万七千八百余石；自省至尧碛每石脚价银七两五钱，该站收过商米五千九百余石”。²¹³南路方面，“南路，自省至打箭炉，每石脚价银九两八钱。该站收过商米四十七万二千六百余石”。²¹⁴

南路口内站台和中路各站台路线如下：

县鹿角坝。上官敕宜宾、巴县、兴文、定远、马边五厅县民夫在坝运输服役。（民国·张赵才等纂修：《荣经县志》卷四，官师志，政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六九号》，成文出版社，第347页）梁勇据南部县档案整理《原管化林坪站南部县造磨旧案军需送饷鞘赏需等项支销夫工清册》、《委管化林坪站南部县造报旧案军需给过站夫口领立□□工食银两数目清册》显示，建昌道、宁远府、珙县、马边厅、大宁县、剑州、涪州、长寿县、太平县、邛州、冕宁县、成都县等地民夫亦到南路服役。（梁勇：《清<南部档案>与乾隆三十七年的金川之役》，《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0期，2005年7月15日）

²¹¹ 具体路线请见《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道里程站，第128-143页

²¹² 《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第119-120页

²¹³ 《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第121页

²¹⁴ 《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第121页

表格 6 南路、中路台站列表

南路		路程：里	中路		路程：里
口内站台	省城	40	口内站台	省城	40
	双流县	40		双流县	40
	新津县	60		新津县	60
	邛州	60		邛州	60
	百丈	40		百丈	40
	名山县	40		名山县	40
	雅安县	50		雅安县	40
	观音铺	50		飞仙关	40
	荣经县	50		芦山县	30
	黄泥铺	40		零鹫山	30
	长老坪	40		灵关	15
	清溪县	30		小关子	35
	富庄	40	口外站台	木坪	30
	宜头	30		大马村	30
	林口	20		歪郎	40
	伏龙寺	20		牙思得	40
	化林坪	40		白胜歌浪（得胜关）	40
	泸定桥	30		赤思达	35
	大烹坝	40		尧碛	40
	头道水	35		扎吉坝	40
	柳杨塘	35		松林口	25
	打箭炉			口口达军营	25
合计		830		牛厂	35
				钦义	35
				达围	30
				日耳	
			合计		915

整个南路和中路接收军米情况如下：

表格 7 南路、中路接收军米表

	路线	口内收米：石	口外收米：石
旧案	南路	319883	144056
	中路	12871	94498
新案	南路	432631	43336
	中路	31185	4684

根据不同时期的计算方式，我们可以算出以下白银投放量：

旧案中，自雅安到打箭炉沿路白银投放量

$$319883 \times 0.153846 \approx 49213 \text{（两）}$$

旧案中，自雅安到木坪沿路白银投放量

$$12871 \times 0.153 \approx 1969 \text{（两）}$$

新案中，自省城成都至灵关沿路的部分白银投放量

$$300 \times 4 = 1200 \text{（两）}$$

新案中，自省城成都至木坪沿路的部分白银投放量

$27800 \times 4 = 111200$ （两）

新案中，自省城成都至尧碛沿路的部分白银投放量

$5900 \times 7.5 = 44250$ （两）

新案中，自省城成都至打箭炉沿路的部分白银投放量

$472600 \times 9.8 = 4631480$ （两）

据不完全的粗略统计，南路和中路沿线，通过发放运送军米的脚价，白银投放量至少在四百八十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二两（4,839,312）以上。如此多的白银进入南路、中路沿线地区以后，它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意义呢？它们对南路、中路沿线地方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影响呢？我们能否从水东乡的社会经济变化，看到这些影响呢？

廓尔喀战役：以茶易粮策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巴勒布（今尼泊尔境内）与西藏发生贸易纠纷（主要是银币与银两比例问题、盐粮交换比例问题和聂拉木等处税率问题²¹⁵），引发了巴勒布与西藏的战争。乾隆皇帝在接到战报消息的当天（七月二十七日），就传谕时任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命令他们准备带三四千名官兵入藏²¹⁶。清王朝军队在藏粮食来源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得到西藏噶厦政府的粮食供应，一个是从以雅州府为基地经打箭炉长途供应白银沿途购买运送，一个是在藏区收集粮食。茶叶作为货币支付手段之一，再次得到广泛应用。

西藏及里塘、巴塘、察木多、拉里各粮员，又委员分赴乍丫、硕板多等处，各就附近出产粮食地方，将青稞、糌粑、面食等项，分投采买，或加价购办，或用茶易换。……就地收买牛羊。²¹⁷

清王朝近万人的军队在藏的军事活动持续了几年，除去民间正常茶叶贸易，从军事角度对茶叶的需求也持续不断。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廓尔喀（巴

²¹⁵ （清）方略馆纂：《钦定巴勒布纪略》，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第114页、291页、303页。以下只注明该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²¹⁶ 《钦定巴勒布纪略》，第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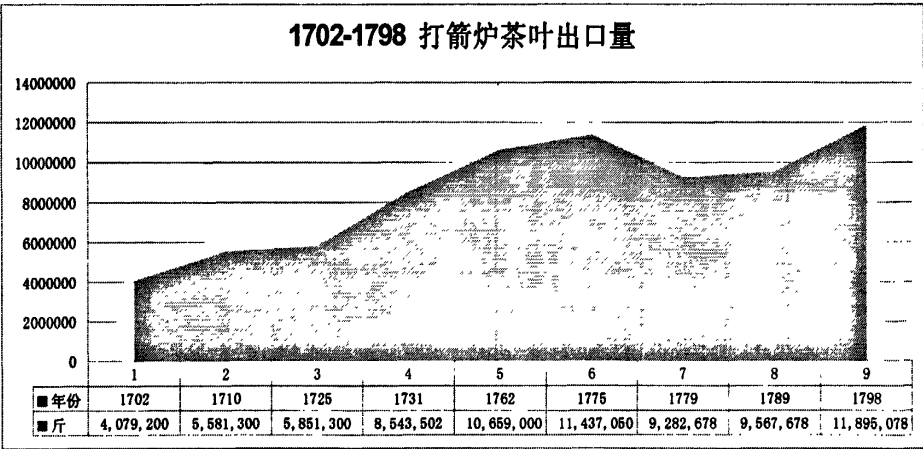
²¹⁷ 《钦定巴勒布纪略》，第62-63页

勒布被廓尔喀吞并后的称呼）被打败、称臣纳贡²¹⁸。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²¹⁹，确定了清王朝统治西藏的基本框架。雅州府作为这次战役的入藏物资收集和转运基地，地区地位再次凸现。

打箭炉茶叶出口量长期走势

经过简要梳理雅州府地区地位的变化之后，我们再来总结打箭炉茶叶出口量的长期走势图，可能就会对“川藏贸易”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了。鲁子健先生作过清代四川茶叶运销量（边引、腹引、土引）和康雍乾嘉历年增加茶引数的统计工作²²⁰，但历年打箭炉的茶叶出口量是多少，我们仍然无法估知。

从统计技术上来说，我们知道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少有八十万包茶叶发往西藏（四川提督、巡抚互参案），那么我们可以此为基数，根据打箭炉税关的茶叶关税税率、打箭炉关每个时期相对固定的税额，以及历年各州县增加出口打箭炉茶引的数量、出口打箭炉与出口松潘的茶引比例这四组参数，来估算几个年份的出口打箭炉的茶叶量（具体数据请见附录，估算过程此处从略），我们再把这几个年份用曲线联起来，则可以看到一个打箭炉茶叶出口量的长期走势图。这一长期走势图是我们理解五甲口场崛起的重要经济背景。



图表 7 打箭炉茶叶出口长期走势图

²¹⁸ （清）方略馆编：《钦定廓尔喀纪略》，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 年版，第 674-676 页

²¹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上，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825-836 页

²²⁰ 鲁子健：《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1990 年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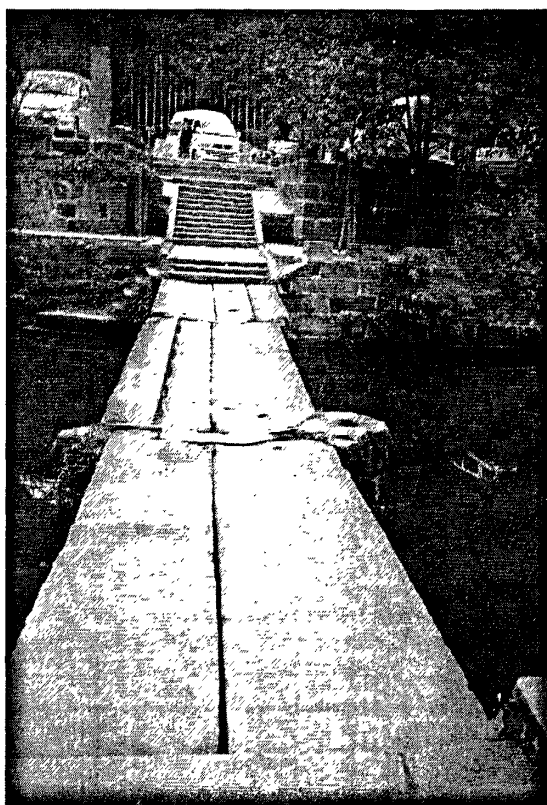
第二节 五甲口场的崛起

五甲口场即上里场，它位于白马泉与黄茅溪交汇之地，白马泉由北蜿蜒而来，黄茅溪从芦山岗发源，汇合了几条北面天台山的溪水，最终在五甲口与白马泉汇合，然后朝南流去。五甲口以下的河流，就被称之为“陇西河”。（年平均径流量为 7.28 立方米/秒²²¹，不能行船，近下里峡口位置今为黄龙水库）

五甲口的名称，最早见于咸丰六年（1856）的《磐安桥碑记》；五甲口的意思，即水东乡上里第五甲的路口；今天“上里古镇”的所在地即是清代水东乡的五甲，也就是五甲口场地。

众姓修建平水桥

乾隆五十二年（1787），在五甲口场东头的白马泉上，一座石桥被架起了，这座石桥由众姓集资修建，取名为“平水桥”。该桥总长约 13 米，宽约 2 米，至今仍是人们出入上里古镇的重要桥梁。该桥由石墩和红砂石板搭建而成，两个主石墩放置在白马泉中，石墩为整体红沙石，约有 2 立方米，石墩上面分别承担两岸搭建的总宽度约为 2 米的石板：西岸的石板有两块，每块厚约 30 厘米，长约 5 米，宽约 90 厘米，东岸的石板有三块，每块厚约 30 厘米，长约 5 米，其中较宽的石板约有 80 厘米，另外两块宽度则分别为 20 厘米左右。由于白马泉宽度在 10 米以上，东岸岸边还有一个紧靠岸边的



照片 3 五甲口场东头平水桥

的石质桥墩，承担东岸伸河中桥墩的石板重量，东岸到紧靠岸边的石质桥墩又搭建了几块长约 3 米、总宽约 1.6 米的石板。整座石桥实际是三段，不过由于东岸桥头的第一段才 3 米长，常常给人的印象是两段石头搭建而成的。这座桥建修成

²²¹ 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16 页

功之后，众姓在桥边竖立了一通石碑，该石碑保留至今，但碑文湮灭严重，目前能辨认出来的文字²²²如下（省略号为碑文湮灭部分）：

平水礮

修建平水礮碑记

盖闻事有因创而权宜在人守旧者流□安常之见图新者逢人治事之哲是□……
峰环□□山□翠□之清为探风者所□盛焉市□□□□□世曷庸……
滞□□德缘□□□□□道□□□□宝□□□领袖□□□□□石礮……
庆□□□乎□□□□见经□□□□下□□□□□□□众□风景……
子□□□之□可因而因可创而创亦□□□□□□□□之同心同德□□□……
爰勒诸石以见乐善之□同志之众云
皇清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首夏月庠生……
（出资名单请见附录）

据残缺碑文可知，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前，平水桥所在的位置应该有一座老桥。到底是沿袭仍用旧有的老桥（即文中所谓“因”），还是把老桥拆掉，根据形势变化，重新建一所更宽大的桥（即文中所谓“创”），这是五甲口当时人们讨论和思考的问题。他们最后选择了在原桥址建设新的更宽大的石桥，即碑文中所谓的“可因而因，可创而创”。由于建桥关系到出入五甲口场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建桥还涉及采石、运石、架桥、人工费用等项开支，因此与五甲口场有密切关系的众姓人群出资，成为五甲口场早期建设的基本模式。由于碑文“出贐众姓”第一横排的前几位人名湮灭了，因此无法判断出资最多者和建桥的组织者。（后世叠加所刻大字涉及到民国年间史事，此处不作论述）

乾隆五十二年（1787），《修建平水桥碑记》是目前发现的清代水东乡第一通众姓共同树立的石碑，它与明代嘉靖十年（1531）水东乡众姓树立于白马泉的《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万历末期水东乡众姓树立的《白云庵碑记》相比（请见附录），具有一些不同之处，反映了重大的社会转变。

与明代相比，上里的人群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姓氏，如陆、景、王、师、邓、黄、余、魏、胡、沈等姓。这些新出现的姓氏人群，有些可能是明末清初躲避战乱而进入水东乡上里，他们的经历可能与新津蓝氏进入水东乡上里的经历相似。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陆续搬入到五甲口场的小商人。据碑文统计，至少有 140 余人（未算第十排以下）参与建桥，出资总金额在 19180 文以上。杨姓共有 19 人，

²²² 2008 年 12 月 17 日拍照，2010 年 3 月 18 日再次拍照核对

李姓、黄姓各有 4 人，陈姓、胡姓、何姓各 2 人。杨姓人群占大多数，这意味着五甲口场及其附近的主要居民为上里杨氏。

水东乡人群传统的公共活动多在上里、中里、下里三个基层市场、庵庙、寺院和墓地。庵庙和寺院曾有众姓出资建设留下的石碑。另一有文字纪录的地方在各姓祖先墓地，它通过树立宗支碑得以呈现，但这种活动局限于明代以来的老姓人群。各姓墓地作为相对封闭的场所，只是同宗人群的公共活动空间，不可能成为众姓活动的公共场所。水东乡的基层市场虽然重要，并按照场期依次运转，但一直没有相应的文字纪录。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众姓在五甲口场边的白马泉上重新修建了一座石桥，以加强五甲口场与邛州、名山县的联系，并留下了一座石碑。这座石碑雕刻精美，它可以作为五甲口场崛起的标志，昭示着商业社会的到来。

邓刘李姓合修石桥

就在“平水桥”修建完工的第二个月，在五甲口的西头黄茅溪处，又一座类似的石桥修建完工²²³。该石桥有四个石墩，长约 20 米，宽约 1 米，桥面厚约 40 厘米，桥高约 2 米。在石桥的东岸矗立了一根六棱石柱，直径约 40 厘米，高约 3 米，戴石帽。石柱正对石桥的一面（西面）底部，雕刻了一尊身着明代官服的人物形象，人物上方刻有三字，字迹非常浅，线条纤细，为“永镇堂”三字。



照片 4 五甲口场西头福寿桥

在六棱石柱的东面，则刻有以下文字²²⁴（省略号为文字湮灭部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岁仲夏月中浣谷旦
阴阳 杨 岑

²²³ 目前本地人称这座桥为“文星渡福寿桥”。承蒙雨城区文物管理所所长王喻指出，特此感谢。

²²⁴ 2008 年 12 月 18 日拍照并抄录

石匠 胡显玉
李文凤

第一横排	第二横排	第三横排	第四横排
	刘 鹏三两三钱	刘泽培一两□□	注
	刘 鹤三两三钱	邓□□□□□□	:
刘彦凤出银三两三钱	邓宏伸三两三钱	刘□□八百....	以
邓文高出五百二十文	邓继统三两五钱	李芳□二百....	下
为首邓弘仁	邓必达三两三钱	李芳□二百....	湮
	□□□貳两	□□□一百....	灭
众出善士			

据不完全统计，这座桥主要由邓、刘、李三姓合修，所用费用超过 24 两白银。目前这座石桥的西头约 200 米的地方，还住有几户邓姓人家，不过他们已经讲不清楚他们的家史了。从这座石桥的出资者来看，当时邓、刘、李姓属于五甲口场较为富裕的人户。

五甲口东头的平水桥至西头石桥（文星渡福寿桥），这条从东到西约有 1 里的道路贯穿了水东乡第五甲，水东乡五甲口东头平水桥附近约 300 米的道路两旁建满了房屋，300 米至 500 米左右的道路，南边为黄茅溪，北边沿道路建满了房屋。目前上里古镇的街道和房屋布局，基本沿袭了的乾隆年间形成的这种格局。经过五甲西头的石桥，沿着黄茅溪往西行走约 15 里，就到达芦山岗的分水岭箭杆林，从箭杆林翻过芦山岗，就进入了芦山县境内。

天宫寺的复兴

天宫寺的复兴约在乾隆时期。天宫寺即明代的天公寺。天公寺僧人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之后没有留下实物痕迹，我们无法判断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中天公寺的具体状况。因为资料的限制，我们也无法准确知道天公寺在清代何时进驻僧人，它的名字由天公寺改名为天宫寺。

乾隆时期僧人重新回到天宫寺的原因可能在于，天宫寺处于邛州至五甲口场的中间位置，它的房屋可以为来往商人和背夫提供住宿与餐饮服务。天宫寺相当于一座僧人经营的客栈。由于邛州与五甲口场之间人货往来增多，许多人常常在原天公寺旧址上歇息，于是水东乡之外的僧人来到天公寺旧址，建修天宫寺，按

照客栈来经营天宫寺。道路沿线的寺庙历来是出门之人夜间临时栖身之处。上里场流传着一首《要黑要黑真要黑》的民谣：

要黑要黑真要黑，

情哥出门哪里歇。

有钱之人打店子，

无钱之人庙子头歇。

演唱：张朝莲，女，42岁

搜集：罗开华，杨炳超²²⁵

这首民谣中所谓“无钱之人庙子头歇”，指的是那些无人常住的庙宇。天宫寺院这样的有僧人经营管理的寺院自然不是“无钱”就能“庙子头歇”的。

乾隆五十七年（1792），天宫寺僧人在五甲口北面的白马泉原有石桥的基础上再次培修这座石桥（目前这座石桥已被改建成现代公路桥梁，长约15米，今天上里的人们仍沿用“大石桥”的老名字）。这座大石桥北距五甲口场平水桥约2里路，它是名山县翻越陈家山后的道路与邛州经天宫寺去五甲口场的道路的交汇之地，因此它是连接名山县、邛州与五甲口场的重要桥梁。

天宫寺僧人培修石桥之后，在石桥的北头树立了一通四方石柱方碑。这通四方石柱的横切面呈四方形，边长约40厘米，石柱高约1.7米，这通石柱方碑四面刻字，其碑文²²⁶如下：
面之一：

溯厥桥创已有年，水自泉头顺羌川。

往来凭足登过去，谁叹褰裳涉步难。

胡期江涌崩颓圯，老幼唏嘘阻岸边。

今朝培修续成后，更口流芳百代绵。

文

天宫寺住持 僧 祖辉 徒 定维 孙 智 捐资

海

吉

²²⁵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四川省雅安市歌谣资料集》，雅安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1986年8月，第18页

²²⁶ 2008年12月30拍照并抄录

乾隆五拾柒年仲冬月初六日立

天宫寺主持祖辉带领徒弟定维、徒孙智文、智海共4人，一起出资培修好了这座五甲口场上游的跨越白马泉溪水的石桥。这座石桥在天宫寺下游约8里的位置，这是目前发现的天宫寺维修道路到达最远的地方，大石桥以下则没有发现天宫寺僧人主持维修道路桥梁的纪录。这显示了清代天宫寺僧人自我认可的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地理范围，远至8里之外的大石桥，这一地理范围把明代就已存在的许家湾都包括了进去。邛州通过天公寺、白马泉至水东乡上里的道路，至迟在明代嘉靖十年（1531）就已开通，其后的200余年中，来往的客货不算太多，所以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道路条件水平。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天宫寺僧人认为应该再培修这条道路上的这座大石桥了。虽然天宫寺住持在碑文中只提到“老幼唏嘘阻岸边”，并没有直接表达‘来往客货日益繁忙因而他们才主动培修这座石桥’这层意思，但联系到5年前五甲口场东西两头相继修建的石桥，这条至邛州到五甲口场、再通往芦山县的道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左右应该出现了过往客货繁忙的景象，这是天宫寺僧人培修石桥的基本原因。

天宫寺僧人培修石桥虽出于行善积德和流芳百代的初衷，然而撰诗立碑的行为表明他们也希望得到这条茶路上过往客商的注意与赞许。刻于方碑上的诗句顺序也非七言一行，天宫寺主持祖辉故意错综字数，特意让最后一个“绵”字成为一行，这也反映了天宫寺僧人多少有些自负，希望识字明理的有心人驻足句读并参会其意。也许，他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藉此获得过往客商更多的施舍。

天宫寺僧人积极参与到“邛州→五甲口场→芦山县”这条商道的建设之中，这既显示了天宫寺主持顺应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变化，这种“于人方便，即是于己方便”的良性互动，营造了相互帮助与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氛围，它成为水东乡五甲口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五甲口场（即上里场）与明代中期相继形成的中里场、下里场具有了不同性质，后者主要是以水东乡居民为主体的赶集和贸易交换的场所。水东乡上里的五甲口场则不光承担着水东乡上里范围内的市场交换功能，还因为它处于通往芦山县的要道，而超出水东乡行政范围，成为长途商路线上一个重要的中继地。

芦山县：五甲口场通往打箭炉的途经地

五甲口场处于“邛州→五甲口场→芦山县”以及“名山县→五甲口场→芦山县”的交汇地。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经五甲口场的商路下一站芦山县，是五甲口场人货的贸易终点吗？如果是，芦山县有什么可以交换的货物呢？如果不是，那么经过五甲口场的商路最终又是通往哪里呢？

民国《芦山县志》载：“芦山东西直径不过十余里，南北直径不过四十余里，户口七千，人民仅三万余，一切负担颇为繁重。”²²⁷这段话出自民国时期“邑绅商学界请复旧治稟”。由于当时芦山县匪患频仍，“灵关”是控制土匪活动的重要关口，芦山县绅商学界要求把灵关从天全县重新收回来管理而写给芦山县长的稟文。芦山县的地域范围和水东乡的地域范围差不多大，芦山县到民国年间人口才三万多人，那么乾隆中后期芦山县的人口可能还没有三万人。从这些硬条件来判断，芦山县不可能成为水东乡五甲口场人货贸易的终点。

五甲口场到芦山县城，需要翻越水东乡西面芦山岗上的箭杆林。芦山岗这道绵延数十里的山岭，它是雅安县水东乡与芦山县的分界山，水东乡人把这道山脉称之为“芦山岗”，芦山县人则把它称之为“罗城山”。《芦山县志》载：“形势，东，罗城山，一名罗纯山，志名始阳山。盖山势绵亘如罗城，曰罗纯者。昔雅州罗纯荡，土人之别称也。志名始阳山者，谓日出于东若阳之从兹始也。其山路可通名、雅及邛崃诸县，森林蔽天，攀木缘崖，难于徒步。其最高处声鸣谷应，云雾茫茫，四时多雨。”²²⁸“箭杆林，在县东二十五里，通雅安五甲口”。²²⁹也就是说，五甲口场向西爬山约15里左右，到达芦山岗箭杆林，翻过箭杆林后，下山约25里，就到达芦山县城。五甲口场距芦山县城约40里的山路路程。

《芦山县志》载：

古道路，……迨自隋大业时，置县设官，复辟通和新道，由县之西南分两路而通碛门，以汉人之茶易吐番之马。唐时杨土司由十八侍卫受僖宗之封，常驻碛门，为世袭六番招讨使司副招讨使，其士卒全系汉人，故和夷风俗，语言渐与汉人同化焉。又由碛门分两路直通吐番（即今西藏），一由碛门经鱼通长河西等地直达大渡（即泸水）而入打箭炉，一由

²²⁷ 宋琅修、刘天倪纂：《芦山县志》（民国三十二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64》，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年，第117页

²²⁸ 同上，第118页

²²⁹ 同上，第122页

碛门东经始阳峡口坝，渡荣水，越相公岭，经黎州（即今汉源县）会于大渡而入打箭炉。为古来由蜀入藏通衢云。²³⁰

芦山县城西南有两条通往天全碛门的道路，天全碛门则是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指定地点之一。清王朝在打箭炉设立税关之后，茶叶贸易地点西移到大渡河以西的打箭炉。从碛门出发，又有两条传统路线汇集到大渡河，越过大渡河则进入打箭炉。“邛州→五甲口场→芦山县→天全碛门→大渡河→打箭炉”与“名山县→五甲口场→芦山县→天全碛门→大渡河→打箭炉”这两条路线，是邛州、名山县不经过雅安县城而经过五甲口场通往打箭炉的较为短捷路线。

乾隆六十年（1795），朱黼时任芦山县知县，“朱黼，江苏江阴举人，乾隆六十年乙卯任，有芦风竹枝词”²³¹，朱黼的《芦风竹枝词》其中之一首如下：

妇力耕耘夫背茶，炉城一去远离家。

骹头包谷余升斗，邻舍都将富户夸。²³²

“炉城”即打箭炉的简称。妇女耕耘，丈夫背茶进打箭炉，这种家庭生产和生活模式在当时的芦山县较为普遍，这是朱黼记录下来的客观原因。这也证明芦山县是通往打箭炉茶路的途经地，芦山县很多家庭的重要收入之一就是背茶。背茶通常使用“背夹子”和一根“拐子”。“背夹子”用于背茶包，途中需要休息时，背夫则把“拐子”放在“背夹子”下面，让“背夹子”停在“拐子”上。这样，背夫就不用把“背夹子”放到地上休息，节省了一放一背的动作，从而节约了体力²³³。雅安市流传着两首关于“拐子”的情歌民谣：

（一）

一张拐子龙凤头，

小情哥打拐不要打斜石头。

三下二下打不起，

²³⁰ 同上，第117页

²³¹ 同上，第207页

²³² 同上，第125页

²³³ 1939年，俄国人顾彼得走过雅安至打箭炉的茶路，途中他特别提到了这些背夫的情形。请参见顾彼得著，和铎宇译：《彝人首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另，参见杨绍淮：《川藏茶马古道》，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年

挣些毛病在心头。

(二)

一张扬子两尺高，

送给情哥背茶包。

背起七包想八包。

想起路程还开不得稍。

演唱：刘开林，男，65岁

住：观化乡袁家村

采录：朱圣明²³⁴

茶园经济的兴盛与山头寺庙

随着五甲口场通往打箭炉茶道的畅通，茶叶作为输藏的重要货物利润匪浅，五甲口场范围内的地方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五甲口场周边山地开始出现众多的茶园。种植茶树，制造茶叶，成为水东乡乡民的重要经济收入之一。那些属于明代以来庵庙的茶园，则逐渐受到了周边俗人的侵占。这一重要变化被记录在乾隆六十年（1795）的法华寺碑记中。法华寺距离五甲口场约8里，在今天的上里镇共和村二组范围内。其碑文²³⁵如下：

垂古

新立法华寺茶园山地界碑。

沙坪，左齐沟，直上宏口茶。

一园，马草直上尖峰顶竹村一方为界，龙崩茶上齐杨拱宸茶为界；白果园直上苗岗下沟，直下岩空头崩，与杨大林直上为界；何家园齐沟，直上与何见一五月茶相连，横过大白蜡树，直上又横过螺铁树，直下齐沟，又直上齐杨先魁茶沾连，横过直上横路，齐水井，邪上杨正显茶园为界，上齐房基坪，横过白蜡树为界，右齐河沟，直上齐何枝竹林，直

²³⁴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四川省雅安市歌谣资料集》，雅安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1986年8月，第72-73页。

²³⁵ 2008年12月23日拍照并抄录

上齐岭栗子头，横过齐石包，齐石碑沟，齐白果树，直上齐黄五茶园到顶为界。

一契，箭杆林一块。掉与黄朝坪园茶一块，右上河沟，直下王子清界，直上与寺岗合界，左上与沈连荣茶地漕，直下转湾，直下与寺茶合界。又横过振水沟，与寺相连。

一契，师祖宏六买到骆仲寅、仲义，又何贤、何板茶二块。有僧普庆将茶代干了去庵料理后，仍为法华寺管茶，勒石为记。其茶坐落楼房岗脚下，左齐李应先地，直上齐房基坪，右边齐竹林岗岭，直上木黄过茶园为界。

一契，有师月生启买张启生茶岗一北，坐落对门栗子头，下齐河边为界，又梯口庵下院，坐落名下东岳庙为界，接连花□，认纳银一两五钱正，共数茶园二十二块，卖记佛银，华荣买契五百一十二两三钱，其茶先师进入蜀府，递年应纳府茶三十斤，后遇免除。

一契，清太买到骆宗贵、宗盈茶一块，坐落花秋园，上、下、右与寺茶相连，左与王姓山相连，古腊树为界。

一契，满应买到张士才茶，□□花秋□一块，其□右□姓相连，右下杨过石角转拐，与骆姓相连，□岩坎下为界，左□买王三相连，敦□直上花宅相连。高坎横断，与沈宅茶合界之。

一契，前应买到张士才茶，上兴寺相连，右与寺相连，右与张仲□相连已界，蜡树为界。

又一契，□意买到杨彦倾荒山，坐落本角山，右上与罗姓相连，□与李姓相连，合本寺茶界。僧蒲应因吾年碑立□不明，复□古约刊立，并后买同□刊遣后，真买为记。按传记，法华寺始于大明宣德元年，开山师元音修，□里□□功凹创茶大岩坪上修观音寺，买□后山园，复修立法华宝寺，□□□□增□。今寺渐弱，强俗多侵，□勒石刊界，以垂不朽云尔。通记前约，□□□□□十三□，并刊□人题句（注：缺字，但不知缺几字）掌寺僧蒲应、元清□□。

新旧两碑立两旁 法华界置甚宽长。

古今无异古今异，后来不见有真行。 山人石室中题

大清乾隆六十年乙卯十二月公五日刊里庠施主张际可代撰 本里石匠王
庭仲刊

乾隆六十年(1795),上里庠生张际可²³⁶指出,“按传记法华寺始于大明宣德元年”。
在通往法华寺的道路上有一处摩崖石刻,其文字²³⁷如下:

四川雅州水东乡罗绳上里居奉
佛□首施财修路信士 杨斐
杨应宗 杨应忠 杨应洪
本庵僧真宗 珪能 珪全 普惠
杨永宗 石匠 柳万奉
洵俗僧等各□资财命工重心
修理石梯路道已完种今生之福果
布来世之津梁者
庙
本 川主龙神主盟上齐大石下齐二堰
庵
正德十五年岁次庚辰己卯月吉旦□

明代正德十五年(1520),法华寺的原址上就有了“庵庙”,且有4名僧人,供奉川主龙神。到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法华寺僧人已相继购买了很多的茶园土地,随着茶园经济重新兴盛,上里五甲口场范围内的俗人有侵占法华寺茶园土地的现象。鉴于这种局面,法华寺僧人请施主张际可把法华寺拥有的茶园土地四至撰写到石碑上,以求申明法华寺名下的土地所有权。

上里杨氏舍田永峨寺

上里杨氏的祖上在明代就已陆续买山地茶园到永峨寺。约在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上里杨氏再次舍田到永峨寺。这些纪录保存于清代永峨寺的石碑之上。永峨寺距离上里杨家沟约6里,距离五甲口场约8里。永峨寺所在的山头名叫古佛顶,古佛顶是芦山岗向水东乡平原延伸山脉上的第二高峰。其碑文²³⁸如下:

主持僧心□□□

□□也□去□□□慈日祥光通斯□□不营寺□而……

²³⁶ 此人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给庙坏杨氏题写过宗碑。

²³⁷ 2008年12月23日拍照

²³⁸ 2009年2月13日拍照并抄录

□□不若垂诸□□□□人此杨讳正富古溪公永峨山古……
 □□四甲姓杨名进善头腹胖大尝哑咲不能行父母逢……
 □□□□也人以为怪家徙洪邑□里□□民欲此……
 □□□□□□□□洪县巫祝……
 □□□日□两其真归是夜雷公开道……
 □□□光□朗圣灯来朝古溪公盼望中已觉佛之……
 □开□二殿装宝像买山茶招僧焚献诚通佛阙物不云□祷……
 灵焉向使公尝当日仅会以神而不垂诸像则佛无凭□人无□……
 □□□□□□□□传开肠于周代金圆郁茂记乐善于……
 书自明迄今碣断碑残倘不抚拾前言而重勒之石□以□后……
 □□继述之人山田之界于后以志不朽云 □□□孙廩生员杨……

计开山茶界

上界古帘无论曲直与谁沾连总以山顶为界右横顶直下蓝宅……
 直下石包转抵水井为界下以水井黄□房下…… 转
 通高登舟山抵乾沟又横过登然山抵邓……
 □□□□界左□山顶昔与马宅相连大岗中心直下……
 □□□□蜡由插蜡斜上抵古大插蜡斜抵路边大石包由路抵杉木岗……
 □□□□又自正富买施以下杨仲林成林弟兄又杨翘杨翱兄弟俱买施……
 □□□□有古约今之碑界乃总界也外有通师茶园上下左右俱与杨作津相连
 □□□□杨启发相连前与左右俱齐深沟周围一转前山包俱在内 计开
 □□□□与杨守富买田一十陆坵价银四拾两一处坐落中里头牌地名□□子一十二
 二
 □□□□□□□□沟随沟流□□登富小田抵杨裔栋田为界下齐栋田相连郑万□
 四……
 □□□□后小田为界一处在上里三牌弓背□路下长田一连四坵上齐路下与天林
 相连左与……
 □□□□□□□□□□□□□□□□在李家沟价贰拾贰两有约不录界又
 转买杨明诗田三坵²³⁹

碑文中提到的古溪公“杨正富”为明代人。乾隆六十年（1795）上里杨氏在斑竹林岗所立第一通宗支碑上²⁴⁰，就有杨正富，其世系为：杨友庆，生廷举，生正富。杨友庆的名字，则出现于嘉靖十年（1531）《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之中²⁴¹，其家庭成员为“杨铎 男杨友庆 杨友金 孙杨廷礼 杨廷□ 杨廷权 性廷”。因此，杨正富生活的时代约在万历朝至崇祯朝。

“中里头牌”、“上里三牌”是清代保甲制度下的名称，证明该碑在清代所立。

上里杨氏历次买山地茶园、田地舍入永峨寺并且“招僧焚献”。我们在中里

²³⁹ 时间：2009年2月13日笔记，地点：上里四家村，拍照并抄录

²⁴⁰ 请见第二章，第二节，上里杨氏宗支碑

²⁴¹ 请见附录《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

八甲杨氏那里（弘法庵）也看到了类似的做法²⁴²。这一现象表明水东乡的老姓人群在开发山地和管理茶园过程中，茶山上的庵、寺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空间。

乾隆末年以来，水东乡各处山头已基本开发成茶山，茶园经济蓬勃发展，茶山上的寺庙（弘法庵、法华寺、永峨寺）是重要的茶园拥有者、茶树种植者和茶叶生产者之一。他们生产的茶叶则通过五甲口场而流通到打箭炉去。

第三节 陈氏引入生活新观念

陈天道于康熙前半期进入水东乡上里之后，落业于陈家山。清代的陈家山处于五甲口场这个市场的重要边缘地带，其所在的位置成为连接清代名山县新店（约 30 里）与水东乡五甲口场的联结点。从陈家山陈氏故居遗址走到上里五甲口场，约有 10 里路程，其中约有 7 里的山路。乾隆三十年代，陈家山陈氏的坟墓已是水东乡修得最好的，那时陈氏家庭经济情况就已超出水东乡的一般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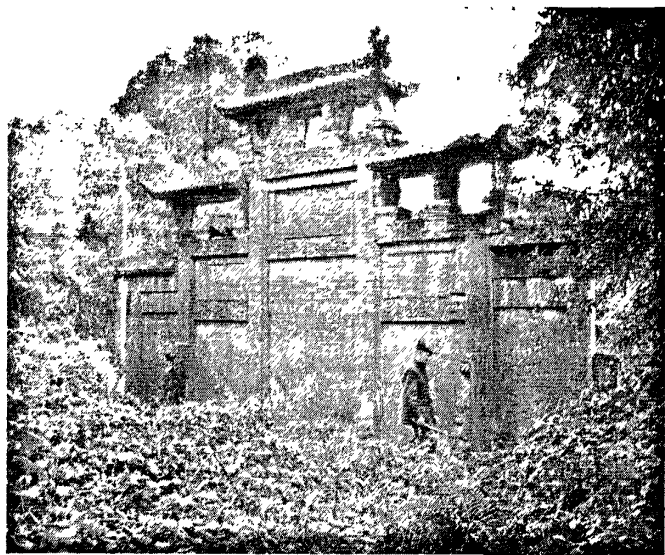
陈氏建修宗支牌坊

乾隆中期以来水东乡各姓人群相继树立宗支碑的潮流，仍在水东乡流行。嘉庆元年（1796）川东白莲教起义没有冲击到川西群山之间的水东乡社会的稳定²⁴³。嘉庆六年（1801）二月，陈家山陈氏率先修建陈氏宗支牌坊²⁴⁴，这通宗支牌坊在陈家山的东面，距陈天道的坟墓仅 50 米左右，宗支碑的正面朝向名山县。陈家山陈氏把承载宗支碑主要内容的石碑建成石牌坊样式，这是水东乡的第一家。这座宗支牌坊高约 6 米，面宽约 11 米，高大宏伟，气势磅礴，其外形常给人以某种震撼，该宗支牌坊文字内容，则比之前水东乡的各姓人群的宗支碑更为丰富。

²⁴² 请见第一章，第三节

²⁴³ 有关清代白莲教起义，请参见蒙默、刘琳、唐光沛、胡昭曦、柯建中：《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七章，第二节。

²⁴⁴ 这道牌坊目前被称之为“九世同居牌坊”，在四川地区较为出名。只闻其名者多，真见其身者少。世人对它的名称、它所涉及到的历史一知半解，人云亦云，且以讹传讹，流布甚广。《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孙晓芬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14—115 页）：“雅安上里古镇陈兴崇家族九世同居：陈兴崇家族上千人九世同居，迄今为中国汉族家族中最大的家族，两次受到朝廷奖励，并在上里镇有嘉庆六年立‘九世同居石牌坊’”。《上里古镇文荟》（雅安市雨城区上里古镇管委会编印，雅内印（2005）字第 053 号，第 16 页）：“九世同居坊建于清嘉庆六年（公元 1802 年），系陈氏家族自第五代迁居上里后，九代同居，人口愈千，共聚一堂，在当时被誉为是全国汉族最大的一个家庭，曾两次受到朝廷嘉奖而立的家谱石坊”。《雅安导游词》（雅安市旅游局，2005 年 8 月，第 40 页）：“（九世同居）坊上刻有陈氏家史的有关记叙，文字叙述了陈氏由楚入川，‘九世同居’一家人口愈千，因而两次受到朝廷嘉奖，于嘉庆 6 年立坊纪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陈氏家族可称得上全国汉族地区最大的一个家庭”。



照片 5 陈云吉和陈氏宗支牌坊

宗支牌坊的下方石头有些破损，造成部分文字缺失。陈云吉讲：“六十年代积灰积肥，统一堆在这里，灰里有炭火，这些灰全部烧起来，就把石头烧爆了，破坏了。”²⁴⁵惋惜之余，所幸这些缺失的文字并不太影响我们对整体文字的理解。该宗支牌坊主要有四通石板刻字，共八面文字，其中有两面为陈家山陈氏世系表（下文引有同治三年名山县陈氏宗支世系，此处世系从略）。

我们先来看这道宗支牌坊的由来，探寻一下陈氏为什么要修这座宗支牌坊。

面之五：

太学翁陈公讳永晖，字荣龙，当世之伟人也。始则贸易而屡中，继则持家而闾阎严家，训成子侄，领乡荐、入邑庠，谟烈恢乎莫与享也。余也三世姻好，情投志合，能不为之追维焉。辛酉仲春，建竖□□历其境，缅怀德音，覩华荃迴思雅范，为之赋俚句以表行踪。

媿媿遗宗百世绵，惟君令德克承□。

□□壁沼□□重，国子林中第一仙。

其一

诒谋尽善美公贤，种得芝兰满户前，

更□□□□□化，已探蟾窟一枝还。

²⁴⁵ 陈云吉（59岁）口述，时间：2009年2月9日，地点：上里陈家山

其二

一门孝友实堪风，公亿于今复见公。

此日覃恩来□阙，芳名传播永无穷。

眷弟韩 昭顿首拜撰

碑面之六：

恭赠

荣龙老太姻瓮吉地

积善之家应感速，试看陈氏先人福
所伏

词讼不入于公庭。有无相通岂贪渎。

德意滂沱雨露优。心田广厚芝兰馥。

彼苍隆眷顾，累叶仍如故。

荣龙太翁□轩豁，经文纬武家声布。

芹香济楚游泮池，鹰蟠欲上青云路。

珍胜繡错接名雅，宝山重叠笼烟雾。

复有嗣君真令人，继志述事善体亲。

家训凛凛垂后代，世系遥遥记前因。

我来佳圻录遗章，环列瑶昆玉友并琳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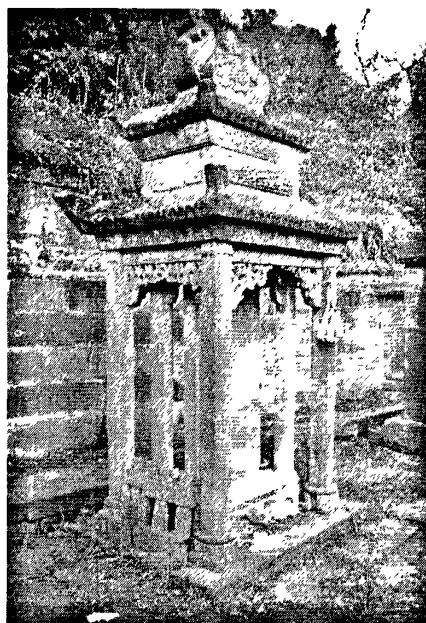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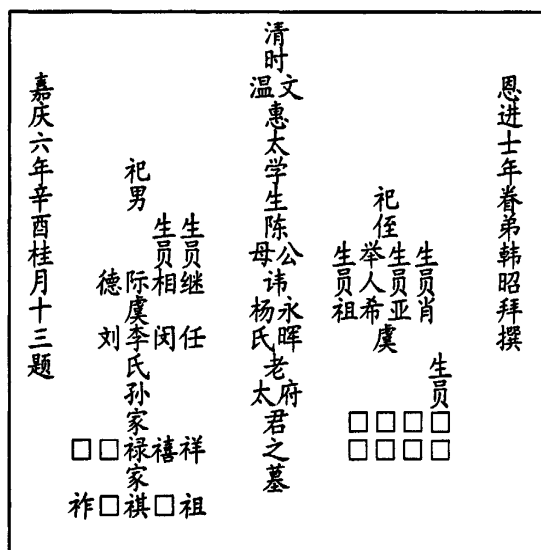
白杨青杉渐成柱，佇看墓在庆焚黄。

姻年家眷晚闲一德顿首拜撰

“陈永晖”是这座宗支牌坊的主角，面之五是眷亲韩昭纪念陈永晖的文字，面之六是姻年家眷晚闲一德称颂陈永晖墓地地理形势好的文字。这座宗支牌坊实乃有纪念陈永晖的意思。

关于陈永晖的经历，韩昭提到了“太学翁陈公讳永晖，字荣龙，当世之伟人也。始则贸易而屡中，继则持家而闳闳，严家训成子侄，领乡荐，入邑庠，谟烈恢乎，莫与享也”。这句话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陈永晖早年一直在做生意，而且“屡中”。他还培养后代（子、侄）读书，让他们入学获取功名。

要理解韩昭的评价，我们得再看看陈永晖的墓碑文才行。陈永晖的亭子碑建于嘉庆六年（1801）八月，距离陈氏宗支牌坊不到100米。其墓碑文²⁴⁶如下：



照片 6 陈永晖亭子碑

墓碑背面如下：

府君讳永晖，字荣龙，号光轩。少时赖先大父与先伯父之经营，虽未敢宽闲，□处帡幪之下。中年以后，仔肩室家重务，纘期于无愧物我，望其有成，恹恹日瘁劳靡矣。倘克享遐寿，得逸豫于垂白之秋，或稍□子侄辈之意。奈何方满花甲，淹忽见背，徒□后之人风木长悲也。

男相虞等谨志

陈永晖刚过完六十岁生日就去世了（即“方满花甲，淹忽见背”之语），他去世的时间应在嘉庆六年（1801）前不久，极有可能是在嘉庆五年（1800）去世的。那么陈永晖的生卒年代约在乾隆五年至嘉庆五年（1740-1800）。陈永晖掌管家务之前，他的父亲陈世业和他的伯父陈世瓚共同经营家族事业，在他三十岁至四十岁左右（乾隆三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70-1780），他开始掌管家业，既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室，又要主持整个陈氏大家族生意（即“中年以后，仔肩室家重务”之语）。在陈永晖的主持下，他的子侄相继入学，仅以他的墓碑来看，就

²⁴⁶ 2009年2月9日拍照并抄录

已有7人入学，其中1人中举。这是韩昭高度评价陈永晖的原因所在。

我们知道了树立这座宗支牌坊的缘由之后，心里不禁要问：“陈永晖即使对陈氏族人来说有如此大的功劳，但陈氏族人怎么敢建如此奢华的‘牌坊’？”原来，上里陈氏还有足以让他们敢建如此规模牌坊的东西：

碑面之一（正中横匾）：

太子太保世袭都尉文渊阁大学士四川督部堂孙 题

覃恩启后

嘉庆六年仲春月朔五日 立

众亲友为

（原匾太高，原文非常清晰但被石栏遮挡，遮挡部分以○代表）

韩万○ 景文○ 闵维○ 杨 ○ 韩 ○ 韩 ○ 韩 ○ 韩 ○
韩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赵全○ 杨大○
顾发○ 王绍○ 于 ○ 竹 ○ 程遇○ 任启○ 杨四○ 王 ○
黄抡○ 李抡○

碑面之二（正中横匾）：

钦命四川兵备建南道加五级纪录十次徐 题

蔚秀名山

嘉庆六年仲春月朔五日 立

众亲友为

刘登○ 杨际○ 李映○ 王肇○ 郑国○ 刘以○ 杨际○ 张公○
杨世○ 杨彦○ 杨文○ 底元○ 罗永○ 施连○ 黄廷○ 黄世○
刘国○ 刘国○ 杨奇○ 陈其○ 杨正○ 杨 ○ 任怀○

水东乡上里群山之巅的陈氏，为何能获得“四川督部堂”、“四川兵备建南道”如此高级官员的题字呢？我们得从这两份题字的人物身份和部分经历讲起。

查《清代职官年表》的四川总督年表²⁴⁷，“太子太保世袭都尉文渊阁大学士四川督部堂 孙”为孙士毅。陈家山陈氏又怎么能够获得孙士毅的题字呢？这又得从孙士毅入川讲起。

²⁴⁷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34-1441页

孙士毅入川与清王朝对廓尔喀（巴勒布）（今尼泊尔）战役有关。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开始，清王朝开始了对廓尔喀（巴勒布）的战役准备，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乾隆皇帝就把孙士毅从两广总督任上调回北京，“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²⁴⁸，“十一月癸巳，命署四川总督”²⁴⁹，让他负责四川省对藏输送军需银粮的统筹工作。孙士毅分别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乾隆五十五年（1790）担任四川总督一职。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十八日，乾隆皇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孙士毅、鄂辉、成德：

朕临御五十六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两金川，拓地开疆，远徼悉入版图。至卫藏，为我皇祖、皇考勘定之地，久隶职方，僧俗人等胥沾釀化百有余年。况该处为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住锡之地，蒙古番众素所崇奉。若任小丑欺凌，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所奏武功，岂转于此等徼外么麽不加躡伐。是此次用兵，实朕不得已之苦心，并非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此天下臣民所共见者。所有筹运粮饷等事节，经降旨令孙士毅妥协办理，并拨给银二百万两，解往备用。如有不敷，仍著孙士毅据实速行奏请，再为动拨。²⁵⁰

孙士毅从此驻扎在打箭炉，往来于卫藏之间，专门负责对廓尔喀（巴勒布）战役的军粮采买、运输、军饷供给等粮饷事务。从此，从雅安县至打箭炉，从打箭炉至前藏拉萨，从前藏拉萨至后藏聂拉木、济咙等边境地区这条漫长供给线上，形成了孙士毅坐镇打箭炉总理粮银供给事务，和琳于巴塘督运银粮，前藏各员再次督运银粮，福康安在前线打仗的格局²⁵¹。

前线军队除了粮银开销之外，缎匹茶叶也是重要的开销物资。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海兰察、孙士毅、惠龄、和琳曰：

又据和琳奏言，哲孟雄稟请添兵并求赏项，随酌赏彼处头人银牌缎

²⁴⁸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76，表16，军机大臣年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62页

²⁴⁹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76，表16，军机大臣年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62页

²⁵⁰ （清）方略馆编：《钦定廓尔喀纪略》，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献编辑室，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版，第114页

²⁵¹ 据《卫藏通志》卷四统计，雅安县→打箭炉（560里）→里塘（680里）→巴塘（545里）→察木多（1450里）→拉里（1500里）→前藏（1010里）→后藏（900里），从后藏扎什伦布至聂拉木，需要走11天。

匹茶叶等物，谕令坚守寨落等语。大兵连获胜仗，贼匪丧胆，已不藉哲孟雄兵力牵制贼势。……想各该部落亦俱不免。传谕福康安等，如各部落有似哲孟雄之请兵求赏者，福康安等亦当照和琳所办，严词拒绝，酌赏缎匹茶叶等物。²⁵²

随着前方战役胜局已定，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初五日，乾隆皇帝谕内阁：

孙士毅自署川督以来，办理一切粮运，尚属认真，且伊系汉人，能由察木多一带驰赴卫藏，会同和琳等筹备军需，俾资源源接济，甚为出力，孙士毅亦著加恩实授为大学士。²⁵³

根据水东乡上里陈家山陈氏宗支牌坊正中横匾面之一的题字落款“太子太保世袭都尉文渊阁大学士四川督部堂 孙”²⁵⁴来看，这幅题字应是孙士毅在乾隆五十七年八月至嘉庆元年（1792-1796）之间题写的。

“钦命四川兵备建南道加五级纪录十次徐 题”，则为徐长发所题²⁵⁵，他时任分巡建昌上南兵备道道员，官品为正四品，他的职责是巡察各府、州兵备²⁵⁶（雅、嘉、宁三府、眉、邛二州），“兼驿传，抚土司”²⁵⁷。

把宗支牌坊的主角陈永晖与陈氏获得这两幅题字联系起来，应该是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陈永晖住持陈氏家政时期积极支持过负责组织供应粮银、缎匹、茶叶等军需物资的孙士毅（可能是捐钱或者其他方式），陈氏才能获得贵为文渊阁大学士四川督部堂孙士毅、四品巡察兵备道员的题字。

陈永晖获得这两幅题字，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得把上里陈氏的经商活

²⁵² （清）方略馆编：《钦定廓尔喀纪略》，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献编辑室，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版，第547页

²⁵³ （清）方略馆编：《钦定廓尔喀纪略》，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献编辑室，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版，第574页

²⁵⁴ 关于“太子太保”，它属于从一品衔，“系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晋衔，内阁、各部院大臣、督抚加衔”。（崑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七，吏部，官制，《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0798·史部·政书类，第325页）

²⁵⁵ （嘉庆）《四川通志》，卷百三，职官，题名，建昌道，第3236页；《雅安县志》：“徐长发，字玉崖，上海进士。五十一年任。时道署初创，规模未备，时补修之。著有《严道记程诗集》，于文士多所造就”。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三，官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4册，第327页

²⁵⁶ 崑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十五，吏部，官制，各省道员，《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0798·史部·政书类，第424页

²⁵⁷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16，志91，职官三，外官，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54页

动经历与雅州地区地位日益凸现的过程结合在一起来看：陈永晖主持家政期间，清王朝进行了进剿小金川战役，大量白银流入南路和中路沿线地区；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甲口场开始崛起；清王朝政府进行了重要的廓尔喀战役。在雅安县，茶叶、布匹、粮米除了供应本地有限的日常需要外，更多的则成为重要的入藏物资，源源不断经打箭炉向西藏输送。邛州的茶叶也有经过雅安县运至打箭炉入藏的。雅安县是内地送往西藏的各类物资的集散中心之一。

上里陈氏的经营活动与清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活动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清王朝政府历次军事政治活动所确定的对藏贸易格局中获利匪浅。从另一方面来看，清王朝之所以能在西南数千上万里地开疆拓土，与茶叶商人积极参与王朝政府军事活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孙士毅正是因为清王朝对廓尔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才被“实授为大学士”。王钟翰先生以王杰、孙士毅的例子，认为乾隆末年满汉大学士的班次有了新变动²⁵⁸。显然，乾隆末期中央高层满汉大学士班次的变化，与川西汉人社会大力支持王朝战争有着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南地区的茶叶商人也是清王朝辽阔版图的重要开拓者与维系者。我们可以认为，嘉庆初年上里陈家山陈氏已成为水东乡新兴的土家大族。

生活新观念的引入

上里陈家山陈氏树立了宗支牌坊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我们还从宗支牌坊的另一面碑文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引入到了水东乡。陈永晖是陈氏经商致富并获得四川省高官题字的关键人物，陈氏在陈永晖的主持下入学人数大增。因此，陈家山陈氏所树立的宗支牌坊重点保存了陈永晖有关建设宗族的精神遗产。陈氏宗支牌坊刊刻了两面陈永晖的遗作，这里仅对石碑面之三的文字作讨论：

荣龙兄讳永晖家训并序

江州陈崇，数世未尝分产，唐僖宗诏旌其门。至南唐，又为之立义门，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九世同居。至宋，子孙益众。陈统之

²⁵⁸ “殿阁之制，明代依次递升，清代表面上满、汉各半，实则汉大学士班列在满大学士之下，只是作为陪衬罢了。乾隆末，稍为改定大学士班次，著阿桂居首，和珅居次，王杰居和珅之次，福康安居王杰之次，孙士毅居福康安之次（见《实录》卷一四五七），已算特典的了。”（王钟翰：《清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174页）

时，尝苦□食，知州唐戡上其事于朝，太宗诏本州每岁给粟二千石，事载□□，彰彰可考。论者以为张公艺九世同居，忍也。陈兢千口共爨，□□。□则无嫌心，公则无私意。能忍而能公，治家之良法备矣。

吾家□□□世，未逮张姓之久，户口之数，未臻昔贤之繁。凡我后人，宜以□□□心，勤俭为志，子姓弥众，仁让倍笃，于怀来经费愈多，拮据较励□□昔，知创业之匪易，识守成之更难，则人虽多，而□善用以节而□□矣。因作俚训，以便口诵，其词曰：

富贵生骄奢，制之以节俭。

贫贱根淫佚，守正乃无患。

尊卑有名分，训□勿干犯。

内外宜严肃，训尔勿褻慢。

和气能致祥，休逞睚眦怨。

心好百福臻，休把私财敛。

忠孝为家宝，夙夜当怀念。

经史是良田，智愚皆宜恋。

一家敦古处，累叶人钦羨。

要学昔之人，始克邀天眷。

凡属后世者，当以兹为鉴。

此示

先兄遗撰，久欲刊诸石，以戒后人，未竖而没兹，故表于碣，以成厥志。

胞弟陈永暉偕侄亚虞相虞宗虞同立

这篇文字的主体部分是陈永暉撰写的“家训”，“并序”部分为陈永暉的补充。陈永暉“家训”中说，江州的陈崇几代人都没有分家，唐僖宗发布诏书旌表他们。到了南唐，朝廷又给予陈氏家族“义门”称号，免除他们的徭役。陈崇的儿子是陈褒，陈褒的儿子是陈昉，他们一直九世同居。到了宋代，陈氏子孙更加多了，到陈兢的时候，曾经苦于粮食不足，知州唐戡把他们的情況上报到了朝廷，宋太宗下诏书命令江州每年给陈氏家族两千石粟，以解决他们粮食匱乏问题。这件事情载于（原文缺字），明明白白可以考证。议论的人们认为，张公艺九世同居，

在于能忍让。陈兢（家里）上千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原文缺字）则没有生嫌弃之心，于公则没有自私之意。能够忍让，又有公心，治理大家族的好办法就齐全了。

显然，陈永晖通过讲述“江州义门”的史事，主要是要引出他创立“治家之良法”的家训，江州即今江西省九江市²⁵⁹。至于陈永晖叙述的这段史事，载在《宋史》·四百五十六·列传二百十五·孝义²⁶⁰。

清王朝政府旌表累世同居（一般为六世同居及六世以上）的例子较早见于雍正二年（1724），按例给建坊银三十两，并由雍正皇帝亲自题字或书匾。清王朝政府在旌表政策下所提倡的累世同居生活方式，是延续了唐宋历代王朝政府所推崇的生活观念，这种生活观念代代相传，成为一种国家政府的意识形态。

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也专门提到江州陈氏：“昔张公艺九世同居，江州陈氏七百口共食”²⁶¹。陈永晖发挥了这段史事，如十三世同居，在他那里则成了九世同居，朝廷贷给陈氏家族粮食，在他那里则是朝廷送给陈氏家族粮食，七百人，在他那里则成了千人，康戡则成了唐戡，等等。陈永晖引用这段史事，想表达‘江州陈氏九世同居是他治理大家族的目标’这层意思，陈永晖归纳出治家之道在于“忍”与“公”，这为引出关于他的治家“俚训”做铺垫。根据陈永晖的发挥，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康熙前半期才搬迁到水东乡上里陈家山的陈氏，在乾隆中期以来经营茶叶生意致富之后，他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人（即“逮来生齿近口，家中约计百有余口”之语，面之四碑文，此处从略），陈永晖接受了累世同居的生活观念，他提倡并表示将要追求累世同居的生活方式（事实做到与否，另当别论）。

嘉庆六年（1801），上里陈家山陈氏树立了宗支牌坊，他们就把过去获得的这两幅题字、陈永晖的遗作、纪念陈永晖的文字都刊刻于宗支牌坊上。陈氏树立宗支牌坊是水东乡的一次盛会，共有49位亲友的名字出现在宗支牌坊上，其中杨姓14位，韩姓6位，刘姓4位，黄姓3位。这四个姓氏的亲友人数占陈氏亲友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次活动的特点是以陈氏族人血缘关系为核心，加上他们的姻亲关系，以及生意往来和入学、中举的同年朋友关系。基本上这是一个以大家庭为中心的公共活动。

²⁵⁹ 有关江州义门研究，参见：陈美娣：《江西‘义门陈’》，《寻根》，2002年3期

²⁶⁰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56，列传215，孝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91-13392页

²⁶¹ 《圣谕广训》，《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17册，第594页

陈永晖撰写“家训”里提到的“累世同居”观念，相对于水东乡而言则是“生活新观念”和全新的生活方式。上里陈家山陈氏树立宗支牌坊之前，水东乡各姓人群树立的宗支碑，仅能达到苏洵当年“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涂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的目标。在这种目标下，同姓同宗人群最多就是“相见并非如途人”，同宗逐渐疏远的人群在他们所树立的宗支碑上名字联在了一起，它们从而变得如此地近。累世同居这种“生活新观念”通过陈永晖撰写“家训”而进入了上里陈氏人群；嘉庆六年（1801），通过陈氏宗支牌坊的树立，这种“生活新观念”才得以生根落脚于水东乡；通过众多参姓亲友参加陈氏宗支牌坊的树立，这种“生活新观念”才得以传播到水东乡各处。

即使如此，嘉庆初年的水东乡还没有任何一家有足够的经济和文化实力完全实践《圣谕广训》里的主张：“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疎远”²⁶²。陈家山陈氏根据自身的实力，也只能树立一通宗支牌坊，实践了雍正皇帝二分之一的主张（课子弟、联疎远）。

²⁶² 《圣谕广训》，《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17册，第594页

第四章 茶道、市场与宗族成长

地方市场建设总是与交通建设分不开的。张应强教授对贵州清水江流域木材市场的考察显示，政府在疏浚清水江流域河道的过程中动员河道沿岸百姓开修，并把沿河百姓参与开修河道与分河段放运木材的权利联系起来²⁶³。这是一种政府出面组织的市场建设方式。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没有县衙出资，也没有地方官员组织而进行的地方市场交通建设活动呢？如果有，这种建设活动有什么特点？

另一方面，有关明清时期的四川历史，“湖广填四川”现象极大地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²⁶⁴。近十几年来逐渐兴起的清代四川宗族研究，也基本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展开讨论²⁶⁵。本章尝试展示不太同于贵州清水江木材市场的交通建设方式和不太同于清代“湖广填四川”的闽粤移民潮的宗族发展之路。

第一节 芦山岗茶道初步发展

芦山岗茶道是五甲口场至打箭炉的漫长茶道中很短的起始一段路，总长不过三四十里。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甲口场众姓修平水桥和文星渡福寿桥，就已表明芦山岗茶道上的人货已较为繁忙。这条茶道经五甲口西头文星渡福寿桥后一路西行，沿着黄茅溪蜿蜒于芦山岗东面的山沟里，途中有好几个地方需要顺着溪流山形的走势而越过溪流继续前行。



照片 7 芦山岗箭杆林茶道，往芦山县方向

²⁶³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²⁶⁴ 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其后诸多论文，恕无法一一列举。

²⁶⁵ 刘正刚教授认为，闽粤移民进入四川后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宗族组织建设。（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五章，第二节）“移民在短时间内就修建祠堂、族谱以及筹措族田，与清代四川移民方式密切相关。闽粤移民往往是原籍同一家族的不同支系同时迁川，入川后多聚族而居，这既为家族组织的重构创造了条件，也会缩短家族组织建构的时间。”请参见：乔素玲、刘正刚：《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家族发展比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第128页；另外，刘蓬春以成都龙泉驿洛带镇宝胜村刘氏为例，探讨族规与国法、宗族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请参见：刘蓬春：《东山客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示谕碑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期；张彦直接继承了刘正刚教授的因移民而宗族重构（即宗族形态由闽粤移植四川重构）的思路。请参见：张彦：《略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宗族组织的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芦山岗茶道沿线居住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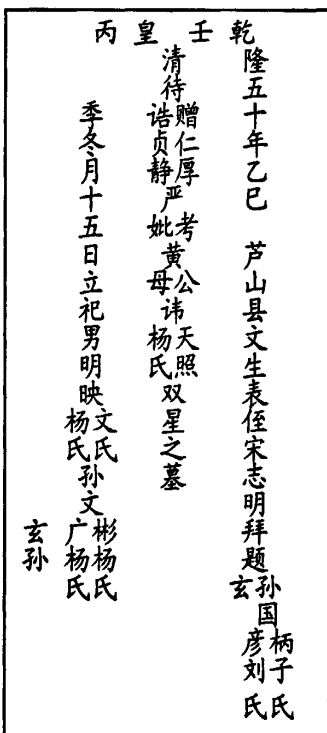
要讨论芦山岗茶道，我们得初步了解居住在这条道路沿线的人群情况。在芦山岗东面山沟的半山腰上，约距五甲口场 10 里的地方，聚居了师姓人户，这个地点即在今天上里镇箭杆林村一组小地名河石坝处。经过师姓人户，再往山上爬约 5 里就到了芦山岗的分水岭箭杆林，这里聚居着黄姓人户，这个地点，即今天上里镇箭杆林村边界。翻过箭杆林，就进入了芦山县境内。

这两个地点之所以能形成人户聚居，应与爬山中途需要休息有关。据上里镇箭杆林村一组河石坝的一位不知名的师姓老人说：“师家也有宗支碑，石头很大，有两面，离河石坝远得很，地名叫官房山麓子宕（音），当年抬棺材都抬了一天才到，现在走路要两个多小时，这个地方是师家自己选的，他（指坟墓主人）就是阴阳先生。”²⁶⁶由于各种原因，我没能去成麓子宕（音），我对师氏的家史了解并不多。

芦山岗山顶箭杆林为黄氏，他们与陈家山陈氏遥向相望，一个在西面山头，一个在东面山头，两山中间的一方平地，则是五甲口场。黄氏较早的坟墓建于箭杆林去芦山县茶道附近。其墓碑²⁶⁷如右。

乾隆五十年（1785）箭杆林黄氏已修建了一个三座墓穴相连的石板围成的坟垣，墓碑形制与陈家山陈天道的相似。与同时期水东乡其他坟墓规模形制相比这是水东乡乾隆时期规模较大的坟垣，其花费白银必不在少数。从这一点来看，乾隆中后期水东乡率先致富的地方，不在平原地区而在处于蜿蜒漫长茶道之上的各个山头。

这通黄天照的碑文显示，箭杆林黄氏与芦山县宋姓联姻（即“表侄宋志明”之语）。就我收集的墓碑文来看，水东乡人与芦山县人联姻的情况不多（芦山岗黄氏也多和水东乡人联姻），箭杆林处于水东乡与芦山县的分水岭，这是箭杆林黄氏与芦山县人联姻的地缘原



²⁶⁶ 师姓老人口述，时间：2008 年 12 月 25 日，地点：上里镇箭杆林村

²⁶⁷ 2008 年 12 月 25 日拍照并抄录

因。如果我们把这种地缘性联姻现象与陈家山陈氏结合起来看（陈氏与名山县闵氏有联姻）则会发现：处于漫长茶道翻越群山之巅的人群，他们的婚姻关系分布于山颠的两边人群之中。这说明通往打箭炉的漫长茶道上的山颠人群是维系一山两边人群的重要纽带。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白芦山岗茶道发展的基本原理。箭杆林黄氏的部分家史和世系保存于同治十年（1871）黄文清墓碑²⁶⁸之上，此不赘述。

众姓合修长寿桥

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箭杆林道路沿线的众姓人户合修了一座石桥，并树立了一道方碑。这座石桥和方碑的位置，就在今天上里镇箭杆林村一组河石坝。石桥全长约15米，宽约1米，桥高约2米。



照片 8 长寿桥，往五甲口场方向

其碑文²⁶⁹如下：

面之一：

尝观辰角见而雨毕，天垠见而水渴。故先王之令曰‘雨毕而除道，水渴而成梁’，则知造千万人往来之桥，歌万平庆正直，亦王政所不废也。

愚门外有山溪，其山自天台蜿蜒而来，其溪自细流积<酉丕>而至。凡担

²⁶⁸ 具体碑文请见“第六章、第三节”

²⁶⁹ 2008年12月25日拍照并抄录

夫贩豎、牧童樵叟，以及耕山、赴市、犖口，必经之途也。虽非长江巨海，然夏秋雨果，沟浍皆盈，波滔汹涌，往来行人，每至褰裳之苦，历揭之艰，愚目击而病者，久之。顾力有不支，结念十余载，始获竣功。纵不能容题柱之客，庶可免望洋之叹。履道坦坦，山人贞吉，愚心始慰焉。是为序。

芦山县廩生陈镐题

嘉庆十五年四月初三日立

父 师在免 黄

任 杨

氏为首男任万嗣 孙任肇珖 氏

任文汉 杨

氏 万

“为首”组织修建这座石桥之人叫“任万嗣”。任万嗣的生父应为任文汉。从任万嗣和他的儿子任肇珖的字辈来看，他们不属于水东乡四甲任家沟的任氏。任万嗣的妻子，则可能是水东乡四甲任家沟的任氏。这通碑文序中的“愚”，极有可能就是任万嗣。

碑文显示，经过这条跨越溪流道路的人非常多，除了供居住在这里的任氏、师氏人户使用外，山下人户上山放牧打柴（即牧童樵叟）也得经过这里，箭杆林黄氏赶五甲口场也得经过这里，最主要的，往来于五甲口场与芦山县的大小商人（即贩豎）及其雇佣“担夫”得经过这里。每到夏秋雨季，这条溪水难以涉足，这种道路状况较差的局面持续了一二十年都没有太大改变。任万嗣较早居住在这里，他一直看着这条溪流时常涨水阻道，十多年来他一直有心修桥，无力出资。

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随着迁居于芦山岗东面的各姓人群的增加，因为处于翻越芦山岗茶道的两个歇脚点，他们缓慢积累白银，家财渐丰。这年任万嗣带头组织建桥，各家各户均踊跃捐出白银。芦山岗众姓捐资建桥，完善芦山岗沿线茶道，这显示了经上里五甲口场至芦山县的商人货物过往量持续增长，五甲口场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据捐资名单来看，每户人家多的能够捐出一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对其他地方的一般农户来说，是一个较大数目。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嘉庆十五年四月三十日萧茂金告状：情蚁原在盐船帮靠船营生。本月二十六日有黄万

年倩蚁帮伊靠船至巫山县，议成身工五百文，原约待二十九日开行”。²⁷⁰如果忽略雅安与巴县地区间的银钱比价差异，雅安水东乡大山里的人家每户捐资的数目，当时足够雇用巴县一个船工在长江上靠船两趟巴县至巫山县。对比当时其他地区农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条道路商业贸易的繁荣，以及这条茶道沿线农户的富裕程度。²⁷¹

关于“堪輿黄天星”，我们在乾隆五十二年（1792）五甲口场东头的《平水桥碑记》中找到了他的名字。根据箭杆林黄氏的排行来看，黄天星应来自芦山岗箭杆林的黄氏。长寿桥方碑上的其他黄氏，从字辈来看，不符合“黄文清”宗谱排行。考虑到箭杆林黄氏康熙年间两兄弟就各有七个儿子，分支非常多，其字辈排行则各不一样，这些黄氏应该也属于聚居于箭杆林的不同宗支黄氏。

芦山岗东面的这些人群与芦山岗西面的芦山县关系密切，他们请来题写这通碑文的人是来自芦山县的康生。这再次证明，箭杆林的人群与芦山县的社会关系较紧密（相对于水东乡其他各处的人群而言），他们社会关系的地域分布既有芦山岗西面芦山县的，又有芦山岗东面水东乡的。这说明他们是水东乡、芦山县人群的中间联结人群。群山之巅的人群采取“山两边”联姻、“山两边”交往的方式，是通往打箭炉的漫长茶道能够畅通无阻的基本原因。

第二节 僧人建桥及葬法改变

白马泉寺即天宫寺的一部分。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天宫寺僧人就对通往五甲口场的大石桥进行过培修。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这条茶道上原有的桥梁损耗较大。另一方面，天宫寺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天宫寺一部分的白马泉也逐渐建起了一些房屋，这些房屋连同白马泉一起被称之为“白马泉寺”²⁷²。嘉庆中期白马泉寺僧人也加入到五甲口场的道路建设中来，他们组织修建茶道上的桥梁，白马泉寺僧人葬法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²⁷⁰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06页

²⁷¹ 2008年至2009年，我在上里镇、中里镇、下里镇走访调查过程中，我与平原地区、山里的农户交谈过程中，有好几个人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这里不缺吃穿，就是手里没有钱，（单靠农产品交换）变钱难”。可见，即使在今日，这里农户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嘉庆时代富裕。

²⁷² 在清代，“白马泉寺”最早见于康熙十二年《四川总志》卷二十四，寺观；乾隆四年（1739）《雅州府志》卷三，“白马泉寺，治北，州人祈雨处”。这些官方纪录并没有注意到天宫寺（天公寺）与白马泉寺的细微差别，笼而统之地称之为“白马泉寺”。

建修复兴桥

嘉庆十五年（1810）十月，就在芦山岗众姓合修长寿桥的六个月后，白马泉寺也僧人加入到地方市场的建修桥梁中来，他们组织重修了白马泉寺附近的通往上里五甲口场的石桥，并把这座石桥取名为复兴桥²⁷³。长寿桥与复兴桥的建造石工都是同一个人，即陈维主（惟柱），因此这两座桥梁的大体式样非常相近。复兴桥长约 11 米，宽约 1 米，高约 1 米，它的桥墩朝水流上游方向雕刻成兽头形状，这种供人行走的石桥出现装饰性雕刻，其花费也相应增加，这也反映了出资兴修者们较为宽裕的经济情况，开始在审美上花费一定钱财。

这座石桥的建桥方碑也非常精美，高约 4 米，共有三层，最下面一层共有四面，其中三面有文字，其文字²⁷⁴如下：
四面之一：

复兴桥

重修石桥碑序

原夫徒杠與梁，王政之章嘉尚，桧楫松舟，風詠之篇口切。又覽之帝君，曰：“造千万人往來之橋。”昭昭可考也。茲因蜀南雅北白馬泉寺左之溝，晴久則口口鮮涼，雨漲則浩浩汹涌，口為昔橋遭暴雨沖毀，是以往來諸人，莫不嗟其難涉焉。第越斯溝者，東通邛名，西達芦雅，且遐迹經商士庶，絡繹不絕，亦為要道耶。今有募化人等目睹心傷，不忍旁觀，爰發片念，鳩工庀石，重修橋道。竊思工程甚大，獨力難成，若非募眾，奚以完工。于是不憚風雨之苦，不辭跋涉之勞，懇乞四方仁人善士施口施粟、助錢助米，俾橋道得以完全，使往來獲此平坦。則若是則，捐貲之功，樂莫大焉。是口望于萬一者也。今將功成告竣，為此勒石標名，永垂不朽。是以為序。

撰碑文僧祖珣

大清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朔四日立

²⁷³ 这座复兴桥原本在距白马泉北面约 200 米的水沟处，2005 年雅安市政府在对白马泉寺进行维修时，把这座石桥及其石方碑，整体搬迁安置在今天的白马泉寺的正门口，作为一座进入白马泉寺的必经桥梁。

²⁷⁴ 2008 年 12 月 22 日拍照并抄录

僧人祖珣所撰写的序文，开篇就引经据典²⁷⁵。白马泉寺僧人祖珣熟读儒家经典，序文开篇就把修桥的意义提升到为政、为官之道在于有利于民的高度。“越斯沟者，东通邛名，西达芦雅，且遐迹经商士庶，络绎不绝，亦为要道耶”，这句话说明白马泉寺前面的这条茶道人货非常繁忙，原有石桥被水冲毁之后严重影响了这条商道的客商往来，这是白马泉寺僧人组织重修石桥的重要原因。嘉庆十五年（1810）的白马泉寺已发展成了规模较大的寺院，据碑文的不完全统计，已有11位僧人。白马泉寺僧人以“募众出费”的化缘形式组织了各方人士捐款捐物、出钱出力；白马泉寺僧人又组织石匠建造石桥；石桥建造好之后，白马泉寺僧人又撰文并树碑纪念。白马泉寺僧人领导重修桥梁活动，部分地承担了相当于现代政府建设地方社会的职能。

关于复兴桥的总造价以及捐资人身份的问题，据碑文不完全统计来估算，四面方碑面之二的第3-7排，一排人数约为12人，每人平均在300文左右算，共计18000文。天空寺僧人捐资人数为11人，金额为25.95两，俗人人数为180人，捐资9.38两白银和39500文钱（约为39两白银）。修建复兴桥总费用约计白银75两左右。这些捐资人（俗人）应多是往来于邛州与上里五甲口场的中小商人。

复兴桥的建成，并不只是白马泉寺僧人与中小商人的功劳，上里五甲口场附近的农民也有贡献，他们虽没有足够的金钱，然而他们家里有米，他们在建桥过程中量力而为，出米帮工，即碑文所谓的“四方仁人善士施口施粟、助钱助米”。

²⁷⁵ “徒杠舆梁”语出《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子产，郑卿。为政，听讼也。溱洧，水名。见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车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以为子产有惠民之心，而不知为政，当以时修桥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舆梁也。’孙奭对这段的疏如下：‘○正义曰：此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抚，是以子产渡人，孟子不取也。’‘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者，子产，郑大夫公孙侨也。溱洧，郑国水名也。言子产为政听讼於郑国，於冬寒之月，见人涉溱洧之水，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车舆济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产虽有恩惠及人，而以陆地乘舆而济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济人矣。所谓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其政也。言岁中以十一月雨旱乾晴之时，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说文》云：‘石杠，石桥也，俗作杠，从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则梁为在津之桥梁也。今云舆梁者，盖桥上横架之板，若车舆者，故谓之舆梁。如此，民皆得济，所以未有忧病其涉者也。”

“桧楫松舟”语出《诗经》，本意为用桧木作楫，用松木作舟，这两种木材各有所长，各有所宜，分别作舟与楫，搭配得当。这句话又常被比喻为仁人适宜做官。《毛诗正义》（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中，孔颖达疏：“《竹竿》云‘桧楫松舟’，《菁菁》云‘汎汎杨舟’，则松杨皆可为舟。言柏木所以宜为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为官，犹仁人所以宜为官，非谓桧木不宜也。”

新建永宁桥

嘉庆十七年(1812),白马泉寺僧人祖向再次组织各方人士,在距寺约2里的地方新建了一座永宁桥,永宁桥所在的位置,正处于名山县通往五甲口场的道路路线之上²⁷⁶。其碑文²⁷⁷如下:

正中面:

建修桥路碑序

从来雨毕除道,水涸成梁,载之典籍,昭昭可考也。兹因雅治上里东北角斜石口,两山并峙,峰峦耸秀,其间有溪,晴久则浅流渐少,雨多则泉溢诸水骤涨,亦甚汹涌矣。自先贤开道,东通名邛,西达芦雅,往来经商士庶,络绎不绝,亦为要道也。盖为桥岸遭暴雨冲毁,凡过往诸人,孰不嗟其病涉乎。今有向触目惊心,不忍旁观,爰是募众出赀,鸠工庀石,始于辛未冬,完于壬申春,新建一桥,名曰永宁,以利永世之涉焉。又斲溜马崎岖,改修平安桥道,兼除当途礙石,培振上下石路。今已工成告竣,勒石標名,以誌众功云尔。

大清嘉庆十七年岁次壬申仲春月下浣之吉立 堪輿祖向敬撰书

白马泉寺主持僧祖向领导了这次新修永宁桥活动,他们差不多是新开通了一条道路。永宁桥碑文中尽管有“自先贤开道,东通名邛,西达芦雅,往来经商士庶,络绎不绝,亦为要道也”的套话,但是这条名山县至上里五甲口场的道路并不如邛州至上里五甲口场的道路那样人货繁忙。从“又斲溜马崎岖,改修平安桥道,兼除当途礙石,培振上下石路”来看,之前走这条道路的人并不太多,这座桥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很少人经过的地方。所谓“溜马”,应是当地的一种藤状植物。目前当地人仍把一种藤状植物称之为“牛马藤”。这种植物常常缠附在三五米高的树上,其茎较为粗壮,常常两条纠缠在一起,长成麻花状,当地人常把它们皮的剥下来搓成绳子用。由于这种植物皮搓成的绳子很结实,适合捆绑各种粗重东西,当地人就把它们叫成“牛马藤”,意思是它们既象牛马一样力气大、承载多,又象牛马一样任劳任怨、经久耐用。从语音来看,“溜马”与“牛马”非常接近,

²⁷⁶ 2005年雅安市政府维修白马泉寺时,把这座桥的石碑整体迁移到白马泉寺门右面。

²⁷⁷ 2009年5月5日拍照

“溜马”应当就是牛马藤，这也才存在“斫溜马”的问题，即把这些生长在道路两旁、笼盖了原有小道的牛马藤砍断，把这条小道清理出来。新桥头还有挡道的大石头，这次修桥也把这个“碾石”敲除掉了，上下桥的道路也用石头培好。

捐资参加寺僧祖向领导的这次修桥活动的俗人群，与前两年捐资建修复兴桥的俗人群相比，只有许倬忠和杨应寿两人参加了前后两次出资建桥活动，其余的俗人群则完全不同。从俗人群人数来看，前一次约有 180 人，这次只有 36 人；从建桥总费用来看，前一次约有 75 两，这次只有 58 两。陈家山的陈永旸也出资修桥了，因为这条路恰好就在陈家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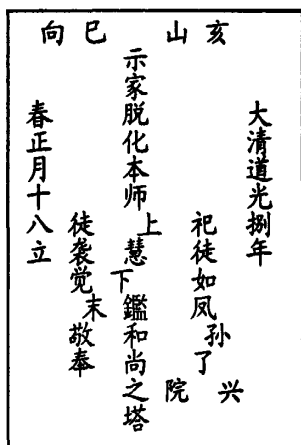
与前两年修桥相比，白马泉寺僧人既是建修永宁桥的组织领导者，又是建修永宁桥的主要出资者。陈家山陈氏虽然富贵也不能成为当地修桥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当然，陈氏可能也不愿意修更多的道路，否则名山县经陈家山到五甲口场的商路就有被替代的危险），这也可见白马泉寺僧人特有的威望。白马泉寺成为两条商道的联结中心，这种一般小商户无法独立完成的公共事业，在佛教寺院僧人的组织和领导下得以完成。

僧人葬法的改变

天宫寺及嘉庆年间兴起的白马泉寺比明代的天公寺具有了更多入世的精神。明代的天公寺僧人（最多达 24 人）更多专注于佛教寺院的自身利益（如修建塔院、塑粧佛像），他们的贡献多在促进了佛教教义与信仰在地方社会的传播；清代的天宫寺、白马泉寺僧人（最多达 16 人）则多从事有关世俗人群的公共利益活动。他们为地方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其佛教观念和仪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其标志表现在僧人葬法的改变。

明代寺院中的高僧都采用舍利塔葬，今天的白马泉寺和天宫寺里尚留有 60 余座明代舍利塔。至迟在道光年间僧人葬法则出现了显著变化。我们先来看道光八年（1828）的僧人塔文²⁷⁸：

²⁷⁸ 2009 年 5 月 5 日拍照并抄录



照片 9 慧鉴和尚“塔”

塔文背面：

大禅师系大邑县西三甲红豆树徐家碾人氏，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相四月二十六日子时。幼年披剃于雅郡水东乡白马泉所属塔房山院。平生耿直，培修寺院，昭然可考。亡于道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享年寿光五十四岁。今迁葬于本山，永佑后裔。

以垂不朽

白马泉寺僧人已经采用了水东乡儒家礼仪规定的墓碑题写格式。“示家”大概即“释家”的别写，即佛家之意。“脱化”是佛教专用术语，它指僧人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有意识地控制并规定自己在何时离世。其奉祀者徒、孙、袞、末四代。僧人实行的是二次葬。慧鑑和尚应是嘉庆十五年(1810)和嘉庆十七年(1812)捐修桥梁人名中的“慧见”。

这通“塔”有石鼓石帽，其形制明显地承袭了乾隆年间陈家山陈天道墓碑开启的俗人墓碑形制。它明明已经是“碑”与“墓”了，但还被称之为“塔”。同治二年(1863)如风和尚的墓则不再称之为“塔”了，而直接称之为“墓”。如风和尚墓碑正文²⁷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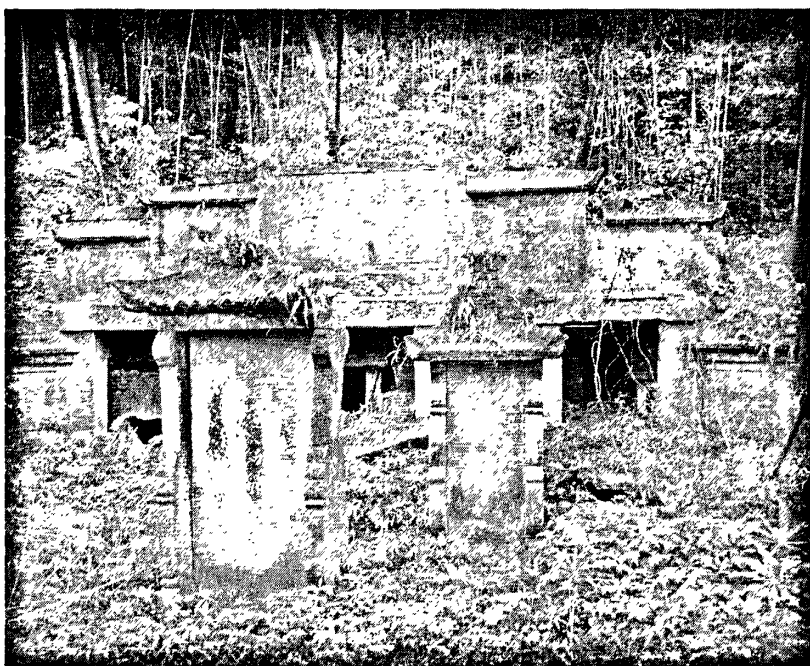
²⁷⁹ 2009年5月5日拍照并抄录

向	巳	山	亥
	清时脱化本师	上如下	祀徒了
	徒孙	和尚	院
恒	崇徒末性禄袞元	和之墓	兴
	庆来满		

白马泉寺僧人从舍利塔葬过渡到儒家墓葬形制的轨迹非常清晰。让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墓形的轮廓：



照片 10 连五穴墓



照片 11 左如凤和尚碑，右慧鉴和尚“塔”

整座墓形制宏大，连五穴墓，其上为大块横幅石板，上书四个大字“飞锡腾鹤”。其墓的横梁外面雕刻了一部戏剧人物，戏中既有做官和孝顺父母的情景，还有男女恩爱的场景。这样的石雕艺术如果出现在水东乡一般人家的坟墓上，一点也不奇怪，然而这些场景雕刻在了僧人的墓上，则显出僧人们与世俗社会异常亲近。保守估计，在修建和尚墓的时候，僧人们接受了匠人们的设计。然而可能更多的是，白马泉寺僧人选择了这部带有升高官、发大财、娶娇妻的世俗梦想的戏剧，他们内心世界似乎也可以从这部戏剧得到反映。当地人把这种墓称之为“和尚坟”。这些和尚坟已经被盗，我们尚能大体看到其内部结构：僧人也使用棺槨，漆黑漆的厚重棺材放置于石槨之中，石槨由一块整体石板密封成一个长方形的石柜。石槨的门外，用一层石条挡住。整个石槨由更大石棺藏起来。石棺门用两扇雕刻成门形的石头封住。天空寺僧人的这种坟墓与水东乡其他一般人家的坟墓相比，多了一层石槨及其内部防盗石条层。

白马泉寺僧人葬法改变的时代，正是邛州的茶包背往五甲口场迅速增多的时代（请见下节拐子窝照片）。白马泉寺则正好处于邛州与五甲口场的中间位置，他们有可能按照客栈的经营方式而赚得了大量银钱（当然也不排除过往人们进香和捐献）。这座宏伟的坟墓上方巨幅石板形成一种威仪和张扬的气势，这是同时

期水东乡任何家庭的坟墓都无法比拟的。道光初年白马泉寺的这种做法也开启了水东乡各姓人群兴修豪华坟墓的奢侈之风。

第三节 韩氏宗族的商宦之路

五甲口场的崛起，上里陈家山陈氏的富贵，白马泉寺的市场参与，我们在这些讨论里一直没有看到这条茶道上茶包流动的文字证据。（尽管当地老人能回忆很多民国年间邛州经五甲口场背茶包的情形和故事）。五甲口场韩氏的商宦之路，则不仅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还能再次证明水东乡这片地域的社会经济变化与整个雅州府地区地位的凸现有密切关系。

经营茶布店致富

韩氏早期居住的房屋处于五甲口场的中心位置。乾隆八年（1743）的时候，韩氏的经济情况仍然不如上里陈家山陈氏；乾隆四十二年（1777），韩珽自撰碑文追述家世，长子韩绍宗书写记录，上里韩氏开始有意识地保存家史了。在随后的二三十年中，上里五甲口场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各方人群都被上里五甲口场这个市场卷了进来。上里韩氏在这二三十年中也因商迅速致富。《韩氏宗谱》记载了韩绍宗长子韩昭的情况，这是我们了解韩氏经商致富的重要依据：

东升公，讳昭，克绳公主器，邑恩贡生也。孝友性成，多智略，居乡恂恂，亲疏咸尊重之。自幼好读汉唐宋古史，嗜爱右军羲之书，摹仿时墨汁淋漓辄盈衣袖，后遂以精书驰誉乡人，士每造门请书焉。年甫弱冠，克绳公见弃，遵遗命持家政，兢兢业业，时凛付托之重，恒思丕显，乃于邑设茶布店数所，二十余年勤经营，权子母，家之昌炽，要皆公焦心劳力所致。然廉介素守，一线一粟无私，饮食服御不敢自丰，延师课子侄书，岁糜百金无吝色，倡修安定桥，捐百金无愆情，其它济亲朋、周困乏，不一而足。德之盛，甲于嘉阳一郡。

韩昭的生卒年代为乾隆十六年至嘉庆十七年（1751—1812），其父韩绍宗（克绳）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去世，韩昭时年 36 岁。所谓“年甫弱冠，克绳公

见弃”，不过是撰文者发挥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道精神的一种叙述方式。

韩氏经营茶布店，这说明上里五甲口场经芦山县通往打箭炉茶道上流通的主要货物就是茶叶与布匹（这与韩先府叙述韩氏祖先自陕西贸布而入四川是吻合的）。关于韩氏乾嘉时期经商的具体过程，因为资料的限制，现在已经很难知晓。目前上里镇韩氏后人的有关韩氏经商的说法基本属于清末民国的状况，故不在此处引用他们的种种说法。

韩氏真正致富的时间可能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后。因为平水桥是由众多中小商户集资修建的，由于碑文残缺和风化，我们没有发现韩氏捐款名字。即使韩氏也有捐款，但他们当时并不算非常富裕，只是众多中小商户中的一员。五甲口西头的文星渡福寿桥的出资者为邓氏、李氏、刘氏，他们当时应比韩氏更有钱，他们三姓就承担了这座桥梁 24 两白银的总费用。而这座桥是上里五甲口场各中小商户（包括韩氏）都要经过的桥梁。

韩昭主持家政把生意做大之后，主要作了三件值得称道的事情：第一，作为一家之长，他开始出资培养韩氏后人，“延师课子侄书，岁糜百金无吝色”；第二，作为上里场逐渐有钱的家庭，韩昭“倡修安定桥”。安定桥在平水桥北面 50 米，即今天的“高桥”（现在取名为“清代立交桥”）。安定桥具体修建时间不详，约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嘉庆十七年（1812）之间。第三，作为逐渐有钱的商人家庭，韩昭在水东乡也会做一些“济亲朋、周困乏”善事。

关于韩绍宗的次子韩晚，据《韩氏宗谱》载：

太学生韩公者，讳晚，字正升，克绳公次子也。生而颖异，孝友性成。值克绳公卒，哀毁尽礼，人称孝焉。继与兄同理家事，协力经营，朝夕不遑，勤苦二十年，家始饶口。然事兄极严，生平虽一钱一帛未尝自私，此友于之德，内外无间言，而怡怡一堂也。

韩晚的生卒年代为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53—1789）。他的父亲韩绍宗去世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与其兄韩昭“同理家事，协力经营”。从“事兄极严，生平虽一钱一帛未尝自私”来看，韩绍宗遗留在生意上的财产并没有平均分配给四个儿子，而是由长子韩昭主持经营，弟弟韩晚协力经理。韩辅臣、韩辅周两兄弟来水东乡上里同心协力打拼生意，到韩昭、韩晚

兄弟还是“同理家事、协理经营”，这表明韩氏一直保持着兄弟共同经营生意的传统。

修建韩氏祠堂

嘉庆十五年（1810）以来，五甲口场再次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居住在五甲口场中心位置的韩氏，是五甲口场商人的领头羊，他们在嘉庆朝随后的十年间发展异常迅猛，迅速积累了大量白银。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五甲口场韩氏开始兴修韩氏祠堂²⁸⁰，至道光元年（1821）三月完工，用时两年多。韩竣和韩旺兄弟主持了这次韩氏祠堂的兴修工作，这座祠堂总共花费了近三千两白银。水东乡第一次开始出现“祠堂”这种建筑物以及这种基本围绕祠堂的制度与观念。五甲口场韩氏的宗族建设道路是跨越式的，他们先修韩氏祠堂，咸丰七年（1857）才修《韩氏宗谱》。《韩氏宗谱》有篇“祠堂说”，专文记载了这次兴修祠堂的事情：

祠堂者，先大人竣公伯仲，率胞伯兄宪文公、堂伯兄斯文公等所建修也。其土木工匠一切修理之费，族众俱有帮补，而经营区划，焦心劳力，不惜己资，以至垂成者，惟先大人伯仲与伯叔兄而已。且既有祠宇，则祭祀有费，赔补有费，住持尤有费，先大人叔侄又为之各舍田业，以备数项之需，以为久远之计，可谓深谋远虑矣。谨将修理年月、族众捐费田业界址，牒列于左，以昭示来者，使知创业维艰之意云尔。

一、祠堂地基，坐落五家湾，条粮一钱七分整

一、修理祠堂，自嘉庆廿四年二月兴工，创建正殿三间，左右廊房二间，厅房三间外，走廊左右各三间，戏台一座，左右山门各二道，后寝室一间，厨房三间，周围粉墙俱用石条砌脚，满屋俱勒石板，大殿前左右石级各七阶，石栏三丈有余，底后砖墙竖高一丈八尺，横长三丈六尺。殿中雕彩，佛龕三座，雕彩隔门十八扇，拜厅隔门十八扇，满堂壁柱俱皆油漆，戏台及正殿、拜厅、左右诸廊横房，皆搬整竖脊，五彩粉饰。至道光元年三月完工，共计所费银二千八百有奇，越后培修，共费

²⁸⁰ 民国《雅安县志》无载，1996年《雅安市志》把“韩家祠堂”作为雅安十大祠堂之一记录下来。

银且百八十两有奇。

一祠堂熟地一分，坐落名山体五甲宋家沟，四界有宗祠石椿为凭。

一祠堂熟地二分，一坐落本里大沟头，一坐落石板路，四界俱有宗祠石椿为据。

一祠堂山地四分，坐落一在大岩沟狮子岩，一在磨子岗，一在长沟，一在四窝茶。

一祠堂水碾一座，坐落本场菜市。

一祠堂店房二间，坐落后场。

一祠堂瓦房三间，熟地一坪，坐落祠堂门首

一祠堂沙地一份，坐落五家湾口

一祠堂山地一分，坐落庙坪

一祠堂房基一坪，坐落河边

一祠堂熟地一方，坐落安定桥侧

一祠堂山地一份，坐落祠后元武山下

一祠堂田二坵一方，坐落总子窝

一祠堂尖田二坵，坐落祠外

韩氏选择修建祠堂的地点在今天上里古镇“长寿桥”的东岸，这个地点处于大石桥下游约 250 米道路的左面，从韩氏祠堂门口沿白马泉下行约 250 米，就到了五甲口场东头的平水桥。目前这座祠堂已不存在，只剩下一片空旷的平地。据韩先府说：“这座祠堂一直保存到 2005 年，后来维修白马泉寺，政府就把这座祠堂拆了，用来建白马泉寺了”²⁸¹。2005 年清明节前，韩氏后人韩德渊根据《韩氏宗谱》保存的祠堂原图，重新使用水彩画的方式把韩氏祠堂图画了出来，并命名为“韩家大院”。

韩氏祠堂的公共财产形式多样，来源多途，如何管理这些财产及其收益，从而维持正常的“祭祀”、“培补”、“住持”等费用开支呢？咸丰初年修撰的《韩氏宗谱》有“凡例”三十条，除去九条（第 1—8，10 条）有关撰修宗谱时确定的原则外，剩余二十一条多为围绕“祠堂”和“祖茔”的宗族制度，我们从中可见这种宗族组织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所具有的重要社会职能。这二十一条规定如

²⁸¹ 韩先府（57 岁）口述，时间：2008 年 12 月 23 日，地点：上里镇

下：

一、族中先年有祖遗官地，以及提入祠堂焚献田产，须互为经理，不得私自当卖强行侵占，以干罪戾。

一、族中每年祠堂祭祀，必先夕宿庙，整齐严肃，各司其事。是日饮福亦必衣冠端正，俨领祖宗厚祝，慎勿褻渎，致神恫怒。

一、族中每岁清明祭祖，各房家长务必衣冠整齐，至祖茔，序齿排班，一同祭奠，勿希图自逸，支幼向前。

一、族中祠堂焚献公业，每年必报首事经理。所收利租，除祭费外，下余若干，须交来年首事经管生息。如有私落，合族公同面饬追交。

一、族中祠堂系先灵凭式之所，前堂后寝，务宜洁净。凡我族人不得恃横霸居，如有倾覆，急宜培修，慎勿迟疑观望，坐视不理。

一、族中每岁设家塾于祠堂，拣清品学兼优之人训教，合族子弟每日课毕，务将 圣谕十六条反复讲解，使后生趋向克瑞，而不即于冥顽。

一、族中石柱坪、石板路二处祖茔不准附葬，其树木不准私伐。

一、族中尊卑各宜守分，或有口角争兢，当凭族长理说，慎勿同室操戈，妄自兴讼。

一、族中冠婚庆吊，无论贫富贵贱，均宜和同向前，努力匡济。

一、族中乏嗣者，宜由内服及外服择贤承嗣，不得任意抚异姓乱宗，倘抚异姓，不准入祠。

一、族中倘有不法愚人，无论服内服外，均应和同饬责，万一有干伦常，合议善处，尤不得挟忿妄诬，致损家声。

一、族中子弟资姓高明，可读书上进，务要留心教导，切勿姑息养奸，庶日化月移，可底于有成。

一、族中子弟材质平常，或耕或商，亦要留心教导，致彼力食，庶免游惰，以落人后。

一、祠堂每年租谷，除油灯、住持、春秋祭祀费用外，所余若干，务凭族众算明，留积蓄亦备族中子弟上进之费，仅将条例详列于后。

一、岁科两考有游泮者，给与使用酬答祖宗银叁拾貳两，如不演戏，少银四两

- 一、入学后有帮增，给银壹两貳钱，补廪给银拾两，如不足，自家贴出
- 一、恩、拔、优、岁、副，子弟有致此者，一切使费与祠堂演戏给银貳十两，如有志进京，给路费银四十两
- 一、中式、会试，则给使费银五十两，演戏酬答祖宗、至京路费给银壹百两
- 一、子弟教馆有门生入学者，其所得束修在祠中演戏一本，不遵者罚
- 一、子弟成名有出仕者，无论职之大小，务将一任俸银输纳公项，以备培修
- 一、经管祠中租谷使用，每年当交替时，务焚香秉烛、鸣钟伐鼓，凭族众在祠中神主位前自发大誓，以表无私。

韩氏祠堂公业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祖遗官地”，一种是各房“提入祠堂焚献田产”。公业共有 13 处，最远的在名山县体五甲宋家沟。韩氏祠堂公业的财产形式分为“田”、“熟地”、“沙地”、“山地”、“店房”、“水碾”。田地一般出租，每年固定时间收取“租谷”。“店房”无疑是韩氏在五甲口场里拥有的房屋，它出租给做生意的商人，定期收取租金。“水碾”是韩氏在五甲口场中重要的粮食加工点，韩先府有一次指着上里古镇二仙桥旁边的磨房（注：近年重修，仅供旅游参观）对我说：“这里原来有一个磨房，是韩家的。俗语说‘家有团团转，好比做知县’，意思就是有了这个加工房，周围团转的人总要把米啊麦子啊拿来磨，收入是很好的，可以和知县的收入相当。”²⁸²水碾需要日常管理与维护，从而会涉及到雇佣人工费用的开支与水碾收入的核算。从这些财产形式来看，韩氏并没有把他们主要的生意（茶店、布店）纳入到祠堂“公产”里来运转。韩氏祠堂公业相对独立，并未成为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还未走到按房（股）集资，按房（股）分红的祠堂经营模式。

宗族中的“首事”来管理祠堂公业。“首事”每年轮换一次，理论上一般通过合族公举产生，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是族中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提名，被提名者以及其它人没有意见，“首事”就算确定下来了。“首事”交接时除了经济核算清楚以外，还要在祖先神主牌位前举行“焚香秉烛、鸣钟伐鼓”的仪式，当着族众自发大誓，不得贪污私吞。新的“首事”在人、神面前发誓的仪式，对净化人

²⁸² 韩先府（57 岁）口述，时间：2008 年 12 月 26 日，地点：上里镇

韩氏宗族形态并非明代水东乡老姓人群发展而来，它是清初才迁入水东乡并作为新兴茶叶商人带入水东乡的宗族形态。水东乡明代以来的各姓人群中，我们或能够看到墓碑世系纪录、或能看到舍业于庵（寺）、招僧焚献，或能看春秋墓地祭祀的纪录，或能看到宗支碑的出现，这些相对松散的“族”的形态，与韩氏宗族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五甲口场韩氏把宗族形态引入了水东乡，“祠堂”这个名字和主要放置祖先神主牌的建筑物，被五甲口场韩氏引入水东乡。此种宗族形态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水东乡在上里韩氏修建祠堂之后的几十年间也少有祠堂出现。

新建四合院

道光四年（1824），五甲口场韩氏在今天上里镇四家村大水湾的地方兴修了新的四合院。如今尚挂于四合院内的匾额匾文²⁸³如下：

原署大竹县儒学正堂洪启灿题

大国学韩七先生 荣建之喜

凤阁储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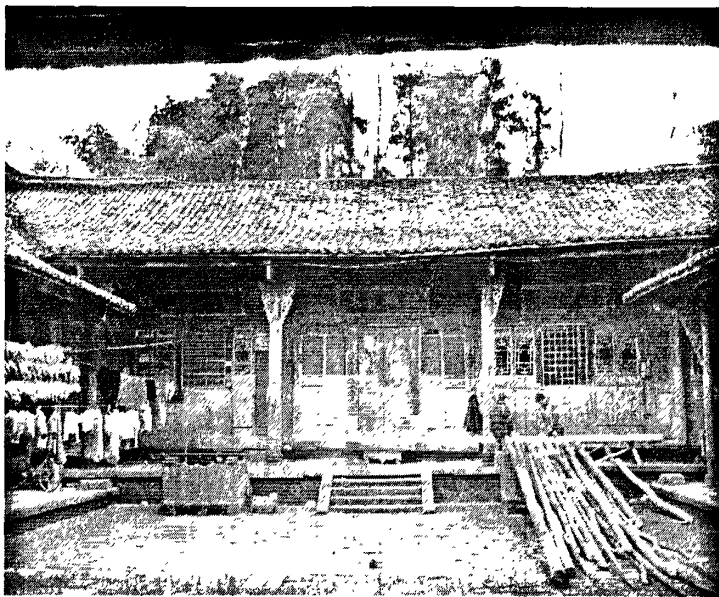
众亲友 等拜

道光四年庚子月 吉旦

根据这道匾额“荣建之喜”四字，我们大体可以判断这座四合院从道光四年（1824）二月开始修建²⁸⁴。韩氏后人把这座四合院的地形叫做“七星抱月”。这座四合院的结构复杂，今天的当地人都用“品”字形来形容这种四合院，意思是，这种四合院的三个天井，呈倒“品”字排列。这座四合院距离上里五甲口场约800米，是上里五甲口场韩氏所修的第二座四合院，现在居住人群为韩晚后人。

²⁸³ 2008年12月30日拍照

²⁸⁴ 日前上里镇修建房屋，仍保存了建房之初送匾祝贺的传统。



照片 12 大水湾韩氏四合院主天井

上里韩氏一共现存三座四合院，最早的四合院即是今天上里古镇中的“韩家大院”。据韩先府说：“这座院子是老院子，一代院、二代院都在这里”²⁸⁵。我们对这座四合院修建的年代并不清楚，可能在嘉庆年间陆续修成的。这座四合院的一代院叫“院子头”，是韩启文居住，二代院即今天上里古镇“韩家大院”的“中军府”、“武魁堂”、“卫守府”，分别是韩靖文、韩耀文、韩守文居住。这四兄弟都是韩旺的儿子。据韩先府说：“这座院子是韩绍宗的，他有四个儿子。韩家在第六代就分家了，老董（即老大）韩昭的后人多移居名山县百丈，老二韩晚就搬到大水湾住，老三韩峻的后人在祠堂的对面，老幺（即最小）韩旺就跟着父母住。”²⁸⁶上里韩氏另外一座四合院，在今天上里镇四家村的石板路，距上里五甲口场约600米。据韩先府说：“大水湾和石板路这两处院子都是韩晚的后人居住。韩峻的院子也很漂亮，在（韩氏）祠堂对面，被火烧过两次，（19）57年被烧的时候我看到过，另外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烧的，没有看到过。”²⁸⁷大水湾韩氏四合院与石板路韩氏四合院结构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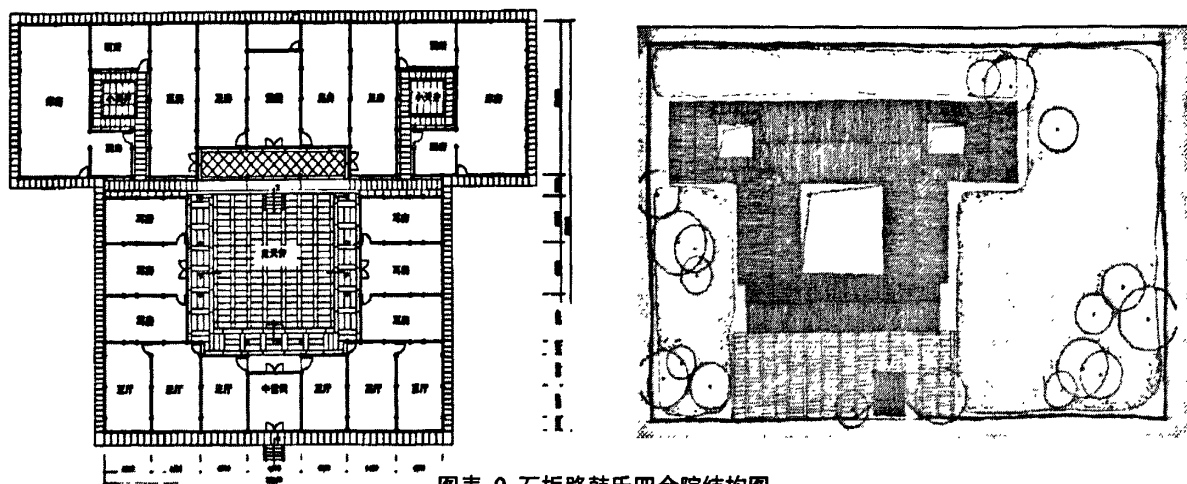
黄河对石板路韩氏四合院做过研究²⁸⁸，现引其文中两张四合院结构图如下。

²⁸⁵ 韩先府（58岁）口述，时间：2009年4月4日，地点：上里镇

²⁸⁶ 韩先府（58岁）口述，时间：2009年10月30日，地点：上里镇

²⁸⁷ 韩先府（58岁）口述，时间：2009年10月30日，地点：上里镇

²⁸⁸ 黄河：《四川省雅安市上里乡四甲村韩家大院调查》，《重庆建筑》，2006年3期



图表 9 石板路韩氏四合院结构图

上里韩氏不是水东乡第一家兴修四合院的，早于韩氏的，是陈家山陈氏。由于陈家山陈氏的四合院毁于民国年间，如今只剩下一大片房基地和大堆石条，我们已没有更多的实物证据用以讨论。

清代的川西，这些庞大的四合院或出现在深山之巅，或出现在群山之间，或出现在场、镇、县城，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考察水东乡的四合院得到回答。水东乡的四合院最先都是由经营茶叶贸易的人户修建。茶叶与布匹是名山县、邛州进入水东乡上里五甲口场的主要货物，这些货物在五甲口场经过短暂停留后，再由背夫背过芦山岗。根据一些老人的回忆和记录²⁸⁹，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四合院的重要功能就是加工茶叶和存放茶叶。四合院基本结构由正厅、正厅左右的耳房，正厅对面的过厅构成。耳房和过厅是打包茶叶、储存茶叶的重要场所。雅安多雨，号称雨城，每年夏秋季雨水特别多。据“韩家大院”陈素英（音）老人讲：“（解放前）每年八、九月背茶进山”。²⁹⁰四合院相对封闭的房屋结构，宽敞的房间和大屋檐下的走廊，是加工和储存茶叶的最好地点（当然不排除存放其他货物）。芦山岗山腰的师氏也有非常宽大的四合院²⁹¹、芦山岗山顶箭杆林黄氏也有四合院。如果考虑到四合院的分布地点，陈家山陈氏、五甲口场韩氏（上里杨氏其后也开始修建）、芦山岗师氏，芦山岗箭杆林黄氏，这些四合院恰好处于通往芦山县的茶道之上。清代水东乡中里和下里，则没有形

²⁸⁹ 杨树槐老人专门把民国时期上里杨家沟的四合院“太兴号 茶叶生产”画入他新编的上里《杨氏宗谱》（2006年编）之中。上里仙人洞杨联辉老人居住的四合院，过去也是打茶包的加工作坊。

²⁹⁰ 陈素英（音）老人（女，79岁）口述，时间：2008年12月17日，地点：上里镇

²⁹¹ 据师氏某位媳妇（约50岁）讲：“以前老人给我们讲过，这个房子是用来放茶包和盐巴的。”（2010年3月17日笔记，地点：上里镇箭杆林村）

成象上里五甲口场那样的茶道汇集点，中里和下里也没有出现有宽敞过厅的四合院这种建筑形态。水东乡的四合院与输藏茶叶加工、打包、储存具有密切关系。四川西部的四合院的分布与输藏茶叶的加工、储存、运输局有密切关系，是联结茶叶总市场打箭炉与产茶地区众多分市场的结构要素之一。

清代水东乡茶叶加工场是家庭性质的或者家族性质的，它们并没有独立的空间，它们附属于各姓人户居住的建筑空间，这决定了茶叶加工场地理分布的分散性。尽管它们有可能相对集中于市场周围，但因各姓人户之间的竞争，它们很难走上联合与统一的道路。水东乡茶商的用于茶叶收购、加工的资金取决于各户家庭或家族兴趣。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茶商韩氏对投资政治的兴趣远比投资茶叶加工技术与设备改进的兴趣更浓。

韩峻的政治投资路

韩峻，字恒升，生卒年代为乾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四年（1760—1834），他是韩绍宗的三子、韩昭和韩晚的弟弟。韩昭、韩晚两兄弟同心协力经营茶叶布匹生意，那么他们的三弟韩峻又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韩峻已不甘愿只当一名五甲口场的小商人了，他的父兄积累了足够的家财，让他有条件考虑为韩氏这个商人宗族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的问题了。韩峻选择了一条通过捐资方式对县级地方公共建设进行投资的道路。这种投资是一种政治性的投资，韩峻并非希图在这种投资中直接赚钱，他主要希图能够结交到雅安县及县级以上的各级官员。对各级官员来说，他们组织的地方公共建设是他们重要的政绩之一，是他们升官的重要步骤，韩峻能够支持这些官员的地方施政行为，这些官员自然愿意结交这样的商人。

《韩氏宗谱》收录其碑记载：

情好慷慨，喜乐施，如嘉庆初年邑令鲁建修雅安桥，公捐银一百两；道光六年，邑令郭设义学，公捐银一百六十两，布政司董给“谊敦序塾”匾额，光宠门楣；道光十年，本口金设雅河义渡，公捐银一百四十两，给有“好善乐施”匾额，以旌表功；道光十二年，邛邑令宣建修川南第一桥，公捐银五十两，给有“荷天之休”匾额。此皆赫赫濯濯，功德昭人耳目者也。

嘉庆初年韩峻时年四十岁左右，他进行了第一笔捐资。“嘉庆初年，邑令鲁建修雅安桥，公捐银一百两”。《雅安县志》载：“鲁凤辉，浙江会稽人。乾隆末大水，雅安桥口崩十余丈，凤辉培修完善，锁以铁犀，故相传为新桥。”²⁹²整个嘉庆二十五年间，韩峻只捐资过一次（100 两）。如果加上韩昭约在这期间捐修五甲口场的安定桥（100 余两），上里韩氏只捐过两次资，总共约有白银 200 多两。从这个数字来看，他们固然已经相当有钱，但捐款间隔时间较长，这说明韩氏在嘉庆年间还没有足够富裕，他们的捐资还没有政治上的回报（这两次都没有获得官方匾额），韩氏还没有实力进行大规模地政治投资。

另一方面，进入道光年间后，从邛州经白马泉寺背往五甲口场的茶包迅速增多。从许家湾到五甲口场的道路边，留下一座小土地庙，其树立时间为道光七年（1827）。韩先府说：“这是当年背茶包的背夫捐钱修的，还愿的。”²⁹³许家湾的长柏桥由众姓修于道光八年（1828），该桥长约 10 米，宽约 1 米，距水面约 1.6 米。



照片 13 长柏桥处拐子窝，往五甲口场方向

经长柏桥上坡的石梯左侧，尚留有“拐子窝”。韩先府说：“茶道上有打拐子的窝，一般是在石头阶梯的左边。背夫背了沉重的茶包，上阶梯非常吃力，右脚抬到上一个阶梯后，左脚在下一个阶梯，背夫左手拄了拐子，他把拐子打在拐子窝里（否则容易打滑），用力支撑，口里同时‘嗨’一声，左脚就抬到上一个台阶了。一队背夫人数很多（几个人到十多人），拉成一条线，前面第一个人是头，他用拐子连续敲击地面，就表示要停下来休息。后面的人听到声音，也用手里的拐子跟着敲击地面，然后领头人喊：‘停’。大家就能够同时停下来，把拐子放在背夹子下面，休息片刻再上路。”²⁹⁴

²⁹² 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三，官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4 册，第 328 页

²⁹³ 韩先府（59 岁）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5 日，地点：上里镇

²⁹⁴ 韩先府（59 岁）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5 日，地点：上里镇

道光年间，韩氏在此种茶叶贸易基础上经商致富的步伐加快，韩峻开始了连续几年的捐资活动，“道光六年，邑令郭设义学，公捐银一百六十两，布政司董给‘谊敦序塾’匾额，光宠门楣。道光十年本口金，设雅河义渡，公捐银一百四十两，给有‘好善乐施’匾额，以旌表功。道光十二年，邛邑令宣建修川南第一桥，公捐银五十两，给有‘荷天之休’匾额”。

关于道光六年（1826）的这笔捐款，该传记记录当时雅安县令为“郭”，民国《雅安县志》没有“郭”姓知县的相应记载，但其中有一段时间相近的记载，“李约亭，失其名，捐立义学，并设义渡。古明维有送李明府句云‘童子入塾沾新泽，商贾临江说旧恩’，记实也。”²⁹⁵韩峻这次捐资得到了四川省布政使董淳²⁹⁶的题字匾额，这是水东乡五甲口场韩氏获得的第一块匾额。这块匾额无疑增加了韩氏在雅安县的知名度，成为韩峻与雅安县官员打交道的名帖。在随后的六年中，韩氏又两次捐资。关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这笔捐款，所谓“邛邑令宣”，《邛崃县志》载：“宣瑛，字黼堂，吉林人，道光年间任最久，善政最多，建修川南第一桥，六十年而毁于水。卒，葬于邛州，墓在平乐东乡五里圆音庵半山上”²⁹⁷。第三次捐资给邛州，这表明韩峻结交官员已经超出了雅州府的行政范围。

韩峻的这条政治投资路颇有成效，他结交到了雅安县乃至县级以上的官员，这使他搭建了一些特殊的人脉关系，从而获得了仅凭商人身份所难以拥有的政治资源，其碑记载：

性喜培植□□□□于家遊其门者，食费弓马，悉仰□□□□年英才
乐育，同姓中游洋者如胞弟□□，中式者如胞侄大成、侄孙腾蛟等，异
□□；采芹者如名邑李联级、雅邑彭大宏等；折桂者如雅邑陈殿颺等，
要皆公曲为裁成。

韩峻已成了雅安县的大名人，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似乎还有常住其家的人（“遊其门者，食费弓马，悉仰……”之语）。他也开始利用这些政治关系，培植自己的势力了。韩峻首先扶持的自然是韩氏宗族的后人（胞弟□□、胞侄大成、

²⁹⁵ 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三，官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4册，第328页

²⁹⁶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96页

²⁹⁷ 刘夔等修、宁绂等纂：《邛崃县志》（民国十一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13》，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年，第521页

侄孙腾蛟)，其次才是名山县的李联级、雅安县的彭大宏、陈殿颺等人。这些人都是走韩峻这条关系而入学中举的，即所谓“要皆公曲为裁成”之意。因此其碑记中才有“公由是名大燥，有荆州风”的评语。

韩大成在韩峻的“曲为裁成”之下，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武举。韩大成中武举这年，韩峻七十五岁，韩峻在这年还收到了一份祝寿文，送文者为“钦命署四川分巡建昌兵备道总理台站粮饷事务乡愚弟孟生蓴”和“特授雅州府雅安县儒学正堂愚弟向瀛”²⁹⁸。这两位官员在祝寿文中称赞韩峻“善白圭治生业，与弟兆昇同力共济，永肩一心”，“由是日积月累，巍然富家大吉，而为一邑之冠”，他们特别指出：

先生则周其困乏，乡邻有不足者，补助之，遇荒年益广为施与，贫穷之赖以生活者，不一而足。……至于四方商贾宾客之所至，受提携者、通有无者、假称贷者，有言必践，无约不诚。

道光十二年（1832）五甲口场已经成为了“四方商贾”云集的地方，上里韩氏则在输藏茶叶贸易中成为了雅安县的首富，他们通过韩峻的富有成效的政治投资活动，成为了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宗族，他们时有补助乡邻、施与贫穷者，提携后人、融通资金，提供借贷资本等的活动。

韩旺联姻兵部尚书王宗诚

韩峻的政治投资活动已让韩氏宗族在雅安县取得了相当的政治地位和地方影响。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在韩峻的“曲为裁成”下，韩腾蛟和陈殿颺（其姐为韩腾蛟之妻，见于韩腾蛟墓碑记）参加乡试中了武举，韩腾蛟时年24岁。经商起家的上里韩氏已经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社会地位了。然而，一份祝文的出现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韩氏宗族商宦路的认识。

原来，韩旺与时任兵部尚书王宗诚成功联姻了。关于这次联姻的具体时间和过程，我们已无法知晓。目前上里镇的韩氏后人（包括最了解韩家历史的韩先府）对这段经历也不清楚。我们仅能通过韩峻的弟弟韩旺获得的祝文以及韩旺的

²⁹⁸ 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三，官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4册，第329页：“县学训导，……向瀛，字揖峰，新繁举人。”

墓志铭来分析。

道光十四年(1834)冬十一月，韩峻之弟韩旺获得了时任兵部汉尚书王宗诚的祝文，其全文如下：

恭祝

诰封“武德骑尉”兆升韩公暨淑配诰封“太宜人”罗太宜人七旬荣庆

昔余乾隆乙卯奉命典试蜀中，入自剑阁，出达夔门，北经栈道，西望玉垒，南盼峨眉，东眺巫峡，嘉陵岷江千流万派，汇于夔巫，所谓千里江陵一日轻舟，天下之山水在蜀，天下之大观尽于是矣。灵淑之气，世载其英，吉甫之文武报国，张仲之孝及传家，自是汉唐宋如司马、杨子云、眉山父子、阆中弟兄，炳炳烺烺，指不胜屈。至于武科之盛甲天下，近世如岳威信公、杨时斋宫保，勳在旗裳，扬休济美矣，亦可谓千载一时盛事矣。

乃今于诰封武德骑尉兆升韩公，而又见世德之发祥，积善之流光，有足为世风者。公本秦之泾阳旧族，祖以上迁蜀之雅安，于今四世，簪纓勿绝，代称善人，昔王承肇孕灵，周公山佳气减半，岐嶷颖异，公亦如之。长试童子军，数奇不遇，乃弃诗书，习弓马，一试即受知于学使陈钟溪。因秋闱屡蹶，遂设帐而乐育英才焉。淑配诰封太宜人。罗太宜人孝惠，克相夫子，宗口称贤，生丈夫子四，长靖文，次殿元，援例授职卫守备，次大成，中壬辰武举，拣选兵部差官，次启文，援例授州同，有孙九人，品俱英伟。

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我

皇上奉皇太后懿旨册立皇后，加恩中外，以次子武德骑尉职，诰封公与太宜人如其官。维时公与太宜人年皆及古稀，当恩纶宠賁之候贤，即捧觴同官进颂，乞余一言，余惟寿者德之。徵公今视听食息不衰，与太宜人齐眉称庆，含饴弄孙，优游井里，由耄耄以至期颐，固可操券而得者。抑又闻之岳威信公原籍凉州、杨宫保祥发华阴，公亦籍出泾阳。夫华岳钟灵，功名赫奕，公有子克家，将来报满外任，宣力驰驱，其所以邀宠渥而荣闾里者，当未艾也。况蜀山水发人文，今岂异于古？而山主静，

静则寿，是以天保九如山陵岗阜已居其四。公与太宜人以德获福，以福备寿，固不必夸閭苑之奇，蹤摭木金之浮辞，以为公与太宜人庆。

赐进士及第经筵讲官兵部尚书通家眷弟王宗诚顿首拜撰

勅授文林郎前金堂县教谕年愚弟张柱赠

赐进士出身宗人府府丞稽察右翼宗学年愚弟卓秉恬拜祝

吏部员外郎年愚弟廖运发贾承蕃顿首拜贺

内阁中书愚弟李嘉秀郭宝勳顿首拜庆

户部主事愚侄毛含昱余彭年王正谊淡树琪祝

兵部主事愚侄洪锡璜朱坚祝昌奎杨熙庆

刑部主事愚侄宋沛霖拜赠

工部主事愚侄吴湘郭维健拜祝

赐进士及第乾清门侍卫年愚侄吴钺李广祝

赐进士出身乾清门侍卫愚侄胥安邦罗三元贺

兵部差官愚侄七兰泰恒庆拜祝

湖北游击愚侄史殿元拜祝

道光十四年冬月上浣 谷旦

查《清代职官年表》，王宗诚从道光二年（1822）至十七年（1837）正月，任兵部汉尚书。王宗诚之父王懿修，曾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上书房阿哥的师傅之一²⁹⁹。乾隆六十年（1795），王宗诚以翰林院编修身份拣点为乡试官之一，入川主持四川的乡试（另一位乡试官为项家达）³⁰⁰。王宗诚与韩旺“通家眷”，王宗诚谦称为“弟”，可见，韩旺的后辈与王宗诚的后辈联姻。

韩旺葬于水东乡上里任家沟，其墓志铭³⁰¹如下：

皇清诰封武德骑尉兆升韩公墓志铭

公讳旺，又讳步云，字兆升，祖籍陕西西安府泾阳县花池渡余家村。

自公曾祖讳辅周，与祖讳璉，由陕入川，居邑水东乡之上里。后辅周公

²⁹⁹ （清）刘锦藻撰：《皇朝续文献通考》三，卷九四，学校考一，《续修四库全书》，第8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2页

³⁰⁰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942页

³⁰¹ 2008年12月27日拍照并抄录

卜葬于大石桥，璉公卜葬于石板路。璉公生子二，长绍宗，字克绳，次绍德。宗，国学生，廕封武略骑尉，即公之父也，后亦卜葬于大石桥。公父以辛勤起家，中岁号素封，生公昆仲四人，姊妹四人。公乃兄者，□生讳昭，国学生讳晚，庠生候补卫千总讳峻。峻以信斋官请封武略骑尉。公其季也。秉性孝友，负质瑰琦，弱冠弃文就武，入雅州府学庠生，人咸以干城望之。因亲操家政，□□仕途，信斋请封武德骑尉。公姊妹长适监生陈永皓，次适文生杨尚志，次适监生刘聘瑄，次适武生穆登浩。公乃兄昭生三子，长法文，次灿文，俱庠生，次宪文，职銜县丞。晚生二子，长深文，次述文。监生峻生二子，长大文，职銜布政司理问，次辉文，庠生。公生平浑朴天华，慷慨不吝，诚长厚之君子欤，宜后起之盛也。公配罗宜人，系名邑国学生秀成公之季女，生子四女二。长靖文，又名作培，应文童试，考列府案，元以未及补为子员而歿，为恨，将耀文之第三子过寄，□名廷嗣。次守文，又名殿元，职銜卫守备，次耀文，又名大成，字信斋，壬辰科武举，癸巳会试，考授兵部差官，旋钦赐营守备。次启文，候选分州，亦早殇，亦守文之第三子过寄，取名廷鼎。公女长适职员姚述夔，次适穆治修。孙九人，长廷佐，议叙正八品，次廷锐，又名振先，庠生，次廷锡、廷铠、廷锷、廷储、廷杰、廷嗣与廷鼎，共九人。曾孙一人，名祥凤。继继绳绳，正未有艾也。

公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闰四月二十四日亥时，罗宜人生于乾隆三十年乙酉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时。公享寿七十有二，卒于道光十七年丁酉八月二十三日己时。兹卜于道光十九年乙亥。□之家世与公之懿行，故略述其梗概而为之。

… …

清道光十有九年季夏月吉日 邑庠生愚外孙姚 渠沐手敬书

考之《韩氏宗谱》，韩旺四子并无“王姓”妻妾，韩旺两女分别嫁给了姚述夔和穆治修。其中，韩旺三子武举韩耀文（榜名大成）配罗氏，生有六子。如果韩大成的婚配纪录没有错漏，那么可以判断韩旺的子女辈并非与王宗诚联姻的人选。韩旺的九个孙子，其婚配关系中有两人妻子为王姓，她们分别是廷锐的继妻王氏，“生道光甲申年十二月廿日子时”，廷鼎的妻子王氏，“生道光乙未年五月

十九亥时”。这两位王氏分别出生于道光四年（1824）和道光十五年（1835），因此，韩旺的九个孙子，也不可能娶王宗诚家族中的女子。最大的可能就是，韩旺的孙女嫁入了王宗诚家。由于《韩氏宗谱》不收录女儿名字，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具体是谁的女儿嫁入王宗诚家。

从时任兵部汉尚书王宗诚的角度来考虑，他愿意与四川西部群山之间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布衣之家联姻，这个布衣之家必定有一些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就在于，雅州府处于控制西藏的战略位置，雅州府附郭县雅安县五甲口场韩氏经营着输藏茶叶贸易，这种长途茶叶贸易对清王朝政府有效控制西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五甲口场韩氏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够与兵部汉尚书联姻，而不是与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中的任一汉尚书联姻，这也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经营着有关军国大事的输藏茶叶贸易。经营输藏茶叶贸易的商人韩氏家族能与时任兵部汉尚书的王宗诚联姻，这更加证明了输藏茶叶贸易在道光朝初期受到了中央政府高层的重视。

水东乡上里五甲口场韩旺与时任兵部汉尚书王宗诚联姻以后，韩旺的三子最先走上仕途之路。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韩旺三子韩耀文（榜名大成，字信斋）在伯父在韩峻的帮助下，考中武举，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韩大成参加会试，“考授兵部差官”³⁰²并拣选营千总（正六品³⁰³）（韩旺墓志铭中所说“旋钦赐营守备”是后来的事情）。随后不久，兵部汉尚书王宗诚的恭祝韩旺文也就送到上里韩家（韩旺夫妇又因“皇上奉皇太后懿旨册立皇后，加恩中外”而获得“武德骑尉”和“宜人”封号）。韩大成入仕，标志着上里五甲口场韩氏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迁居水东乡以来，经过近150年的奋斗，终于从一介布衣的庶民商人，走向了宦宦之家。

道光十四年（1834）是水东乡上里五甲口场韩氏辉煌时代的开始。韩峻为韩氏宗族走向宦宦之家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还极可能是韩王两家联姻的重要组织者。这可能也是韩大成封其伯父母的重要原因之一。时任兵部汉尚书的王宗诚，作为韩氏的亲家，他对韩氏走向宦宦之家所起的作用，则不言而喻。

³⁰² 兵部差官的职资为：“遇有紧要事件，给发火票，交差官驰送通州、良乡、昌平、顺义，各驿接续飞递。”（崑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三，兵部，邮政，管驿，塘务，《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0808·史部·政书类，第757页）

³⁰³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17，志92，职官4，武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89页

第五章 族权象征与世系重构

道咸年间上里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茶叶分市场五甲口场的持续经济繁荣，使得水东乡经济重心从过去的中里场转移到上里。水东乡社会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又呈现出了多层次的景象。有钱有势的商人家族开始申建节孝坊。经济实力稍差的农业人群则继续树立宗支碑，这些农业人群有关“族”的建设活动地点依然在坟园墓地，公共活动资金多来源于坟园内的树木。水东乡的老姓人群在重构宗支世系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现象，这些新现象也是我们理解五甲口场崛起之后的人群间实力升降的社会变化。

第一节 势力之家申建节孝坊

节孝坊是联结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重要制度，国家政权通过批准建立节孝坊来控制 and 引导各地宗族势力发展，各地宗族势力通过申请建立节孝坊，获得国家政府的某种授权，从而在地方得到更高的威望。节孝坊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又是地方宗族势力的彰显；节孝坊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又是宗族权力的象征。节孝坊一旦树立于地方，它就从当地宗族人群那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当然，那些正向宗族发展的姓氏人群，同样可能申请到节孝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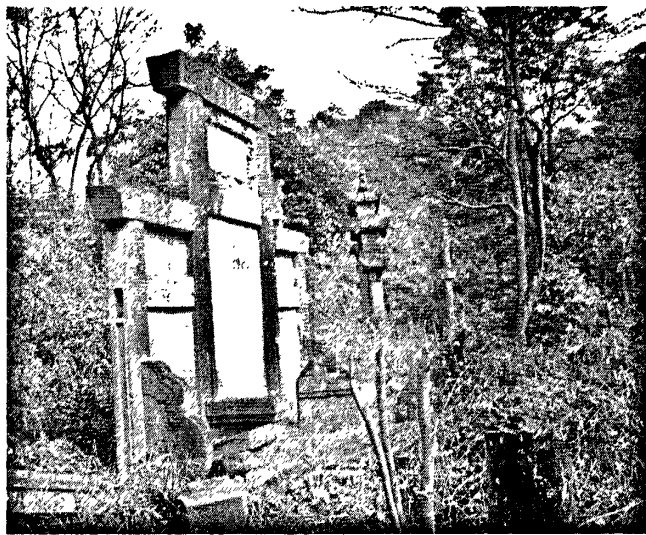
申建节孝坊例由礼部管理，属于“风教”范畴，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政策，政府通过确立好榜样的标准，详细制定如何确定这些榜样，通过动用尽量少的财政开支，调动民间积极性，以实现最大社会效益的目的。礼部对旌表妇女节孝，有相当详细的规定：

（雍正十三年）又议准：举报节孝，向例皆由生监具呈，经县申府以至司抚。其中衙门甚多，胥吏辗转，弊端百出。应令各直省督抚，飭所属州县，将一应合例旌表之节妇并贞女孝子，详细条例，遍示乡城士民，令本家开载事实具呈，并飭乡邻族长，于具呈日一并据实投递甘结。该学该州县核其事实确据，即行加结详报，该督抚确核存案，据实汇题。毋庸往返驳诘，致滋弊端。至坊银亦令本家具领，当堂验发，不经吏胥之手。……（乾隆）二年议准，举报节孝，该州县学确核加结，径详督

抚学政核实汇题，仍备文申报府司存案。各其直省凡有节孝，并令督抚主稿，会同学政具题，以昭画一。³⁰⁴

陈氏申建节孝坊

道光十五年（1835），陈家山陈氏在其宗支牌坊右边约 10 米的地方树立了一道节孝坊，为表彰苦命女人陈翟氏。这座节孝坊高约 3.5 米，面宽约 4 米，采用四柱三间的形式，共间隔出 6 个石板 12 面。陈翟氏节孝坊完整地保留了申报手续，其 6 面内容及横梁内容³⁰⁵如下：



照片 14 陈家山陈翟氏节孝坊

面之一：

具呈恳请旌表节孝，以阐潜德而彰风化。缘水东乡节妇陈翟氏，系名山县文生翟文举之室女，大邑信童陈绍虞之妻，附生陈奉韶之母。该氏生于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于归绍虞，氏年甫一十九岁。乾隆四十九年二月，绍虞病故，遗腹，至七月始生奉韶，氏年仅二十岁。维时翁姑具存，年衰多病，子道妇职，氏以一身兼之。未几翁姑相继下世，祭葬尽礼，复代抚叔二人，俱各婚配成立，教育伊子奉韶成名游泮，迄今坚松栢考四十九年，历春秋者六十八载。揆于旌典，颇为合格，贞

³⁰⁴ 崑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403，礼部，风教，《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804·史部·政书类，第 400 页

³⁰⁵ 2009 年 2 月 9 日拍照

节孝行，□膺公举。
为此具呈，恳请转报

面之二：

公举绅耆
甲子科举人阆中县教谕 闵一德
雅安县 岁贡生 陈 钊
雅安县学庠生 杨际霖
雅州府学廪生 闵 □
雅安县辛酉科 拔贡 卢铭叙
雅州府学 文生 陈继虞

面之三：

公举地邻
杨明达
杨文镇
闵正道
王朝清
杨明潜
杨明泰
堪輿 名山县学增生 侄婿 □□□ 拜□
石匠 杨洪名
愚侄雅州府学文生嘉祐沐手敬书

面之四：

计开事实

面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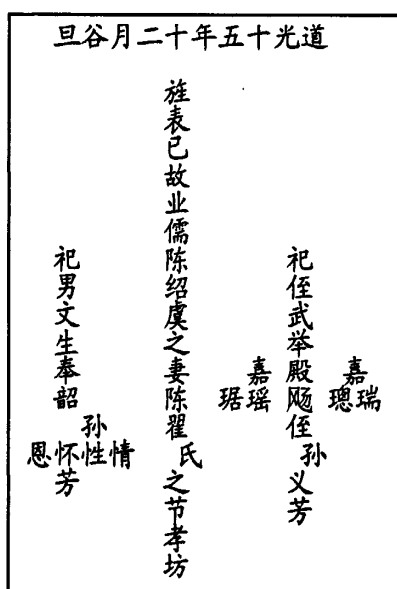
一、节妇陈翟氏，自适夫家，翁姑年已衰暮，奉事尽礼。嗣后夫故，代夫尽子职，服食起居，悉皆躬亲，毫不壬于人。故子虽没，翁姑亦忘无子之苦，得以各尽天年。翁姑没后，丧祭俱遵家礼，戚党咸钦为不及。

一、节妇于归之时，年甫十九，未周岁而氏夫报恙，百方调护，迄无一应，氏欲以身殉，又念遗孤在腹，偷生至今。一子成名，禋祀不绝，皆氏苦节所致。

一、节妇有叔二人，夫没时甫及岁童。翁姑因长子之逝，年衰子穉，哀

参倍增，节妇抚二弟如手足，读书□婚，罔不竭尽心力。至于成立，叔亦奉嫂敬谨，不敢侮慢，同居共爨无闲言，里党钦其和睦。

一、节妇自夫没后，非至戚罕有识面，且存心仁厚，族党贫乏，每分润周恤，延师教子，不吝修脯。其子奉□，亦念母氏青年，矢志努力攻书，得进黉门，至今兰孙济济，皆氏苦节之应。里中绅耆举报，叠次奖许。大宪批云：“陈翟氏性原贞静，志復坚凝，家守女箴，归姻妇道，方冀鸡鸣相警，忽伤鸞影分飞，诚意事□，义方训子，溯其苦节，年例允符，表厥幽光，贞风永励。爰入奏章，得邀圣恩，褒嘉为



面之六：

正中横櫟：

钦命四川总督部堂	鄂
钦命四川提督学院	黄
钦命四川布政使司	花
钦命四川按察使司	苏
钦命分巡上南兵备道	文
特授上南道雅州府	杨
特授雅州府雅安县	王
特授雅州府学正堂	李
特授雅安县学正堂	刘、向

据《陈氏宗谱》收录同治三年（1864）名山县吊水沟山上的宗支碑，陈绍虞

世业

水阳
建威 翼成 效威 嗣威
高玉 高指 高言 高璋 高亭
策芳 底芳 第芳
崇港 崇口 崇

水陆
恒威 尚威 希威 亚威
高绍 高球 高瑞 高猷 高谋 高名
廷芳 翻芳 崇亮
崇烈 崇照
先德 文治 华华

水晖
相威 德威 际威 维威 绍威 启威
高演 高祥 高祺 高禧 高礼 高福 高英 高炳 高瑒 高琨 高理
桂芳 俊芳 志芳
崇奉 崇龙 崇耀 崇彰

陈翟氏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享年六十八岁，亡于道光十一年(1831)。她能够坚持守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她生了一个儿子，而不是一个女儿。在以男性世系为家财分配与继承原则的传统时代，生儿子的母亲当然比生女儿的母亲地位高很多。陈翟氏的这个儿子的出生，使得陈绍虞这份家产有了合法的继承人。陈翟氏作为母亲，在儿子幼小阶段，自然对这份家财拥有监管与受益的权力。如果陈翟氏改嫁，她将一无所有、净身出门，她的儿子从此也就成了连母亲都没有的孤儿。陈翟氏能够获得陈氏族人的认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生了一个儿子(陈奉韶)，并且培养儿子入学。妇女在夫家守节，她对夫家父母当然就要尽孝，这是节与孝常常联在一起的缘由。陈翟氏的娘家名山县翟氏并没有出现在这次申报节孝坊名单中，这表明夫家才是决定妇女能否申报的关键，娘家已没有太多影响力。

三十多年前给陈永晖撰文的闵一德，在道光十五年（1835）已经是阆中县教谕了，他成为这次申报陈翟氏事迹的绅耆之首，再次出现在陈家山。武举陈殿颺（陈启虞之子，宗谱名字为“嘉琚”，其姐为韩腾蛟之妻）当然也出现在这次申报之中，他的父亲陈启虞就是由陈翟氏一手带大的。

从上里陈翟氏节孝坊的文字组成部分来看，他们完整的保存了这次申报的手续，“面之一”为陈家山陈氏生员写的呈报事由和当事人简介，即“本家开载事实具呈”；“面之二”为有威望和信誉的耆绅联名推举当事人，“面之三”为陈家

山陈氏周围的住户的联名证明，即“乡邻族长”的“甘结”；“面之四”、“面之五”为罗列具体事实；正中横梁诸多官员的职务和姓，显示了陈家山陈氏经历了从雅安县儒学正堂到四川总督的层层审批过程，最后报至礼部，获得批准，领银修建节孝坊。按照惯例，雅安县衙门支給建坊银三十两（雅州府所属州县廩生每人每年领饩粮银三两二钱³⁰⁶，可见例给建坊银两不算太少）。陈家山陈氏从向各级政府部门申请陈翟氏节孝坊，到最终审批下来，其整个时间周期为两年多。雅安县城距成都 360 里，陆路距北京 6060 里，水路距北京 11010 里³⁰⁷，加之人事更迭，公文转换，这两年多的申请批复时间，让我们看到清王朝统治幅员辽阔疆域中普通事务的行政周期。

上里陈翟氏的人生经历，有利于我们理解清政府推行节孝坊的社会政策的目的：那就是希望把抚育孤儿问题与赡养老人问题，尽量放在各个宗族组织内部解决，不让这些人流落乡间街头或者无依无靠苦难度日。所谓节，就是针对妇女膝下儿子而言，所谓孝，就是针对妇女头上的父母而言。因此，树立节孝坊的社会用意，基本围绕抚育孤儿问题和赡养老人问题展开。节妇一般分两大类，一类是夫亡守节妇女，一类是抗争强暴完节妇女。前一类规定了一个明确的年龄段，即从三十岁以下守节，一直到五十岁以上（乾隆后期降低到四十五岁以上）。这种规定一方面是考虑到抚养孩子的问题，这段时间正是孩子需要抚养照顾的时期，另一方面，妇女再婚生子后其前子多会受到冷落排挤甚至被虐待而夭折。一位寡妇如果有孩子，这个孩子往往成为寡妇再婚的主要障碍。中里场流传着一首名为《三更五点树发丫》的民谣：

三更五点树发丫，
丈夫死了乱如麻。
短命儿夫归泉下，
膝前丢个奶娃娃。
昨晚三更进屋下，
一盏孤灯陪奴家。

³⁰⁶ 曹抡彬、曹抡翰纂辑：《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十三，西藏路程，《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二十八号，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第91页

³⁰⁷ 曹抡彬、曹抡翰纂辑：《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二，疆域，《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二十八号，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第45页

提起鞋儿来做下，
侧身过来喂娃娃。
睡到半夜奴要嫁，
莫非明早媒婆要到我家？
媒婆说东家的茶饭好，
又说西家酒生花。
走东家看西家，
生死不准带娃娃。
娃娃本是娘生下，
不发八字就转回家。

演唱：罗绍贞，女，62岁，中里郑湾七组

搜集：罗开华 杨炳超

流传范围：雅安市³⁰⁸

这首民谣反映了有孩子的寡妇难嫁人的事实。清王朝风教政策的出发点是，与其让儿童受苦，不如让母亲守节，这是两相权衡后的妥协办法。那些夫亡有子的节妇，可能会承担大家庭的重任，抚育较小晚辈和照顾家庭老人。因此，这种节妇又可以加一个“孝”字。这种社会政策的制定出于正统伦理价值观。正统伦理价值观有一套家庭正确秩序与人伦关系标准，清政府社会政策的制定正是为了维持正常家庭与人伦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政府通过“建坊”来实现推广“节孝观”，实现社会人心的教化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康熙皇帝提出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写成《圣谕广训》，它们之所以能够逐渐深入人心，与宗族组织具有这些重要的社会职能有关。水东乡社会对宗族的需要，并非清政府单方面“鼓励”所能实现。乾隆朝以来的水东乡，人们（官绅士庶）出于抚育孤儿问题和赡养老人问题的考虑，他们开始积极进行收族活动（从各姓相继树立宗支碑开始）。上里陈家山的陈翟氏理应该获得政府的旌表。从节孝坊本身来说，不论在繁华街市，还是在穷乡僻壤，它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

³⁰⁸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四川省雅安市歌谣资料集》，雅安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1986年，13-14页。

品。清政府这种社会政策和有限度财政开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地人群的积极性，这种建筑形式因为与当地人群有密切关系，其通过石质建筑外型带来的社会人心的影响是持久和广泛的，从而实现孤儿问题与养老问题的社会解决（而非政府解决，当然，政府也会建立数量有限的育婴堂）。

尽管不排除某些势力之家更易申请到节孝坊的事实，但它却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广泛的正面影响。清政府“鼓励”节孝，是一种表彰与示范，是一种非常柔和的政府导向。从雍正元年（1723）起，清政府在各州县学宫附近建立节孝祠，树立石牌坊，把大量节孝妇女的名字刻上去，祠内供奉已故妇女的牌位³⁰⁹。通过水东乡陈家山陈翟氏的人生经历来看，清代节孝祠中大量节孝妇的名字（如贾鸿基的《雅安历史》所载光绪二十五年以前人名及事迹），代表了清政府倡导民众抚育孤儿和赡养老人，也代表了当地的孤儿问题和老人问题得到了相当的社会解决。因此，维护和推广“节孝”观念包含了清政府处理较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某些想法。

韩氏申建双节孝坊

道光十九年（1839），上里五甲口场韩氏宗族也许是受到了“祖亲旧眷”陈家山陈氏的影响，他们也申请建修了一道节孝坊。这道节孝坊建于上里五甲口场下游约 500 米的陇西河东岸。解放前（1949 年以前），五甲口场通往中里场乃至雅安县的道路，就得从这座节孝坊下穿过。这座节孝坊“采用当地盛产的红砂石建造，门楼式，四柱三间十二翼，出檐多脊，通高 11.25 米，进深 3 米，基座宽 7.8 米，出檐 1.1 米，长方形柱础，每根柱子下面都有



照片 15 韩氏双节孝坊

³⁰⁹ “（雍正元年）著于学宫内建忠义孝弟祠一所，立石碑一道；于学宫近处购买基址，建节孝祠一所，立大牌坊一座。其石碑、牌坊将先后忠孝节义之人，悉标姓名于其上。已故者设牌位于祠中春秋祭祀，用阐幽光，以垂永久。”《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一，群庙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634 册，第 655-656 页

石抱鼓”。³¹⁰刻于其上的文字³¹¹如下：

旌表已故处士韩晚之妻、处士韩深文、监生韩述文之母、庠生韩廷儒、甲午科举人韩腾蛟之祖母杨氏，暨已故处士韩深文之妻、庠生韩廷儒之母、韩澄之祖母范氏，姑媳二人坊。

男述文率同廷儒敬立

大清道光十九年仲冬初二日建

这座节孝坊是为旌表杨氏和范氏两姑媳而建的，因此它在当地一直被称为“双节孝坊”。与陈家山陈翟氏节孝坊相比，这座双节孝坊保留的文字少了很多道手续。韩廷钧榜名即韩腾蛟。

		生	卒	妻	生	卒
绍宗房	晚	乾隆癸酉，1753	乾隆己酉，1789	杨氏	乾隆甲戌，1754	道光庚寅，1830
晚房	深文	乾隆己亥四十四年，1779	嘉庆癸酉八年，1803	范氏	乾隆甲辰，1775	道光壬寅，1842
	述文	乾隆丁未五十二年，1787	道光壬寅二十二年，1842	许氏 (续)杨氏	乾隆壬寅 乾隆乙卯	道光辛巳，1821 道光己亥，1839
深文房	廷儒	嘉庆乙丑，1805	道光辛丑，1841	孟氏	嘉庆丙寅十一年，1806	
述文房	廷钧	嘉庆庚午，1810		陈氏	嘉庆庚午十五年，1810	

据《韩氏宗谱》可知，韩晚 36 岁去世，其夫人杨氏时年 35 岁，其长子韩深文时年 11 岁。韩深文 24 岁去世，其夫人范氏时年 28 岁。这道节孝坊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那么范氏已守节 36 年。按照清政府礼部的规定，妇女 30 岁以下，守节到 45 岁以上者，则可以申请旌表。因此，即使如此，范氏才有资格被旌表。但是，如果我们核对韩深文的独子韩廷儒的出生年份，他在韩深文去世一年多之后才出生，这是不合常理的事情。这意味着韩深文去世的时间稍晚几年，而其夫人范氏也已超过 30 岁了。也就是说，事实上杨氏和范氏都不符合礼部的旌表规定。

为什么上里韩氏又能够获得建立节孝坊的资格呢？我们做出以下推测：韩氏宗族产生了武举人韩腾蛟（廷钧），韩腾蛟为了给自己的祖母（杨氏）立节孝坊，他只得借其伯父韩深文早逝的由头，更改了韩深文的去世年份，以使韩深文的夫人范氏符合礼部的规定。《韩氏宗谱》把有关韩深文去世的年份作了更改并记录下来，但韩廷儒的出生年份并没有相应更改。韩深文“去世”一年多后，其儿子韩廷儒才出生。这证明韩深文并不是在嘉庆癸酉八年（1803）去世的。这座节孝

³¹⁰ 《上里古镇文荟》（上里镇政府惠赠），雅安市雨城区上里古镇管委会编印，雅内印（2005）字第 053 号，第 14 页

³¹¹ 2008 年 12 月 25 日抄录并拍照

坊没有“计开事实”部分，没有本地绅耆具结部分，也没有从雅安县学正堂到四川总督的人名。这足以推测韩腾蛟并没有走层层申报的正常途径，而是经过特殊的活动，才获得礼部的批文。韩氏所立的节孝坊，实际是金钱运作的产物，并不完全如上里陈氏那么真实。韩腾蛟墓碑载：“又为祖妣杨老太宜人请旌建坊，不惜千金。”

从安放的地点来说，陈翟氏节孝坊，建于陈家山陈氏族人的墓地，这个地点并非在交通要道上，显然，只有陈氏族人每年到墓地活动，才能瞻仰到它，这座节孝坊重在教育陈氏族人，激励大家守节与尽孝。韩氏宗族的双节孝坊，则建于上里五甲口场通往中里场和雅安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所有过往的行人，都得从这座坊下穿过。这座双节孝坊比陈家山陈翟氏节孝坊宏伟精美，其花费上千两白银，大部分钱都花在了打通各级官员上，另一小部分钱则花在了建修节孝坊上。韩氏双节孝坊更是一种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它显示了道光十九年（1839）的上里韩氏宗族雄厚的财力，上里韩氏宗族试图通过树立双节孝坊来炫耀他们在水东乡的特殊地位。

清政府提倡的“节孝”观念深入人心，陈家山陈氏和韩氏宗族通过申请树立节孝坊加强了自身宗族权力。

第二节 世系重构中的洪武现象

重构宗支世系的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刘志伟教授对广东珠三角地区沙湾何氏宗族的研究重在讨论“为什么重构”，何氏宗族在重构祖先世系与沙田开发和控制地域社会有密切关系。利益竞争促使了何氏联结南雄珠玑巷南迁故事，使其祖先获得王朝正统身份，从而拥有和控制开发沙田的权利³¹²。黄国信教授、温春来教授对徽州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的考察重在讨论“如何重构”，他们提供了一条线索解释“明清以来华南宗族所修族谱何以明清世系混乱而宋及宋以前世系清晰的问题”，“即唐代以来，北方仍维持着修撰谱牒的传统，到宋代，这些撰修谱牒传统的地方已经撰修出诸多世系清楚的不同姓氏的谱牒，成为明清各地撰修族谱的依据”。³¹³

³¹² 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4期；

³¹³ 黄国信、温春来：《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史学月刊》，2006年7期，115页

因立碑记，并誌源流。

始祖张贤、罗氏，闻自楚入川，住□□至张家沟□氏，生能，三代之墓场在张家沟，闻有等隐业埋碑，兑令裔辈寻之无迹。能生应□□□边□内□其是老之墓乎。生廷春、杨氏，生拱文、刘氏，生乾、顾氏，生文选，游泮早故，次文□、次文□□□□□寿万禄□之后出外，万寿墓在锡匠沟。此数代皆有碑迹可寻，因依宗支序。是以勒石焉。……

上里张氏在乾隆年二十八年（1763）只能追溯到张乾³¹⁷，他们当时制作了一份标准的小宗世系表，张文举那时还只是第2代。道光十八年（1838）张文举则变成了“八代祖”了。上里张氏对上推七代的解释是：“闻有等隐业埋碑，兑令裔辈寻之无迹”。“自楚入川”四字，第一次生根于上里张氏祖籍源流的墓碑之上，而且这个说法前面有一个关键性的字“闻”。这明显是受到了清初“湖广填四川”集体记忆的影响。

道光二十五年（1845），紧挨上里张氏聚居的庙坪杨氏为杨宗仕立碑，碑文由杨宗仕的孙子杨奇芳撰书。文字³¹⁸如下：

我杨氏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堡人也。祖讳筠松，三国时武侯南征从军入焉。有功□楚，后为大邑县太守，驻驿于三岔街。相传数十余代，迨唐宋之久世远年，湮其序次，难以记录。始祖桂芳于明洪武二年迁徙雅州河北街，移居黄村白塔山，婚时氏、海氏，生三子一女。长子发生，次子万生，三子九生，女招赘寿生，分为四房。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里八甲杨氏在杨立程的主持下重修《杨氏宗谱》，“洪武二年”的提法正式进入水东乡的中里八甲《杨氏宗谱》：

前明洪武二年，岁在丁酉，我远祖讳桂芳者，始则播迁雅州河北街，旋复转徙黄村白塔山，婚于时氏海娘，育有三子一女。

咸丰元年（1851）中里八甲杨氏又立一通宗支碑的墓地，他们又把“洪武二

³¹⁷ 请见第二章，第二节

³¹⁸ 2008年12月28日拍照

年”写到了宗支碑³¹⁹上:

前明洪武二年丁酉,我 远祖桂芳公白塔山笃生三子,长讳万生,今本里庙下一族其裔也,次讳发生无考,季口九生,是吾祖也。

咸丰三年(1853),上里张氏重新给张懋贤(茂贤)立碑,其碑文³²⁰如下:

祖籍源流世系宗谱

明洪武由楚入川,始祖张讳国明,彭氏、牟氏;二世峻,原住上里张家沟,次贤,罗氏,继迁张家坪,即我族房之祖;三世志亮,何氏;四世能, 氏;五世应忠, 氏;六世廷春,杨氏;七世拱学,刘氏;高祖讳乾,顾氏,二子。叔曾祖文炳,曾祖文举,任氏,二子。叔祖万禄,丁氏,迁居崇庆州,祖万寿,杨氏,二子。伯崇仁,崇义庠名嵩,李氏,二子。兄懋行,杨氏;口庠名贤,程氏,下里程公讳先弟之女。子四女二,长适名邑,次适郑家湾、国学鹤年之母也。

上里张氏在(道光十八年,1838)上推七代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他们祖先是“明洪武”年间入川的。单从上里张氏的重构宗支世系来看,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洪武现象是上里张氏重构宗支世系的产物。

道光十八年(1838)以后,为什么上里张氏、庙坪杨氏和中里八甲杨氏要重构他们的宗支世系呢?以目前的资料来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是否可以从不同姓氏人群间的文化竞争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呢?清代才搬入水东乡上里的陈家山陈氏和上里韩氏,短时期内因为从事输藏茶叶贸易而发家致富,他们在道光年间声势浩大,建祠堂、建四合院、后人入学做官、还和兵部尚书王宗诚联姻,又申请建立了节孝坊。这些有声有色的活动对水东乡明代以来的老姓人群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因此,重构宗支世系可能是这些老姓人群的一种文化策略,他们可能要表达一种情绪: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比你来得更早!按照科大卫教授有关乡村入住权的讨论来看,这种情绪表达的背后是有关占有和控制土地资源的竞争关系:谁来得早,谁就有在这个地方的入住权,

³¹⁹ 2009年2月17日拍照

³²⁰ 2009年1月2日拍照并抄录

就可以开垦土地，建房修坟甚至上山拾柴禾。陈氏、韩氏来得晚，却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周围的老姓人群难免不会有一些情绪化的看法与表达³²¹。

另外，道光年间的上里老姓人群重构宗支世系时为什么会出现“洪武现象”呢？家国同起，可能是我们理解这种重构宗支世系的原因。从时间序列来讲，一个家族的祖先总要和王朝皇帝之家的祖先一致；有一朝的开国皇帝，则当然应有当朝的属于自家的始祖。水东乡的这些老姓人群最初（乾隆年间）能够追溯到的祖先基本都在明代中期。乾隆四十七年（1782）杨氏树立宗支碑后，到咸丰三年（1853）上里张氏重构宗支世系，都出现了多代单传世系，都是从“洪武”朝开始的。这表明“家国同起”的观念支配着重构宗支世系中“洪武现象”的不断产生。

第三节 不同世系的联结与再造

“洪武现象”属于在自身原有宗支世系基础上重构的结果。咸丰初年水东乡还出现了另一种重构世系的情况：把不同地域的相互独立的宗支世系联结起来。这种情况是具体如何联结的呢？让我们来看中里郑氏的例子。

中里郑氏居住于水东乡中里郑湾，以农为业，他们住在靠近芦山岗、相对于八甲杨氏而言的上游位置，郑、杨两姓人群聚居的房屋相隔约4里路。中里郑氏现存最早的墓碑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郑汝安的墓碑³²²。崇祯十年（1637）雅州儒学生员郑光周立碑一通，这是目前发现的水东乡最早的一通生员墓碑³²³。中里郑氏在明末永历时期立有多通墓碑，这显示了中里郑氏从明末开始势力逐渐壮大。

郑氏虽有《郑氏总宗谱》，但由于这部总宗谱的世系纪录与郑氏墓地历代墓碑世系纪录差异很大，它的大部分内容很难成为我们讨论清初以来郑氏人群情况的依据。这部总宗谱能够供给我们讨论的是宗支世系联结与再造的问题。

《郑氏总宗谱》形成于咸丰三年（1853），“咸丰三年癸丑三月十五日，永、显、清各房宗谱滕一次”，本文使用的版本则是1988年郑加和老人抄录本。《郑氏总宗谱》的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宗支序”和“开列长房”，

³²¹ 我听到过好几个关于上里杨韩两家之间的故事，不过多属于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事情，此处不作引述。

³²² 2009年2月7日拍照并抄录

³²³ 同上

第二部分为世系纪录，第三部分为“郑清”的内容，第四部分为历代祖先做官的纪录，第五部分为三篇序。

《郑氏总宗谱》奇特地方就在于宗谱的最后部分为三篇序，这是水东乡各家宗谱所未见的现象。让我们先来读读《郑氏总宗谱》最后部分的这三篇序文：

(一)

……反胡元，天下大乱。吾祖遇春公与其姻家吴禎起义，佐明太祖灭元而有天下，定鼎南京。吴受封靖海侯，公受荥阳侯。公薨，其子某袭爵，迨靖难兵起，奉建文帝命，偕大将盛庸率兵御之，殊庸兵围之不射，而燕王棣遂尊称矣。某誓不臣贼，遂弃湖广籍，偕吴后入川，自号孤贞，实以明为孤臣之守贞也。

初至嘉洲木城插业，继至名邑板缝岩下，后遂于体十甲安居，生八子，皆以兴命名，岂非以其兴也勃焉乎。长曰兴一陈氏，迁居雅邑郡，次曰兴二陈氏，卜居邛崃，至兴三吉氏，兴四高氏，仍还木城，更名兴龙、兴虎，兴五黄氏，在简洲三岔坝，兴六古氏，兴七万氏，则在板缝岩左右，及大邑县泥乌龟地方，兴八乚氏，随吾祖母仍回南京，以示不忘故国之意。祖则卜葬于此，其以腰磨碑记，则意之深且微耳，岂禎等所能悬揣耶。此吾祖之大楷也。

禎等不才，未能宣扬祖德，而身为后裔，固当略述端倪，以为后来作铭之材，于庶不负吾祖一片苦心，去富即贫，舍贵就贱之至意。

(二)

郑氏宗支碑序

……逮至明朝，郑遇春公从事洪武，削平元乱，官封荥阳侯。迨成祖反京犯阙，公奉建文皇帝，出奔逃至四川名邑，始卜居于板缝岩，继迁于小溪洪，生八子，皆以兴命，更命孤贞，言其孤臣守贞也。没后璽玉在斯，以腰磨为碑，隐姓埋名，以示磨石之苦，不臣永乐之意。不求闻名于世也。

(三)

郑氏宗支序

……及元天下大乱，我祖遇春公英杰，与婚家吴禎起义兵，从太祖，平定天下。四路烟尘扫净，南京立帝。吴封靖海侯，公封荥阳侯，二公薨，其子皆世袭侯职。太崩，皇太孙建文帝立，会燕王举兵犯阙，帝命大将盛庸率诸将二公御之。庸兵围燕王不射，王得脱。反攻，庸兵大败，入城。帝不欲燕弑逆之名，又念宗社，将不如一逃，遂火焚宫，自披僧衣，从窦逃去。

我祖丢世袭侯，誓不臣贼，弃官变服，莫之能向，遂归与妻遁入川省。祖自号孤贞者，实己自伤其为孤臣之守贞也。初至嘉洲，复至名邑板缝岩插业，后插业名邑小溪泔，住居，生八子，欲其兴也，遂皆以兴字命之，复以大磨石为记，是转移磨石之意耳。长曰兴一陈氏，插业雅郡嘉谷在乾溪泔。次名兴二陈氏，与兴三吉氏、兴四高氏退回嘉洲木城，更名兴龙、兴虎。兴五黄氏，插业简洲三岔坝，兴六、兴七万氏住民板缝岩老业，分一支大邑县泥乌龟地方，生子六人。兴八也也氏，随祖婆还居南京。

我祖兴二名应显，插业邛洲平落坝上乡龙头溪住居，娶祖婆陈氏，生四子，卒葬大曲中郎，今龙头山是也。长子志忠，次子志让，三子志谅，四子志谦。其应显公者，以其为入邛之祖也。

根据这三篇序的内容来判断，第一篇是名山县体十甲郑氏的宗支序，第二篇是名山县“小溪泔”郑氏的宗支序，第三篇是“邛洲平落坝上乡龙头溪”郑氏的宗支序。这三篇序都提到了明代初年宫廷政治斗争。朱棣靖难之后，有关建文帝的生死存亡，一直众说纷纭，明代中后期以来相继产生了大量有关建文帝的野史逸闻³²⁴。关于郑遇春的最后结局，《明史·郑遇春传》定论：“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死，爵除。”³²⁵

据第一篇宗支序的说法，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后，郑遇春袭爵的这个儿子带妻子从南京逃出来，隐姓埋名，一路西行，先到嘉定州，再到名山县的板缝岩插业，后来于名山县体十甲入籍。这是一条沿长江溯流而上的路线。郑遇春的这个

³²⁴ 如《建文遗事》、《建文朝野汇编》、《建文遗迹》、《建文忠节录》、《建文帝后纪》、《建文皇帝事迹备遗录》、《建文逊国记》、《建文年谱附甲申秋抄山僧问答》、《革除建文皇帝纪》等等。

³²⁵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一，列传第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38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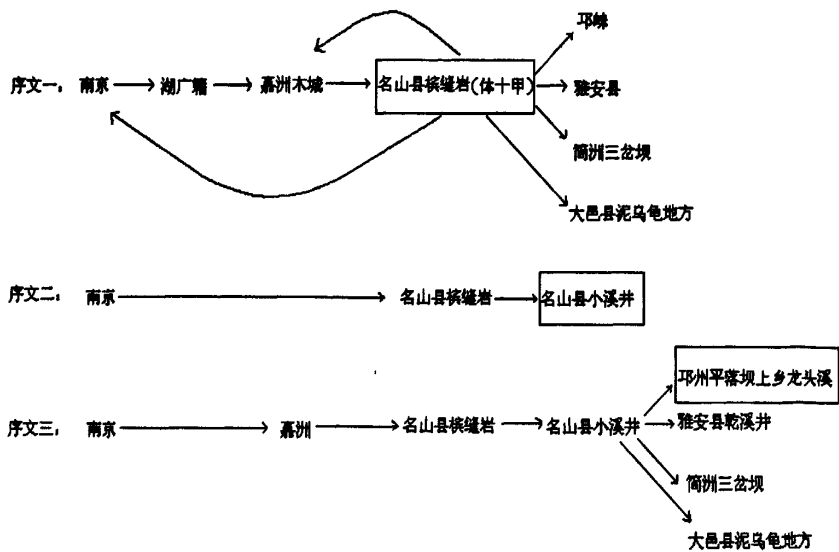
儿子“某”自号“孤贞”，他生有八个儿子，分别迁居嘉定州、简阳州、大邑县、雅安县、邛州、南京等地。如果这篇序文说法无误，那么这将改变《明史》有关郑遇春的纪录。

姑且不论明代初年较严密的路引制度以及户籍管理，即使如此，这三篇序文内容本身存在好几个关键细节，这些关键细节是我们判断这三篇序文成文时间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基础。

第一篇序文提到“祜等不才，未能宣扬祖德，而身为后裔，固当略述端倪，以为后来作铭之材，于庶不负吾祖一片苦心，去富即贫，舍贵就贱之至意。”这个“祜”称郑遇春袭爵之子逃出南京是“吾祖一片苦心，去富即贫，舍贵就贱”，而且称“兴八乚氏，随吾祖母仍回南京，以示不忘故国之意”。那么，这个“祜”应该是郑遇春之子、自号“孤贞”的孙子。即便再退一步讲这个“祜”有可能就是郑遇春之子，他为了隐藏身份而借用孙子的口吻来叙述自己的家史。从《郑氏宗支序》内容本身来看，这个“祜”不论是郑遇春之重孙，还是郑遇春之子，这个“祜”应为明代之人。然而，一个明代之人，却说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来：“吾祖遇春公与其姻家吴祜起义，佐明太祖灭元而有天下，定鼎南京”。明代当朝之人，绝不会说“佐明太祖”的话，而应该说“佐我太祖”或者“佐太祖”。凭这句不合时宜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这篇序文成文时间在清代，而非明代。这个细节的纰漏，均出现在了另两篇序文之中，《郑氏宗支碑序》：“逮至明朝，郑遇春公从事洪武。”《郑氏宗支序》：“佐明太祖平祸乱有郑侠。”如果这些文章出自明代之手，只会说“逮自我朝”，而非“逮自明朝”。这个细节都证明这三篇序文成文时间均在清代，而非明代。

第二篇序文，属于名山县“小溪洪”郑氏的《郑氏宗支碑序》。在水东乡，宗支碑的“支”最早出现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其后水东乡相继出现没有“宗支碑”这三个字的宗支碑。名山县处于水东乡罗绳岗东面，它的文化发展虽然比水东乡快，但也不会快到名山县在明代就产生“宗支碑”这样的新事物（否则，明代水东乡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就会出现“宗支碑”）。

我们再把这三篇序提到的迁徙地点整理如下：



图表 11 郑氏宗支序所及迁徙路线简图

简图中方框里的地点，是三篇序文所及人群真实的住地。如果我们把这些迁徙路线的箭头方向反过来看，就能清晰看到这三个地点的人群是通过确认一个共同的地点——“名山县栢缝岩”而联结在一起的。他们把三个地方郑氏世系联结起来的办法就是追溯共同的祖先“郑遇春”，然后采用“八大房”的世系结构模式，加入四处躲避追杀而分散各地的因素，且采用诸子“改名”的解释框架，来把不同地方的不同祖先名字下面的郑氏人群世系联结在一起的。（当然，这种分析是不排斥“名山县栢缝岩”的郑氏后人很多、四处迁徙的可能性的）

咸丰三年（1853），水东乡中里郑氏的读书人收集到这三篇序文之后，他们开始编写《郑氏总宗谱》。他们接受了“八大房”的世系结构模式和诸子“改名”的解释框架，力图把水东乡中里郑氏与“名山县栢缝岩”联系起来。中里郑氏的宗支序文如下说道：

我始祖郑甲，本系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氏，于大明洪武年中落业于名山冰缝岩，三氏所生八子，改名高、峰、头、荣、绍、基、光、辉，改为八子之名讳，传于后记。

这里所谓的“传于后记”，是指随后的文字（此处从略）。中里郑氏宗支序随后讲了一个关于“郑清”的惊险故事，以作为诸子“改名”的原因：

……郑思熙更名郑清，于二十岁入学，又于成化丁卯科重举，又五年会两榜进士，效力几载，回家办银一千二百两即选通江知府，至任数载，皇上有恩加升，红报回家，名扬天下，即选安南知府，郑清大学士，恩授捧训大夫，仙立宗支牌房。洪治十年被奸臣暗害，假传圣旨，法罪满门，幸得次子郑芝虎去到京城讨账，听说此事，连夜赶南报信，此事不可迟延，即将家园奴婢尽行私逃出府。幸有一老人家听说此事，伤心不已，其年六十有余，与郑清商议，情愿一死，顶代知府官诰，替郑清自刎府中。郑清包定银两，私逃出府，隐姓埋名。幸好有信归家，长子即将书院改为弥陀庵，削发为僧，名曰真空。

同亲弟兄俱皆改名，郑思荣改名郑伦，郑思孟改郑宗，郑思昭改郑楚，郑思鑑改郑崇。郑伦，二子，郑本韩（终）、璋，张、顾、杨氏，此时郑伦将先祖修立宗支碑记皆埋藏在地，抄写宗谱隐匿不可失出。此是郑伦亲笔批于后记。

郑清私逃数月回家，见长子削发为僧，只得隐匿家下，次子郑芝虎改名落业泸州，郑宗同妻搬至川西坝住五载回乡，生一子，改名郑本禄。

万历癸酉年三月初三腾录一次，将高祖系处原由隐逸列于后记，只将高祖生发事开列于子孙之后。故前三代隐匿不明，此为祖传至宝，不可忘记。玄孙郑金连记。

咸丰三年（1853）中里郑氏读书人说，诸子“改名”的理由是因为“郑清”得罪朝臣，“法罪满门”。关于“郑清”，历史上确有其人。雍正《四川通志》载：“永乐年举人，……郑清，雅州人。”³²⁶但据中里郑氏墓地现存文物来判断，很难得出郑清是水东乡人的结论。咸丰三年（1853）水东乡中里郑氏读书人还说，明代时他们就有“宗支牌房”和“宗支碑”，由于“法罪满门”的原因，这些都埋了起来，再也找不到了，而这些牌房和碑上的序，则保存在了这部《郑氏总宗谱》的末尾，即“将高祖系处原由隐逸列于后记”之语。这种说法主要是为了解

³²⁶ 黄廷桂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雍正七年始修，雍正十三年完成），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561册，第103页

第六章 生员、大族维系的四民社会

水东乡处于群山之间，与输藏茶叶总市场打箭炉联系紧密，它持续的经济繁荣，带来了地方社会生员的不断产生和生员阶层的形成，从而促进了地方公共建设事业。这些都是水东乡走向兴盛的重要标志。发源于滇北川南的咸同动乱，短暂地打破了水东乡原有的宁静与平稳。之后，水东乡又恢复到原有的生员共治的四民社会之中。

然而，水东乡并非世外桃源，经咸同动乱之后，国家税收政策和水东乡周围社会发生的变化逐渐影响到水东乡，使水东乡慢慢滑入到经济衰退的轨道。这种经济盛衰渐变的缓慢过程并非泾渭分明，我们在咸同动乱之后的六十年中，还能看到水东乡在四民社会中共同性形成的过程，以及桥梁建设活动和祠堂建设事业的开展。

第一节 文字格式和文人祭祀权

科大卫教授和刘志伟教授探讨过文字和儒家礼教的关系，他们认为僧、道、巫覡在儒家没有进入乡村之前，就已利用文字影响乡村的日常生活，“长期以来儒学其实没有成功地垄断文字的运用，士大夫利用文字推行教化的努力只在有限的礼教形式上取得了成功”。³²⁸本文试图对他们强调礼教的看法作进一步的补充，儒家礼教进入乡村和影响乡村生活的重要方式：文字格式。

咸丰年间，一本名为《随身宝》³²⁹的印刷书籍传入水东乡上里，五甲口场范围内的庙坏杨氏购买了一本，并保存至今。这本书的内容关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人生礼仪、祭祀礼仪与经济文约的一个大总结。目前的上里、中里、下里的乡村社会生活中，也会时常碰到相关的问题，而这本书则能解决这一系列的传统问题。所谓乡村传统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本书的传入，而在水东乡社会得以树立和延续，使之一直成为一系列的“传统问题”，并需要

³²⁸ 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3期

³²⁹ 在我看到这本书之前，书的主人把这本书借给一位好友复印，他的这位好友把原书拆了下来，一页一页地复印，之后重新装订。这位友人不太懂原书从左至右翻页的顺序，在重新装订时，这本书出现了每页顺序倒着装订及错乱现象。在目前的上里镇，这本书仍然属于不轻易示人的好书，乡村中一些能写毛笔字的人都想看到这本书，然而书籍的主人则不会随便给他们看。不过，从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的角度，我认为有必要适时公开这本书的内容，相信这也是本书的主人同意我对该书拍照的深意。

按照这本书提供的规矩（方式方法）去解决。

关于《随身宝》的作者，这本书在不同的部分出现了三个人名：写契约部分出现了“邹可庭”的名字；写契约部分的“附载 客路箴规”，出现了“江湖老叟邹云林著”；写祭文部分，出现了“名邑杨荣山纂述”。可以推断这本书是汇集多人写本最后刊刻印刷而成，作者和汇集刊刻者可能都来自水东乡以东的名山县。

关于《随身宝》成书的时间，据写祭文部分的“祭父文”开头一段“维 大清咸丰△年△月△日宜祭之辰，爰有奉祀不孝男某名，率媳某氏、孙某名，通暨合家孝派人等”，我们可以判断这本书产生于咸丰年间。

这本《随身宝》前后部分书页残缺（不知缺多少页），现存 222 页，共分九个部分：写帖子、写称呼、写袱子、写契约、丧礼类、三献礼式、写祭文、礼仪类。现仅举六部分的一些例子如下：

（一）写帖子（序号为我所加，下同）征引部分：

写帖款式，凡请帖或用全柬，或用副启，或折柬，或单牋，皆当相事相人，不可蒙糊。……

○请会亲帖式

谨卜某日洁觞惠邀

台从会教

姻雅伏惟

俯临曷胜光宠之至

这部分各种帖式的标题如下：

请写神牌帖式	谢助贖帖式	报书式
请点主官帖式	又冢子季子及妻媳用式	取亲客下逮帖式
请先生叫礼帖式	请题主帖式	又名单式
请阴阳帖式	新莹竖碑帖式	从简单帖式
请和尚、道士念经帖式	同前简帖式	请女简式
居丧通用帖式	计开式	命徒写关帖式
请厨子帖式	请祠主帖式	延师关帖式

（二）写称呼：

以上帖式成格颇晰，而上下称呼未详，兹当序次如左：

宴客请帖上下称呼

请尊长称呼式

硕德望某号某翁某姓老先生大人侍右

(自称或晚生晚侍教生,有亲者加一“眷”字。)

眷晚生某姓名顿首拜

这部分内容非常庞杂,因为相对不同关系、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就有不同的对称和自称。这种称呼适用于写帖子、写袱子、写祭文、丧礼类。撰写这部分的作者在举出了一系列的人际关系称呼(尊称、敬称、谦称、平辈之称)之后,还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专门撰写了“附辨岳舅自称一条”:

释义:“妻之父曰外舅,妻之母曰外姑”。后世易称曰岳父母。欧阳永叔云:“今人呼妻父为岳公,以泰山有丈人之峰耳。”故人称妻父为泰山、为岳父,乃婿尊称之词也。为人妻父者岂有自居泰岳之理耶。胡今之人,一请女婿,动称拙岳。何其愚谬之甚也。当谦称眷生或称愚舅。孟子云:“帝馆口”(以下原文纸页缺失)

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人在规范乡民礼仪文字格式的称呼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他们去规范民间使用文字的格式,以达到通过文字格式控制、指导、调节乡民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由于乡民社会生活与这些文字息息相关,所以他们不得不使用相关的文字与格式。在水东乡,读书人这种对这些与乡民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字进行总结与规范,远比高头讲章的四书五经更直接、更有效。换句话说,正是撰写和编刻《随身宝》的儒家文人,把四书五经的长篇大论及其大义,化作与乡民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字格式,让这些文字格式深入到乡民的生活中,使用于乡民的生活中,有助于乡民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读书人才能由此获得真正的文化权力与社会地位。儒家文人为乡民题写碑文或者写袱子,自然能够得到乡民的崇敬。《随身宝》是儒家礼仪渗透到乡间并控制乡民社会生活、指导其伦理关系的重要文本,它也是乡间民俗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切,都与制造、传播、使用《随身宝》的乡间读书识字之人有密切关系。

(三) 写袱子:

所谓“袱子”,就是在烧钱纸时,用于包裹钱纸的“信封”。袱子格式分为四

行，解说亦针对每一行进行分别解说。第一行为“写袱子提头式”；中间一行为较复杂，见下文例子；第三行为落名款式，“第三行己名处照依后载款式称呼”；“第四行写年号 天运干支年〇月〇日火化”。

关于如何写第一行的提头式，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就有不同的“提头式”，其变化和称呼较复杂，征引部分如下：

生子满月，为儿弥月之期
生子周岁，为儿试周之期
银钱会酒，会筵化帛之期
人死两、三日，辞阳化帛之期
死十天半月，游仙异灵之期
□丧用，寄殡化帛之期
移出停丧，移棺化帛之期
屋内停丧，停柩化帛之期
葬丧用，归窆之期，又用，窆窆、□玉化帛之期
和尚葬丧，安厝化帛之期
道场葬丧，还山安葬之期
和尚烧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九化帛
俗人与和尚用，登佛化帛
俗人与道士用，登仙化帛
儿子与人上门，入赘化帛
买田置酒用，置业、定界化帛
讨小婆子用，纳宠化帛
烧钱写袱，襁送化帛
请助友写袱，借助、将□化帛
立房子写，修造化帛
凡大小事务，不好下笔，用，是日化帛
以上提头是第一行，即写今值〇〇化帛之期，虔具□□□封奉上。中一行写

故
〇
妣考
某公
母公
諱
〇〇
氏太
府
君老
孺大
人正
性魂
收
执用

或用冥中收用，或上坟用墓前收受亦可。第三行己名处照依后载款式称呼。第四行写年号：天运干支年○月○日火化。

《随身宝》规定了非常多烧钱纸的情况，以上“提头式”只是较集中的地方，该书各部分还有许多生活琐碎之事，也有烧钱纸写袱子的“提头式”，不再一一列举。现引述部分写袱子的中间格式，以供参考³³⁰：

始祖 故鼻祖 妣考 ○公讳 ○氏 老孺大人 性魂收用 祀耳孙 ○度具	二代祖 故远祖 妣考 ○公讳 ○氏 名老孺大人 性魂收用 祀云孙 ○度具	三代祖 故太祖 妣考 ○公讳 ○氏 老孺大人 正性魂收用 祀奶孙 ○度具	四代祖 故烈祖 妣考 ○公讳 ○氏 老孺大人 正性魂收用 祀舅孙 ○度具	五代祖 故尊祖 妣考 ○公讳 ○氏 老孺大人 正性魂收用 祀来孙 ○度具	六代祖 故高祖 妣考 ○公讳 ○氏 老孺大人 正性魂收用 祀玄孙 ○度具	七代祖 故曾祖 妣考 ○公讳 ○氏 老孺大人 正性魂收用 祀曾孙 ○度具	八代祖 故祖 妣考 ○公讳 ○氏 老孺大人 正性魂收用 祀孙 ○度具	九代祖 故显考 妣考 ○公讳 ○氏 老孺大人 正性魂收用 祀男 ○度具
--	--	--	--	--	--	--	--	---

作者对以上每一个格式的称呼有一些简要解释，现整理如下：何为鼻祖？凡人受胎，鼻先受形，故称鼻祖。耳孙者，且闻始祖口口行，故曰耳孙。然或用祀嗣孙裔孙远孙亦可。此本朱子；二代祖称（莫可名，但曰远也）；三代祖称（莫可名，但曰太。太者，远也）；四代祖称（莫可名，但曰烈。在祖之列也）；五代

³³⁰ 我在上里镇、中里镇乡民家里发现的几部“袱簿子”，成书最早的在民国年间，成书最晚的约在10年前，这几部“袱簿子”直接继承了《随身宝》“写袱子”的格式，基本按照这些格式书写各自家庭的世系。问及这些“袱簿子”的用处，乡民都说，“这是七月半给祖先烧袱子时要用的”。至少可以认为，目前的上里镇、中里镇形成的每年七月半给祖先烧袱子时“写袱子”的传统，是在咸丰年间形成的。在上里场和中里场，我还看到有专门的“袱子信封”卖，各家烧袱子时，只需买这种固定格式的“袱子信封”，在相应的地方填上祖先的名字，把纸钱装进这样的“袱子信封”，就可以烧给祖先了。乡民结婚，也要在结婚当天给祖先烧“袱子”。

祖称；六代祖称（凡人烧袱子，于从此者多）；七代祖称（即老祖公老祖婆）；八代祖（即老爷奶奶称）；九代（即亡父母，俗云爹妈）。

另外，烧各种袱子时还有两个必备的袱子，其格式征引如下：

(一) 与地盘业主古老先贤烧袱子写	(二) 与引魂童子写袱用
为妣考 上 前朝地盘业主 古老先贤 老大 人 冥中收用 天运千支年○月○日 火化	为妣考 地府差来引魂童子冥中收用 天运千支年○月○日 火化
主某○氏具备冥金○封奉	父死称孤子 哀子 母死称哀子 具备冥楮○封给付

(四) 写契约：

这部分内容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将涉及到的各种文约格式，这里只征引每篇文约的标题：

买田契式	讨地葬坟文约	母授分产业关书
买田地打定约	合伙文约	兄弟分关文约

卖水碾文约	卖新货文约	继嗣遗命
卖山地文约	借独脚会文约	允子出继字
借银钱文约	欠钱文约	抚子文约
压借银钱文约	收钱文约	送子学和和尚舍白文约
佃田地文约	银钱会当约纸	买妾契式
当田地文约	木匠包修瓦房文约	卖牛契式
请常年文约	石匠包修石碾文约	请医包治病文约
租牛文约	包作堰修沟文约	跟寻使女帖式
卖房子文约	写戏文约	寻猪、牛赏帖式
卖街基文约	学手艺文约	禁止戕禾
当街房文约	包揽挑货文约	禁盗囤蔬
佃街房文约	包揽载船文约	禁盗坟山阴木
卖河船文约	伏约帖式	
卖市斗行戮文约	父授分产业关书	

通过这些契约格式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咸丰年间乡民社会经济活动所涉及到的一系列的契约，其中有两个“会”，一个是“独脚会”，一个是“银钱会”。这两件文约成为固定格式出现，说明这两种“会”存在并活动于名山县及附近州县，并已形成了一套通行的规矩。这两个会的出现，表明乡民经济活动的模式有了更多的选择。过去，乡民如果缺钱，他们只能向亲戚乡邻借；咸丰年间，乡民如果缺钱，他们则还可以向“独脚会”或者“银钱会”借钱。不过，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种会在咸丰年间水东乡活动。

（五）写祭文：

这部分只征引其部分范文格式标题：

祭父文	祭伯娘文
祭母文	祭丈母文
祭老爷文	祭姨母文，妻姨母同
祭奶奶文	祭伯叔丈母文
祭伯叔母文	祭丈人文

（六）丧礼类：

这部分只列部分范文格式标题：

丧礼称呼	修方祭考妣文	祭丧輿文
铭旌式	祀水府文	又丧輿文

题主陷中式	祀井文	祀文武庙
题主粉面式	祀灶文	遣奠祝文
入棺祝文	祀灶文	下葬祝文
祀昭穆文	祀河伯文	题主祝文

这些文字格式是围绕着人的生老病死制定的各种礼仪文书。人与人之间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以及各种活动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礼仪与契约关系；人与亡故亲人的灵魂之间，也有着种种的礼仪，活人通过这些文字格式（烧袱子、烧祝文）去沟通生死的界限，并实现活人给亡故亲人神魂带去幸福（钱纸）的目的。乡民愿意做这些事情的基本原因，并不在于读书人的督促与诱导，而在于乡民们很清楚自己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阳间），去到“地府”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府，自己也需要阳间亲人的关心、帮助与祭奠，才不至于孤单、贫穷和受罪。这本《随身宝》就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死亡的现实之上。《随身宝》并非文人制造出来的骗人把戏或者愚民手段，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直面死亡。这些文人制造的礼仪文书格式，不光要乡民遵守，文人自己也得遵守，它帮助了过去的乡民（以及文人自己）坦然面对死亡，从容应对蹒跚而来的“引魂童子”。各种事物都有神灵（土地、门、桥梁、井、灶、河等等），人与这些事物打交道也需要通过烧钱纸去祭祀他们，写一些祭文烧去，希望这些神灵保佑乡民平安，禳灾去病。至少，人们在尝试着主动与亲人的死亡（亡魂）打交道的时候，对自身的死亡有了一点点预期的感受，从而不会有太多的不可知的恐惧与害怕了。

乡村文人通过《随身宝》制定的文字格式，把各种礼仪贯彻到乡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了。咸丰年间拥有这本《随身宝》的乡村文人，在水东乡乡民中的威望一定很高，他从此获得了祭祀权。“不写袱子，亡故亲人神魂就收不到烧给他（她）的钱纸”，这个观念正是通过《随身宝》来确立的。文字与文本格式，成为乡村文人行使祭祀权的重要工具，它在沟通活人与亡魂、活人与各种神灵的过程中，成为关键的桥梁；掌握文字以及能够书写各种祭祀祝文的乡村文人，则成为修建这座桥梁的关键人物。当乡村文人去为乡民书写祭文、祝文的时候，这个书写过程本身也成为沟通活人与亡魂、活人与各种神灵的仪式之一，乡村文人此时的身份更像是一名通神或者通灵的祭师，是他通过写祭文、祝文而主持了乡民的家庭祭祀。咸丰年间《随身宝》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文人在水东乡祖先祭祀权

的领导地位³³¹。

第二节 公共事务与生员阶层

雅安县的部分绅士（主要是贡生以上）³³²，在道光元年（1821）就已获得了政府授权，负责征收部分地方税。民国《雅安县志》载：“夫马，初派之民，谓之火把差。雅安蜀西南要道也，差徭繁。道光元年摊之粮，两输钱千，或全免，或免八，或免六，或免四，举贡生监，以别绅司之。岁以支之，余置田。光绪三年减为两输钱四百。”³³³。雅安县道光元年（1821）就把夫马差徭摊入地丁银内征收，一两地丁银随征钱一千文钱，有的地方免去夫马差徭的摊派，有的地方随粮征两百文，有的地方随粮征四百文，有的地方随粮征六百文。雅安县的贡生监督此事，其他绅士则负责征收。这种税收方式，深刻地改变了政府与绅士的关系，政府的财政收入，极大地依赖于地方绅士的合作。绅士大大增加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和地位。

道咸时期水东乡的宗族文化建设，基本上都是各姓独自建设各自的宗族文化。在这些相互独立的建设活动中，我们仅能发现同一个祖籍传说开始成为各家宗族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直到咸丰初年，这种相对松散的状态有了一定的改变。

建修磐安桥

咸丰六年（1856），五甲口场韩氏、上里杨氏、上里张氏领导众姓修建了磐安桥，其位置在今天“上里古镇”磐安桥下游约 50 米的地方³³⁴。这座建桥方碑共四面，其碑文³³⁵如下：

面之一：

³³¹ 目前，水东乡仍然保持着给去世老人写祭文的传统，书写者为阴阳道士先生或者有足够修养的人。祭文火化于四七。

³³² 张仲礼先生把绅士分为上层绅士（贡生以上）和下层绅士（生员、监生、例贡生）。请见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 页

³³³ 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二，田赋志第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4 册，第 315 页

³³⁴ 今天的磐安桥重修于 1988 年。咸丰年间的石桥早已被洪水冲毁，但立于桥头岸上的建桥方碑，却一直保留至今。现在这座方碑也被搬到了 1988 年新建的磐安桥桥头。

³³⁵ 2008 年 12 月 21 日拍照并抄录

左：磐石镇江心长留秀曜

右：虹桥锁溪口永利行人

里人刘长钦

面之二：

从来安心为善者，不欲人之履险涉危，故必选安基以建桥焉。五甲口山水明丽，两溪交环，其东南隅之水，出白马灵泉，上有安定大桥，下有小平桥。惟兹西南隅之水，出后凹山谷上，远有弓背高桥，下近此独无桥。昔杨姓曾事建修，厥功未就。今杨韩任□□□□君复□□□□经春历夏，大功告成，众咸称□与彼三□者异时同（空框字数待考）功吾则独有奇于斯桥。下有沙洲，接生磐石，岂非风鑑家所谓禽心泝水耶。桥即建于其□□流灵钟□□□□□□风水□□□□去其□□□□□□□□□□备于彼三桥矣。然苟非斯人之安心为善，曷能自昔及今，终选此磐石安基，以成此桥也。请名之，为磐安桥，□里人刘长钦□□□□□□□□□□□□□□□□。

五甲口，郡志为上里场，山水清奇，民风淳厚，地灵耶，人杰耶。白马灵泉之水，绕于东南，后凹山谷之水，发自西北。惟东南溪口无桥，下有沙洲接生磐石，里人建桥于其上，叙桥者，名之为磐安，其义安在？磐石安镇江心，因地名也。桥将安于磐石，谓桥年永也。□日磐石无桥，行人不免涉危□□。今日磐石建桥，行人咸欣去危就安也。此磐安命桥之雅意也。

夫善之所基，福从以生。予亦爱此山水之清奇，抗怀古迹，乐此□
□厚景□名□路肇皆□□钟□马占□□□□陈□□□□车登龕
堂。刘杨堪钦知继起有人，将题名雁，倘后来居上，且翔步龙池，绵绵
吉徵，不将于□□桥□□□□□□□□□□□□□□□□杨□□
□□□□

功竣

卫千总銜 武庠 韩秉成

紳耆

开桥

壬辰科武舉前兵部差官韓大成

韩腾蛟

杨永长 杨枝玉

甲午科武举

耆老

陈殿颺

杨际云 杨文玉

发心敬刻土地 信女 韩裴氏

面之三: (正对河下游方向)

任云南□□□县知县	韩廷璠	助银一封
正八品	韩廷璠	六千文
	韩廷鼎	五千文
监生	韩澄	四千文
	韩廷储	三千文
正八品	韩廷佐	二千四百文
	韩祥玉	二千四百文
监生	韩泽	二千文
	景大常	二千文
	杨文秀	二千文

(以下名单见附录)

面之四 (磐安桥正对来路方向):

地主 韩步云

邓曰旺

□□名山县学生员罗徽典

捐钱伍千文

建修首事 张怀珍

杨文玉

武生韩振先

任登举

余兰楦

每人名下捐钱貳千文

石工 任文华 任文耀 任天□

(名单请见附录)

□吉府学增广生员刘灿黎

大清咸丰六年岁在柔兆执徐仲春经始孟夏吉日告成立

咸丰六年(1856)兴修磐安桥,首次出现“首事”,分别为张怀珍、杨文玉、韩振先、任登举、余兰楦,前四位分别是上里五甲口场范围内的韩氏宗族、杨氏、张氏、任氏的代表者。

据以上不完全碑文统计,这次参加捐资修桥的人数在161人以上,他们分别是五甲口场韩氏、上里杨氏、庙坪杨氏、上里张氏、上里陈氏、上里任家沟任氏、上里景家坝景氏、上里蓝家岗蓝氏、上里箭杆林黄氏和师氏,上里邓氏,还有零

星的中里何家湾何氏、中里胥家湾胥氏等姓氏人群。这些主要姓氏人群以外，就是上里五甲口场的商民。这是一个主要以五甲口场范围的人群，这些人群活动以会“首事”来组织地缘人群进行地方公共建设活动。其中邛州方面的人员相对较少参与这座桥梁的兴修，没有名山县人参与这次修桥活动。白马泉寺的僧人也参与了这座桥的捐资，碑文中的“如俸”，即同治二年（1863）墓碑主人“如凤”³³⁶，“昌慈”、“妙湛”也应是白马泉寺僧人。

五甲口场韩氏是此次捐资修桥人平出资最多的人群，他们做官的和有功名的人也最多，老一辈的如韩大成、韩腾蛟，新一辈的如韩秉成，韩氏还培养出了一名云南禄劝县知县韩廷璠。韩廷璠的幼学启蒙，就是在韩氏祠堂里度过的。《韩氏宗谱》收录了道光二十年（1840）邛州李萼给韩绍宗写的传记，李萼在该传记文末提到：“庚子岁余设帐公宗祠，训公重孙璠，因得览公亲撰碑记，询及盛德，遂乐而为之传云。邛邑戊子亚元契愚晚李萼拜撰。”

磐安桥的建成，反映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与乾隆五十二年（1787）建修的平水桥相比，水东乡上里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绅士。第二，与道咸时期各姓树立宗支碑相比，上里产生这些绅士不只在各自姓氏人群内部活动，他们开始走出族内，联合成为一个团结的阶层。上里进入绅士共同治理的时代，地方公共建设也由这些地方绅士出面领衔。通过建修磐安桥，上里绅士巩固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统治权力，维护了乡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与人伦价值观念。咸丰六年建修磐安桥，是水东乡上里官、绅、士、庶、僧各阶层、各职业群众大团结的象征。

据以上不完全碑文统计，这次各姓人户捐钱共计 140400 文，外加韩廷璠“银一封”。各姓人户捐出的货币主要是铜钱，而不再是白银，这与嘉庆十五年芦山岗众姓兴修长寿桥时各家各户多捐银二两、银一两相比，咸丰六年（1856）在五甲口场流通的货币已经变成了以铜钱为主，白银变得日益稀少，这种情况与白银缓慢流出水东乡乃至水东乡周围州县地区有密切关系。

上里的绅士们开始寻找茶道市场功能之外的发展途径，于是，他们想到了就地创造五甲口文化。建修磐安桥成为创造五甲口文化的重要工作。磐安桥本并非五甲口场所必需，在黄茅溪的上游位置，已有“弓背高桥”，这座“弓背高桥”是连接黄茅溪南岸与五甲口场的重要桥梁，上里杨氏、庙坪杨氏、上里景家坝景

³³⁶ 请见第四章，第二节，“僧人葬法的改变”

氏、上里张氏赶五甲口场的多经过“弓背高桥”。磐安桥的建立，是上里绅士领导的各方人群对上里五甲口场的认同和热爱的表现。五甲口场范围的人群开始尝试增加这里的基础设施，美化这里的人文环境，上里绅士开始创造“山清水秀、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五甲口文化，正如碑文中所说：“五甲口山水明丽，两溪交环……山水清奇，民风淳厚，地灵耶，人杰耶。”

咸同动乱与水东乡

四川咸同动乱始于咸丰九年（1859）九月，后世史称蓝大顺（又名蓝朝鼎）、李永和起义³³⁷。这次农民起义从云南省昭通府大关县牛皮寨开始的，起初 700 余人，六天内连克四川省筠连县、高县、庆符县，最后波及四川省四十多个州县，历时六年³³⁸。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朝廷命令四川地区组织团练，“现在各属土匪蜂起，著责成地方文武联络绅董实行团练”³³⁹。四川官僚体系无法有效管理各级官吏和军队而导致吏治腐败，是这次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³⁴⁰。艾小惠指出，这次大起义由贩卖鸦片的烟帮组织发动，烟帮是清水袍哥（哥老会）组织中势力最大的一支，烟帮的成员也是哥老会的成员，烟帮与烟帮之间靠哥老会组织互相联络³⁴¹。

雅安县城在这次农民起义中并没有失守，与雅安县交界的名山县城则两次被攻破。

吾蜀承平数十年矣。……突于咸丰九年九月滇匪李蓝二逆窜扰川疆，筠连、庆符相继失守，蔓延叙府，全川震动。……丹稜、蒲江、名山失守两次，夹江、峨眉、雅安虽未失守，而贼临城下，杀戮甚惨，焚掠尤

³³⁷ 关于蓝朝鼎、蓝大顺名字的记录，四川各县方志记载不一。隗瀛涛先生认为，蓝朝鼎是蓝二顺，蓝朝柱为蓝大顺。（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0 页）张宁认为蓝朝鼎是贵州省威宁县人。（张宁：《蓝朝鼎籍贯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 年 2 期；张宁：《蓝朝鼎身世及其起义原因的探讨》，《昭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2 年 4 期）刘光全认为蓝大顺本名蓝朝璧。（刘光全：《“蓝大顺”本名蓝朝璧》，《文史杂志》，2005 年 3 期）

³³⁸ 隗瀛涛、李有明、李润苍、张力、刘传英、曾绍敏著：《四川近代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第二章，第三节，“震撼全国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³³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九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23 页

³⁴⁰ 骆秉章：《择尤参劾以图整顿川省吏治营务片》，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0741 册，《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十九，吏政四，考察，第 539-544 页

³⁴¹ 艾小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蓝朝鼎李永和农民起义》，《史学月刊》，1956 年 4 期，第 9 页

战乱经过的地方，“兵、贼”对地方社会的伤害很大。与雅安县近邻的丹稜县被灾，其惨状由身在其中举家逃难的丹稜县进士李昶元一一记录下来：

我居总岗巅，贼扰总岗麓。
烽火四面红，妖氛来飘忽。
直入丹稜乘，生灵遭荼毒。
焚掠遍乡村，搜捕及山谷。
老弱填沟壑，少壮为贼屈。
蹂躏一月余，惨不忍属目。
又顾而之他，纵横随所欲。
去之日二三，流民始渐复。
谓此大劫余，差可安食宿。
艰苦谋春耕，焦土架茅屋。
忽又官兵来，横暴递相续。
始则妄诛求，继乃肆鞭扑。
掘遍窖出钱，搜尽仓余谷。
拆屋供炊薪，牛羊恣屠戮。
贼弃兵皆取，兵较贼弥酷。
夫役不择人，绅耆咸畏缩。
刀光驱子女，血涕作僮仆。
甚且杀无辜，报功诬贼属。
偶或与贼遇，其退勇且速。
处处尾贼行，相倚如心腹。
视贼为奇货，纵之任出入。
日费国家粮，何曾相角逐。
所以军兴来，兵贼两和睦。
尸骨满山林，概是良民族。

³⁴² 长宁教谕邓敏修：《防堵记》，《洪雅县志》卷七，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38》，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年，第581—5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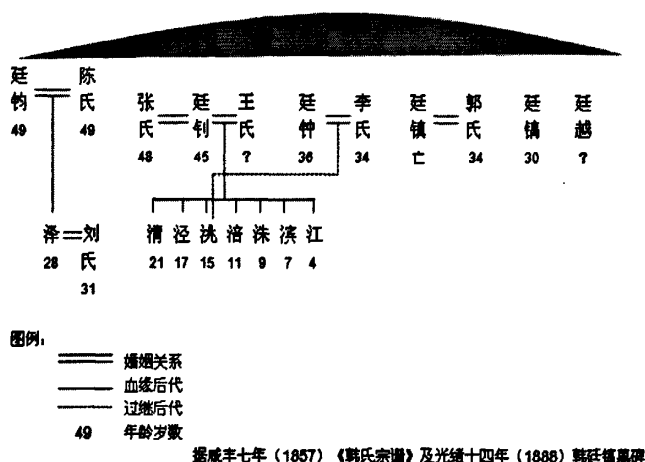
哀哉乱离人，何以遂生育。
惨无天日光，下情难上告。
言之不忍言，直笔为痛哭。³⁴³

蓝大顺的人马、打着蓝李旗号的各路人马以及各路官兵围着水东乡四周的山（东面罗绳岗、南面碧峰峡、西面芦山岗）转了一个圈，他们并没有进入水东乡，水东乡在这次动乱中并没有受到大的直接伤害，也没有造成大规模乡民逃亡。《雅安县志》载：“已克复金鸡关，乃向周公山败窜。……集残队，屯李坝，攻宝子山，破花溪、柳江，团侵峨眉（闻李短搭将袭嘉阳，故至峨眉），又自峨眉折而犯荣经，踞徙阳，掠芦山，出火井，雅境方宁。”³⁴⁴

韩腾蛟分家与领导团练

这次动乱对水东乡的富户影响最大。咸丰九年（1859）九月之前，上里的武举韩腾蛟（即韩廷钧）主持其父亲韩述文（1842 年去世）留下的家产，韩腾蛟是长子，他有五个弟弟。据咸丰七年（1857）《韩氏宗谱》记载来看，这个大家庭有 6 房，共 19 口人，其咸丰九年（1859）未分家的结构为：

咸丰九年（1859）韩廷钧分家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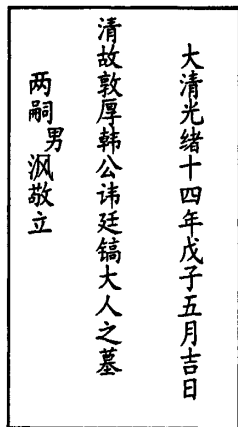


图表 12 韩腾蛟未分家前结构图

³⁴³ 刘良模监修、罗春霖总纂：《丹稜县志》（民国十二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38》，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 年，第 626 页

³⁴⁴ 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四，变乱志第九，《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4 册，第 354 页

韩腾蛟主持的这个大家庭维持了 17 年，咸同动乱直接导致了这个大家庭分居、分爨和分家产。据同治十三年（1874）韩廷钊墓碑载：“不幸又遭蓝逆扰乱，悉各分居”³⁴⁵。上里韩氏作为雅安县首富，他们开始分家，各自自保。这种人心惶惶的气氛，可能影响到整个水东乡富户。因为存在韩廷镐没有成家、没有后代的问题，韩廷镐这份家产如何分配，他的香火如何延续，这是当时分家争论的要点。光绪十四年（1888）韩廷镐墓碑³⁴⁶对这咸丰年间的分家有详细记录。



背面：

余兄廷镐，幼而失明，长而病狂，其行毋庸序也。所以序者，欲以明继嗣之故也。镐既病废，授室不果，□□□□继也。所以继者，盖以情义之不容己也。其不容己也，奈何？先君子光斗公元娶许太宜人，脉生长兄曰廷钧，仲曰廷钊。许宜人没，续娶杨太宜人，脉生次兄曰廷钟，季曰廷镛，曰廷镇，曰镐，及余。镛未成立而夭；廷钟于先君没后而亡，室人李氏无子；兄钧以钊之子洮为嗣；不数年镇亦亡，有子周年而夭，其室郭氏欲抚子，兄钧仍欲以钊之子承，而钊不就，谓己子已应一房嗣，宜待余子。迁延数年，而钊亦亡。

无何蓝逆上窜，兄钧倦于家务，议分爨。余乃仍请兄钧以钊之子沅为□嗣。又以镐癫盲无依，前屡聘未娶，复为聘樊氏，樊亦终不从。既而钟抚子洮亦亡。兄钧以为无庸复嗣，而钊子清等不可，遂凭族长公议，金云：洮可绝而再续，叔镐虽病废，而年过知命，岂反不如夭亡之侄？

³⁴⁵ 请见韩廷钊墓碑文

³⁴⁶ 2008 年 12 月 30 日抄录并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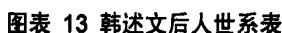
议以兄钧之孙承洮，以余子承镐，请以一房承一房，情事两全。而清等不从，惟于钧孙承洮之议，无辞。于是兄钧远以其孙席纯承洮焉，三分镐之产，以一分归清，以一分归余，又以镐未分住宅，不能自立，约以一分为生养殁葬费，余经理。余谊不容辞，谨受命焉。□钧□□谓己之子孙及沅等曰：尔等现应一房，后此必无容于此分内覬覦。于是定分。

分后数年而余适得次子泓。兄镐虽□□，亦知爱怜抱持。余悲其意，遂许以泓嗣之。盖以前此镐产未分，事犹待众而定，今镐产已析，义可。惟余自起未几，镐兄病终。余计其一分业值千缗，遵约易以为葬丧费，籍而记之。乃使泓嗣其后。时侄清遂具帖，请还其分。余惟所以嗣镐者，以情，非以利也，郤其产，一无所受。余于此窃幸六房俱全，而不意余长子洮以游泮后天亡，谨遗一子曰树芳。余用是深自悲悼，几无复有世事意，且精神衰落，遂自为生圻兼立碑，及为镐立碑，碑例书嗣，念泓奉余之命两承□，使不书嗣，则余为不信。然泓嗣镐，而镐之产已分，使不书嗣于余，则泓将无资，而余为不念无己。伏查律文，承嗣无□□许两承。夫兄镐名虽有产而实已瓜分，则其嗣非无人欲承者乎。兄钧以一子二孙而得两业，兄钊以数子而后□□得两业有余，则其嗣非无人可承者乎。以无人可承、无人欲承之嗣，而余使泓承之，是泓虽承镐之后，而不可不承□□业。承镐之后，固应书嗣，承余之业，亦应书嗣，覆与两承之义实符。况今日功令出继者三代均许双填，诚以□于□性名不可易也，况如泓之嗣，犹与寻常不同者乎。

碑既成，遂命以两嗣书，而特虑后之人有疑于其事者。爰为□□颠末，详其委曲，而著之乎碑，亦聊以明镐之所以想者。盖士于情与义不容己也云尔。是为序。

胞弟廷樾谨述

韩廷钺在胞兄韩廷镐墓碑后面写的这篇长文，主要是解释墓碑正面韩泓“两嗣”的问题。韩泓是韩廷钺的次子，同时又是韩廷镐承嗣之人。



韩廷钧主持分家后，族长成为伯侄间财产分配分歧的重要仲裁者。韩洮去世后，韩廷钧主张廷钟房不再设嗣，侄儿韩清则认为应该重新设立承嗣人，以便继承这份家产。韩氏宗族族长的意见是，韩廷钧的孙子承嗣韩洮，这样，韩廷钧的孙子就直接继承了韩廷钟的家产；韩廷钺的儿子承嗣韩廷镐。这种安排叫“一房承一房”，即廷钧房继承廷钟房家产，廷钺房继承廷镐房家产。这样的安排使得廷钺房没有分得家产，韩清作为廷钺房的长子，自然不同意这种安排。他没有直接与伯父韩廷钧争夺廷钟房的家产，他同意廷钧房继承廷钟房家产的安排，但他对韩廷镐那份家产提出了“三分”的意见，一份归韩清（廷钺房），一份归廷钺房，一份留作廷镐生养病葬费。这样，两房家产，最后被三房分去。“钧兄以一子二孙而得两业”的意思是，廷钧房算一业，廷钟房算一业。韩廷钺房在这次分配家产中只得到了廷镐房 1/3 的家产，他还承担负责韩廷镐的生养病葬（以其 1/3 家产为费）。廷镐房另外 1/3 的家产则被韩清（廷钺房）分去。这种分配方式只

是原则上的，因为韩廷镐还在世，所以没有真正分这份家产。

在廷镐房家产（共约三千缗）被分配完毕的情况下，韩廷铎让自己的次子韩泓承嗣韩廷镐。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给韩廷镐延续香火。但是，承嗣本身不只是延续香火的问题，更是财产继承的问题。韩廷镐的财产已经分完了，韩廷铎让自己的儿子韩泓去承嗣韩廷镐，韩泓就无法得到自己家产的一部分。所以，韩廷铎特意让韩泓“两嗣”：从世系承祧关系上说，韩泓两边承嗣，两边的香火都由他来祭祀和延续；从财产继承关系上说，韩泓只有在没有过继的前提下，才能合法继承父亲韩廷铎的家产。

韩腾蛟处理完令人头疼的家产分配后，他作为在乡举人，他领导了水东乡组建团勇的工作，维持了水东乡正常的社会秩序。据韩腾蛟墓碑载：“至若急公好义，公也有焉。昔蓝扰乱，公整练团勇，费金千余，绝无难色，而一乡得以保全，是皆公之力也。后县主何以其事闻于上，蒙加五品蓝翎，以奖公焉。”雅安知县何鼎勋³⁴⁷愿意上报韩腾蛟到朝廷，韩腾蛟能够获得朝廷的“五品蓝翎”的虚衔，并非是由于韩腾蛟只保卫了区区一个的水东乡，更重要的是韩腾蛟“费金千余”，从经济上大力支持了知县何鼎勋。咸丰末年四川地方士绅组织团练，资金来源于捐输和厘金。周询大致描述了咸丰末年动乱时期四川各地士绅代收代交地方“捐输”的办法：“一邑之中所纳捐输，但出自一家者，集有成数后，均准由其家之任何一人，将历年纳款收据汇缴，由地方官验明，按照捐例之数，呈由总督奏请奖给是人虚衔翎枝封典，惟不能实官。”³⁴⁸整个雅安县每年捐输额为三四千两³⁴⁹。贾鸿基记载：“捐输始于咸丰。岁输六千两，递减至一千两。嗣复加一千两。”³⁵⁰不论整个雅安县金额是多少，韩腾蛟上缴的这些钱都不算少。

民国《雅安县志》和水东乡现存资料里并没有团练做法的具体记载，我们可以参看同时期雅安县附近的庆符县的做法。

咸丰九年李逆倡乱后，邑令李到任，始行练团。挨户编联，不令遗漏。或十余里、二三十里联为一团，每团选公正团首二人或四人不等，

³⁴⁷ 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卷三，官师志第五，《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4册，第328页：“何鼎勋，字筱塘，浙江举人。蓝逆围城，多方防御，旋解去。”

³⁴⁸ 周询：《蜀海丛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0007，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3页

³⁴⁹ 同上

³⁵⁰ 贾鸿基：《雅安历史》（民国十二年），卷二，田赋篇。承蒙雅安市方志办耿俊杰惠赠，特此感谢。

每十人立一牌首，每场立一团总，各团中有小事，凭团总理论，大则为之代禀。若有调遣，县尊飞谕团总，由团总挑选，遵照官谕办理。每年农隙时由团总定期操演并随时制造军器火药各项，其经费按户公派。收租者每租十石，酌派若干。佃田者每顶首百千，酌派若干。未及五十千者，不派。均按时势公议，不得私派。每年终凭团众清算账目。若遇无事之年，则只操习，不得滥派经费。³⁵¹

市场，成为清政府组织地方武装和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枢纽之一。庆符县把全县按照二三十里分为一团，选出“团首”二到四名，这个大的地域范围内存在多个“场”，每个“场”再确立一个团总，领导牌首；一个牌首领导十人。这种团练方式，多以地方绅士充当“团首”“团总”（少数地方也有商人和土豪充当的³⁵²），既以市场为中心，又把此地域范围内原有的保甲制纳入其中。大竹县的团练方式除了具体一些名称有差异外，基本相同。贾鸿基记载：“（光绪十七年之前）旧有镇安团，城乡各举团首，自置刀矛，丁抽于户，自食其食。”³⁵³雅安团练方式，实际是政府通过绅士征发编户民人的一种劳役。

韩腾蛟素有威望，他是磐安桥开桥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韩述文家业的掌管者。在乡武举人是水东乡团练的重要组织者与领导者。咸同动乱巩固了韩腾蛟在水东乡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咸同动乱又削弱了韩氏宗族的凝聚力；韩氏培养的唯一一位现任云南禄劝县知县韩廷璠，在这场动乱中劳累过度、染病身亡。《韩氏宗谱·鳧山公传》：“丙辰春临安民变，所过勒犒，惟君邑鸡犬不惊，其智略之震慑人心，可想见矣。乃董戒过于勤劳，孟春忽不虞，卧治数月竟于署告终。”这对上里五甲口场韩氏宗族来说，是一个较沉重的打击。

同治中兴下的四民社会

同治五年（1866），四川蓝大顺、李永和农民起义基本被清王朝政府扑灭，由于资料的限制，韩腾蛟组织的团练以及韩腾蛟在同治年间的活动，我们无从得

³⁵¹ 孙定扬修、胡行达等纂：《庆符县志》（光绪二年）卷二十六，屯练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35》，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年，第588页

³⁵²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1页

³⁵³ 贾鸿基：《雅安历史》（民国十二年），卷二，田赋篇。

知。水东乡没有受到“兵、贼”直接伤害，很快就从这次动乱中恢复过来。水东乡上里的生员们领导众姓捐资修建了一座藏字纸的塔形石库³⁵⁴，以振奋人心，提升民气。这座塔形石库高约 10 米，共 5 层，呈六面体，最下层直径约 2 米，它在五甲口场平水桥下游约 300 米的陇西河东岸³⁵⁵，它北面 150 米处是石佛岩，南面 150 米处是韩氏双节孝坊。其上文字³⁵⁶如下：

石刻匾：

匾之一

字库配山长文风
石亭锁水保财茂

匾之二

要好儿孙字必惜
欲高门第善宜建

匾之三

能培心地自广福田
欲求荣华正宜作善

面之一：

六品 韩秉成上钱五千文
韩澄上钱乙千二百文
韩□□上钱□千文
余□□上钱乙千二百文
杨守儒上钱乙千二百文
杨在东上钱乙千二百文

高启□
杨大训
卢洪顺
杨快淮
杨□□
九品 景文常
周廷良
文生 陈绍基
张怀琨
九品 黄玉堂
黄国兴
□□上钱壹千文

(略)

面之二：

且自仓颉造字而天地之精以发抑自文昌重□□□□□道以
口彰是□也不但文人学士所当□重而□□为□惜□□□
□□□□有□□□佳□□□□□表□□□□□记□□□
□□□□定□字□为□□所□敬者其□□□□□□□
□□□□子□□□惜□重者亦寥寥□□□□□□□□
一□知当敬之原遂致以字纸□总包物□字□□□□□□
踏不检者有之深可惜也良是慨焉故古之善人君子知□□

³⁵⁴ 今天上里镇的人们把这座藏字石库称为“文峰塔”。

³⁵⁵ 上世纪 80 年代，在文峰塔的旁边修建了一座多拱石桥，石桥联结岸上的地方，正好是文峰塔的位置，因此现在的文峰塔就被这座石桥延伸部分包裹起来，只露出上半部分塔身。

³⁵⁶ 2008 年 12 月 17 日拍照

当敬而恐无收藏之所乃建修石库以为贮藏之局以珍□□
 □□□处□□□□从而□效□□古□□□□□□□□
 □□□人劝□之意至深□□如□五□□□□□□□□
 □□□四□□□□两岸□□□无锁□□□□□□□□
 □□财源兴□□□□□□□□□□□□□□□□□□
 以□方里之□□一因财源以为藏字之宝库更□□□□□
 更为数人之□实以□□众姓之□缘也□众善乐□□□□
 俾一方之人咸知之宜惜焉是以为序

面之三:

右: 大清同治五年岁次丙寅

文光射斗

左: 仲夏月二十日谷旦

面之六(对联,从第二层起,从下往上):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左: 无上大宗师

左: 财源由是来

左: 单看心田

注: 无法看清

右: 人间真父母

右: 文风自然起

右: 须凭阴德

修建这座石库共有 114 人捐资, 捐资金额约计 45160 文。韩秉成即韩深文,《韩氏宗谱》载:“邑武库生, 援例授营千总职, 榜名秉成, 字彝斋, 生嘉庆丁巳年十一月二十一亥时”。六品衔韩澄为韩廷儒之子。五甲口场韩氏仍是这次捐资较多的大户。这些出资人员, 基本在上里五甲口场为中心的地域范围之内, 东面远至名山县, 南面至陈家岗(陈绍基), 西面至箭杆岭(黄氏)。绅士(包括吏员)共 12 名, 占出资人数的 10%, 出资额占总金额的 17%。修建藏字石库并不意味着上里的字纸到处都是、多到需要修石库“藏字”, 这是咸同动乱后重振人心的公共活动, 绅士庶民抱有极大的热情来参与捐资, 修建藏字石库再次成为联络五甲口场各处士庶人等的重要方式。

如果我们把咸丰六年(1856)建修磐安桥的名单与同治五年(1866)建修藏字石库的名单作一个比较的话, 我们会有以下发现: 咸同动乱之后, 水东乡上里的社会经济持续衰退, 然而其社会秩序则保持相对的稳定。

表格 8 磐安桥与藏字石库出资比较表

出资金额等级	磐安桥出资人数	藏字石库出资人数
2000文以上	16	1
1200文	10	5
1000文	38	11
800文	5	0
600文	28	0
500文	18	17
400文	35	0
300文	不详	41
240文	不详	8
200文	不详	51
合计	约280	134

同治五年（1866）水东乡上里仍是一个秩序井然、结构稳定的四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员倡导尊重文化、敬重文字的社会风气，提倡多培养善心地，多做善事，多积阴德，参与建修石库的农、工、商民（不光有男性，还有两位女性）则紧随绅士其后，认同这种价值观念和受到道德教化。在上里五甲口场范围内，既有以耕种为业的人群，又有以经商为业的人群，还有以工匠手艺为业的人群，他们都强调读书识字，崇敬文字，这实际是希望追求文字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正如石匾提到的“保财茂”、“门第高”、“好儿孙”、“求荣华”，具体期盼可能就是儿孙读书科举考试成功或者发家致富。儒家能带给人们现世财富与社会权力，绅士们通过提倡敬重文字来满足人们的这种追求与希望，它不同于佛教信仰满足人们有关长寿、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之类的祈求。同治五年（1866），水东乡上里各阶层人群的心里又升起了读书上进的希望，他们既可以农为业续而读书上进，也可以商为业续而读书上进，他们还希望“财茂”。水东乡上里绅士庶民等社会层面的人们对国家秩序正常运转，又重新抱有莫大的希望。通过这座藏字石库，我们可以看到水东乡人群感觉“同治中兴”的普遍社会心态。

同治十一年（1872），芦山岗东面山腰的师姓人家独自出资，在五甲口场通往芦山县的途中小地名叫三宝沱的地方修建石桥，并树立石碑或刊刻文字于岩石上。其文字³⁵⁷如下：

三多桥

³⁵⁷ 2008 年 12 月 27 日拍照并抄录

尝闻修崎岖难行之路，造行人往来之桥。此桥与路，要皆有利于人也。然既有利于人则不修，不能济人；既□修，则募化以为功。合众姓以为之，不若自为之，乃云有益□也。庭修桥与路，其桥名三多。

桥上通芦城，下通名邑。每年五六月间，河口涨流，农工商贾往来，行人接续不断，恒多阻滞焉。予发心原，非为□非要□，不过使人口共行坦平之路，不至有深历浅揭之忧，而予心使快焉。

建造师元贵李氏 男 师□□

石匠任运昌

同治十一年仲春月廿八日谷旦

同年仲夏，师姓另一户人家又在三宝沱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五福桥”，并刊刻一座观音像于岩石上，旁书³⁵⁸：

同治十一年仲夏月日吉 石匠 任运昌

五福桥

建修师元富 男步云、青立

师姓人家地处五甲口场通往芦山县的茶道中间位置，只要经过他们住处的人货两旺，他们就可以通过辅助性劳动从中获得部分利益，这是他们独立承担修桥的经济因素。这显示了咸同动乱之后，水东乡上里通往打箭炉的茶叶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咸同年间水东乡这些地方公共建设活动，的确具有某种地方自治的性质。然而，这一时期水东乡地方自治因素并非外在于王朝国家，并非与国家权力相对立，它们是维护清王朝政府统治的重要力量。这些地方自治性质的公共活动，是由拥护清王朝政府统治的在乡生员阶层领导的（尽管这些生员可能会谋求私利），这些活动不光提倡善行，更是在实践善行，推崇清王朝的科举制度，教化乡民心地善良、有道德、服从权威，这些活动维护了乡村正常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观念，有利于清王朝政府统治。

³⁵⁸ 同上

在乡生员阶层形成的原因

从经济上来看,水东乡地处川西群山之中,它通过漫长茶道,把水东乡与西藏茶叶总市场打箭炉联系在一起,西藏长期较稳定的茶叶需求,使得水东乡经济亦长期稳定发展。从社会阶层来看,水东乡在这种面向西藏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逐渐孕育出生员阶层。整个明清时代,水东乡没有一名在科举考试中通过殿试产生的进士(上里杨调元为岁进士;中里杨立程为恩进士,且他的户籍不在水东乡)。乾隆时期中里杨氏培养了两名举人都离开了水东乡,并没有在水东乡本地有更多的活动。道咸时期,水东乡经济辉煌时代相继产生了韩秉成(武举)、韩腾蛟(武举)、陈殿颺(武举)和韩廷璠(文举),以及众多的文武生员。咸丰后期至光绪末年,水东乡则没有举人出现了,但是还有一大批的文武生员相继产生。

通过前文所列举的碑记,我们可以看到水东乡长期保持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员阶层。当我们从王朝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个阶层的人的功名都很低,最多不过就是举人,更多的则只是文武生员(包括捐纳);然而,当我们从水东乡本地人群的角度来看,能够考试入学成为府、县生员的,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文武生员在水东乡是非常有身份和地位的阶层³⁵⁹。

关于生员阶层形成的原因,我们以水东乡上里张氏和韩氏为例加以讨论。

咸丰五年(1855)张怀珍在其曾祖庠生张懋贤坟墓的旁边预先修好了自己的坟墓,并撰文立碑。通过张怀珍的碑文,我们可以考察上里张氏与水东乡其他姓氏人群的婚姻关系。其碑文³⁶⁰如下:

父国学,讳性,氏杨,本里杨家岗讳天相公之女,庶妣邛州西门王家坝讳泽璋公之女,生女四男二。长适陈家岗、庠生绍基之母;次适彭家山讳增宁;三适陈家沟耆老讳志裕;四适陈家(土扁)讳大业。兄讳琨。

予姊妹兄六人,均系嫡生庶母抚养,与嫡母无二。予讳珍,生于丁巳年二月初二亥时,幼配黄氏,生于乙卯年正月廿一吉时,系后凹黄讳

³⁵⁹ 关于生员的一般政治身份和政治特权,请参见张仲礼著、李昌荣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2002年第4次印刷,第一章,第五节“绅士的特权”。本文所说的“生员阶层”,相当于张仲礼先生划分的“下层绅士”。

³⁶⁰ 2009年1月2日拍照并抄录

廷取公之女，无嗣，继娶马氏，生于壬戌年十月十一吉时，系名邑方家岗马讳维信公之女，生子三女二。长适杨家湾讳国谋；次适名邑李家湾讳先成；长男一隆，李氏，系名邑李家湾讳恒义公之女；次一德，杨氏，庙下庠生讳奇芳之女；三一栋，田氏，下里田家山讳绍忘之女。

男三女二，黄氏在日抚养，费尽千辛。但予自顾一生庸碌，不能光显门庭，爰作俚语，以示后。

曰：

间来蒙业愧无功，只望儿孙一派同。

孝友传家书教子，炽昌俾尔著休风。

上里张氏从乾隆年间开始，就频繁的向外移民，移居方式为一个家庭整体搬迁，移居方向为名山县、建南（西昌）³⁶¹，八甲杨氏在乾隆初年也有移居名山县的情况。这种人口向水东乡之外流动的方向，与同时期四川东部“湖广填四川”的人口流动方向恰恰相反。其原因在于，明末清初的四川平原动乱并没有中断水东乡社会，经过 100 年的发展，水东乡的人口增长很快，向外输出农业人口，则成为乾隆时期的水东乡农业人群流动的普遍现象。

张怀珍这辈（四女二男）生活时期在嘉道咸年间，其婚姻关系如下：张怀珍的姐姐嫁给了陈家岗陈氏，庠生陈绍基称张怀珍为舅舅。张怀珍的其他三个姐姐分别嫁给了陈家沟、陈家扁的陈氏、彭家山的彭氏，这些姓氏人群分别在上里场和中里场范围之内。张怀珍的第一个妻子为水东乡后凹黄氏（来源于箭杆林黄氏），第二个妻子则是名山县人。张怀珍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中里杨家湾杨氏（即中里八甲杨氏），次女嫁到了名山县李家湾，长子的妻子则来自名山县李家湾，次子的妻子为庙坪杨奇芳（即撰写杨宗仕碑文之人）之女，三子的妻子为下里田家人。

从张怀珍子女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知道，上里张氏与庙坪杨氏、中里八甲杨氏、上里陈氏、下里田氏有姻亲关系。可以说，张怀珍子女的婚姻关系遍布了水东乡上里、中里、下里，还与水东乡东面（罗绳岗以东）名山县的李氏联姻。通过这种婚姻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水东乡人与东面的名山县、东北面的邛州联系紧密。道咸年间，水东乡的婚姻关系已经有超出基层市场范围的倾向。嘉道时期

³⁶¹ 据咸丰三年（1853）重立张懋贤墓碑，此处从略。

水东乡多因婚姻关系而产生农业人口的流动。在水东乡的各姓婚姻关系中，除了芦山岗黄氏和师氏偶然有与芦山县姓氏联姻纪录之外，我们较少从墓碑、宗谱上看到水东乡人与西面芦山县人保持婚姻关系及其迁徙纪录。

张怀珍的父亲为捐纳的监生，张怀珍本人一辈子都没有考中秀才（并非生员），内心无比的遗憾（即“间来蒙业愧无功”之语）。张怀珍的姐姐、张怀珍的儿子，都与生员之家建立了姻亲关系。

让我们再来看上里韩氏韩腾蛟（廷钧）和韩廷钊的例子。同治十三年（1874）韩腾蛟碑记³⁶²如下：

孝廉韩公腾蛟碑记

配妣氏陈，启虞公之女，同榜举人陈殿颺公之姐也。

公讳腾蛟，字水生，邑国学光斗公长子也。赋姿魁梧，自幼气勇过人，有不凡概乡。先辈多以名将才许之故，去文就武，娴于弓马。弱龄而拔幟童军，后以甲午科乡试，鏖战而登高魁。当时宗工哲匠咸优奖焉，以为可应干城选。公更豪气遍迁，欲步南宫。奈北上两试困蹶未售，公实隐憾焉，即识者亦深为公惜。而公壮志因稍减矣，遂淡于仕宦，旋归梓里，以就终养至亲，丧毕，又为祖妣杨老太宜人请旌建坊，不惜千金。可谓大本克敦者矣。又其最者，体父志以承家，基业更增于廓大。而同怀诸弟体恤备至，同居共爨，悉孟教养。文则延师谋训，武则亲为教习。游武洋者韩公济川也，叨廩禄者韩公廷钺也，入成均者韩公廷钊也。不憚此也，及侄辈亦皆训以义方焉。而成名者，则有文库名贞，武库名政，弟侄诸人，文经武维，济济一堂，何非公之所克成也乎。夫固吾乡中名孝廉也。

公子名泽，亦入国学。孙三人，长曰树椿，次树楷，幼曰树械，亦见爪鬣之绵焉。至若急公好义，公也有焉。昔蓝扰乱，公整练团勇，费金千余，绝无难色，而一乡得以保全，是皆公之力也。后县主何以其事闻于上，蒙加五品蓝翎，以奖公焉。公诚卓卓者哉。至敦品励节，无待言矣。予亲近有素，虽未深悉其详，聊述其概，以著于石

清之同治甲戌年春三月望府学廩膳生内侄孙陈荣宗拜撰并书

³⁶² 2008年12月30日拍照并抄录

韩腾蛟两次进京会试不中之后，“体父志以承家，基业更增于廓大”，主持家族的输藏茶叶、布匹贸易，并且取得更大成绩。以此经济为基础，上里韩氏相继培养族人入学。道光朝以来，上里韩氏已上升为水东乡最大的士家大族，他们远超过了老姓中里八甲杨氏和上里陈氏。宗族是培养生员阶层的重要社会组织。

同治十三年（1874）韩廷钊墓碑文³⁶³如下：

先大人讳廷钊，字希，太学生，曾祖晚公、旌表节孝曾祖妣杨之孙；祖述文公、祖妣许、杨之次子也。先大人兄弟共七人，祖妣许脉生伯父廷钧、榜名腾蛟、甲午举人，与先大人。祖妣杨脉生叔父廷钟、济川武庠、鏊、鎬、钺廩膳。先大人始配慈妣张，雅城张洵公之女、文举张肇棠公之妹也。脉生女二，长适雅城文生焦光昱，次适名邑监生邓绍孟。妣后因产故，葬于九曲水。继配慈母王，后盐溪者勋公之女、贡生廷彦公之妹也。脉生男等六，清、泾、洮、沅、洙、涪，女二，长适名邑季发珍，次适高朝杰。洮自幼与钟叔承祧，短折。镇叔复无出，伯叔命沅、涪承嗣。

先大人生平性孝友、品磊落，博通经史，寄情诗酒，素爱琴瑟，兼晓武事。文武两考历十余试，俱在前列，惜未售而纳监焉。复精医术，明地理，乡中人每患疮疽，施药调理，决不望报。修墓于斯，即所自择也。且与伯父共承祖父遗训，二十余年事伯父极恭，因劝勉诸叔父，怡怡一堂，而家道昌达。惟己功名事，深自憾焉。中年来遂以其事嘱望清等，迫欲即见，或文或武，虽延师课，犹自苦训。岂意诸事过于勤劳，忽于咸丰九年七月告终。临终时谆谆以清、泾等功名付托慈母王克成。

自慈母受先大人重托以来，清等俱幼，寝不安枕，食不甘味。不幸又遭蓝逆扰乱，悉各分居。先不过以功名事累吾母，后更以家事累吾母。此诚任大责重也。而吾母生性刚正，居家严明，多识古今格言，朝夕训导，每言及先大人时，惨然下泪。昼则营谋家事，夜则教训子孙，数年饮食辄废，幸赖维持。家悉顺遂，武则泾于同治二年入胶庠，文则清于同治九年游泮水。虽由先大人生前教训所致，甚赖老孺人多方克成之力也。且最劳心劳力者，莫如家中琐事。清配刘氏，先大人尚在。至泾配

³⁶³ 2008年12月30日拍照并抄录

王氏，洙配吴氏，次妹于归，又为泾纳妾，一切事务皆赖老孺人之亲自
检点。况始分居，冠婚四次，进学两名，家无余费，更赖老孺人之善为
调停。而老孺人所望清等者，更有进也。噫！以母兼父母之心，苦矣。
百年后可对先大人于九泉下矣。后世子孙临山思慕，虽不能见祖父母之
身，犹见祖父母之心。嘉言懿行，垂诸石助，流芳于不朽云。

同治拾三年甲戌夏四月初九日 男 清谨述 泐敬书

清 泾 榜名 贞 政

生员阶层形成的另一途径，就是生员家庭在婚姻关系上尽量保持门当户对。韩廷钊是捐纳监生（即太学生），他的婚配关系及其四个女儿的婚配关系，都能反映出这个特点。韩廷钊可以娶雅安县城内的女子，他的女儿也可以嫁到雅安县城去，然而韩廷钊及其儿子，则没有搬入雅安县城居住。韩廷钊一辈子参加了十多次的文武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上秀才，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儿子的功名前途。象上里韩氏这样富裕的家庭，科举考试也并不容易，那些经济条件稍差的家庭，培养一个生员，更是不容易。直到韩廷钊的儿子韩泾、韩清相继考上武科生员、文科生员后，他的儿子才觉得可以报答父母于九泉。韩泾、韩清入学，简直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们把这些功劳和荣耀归因于父母，“虽由先大人生前教训所致，甚赖老孺人多方克成之力也”。至少在这通碑文里，我们没有看到韩泾、韩清对自己只是生员而不满或者抱怨，他们已经非常知足于生员身份。

张仲礼先生认为：“还有种迹象表明，绅士总倾向于移居行政驻地，绅士地位的上升往往与其移居更重要的市镇有关。”³⁶⁴张仲礼先生指出的这种倾向的确存在，我们在咸丰六年（1856）磐安桥碑记、同治五年（1866）的藏字石库上并没有看到韩清（榜名贞）、韩泾（榜名政）的名字，可能他们都移居雅安县城。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在以上两个碑文中找到文生陈绍基的名字。即使移居到雅安县城的生员，因为家庭成员与水东乡的姻亲关系，也有可能与水东乡保持着密切往来关系。我们还能通过各种碑文看到生员在乡间的种种活动（题字、捐资、组织建桥、申建节孝坊），这表明在水东乡居住着相当一部分在乡生员（包括致仕的绅士，如韩大成），他们并没有搬入雅安县城。虽然水东乡生员修桥等活动，

³⁶⁴ 张仲礼著、李昌荣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2002年第4次印刷，第55页

并没有超出张仲礼先生归纳的绅士职责³⁶⁵，然而，我们通过张仲礼先生有关绅士修建桥梁的举例³⁶⁶，无法分辨出绅士在城还是在乡。

清代水东乡从乾隆末年就开始陆续出现地方公共事业建设，如此小的地域范围内出现这么多的地方公共事业建设（以及奢华坟墓和墓碑），这在其它地方是较为少见的。正是在长期输藏茶叶贸易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这么一个稳定的生员阶层，水东乡的社会才会呈现出秩序井然的四民社会，文风兴盛，公共活动众多，道德教化富有成效。生员在乡，而且形成生员阶层，这是清代水东乡地方公共建设事业颇有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水东乡的生员阶层是科举制度、捐纳制度与众多乡民、生员自由选择交织而成的结果。没有科举制度（以及捐纳制度），水东乡就没有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就不可能产生生员（以及捐出身的监生）；所有生员都选择移居县城，或者生员家庭之间的没有婚姻选择以及没有地方公共建设活动，生员阶层都无从形成。清代水东乡的例子则表明，王朝制度与地方人群的自由选择，都是地方阶层形成的重要因素。Leach 认为“有时，社会结构最好被看作是多种多样的个体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选择结果，而不是法律上的规则”，Murdock 则更进一步地认为，连法律上的规则都是多种多样的个体选择的结果。³⁶⁷尽管 Leach 和 Murdock 带有强烈的达尔文进化论色彩，不过他们的看法还是有助于我们从“选择”的角度理解清代地方生员阶层形成的机制。

³⁶⁵ 同上，第一章，第七节，“绅士的职责”

³⁶⁶ 同上，第 60 页

³⁶⁷ G. P. Murdock: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Quadrangle Books, Chicago, 1960, p9

	水东乡产生的士人	所在姓氏	资料来源	资料地点			
嘉庆朝	生员陈继虞	上里陈家山陈氏	嘉庆六年陈永晖墓碑	上里镇四家村陈家山			
	生员陈相虞						
	生员陈肖虞						
	生员陈业虞						
	举人陈希虞						
	生员陈祖虞						
	文生英文通				上里箭杆林黄氏	嘉庆十五年潮江河碑	上里箭杆林村
	国学生张性				上里张氏	嘉庆十七年张性墓碑	上里镇七家村
邑廪生陈大桂	不详						
道光朝	生员杨奇武	庙坪杨氏	嘉庆十六年杨如璜墓碑	上里镇庙坪村			
	廪生赵维新	中里赵氏	嘉庆二十四年子母庙碑记	中里镇龙泉村			
	监生韩七	上里韩氏	道光四年上里韩氏匾额	上里镇四家村			
	生员杨泽霖	上里杨氏	道光十一年宗支碑	上里镇治安村杨家沟			
	武举人韩大成	上里韩氏	道光十二年韩氏匾额	上里镇五家村			
	武举人韩腾蛟		韩氏宗谱，道光十四年	上里镇五家村			
	武举人陈殿燧	上里陈家山陈氏	韩氏宗谱，道光十四年	上里镇五家村			
	文生陈奉韶		道光十五年陈翟氏节孝坊	上里镇四家村陈家山			
	庠生韩廷儒	上里韩氏	道光十九年双节孝坊	上里镇四家村			
	庠生杨奇芳	庙坪杨氏	道光二十五年杨宗仕墓碑	上里镇庙坪村			
	廪生杨福基	上里杨氏	道光三十年杨枝玉墓碑	上里镇五家村			
	咸丰朝	武庠生韩秉成	上里韩氏	咸丰六年磐安桥碑记	上里镇五家村		
		禄劝县知县韩廷璠					
		正八品韩廷瑛					
监生韩澄							
正八品韩廷佐							
监生韩泽							
文生陈绍基		陈家岗陈氏					
武生韩振先		上里韩氏					
同治朝	武庠韩政	上里韩氏	同治十三年韩廷钊墓碑	上里镇四家村			
	庠生陈继昌	中里陈家沟	陈志裕同治四年墓碑	中里镇建新村			
	廪生陈光耀	不详					
	监生韩廷鼎	上里韩氏	同治五年藏字石库	上里镇四家村			
	武生韩振林						
	武生韩定邦						
	文生杨含章						
	文生邓为林	不详					
	文庠韩贞	上里韩氏	同治十三年韩廷钊墓碑	上里镇四家村			
	光绪朝	监生张维泰	上里张氏	光绪二年宗盟碑	上里镇七家村		
武生张树良							
武生张腾蛟							
监生张一星							
文生黄坤		上里箭杆林黄氏	光绪四年积福桥	上里镇箭杆林村			
文生郑永升		中里郑氏	光绪七年中兴桥碑记	中里镇郑湾村			
武生郑永嘉							
千总郑国玺							
文生张必达		上里张氏					
监生杨宗汉		不详	光绪十二年二郎桥	上里镇共和村			
文生康兰薰		不详					
武生张维泰		上里张氏					
武生杨万祥		不详					
武生杨全口		不详	光绪三十四年祠堂碑记	上里镇六家村			
监生刘汉英		上里刘氏					
民国初年		前清文生杨绳锡	中里八甲杨氏	民国五年中和桥	中里镇建强村		
	中学生杨佑涂						
	前清武生韩柱	上里韩氏	民国六年福善桥	上里镇白马泉村			
	前清文生杨攀华	上里杨氏					

表格 9 嘉庆朝以来水东乡士人统计表

第三节 “麻城县孝感乡”的传播

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大量人群的后代，多声称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粤东地区很多客家姓氏谱牒都称自福建宁化石壁来³⁶⁸。

³⁶⁸ 罗香林：《宁化石壁村考》，罗香林著：《客家史料汇编》，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77-387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广泛流传着源自南雄珠玑巷的传说³⁶⁹。华北地区则广泛流传源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³⁷⁰。这些传说包含了部分的历史事实,然而更多的却带有传说性质的虚构历史记忆³⁷¹,其形成与流播的具体过程,常因为材料不够,很难实证。

如果翻阅四川的方志和家谱,则常会遇到追溯祖籍为“麻城”或“麻城孝感乡”的情况,如:“先生严姓,讳履泰,字衷介,其先湖广麻城人”³⁷²,“南溪经明季丧乱,土虚无人,康熙之际,粤闽湘赣之民纷来占插,而以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为最夥”³⁷³、“我始祖赵公讳芳,本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之大族世家”³⁷⁴,“(德阳县)张氏,其先湖北麻城孝感乡人”³⁷⁵。川北仪陇县的大量族谱也有这样记载³⁷⁶。祖籍“麻城县孝感乡”固然包含有部分的历史事实³⁷⁷(其实还有待讨论),然而在四川它更多却具有传说的性质。过往讨论四川地区明清历史过程中,祖籍“麻城县孝感乡”常常成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依据而被引用³⁷⁸。另一方面,一些质疑性的文章也相继出现,并形成了逃税说、冒籍说与从众说³⁷⁹。

事实上,由于“麻城县孝感乡”传说出现的时间较晚,留下相对多的材料,我们有条件进行过程的讨论,把“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看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扩散过程,注意这一传说什么时候在哪里开始兴起和具体如何传播,在使用族谱中

页。承蒙同年陈景熙惠赠,特此感谢。

³⁶⁹ 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6期

³⁷⁰ 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1期

³⁷¹ 刘志伟教授较早提出这类祖籍说法是一种“历史记忆”。请参见:刘志伟:《‘移民’——户籍制度下的神话》,《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5期,香港科技大学出版技术中心印制,2001年10月15日

³⁷² (光绪二年)胡锡祐、冯宗翰等纂:《庆符县志》,卷四十九,艺文,丰都翰林易简:《严衷介墓志铭》,《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35,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年,第673页

³⁷³ (民国二十六年)钟朝煦:《南溪县志》,礼俗篇第八,下,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31,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年,第611页

³⁷⁴ (光绪九年)《赵氏家谱序》,祝世德纂修:《汶川县志》(民国三十三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66,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年,第634页

³⁷⁵ 佚名:《德阳县乡土志》,氏族,清末修,民国刻本,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³⁷⁶ 常建华:《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7页

³⁷⁷ 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麻城孝感乡》,《寻根》,1997年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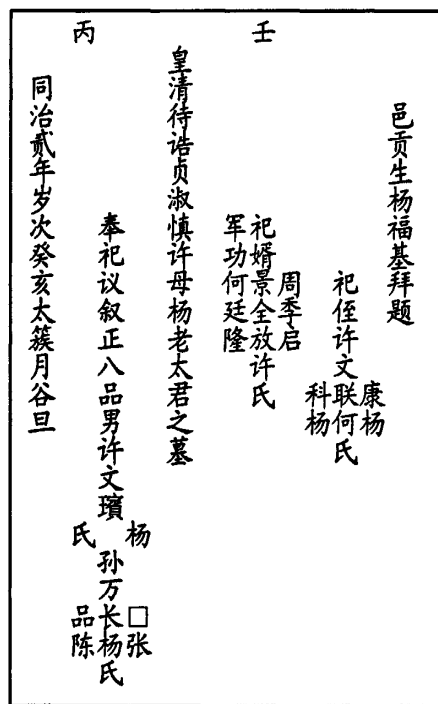
³⁷⁸ 胡昭曦先生认为明代已有湖广籍人移入四川,其证据大多是咸同以后所形成的家谱,其中大部分家谱都声称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请参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79页;蓝勇教授则仅据方志记录来做清代四川地区移民籍贯的地理分布的统计和讨论。请参见:蓝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2期;孙晓芬认为“‘麻城孝感’是一个祖籍记忆的人文地理概念”。请参见:孙晓芬:《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³⁷⁹ 黄友良:《明代四川移民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期;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世松:《“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6期;雷兵:《清代“湖广填四川”质疑》,《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4期

的说法时，首先应考虑到族谱的产生过程³⁸⁰。这种过程研究，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明清四川社会历史，也有利于重新观察全国各地不同时代的传说传播机制和区域社会的历史内在脉络³⁸¹。

水东乡逐渐形成了在乡生员阶层，水东乡免于蓝大顺、李永和起义（“兵、贼”）直接伤害，四民社会结构完好，这三重因素促使水东乡各姓人群在重建祖先历史过程中出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是“新”的，主要相对于乾隆年间相继出现的宗支碑而言。

同治二年（1863），上里许氏第一次树立墓碑以整理世系³⁸²。这通墓碑正面和背面文字³⁸³如下：



背面：

从来世系之流传，有记与前，方能有志于后也。故莫为之前，虽盛弗传，莫为之后，虽美弗彰。是以有创于前，尤赖有继于后也。

即如我始祖许大材，何氏、周氏，本湖广荆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

³⁸⁰ 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王鹤鸣等主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

³⁸¹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³⁸² 目前，上里镇许氏把这通墓碑纪录作为他们整理世系的基本材料。

³⁸³ 2009年2月8日拍照并抄录

扁人氏，同母张氏迁居四川洪雅县白塔山居住，后又迁居雅安县水东乡罗城上里玉皇庙许家湾创业。始有我二代祖许正贤，李氏；生三代祖许国禄，杨氏；生我四代祖许应藩，杨氏；生我五代祖许朝阳，杨氏；生我六代祖许登林，丁氏；生我七代祖许天元，杨氏；生我祖弟兄三人，长房宏梅，胥氏，么房宏恩，朱氏，二房我祖宏桃，张氏；生我父弟兄三人，大伯许崇仕，胥氏，二伯父崇永，杨氏，我父崇昌，杨氏；生男文瓚，杨氏；生五子，长万寅，张氏，次万长，杨氏，三子万品，陈氏，四子万隆， 氏，五子万德， 氏。

瓚非敢自为张大，亦不过誌先代之姓氏，祖宗之由来，传于后裔，俾后人知木本水源之自来也。是以为序。

（下略）

这通墓碑让我们看到了本地产生的官员与地方士子的重要活动。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墓碑中整理世系的纪录已经不再像乾隆年间那么简陋，开始出现大段的文字叙述，而不是简单的人名排列。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其后水东乡各姓树立的墓碑上。许文瓚给母亲（许杨氏）树碑重要的原因在于，许文瓚议叙正八品官了。据许大龄先生研究，“捐生欲得实官，或先捐职衔，随后再照衔议叙，逐次报捐分发，作为候补。”³⁸⁴许文瓚议叙正八品，与上里韩氏韩廷佐应该是一样的，即由捐纳而得实官。许文瓚母亲姓杨，墓碑正面由上里杨氏族入杨福基³⁸⁵题写，上里许氏与上里杨氏具有姻亲关系。

有关上里许氏的祖籍来源和世系纪录，许文瓚与杨福基可能在一起商量过，甚至有可能是杨福基给许文瓚撰写了这篇碑文。因为杨福基在道光三十年（1850）给杨枝玉题写墓碑时，墓碑背面就有“由广入川”的说法，他把更具体的提法“湖广荆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扁”³⁸⁶写入上里许氏的祖籍来源，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在整理这篇世系纪录时，显然参考了上里许氏墓地墓碑。许正贤、许国禄有墓碑³⁸⁷，他们在许正贤的前面，添加了一个没有墓碑的父亲“许大材”，并把许大材与寡母张氏来水东乡的故事虚构了一遍，作为上里许氏迁徙进入水东乡的起祖。

³⁸⁴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³⁸⁵ 道光三十年（1850），杨福基给杨枝玉题写过墓碑碑文。

³⁸⁶ 这一祖籍提法最早来自名山县庠生杨奇伟，请见第二章，第二节，乾隆四十七年（1782）杨氏宗支碑。

³⁸⁷ 请见第一章，第二节

同治年间上里许氏整理的祖籍来源与祖先世系纪录，带有浓厚的清初“湖广填四川”集体迁徙记忆的痕迹。其理由在于，按照许文瓚与杨福基整理的世代数推算，上里许氏是明末清初迁入水东乡的。事实上，许文瓚与杨福基并没有完全考察上里许氏墓地的墓碑，他们遗漏了许氏墓地中一通非常重要的墓碑，这通墓碑的位置并不在许正贤、许国禄墓碑的山头，而是在距许正贤、许国禄墓碑约400米的另一个山头墓地³⁸⁸，其碑文³⁸⁹如右。

日	寿	月
癸山丁向千秋□	明考□□□ 妣余氏大之墓位	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吉

上里许氏定居于水东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而并非明末清初。显然，清初“湖广填四川”的集体记忆流传到水东乡士子耳朵里，他们接受了这种传说，并按照这个传说模式整理了自己祖先世系纪录。

同治十年（1871），居住在箭杆林的黄氏，树立一通墓碑，其碑文³⁹⁰如下：

丁	癸
同治十年辛未十月二十	雅邑贡生杨奇芳题
祀男德善罗氏孙国	皇清待赠仁厚显考黄公讳文清杨氏老人三星之墓
青富学桂魁钦院斌	

背面：

本我祖之辉映，是吾门之嘉幸也。本属湖广五昌府麻城县孝感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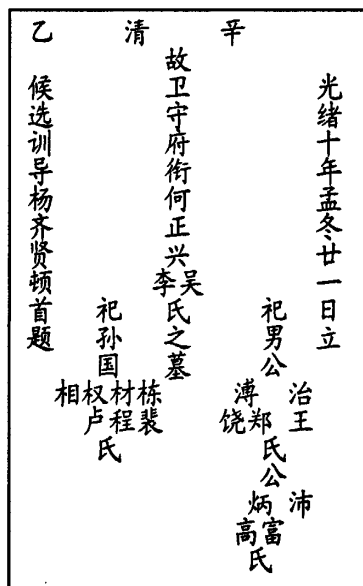
³⁸⁸ 同治二年（1863）三月，许文康还在这个墓地里树立了他父亲许崇仕的墓碑。这块墓地并没有荒弃。
³⁸⁹ 2009年2月8日拍照并抄录
³⁹⁰ 2008年12月25日拍照并抄录。目前，上里镇黄氏仍然把这通墓碑当成他们的宗支碑。

迁流古郡，托业汉嘉，数十年间分移瀑水，四五代内，嗣承骆张，虽其门名氏异，而衣食饶足，子孙繁衍，无非我祖之醞釀所流露、积累所祥者也。

(下略)

箭杆林黄德善、黄德扬两兄弟“不忍渊源后裔荒坠”，请“雅州府吏员黄永昌”撰写背面碑文，请庙坝杨奇芳题写墓碑正面，专门树立墓碑整理宗支世系。根据字辈排行来看，黄永昌为箭杆林黄氏成员；根据黄文清的一位妻子杨氏，庙坝杨奇芳与箭杆林黄氏有姻亲关系。箭杆林黄氏接受了“麻城县孝感乡”祖籍传说，应与杨奇芳有很大关系³⁹¹。吏员黄永昌与贡生杨奇芳肯定相互认识，在撰写碑文过程中，黄永昌可能请教过杨奇芳，因此他才把“湖广五昌府麻城县孝感乡”写入了黄氏的祖籍来源。

光绪十年（1884），水东乡中里何家湾何氏树立墓碑一通，其碑文³⁹²如下：



楹，沈氏；生应文，黄氏、刘氏，公父母也。

公季十五即分爨，弃书务农，暇即业陶朱，跋涉险远，家遂舒，置田舍甚广，周甲时照入粟例，补卫守府，因老不就，给荣身。其一生事难枚举，特述其巨者。德配吴，邑之宾公女也，子三。继配李，名邑忠福公女也，子一。凡公之事，两孺人实成之。以今孙曾绕膝行看，世代簪缨焉。时光绪甲申孟冬廿一之吉谨。

(下略)

墓碑主人何正兴早年非常勤劳，农商兼理，逐渐致富，他在六十周岁时，捐纳了一个“卫守备”的虚衔（即“周甲时照入粟例，补卫守府，因老不就，给荣身”之语），这是他立碑的原因。何正兴生有4个儿子，6个女儿³⁹³，其中一名女婿和一名外孙是生员。何正兴的墓碑碑文由“候选训导杨齐贤”撰写和题写。也就是说，何氏的祖籍源流，是由外姓人杨齐贤书写的。“麻城孝感”通过撰文和题碑的方式进入了中里何氏的祖籍源流中。杨齐贤书写何氏祖先的迁徙路线和小地名，与杨奇芳道光二十五年题写杨宗仕墓碑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从此，“麻城孝感”进入中里何氏有关祖先的记忆之中。

光绪二十年（1894），上里任氏树立一通墓碑，其碑文³⁹⁴如下：

本里太学生愚内弟蓝炳林拜题

清故醇厚处士任公讳文钊老孺人之坟墓

祀婿卢盛然 郭永通 许世荣

祀男泰 克昌 卢氏孙国栋 桂曾 梁孙 嘉禄 敬立

大清光绪甲午年应钟月谷旦

背面：

³⁹³ 何光赞老人（74岁）指着墓碑上的“么女”二字，告诉我：“么女是早死了的。”（时间：2009年5月4日，地点：中里镇）

³⁹⁴ 2009年1月3日拍照并抄录

始祖讳 都，系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土桥沟慈竹岩人氏。明永乐年避贼入川南雅安县慕义乡子林沙坝头，迁河北街，娶妣氏朱，后又迁芦山县七元乡；二世祖讳 珖，都公之子，有功于国，官拜一等；三世祖讳 碧宗，氏朱，珖公之次子，后仍迁雅邑罗绳方家扁，次子万乾，氏张；四世祖讳 万冠，氏赵，宗公之长子；五世祖讳 金珠，氏杨，冠公之子；六世祖讳 守祥，氏郑，珠公之子；七世祖讳 谨，氏张，祥公之子；八世祖讳 应孔，氏刘、杨，瑾公之子；九世祖讳 玉焘，氏袁、杨，孔之第六子，兄弟六人，长玉琨，次玉琮，三玉瑯，四玉環，五玉珠；十世祖讳 大启，氏刘，焘公之抚子，系本境地沈家壩沈曰璋之第三子。焘公抚为己子承祧；十一世祖讳 彦秀，氏蒋，启公之长子，兄弟二人，弟彦寿，氏杨，生子文银；十二世即文钊公，氏蓝，本里蓝公宗仕之女、监生炳林之胞姐，生子一，未成，女二，长适郭，次适胡。又氏杨，亦本里杨公连坤之女，生子女各二，长女适卢，次适许，长子泰昌，卢氏，次克昌，张氏，孙已有三，济济一堂，亦见瓜瓞之绵焉。

（部分略）

大清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十月十二吉日

建

上里任氏能够立碑的原因是，墓碑主人任文钊的内弟蓝炳林是监生。任文钊的祖籍源流和世系纪录，由“内侄孙蓝映奎”撰写。“麻城县孝感乡”第一次进入上里任氏的祖籍源流之中。另一个问题是，墓碑主人任文钊的爷爷实际是水东乡沈家坝沈曰璋的第三子，被任玉焘抱养为承祧子。因此，任文钊有关上里任氏祖先的世系纪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尽管如此，有关上里任氏的宗支世系，目前仅见此碑提及。

同治以来“麻城县孝感乡”祖籍传说在水东乡进一步传播，（以上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撰写墓碑碑文或题写墓碑碑文的姓氏人家，都依靠了外姓生员，他们没有文化实力独自完成这项工作；相关的在乡生员与这些姓氏人家有亲戚关系。这是“麻城县孝感乡”祖籍传说从水东乡杨氏人群扩散至其他各姓人群的关键所在。那些接受了“麻城县孝感乡”祖籍传说的在乡生员，通过亲戚关系去撰写墓碑碑文或者题写碑文，把这种祖籍传说普及到水东乡各姓人群之

中。换句话说，水东乡那些没有能够培养生员或者与生员没有姻亲关系的姓氏人家，他们没有文化实力树立墓碑，也没有人去给他们撰写碑文和题写碑文，祖籍“麻城县孝感乡”就无法在这些人群之中生根。相反，那些拥有祖籍“麻城县孝感乡”的姓氏人群，则代表着他们与生员有着某种密切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优势。“麻城县孝感乡”被名山县庠生杨奇伟引入水东乡后，它已经成为一个固定词汇，被贡生杨奇芳、上里杨氏后人雅州府学廪生杨福基、上里监生蓝炳林等这样的科举入学之人（包括捐纳），在乡村的生活中通过撰写碑文与题写碑文的方式，推广到水东乡各姓人群之中。

祖籍“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的传播还有另外一个途径，那就是在乡士子给各姓氏人群书写清明祭文。中里镇现存一本《随身宝》（民国年间手抄本）³⁹⁵，与咸丰年间的《随身宝》内容对比，两者的祭文部分，除了题目相同之外，祭文的具体内容都不相同。这说明咸丰以来在水东乡流传着很多种版本的《随身宝》。更为重要的是，水东乡的在乡文人还会在此基础上自己创作祭文。其中有一篇“清明祭文”，透露的信息非常重要：

清明祭文

.....

惟我先祖，本系楚人。始祖入川，乐业罗城。后世族繁，大启人文。今有裔孙，又采新芹。沐恩报德，用献牲豚。灵其有知，伏冀来临。

.....

惟我祖籍，湖广麻城。始祖入川，讳曰○○。厥后族繁，子孙绵绵。克光前业，佑启后人。呵护裔孙，○入黉门。念切本源，祭献坟茔。灵若不昧，来格来歆。

.....

据“乐业罗城”判断，这篇祭文并不是从水东乡以外抄录的，而是水东乡的在乡文人自己创作的。这篇“清明祭文”是作为一个固定格式出现的，我们似乎能看到“麻城县孝感乡”传说传播的另一种内在机理。首先，文中圆圈的地方可以根据不同的姓氏，填上具体的始祖名字。其次，文中“又采新芹”，即为“采芹”一词的演化，与“黉门”均指考中庠生（俗称秀才），成了县学或府学的生

³⁹⁵ 2009年1月15日拍照

员³⁹⁶。可见，能配得上这种格式的清明祭文的各姓氏宗支，还必须是有宗支成员科举考试中入学。再次，祖籍湖广麻城的始祖呵护裔孙，后人才能入学，祖籍湖广麻城与科举成功有着必然联系。这篇“清明祭文”范文的出现，意味着“湖广麻城”说法的“群众基础”应该很好，否则这样的祭文就没有市场。这使我们明显感觉到，那些宣称“祖籍湖广麻城”的人群在水东乡的科举考试中有现实优势。虽然我们无法探明到底是掌握民间文本的写字人传播了和规定了“麻城县孝感乡”传说，还是“麻城县孝感乡”传说规定了民间文本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但科举考试与乡间的读书写字之人，在水东乡“祖籍湖广麻城”的价值导向与舆论导向上起到关键作用，这一过程是非常清楚的。

关于这篇“清明祭文”产生的时间，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名雅遭贼记》载：“（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八，杀中里场王乡约及文生杨培基。县主申文进省，因路不通，命差役由中里场转回夹门关。路阻，差役在莲花山一带抢掠人财物，被王乡约把差役当贼匪绑来。县主责云：‘纵认不得差役，难道认不得文书？显系与贼同谋。’收在班房。隔数日，王「杨」培基来城保王乡约。县主问其来期，乃是贼渡河之日，遂与王乡约同杀。”³⁹⁷杨培基即为中里八甲杨氏后裔，据八甲《杨氏宗谱》载：“文生培基，在字派，秀朝六世孙。”《随身宝》抄本保存于中里场范围内，其中的“祭乡约文”提到：“或此蓝贼逆天，曲杀万千，地狱作乱，冥王不安，召公去解散，地府得平安”。可知，这部《随身宝》抄本的部分内容最早可能产生于咸丰十年（1860）三月以后不久。这篇“清明祭文”产生的大致时间，可能在同治、光绪年间。这一时间段，与祖籍“麻城县孝感乡”在各姓人群墓碑上流传的时间段是一致的。

同治以来，在乡生员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阶层，他们领导了水东乡公共活动。这些在乡生员是清王朝政府在水东乡的社会秩序维护者、文化创造者、意识形态灌输者，道德教化的实践者和宣传者。在乡生员通过撰写墓碑碑文、题写墓碑碑文或者编写、抄录诸如“随身宝”之类的范文文本，使用固定词汇“麻城县孝感乡”来描述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水东乡姓氏人群，这就成为一种观念的普及。祖籍地既是宗族文化（宗谱）结构性内容，又是人群地域认同的模式。水东乡各处

³⁹⁶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³⁹⁷ （佚名）《名雅遭贼记》，《近代史资料》总50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3页

人群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祖籍地，那么他们在这片地域范围内就达成了某种共识，具有了某种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成为一个可以相互合作、相互体谅的共同体人群。水东乡的在乡士子之间已基本认同祖籍具体到“麻城县孝感乡”是具有优越感的，赋予某姓氏“麻城县孝感乡”的祖籍追溯，即表明该姓氏科举入学有人。通过科举入学的读书人家族，则是与清王朝正统性保持高度一致的人群。在水东乡，从某种程度上说，“麻城县孝感乡”是社会身份和文化权力的炫耀。“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的普及，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清王朝在人员迁徙流动极大（湖广填四川）的四川逐步确立正统统治地位的标志之一，也是水东乡社会共同性的显著特征之一。

麻城县孝感乡的祖籍传说早在乾隆年间就在水东乡杨氏族人间传播了，为什么它在同治年间则迅速传播到其他姓氏人群中去了呢？刘志伟教授分析广东地区南雄珠玑巷传说的原因时，其中提到一条“从无籍变为有籍”的过程，这种过程与明中期黄萧养之乱密切相关，“乱事平定后，明朝军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村搜查，要分辨谁效忠国家，谁是叛乱者。当时，很多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叛乱者，便要证明自己是拥有户籍的。”³⁹⁸水东乡同治以来开始迅速传播麻城县孝感乡祖籍传说，是否与蓝李起义有关呢？

清初福建、江西、湖广等省大量移民四川，当时就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³⁹⁹的民谣。咸丰年间川西各地流民或加入蓝大顺、李永和的队伍，或“土匪起者益众，多冒蓝李”⁴⁰⁰，或自立旗号，成群结队。这种局面致使官兵在四川面临如何区分粮（良）民与匪党的问题。丹稜县进士李昶元说：“忽又官兵来，横暴递相续。始则妄诛求，继乃肆鞭扑。”官兵“妄诛求”，自然是诛杀和搜索蓝李起义人员。一般百姓自称“湖广”而来，至少可与“滇匪”划清界限。在四川，这种“麻城县孝感乡”的祖籍追溯于咸丰九年（1859）以后显得尤为重要。蓝李起义后，川西地区还出现了大量四处游荡的“游民”（请见下节），官府如何处理这些脱离户籍的游民，本地在籍粮（良）民如何与这些外来游民相区别？麻城县孝感乡祖籍似乎成为一个较简便的区分方式。另外，清政府成功镇压蓝李起义，有籍民人一方（清政府）战胜无籍人员（蓝李起义者）一方，祖籍传说迅速传播，

³⁹⁸ 刘志伟：《‘移民’——户籍制度下的神话》，《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5期，香港科技大学出版技术中心印制，2001年10月15日，第2页

³⁹⁹ 魏源：《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页

⁴⁰⁰ 祝介：《蜀乱述闻》，《中国野史集成》42，四川大学图书馆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488页

是否又和“同治中兴”的整个社会氛围有关呢，这是否是清政府重振地方秩序的一种民间反映呢？这些看法只是猜测，水东乡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需要其他地方的材料来证明它是否合理。

第四节 清末地方秩序开始崩溃？

清末水东乡的地方秩序到底有没有崩溃？本文之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原因在于 John M. Flower 据称花了十年时间来研究清代雅安水东乡的道路和庙宇，并于 2004 年发表了《路是走出来的：四川雅安县的道路、庙宇和历史记忆》(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⁴⁰¹。本文打算在这里回应他的观点。

Flower 所讨论的道路（即其文中的“北路”），指的是雅安县北上经太平场、峡口至下里、中里、上里的道路。他涉及到的庙宇有城隍庙、土地神、文昌宫、川主庙，其讨论的重点在川主庙，该川主庙在清代水东乡的南面，即罗绳山南端的莲花山东南面，陇西河经峡口流出下里的位置。他讨论的地域范围主要是民国时期的太平乡（即清代水东乡的东南部），他试图把这条道路以及道路上的庙宇（主要是川主庙，在太平场），放到清末（1883）⁴⁰²到 1992 年这段时间里，观察不同时代的人们聚集在这条道路和庙宇上的利益与观念。Flower 想要把庙宇和道路放在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解释框架里来讨论当代中国的发展目标与农民处境的问题，其核心观点为：庙宇和道路代表了农民利益诉求和道德诉求，自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以来，庙宇一直被作为“封建迷信”对待，农民通过庙宇和道路所表达的这两种诉求一直未被地方政府所重视。

Flower 从“北路”的角度，勾勒了晚清到民国期间“北路”地方秩序从混乱到崩溃的过程：

晚清时代地方秩序开始崩溃，这个迹象反映在 1883 年以后北路上有记录的桥梁和庙宇维修的缺乏（absence）上，这种趋势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能看到（Duara 1988a, 133）。这一趋势与哥老会（Elder brother

⁴⁰¹ John M. Flower: 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Aug., 2004), pp.649-685

⁴⁰² Flower 最早提到的时间段在嘉庆年间，即 1809-1812。

society)势力的兴起是一致的,哥老会在雅安本地被称之为袍哥(gowned brotherhood)。袍哥在乡村图景中的出现,强化了道路的非正统意义,这些非正统意义与上文描述的有些理想模式的正统体系共存于同一个平衡之中。

晚清时代,袍哥开始填补国家权力逐渐衰弱后留下的地方真空。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袍哥在四川乡村里变成了一支越来越显著的势力,他们在内战的1940年代后期达到了他们影响力的最高峰。袍哥最初形成于17世纪晚期,它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抵抗团体,袍哥第一次发展成为一个互助组织和交通网络(Wang 1993; Stapleton 2000, 197-204)。根据本地人的口述,在1930年代后期之前,袍哥给它的成员提供的主要服务,就是发放“通行证”,以确保了旅行者在其他地方能够自由地住宿和取得个人之间的联系。这个“通行证”对那些缺钱的乡民特别重要,这些乡民充当茶叶背夫,频繁地在通往西藏的城镇康定(打箭炉)道路上工作,这条道路一路往西约200公里长。袍哥团体控制了地方道路,保护他们的底层成员(turf),掠夺袍哥组织之外的人们。1930年代,由于军阀的军国主义,袍哥分裂了,充当盗贼和走私本地生产的鸦片仍是袍哥的活动,袍哥团体作为一个具有掠夺性和保护性的组织(Perry 1980),它迫使许多男性村民加入以求自保。⁴⁰³

20世纪初,袍哥被城市里和乡村里的传统精英控制着,这些精英把他们确定为舵把子(helmsmen),这个位置处于精心制作的社会层次的顶端,以区别于其他社会阶级⁴⁰⁴。

Flower把是否存在公共建设活动作为地方社会秩序崩溃与否的判断标准。他的结论是,1883年以后“北路”一带就没有桥梁建设和庙宇维修的情况了,“北路”地方秩序从1883年开始崩溃。即使以Flower的标准来看,他的这个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让我们先来看看同治年间至民国五年(1916)水东乡社会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⁴⁰³ John M. Flower: 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Aug., 2004), p660

⁴⁰⁴ 同上, p661

水东乡周围寺产渐被覬觎

同治二年(1863),四川捐输开始要求佛教寺院认捐,“至若庵观寺院,虽属方外之流,然或田业盈千累陌,或拥资数十万金,坐享丰饶,绝无外耗,实较富民更为优裕。曾经粮绅公议,非与商民一体认捐,无以示公平而杜藉口,故均勉从其请,以顺輿情”⁴⁰⁵。这一政策使得四川佛教寺院开始处于不利境地。

咸同动乱之后,水东乡天空寺与白马泉寺僧人活动留下的文字资料较少,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具体活动与变化。不过,水东乡附近的寺院命运,则可以作为天空寺与白马泉寺命运的一面镜子。三江寺位于名山县与水东乡交界处,属名山县管辖,距离水东乡天空寺10里左右。同治五年(1866),名山县知县李承保(字赤城,江苏人)为保护三江寺而立碑一通⁴⁰⁶。其碑文⁴⁰⁷如下:

特用军粮府直隶州正堂署雅州府名山县正堂八级纪录二十次李
为处情示谕事

案处三江寺僧圆满稟称,缘僧住雅邑臻胜阁,因思治三江寺前僧浪败,咸丰元年僧师祖如凤携钱四百钗,凭寺邻等接理三江寺,续回田业,接修天王殿、东西两廊,及买王姓田业,共去钱八百余钗,添租柒拾余石,寺内收不敷支,系臻胜阁添补,现修山门木料,均由臻胜阁搬运,寺邻咸知。今被武生黄金钟等见寺稍有租谷,遂串新进文生杨元乡,于本月十五日来寺会议,传集佃户,意要将僧租石分收作公。且三江寺虽收租石,系臻胜阁蓄积,与伊等无涉。地方纵有义举,另行筹款。况现修山门,度用浩繁,谷石如何能分。且寺近大路,常遭痞匪入寺滋扰,再被伊等设谋把持,致僧受累更深。只得恳赏示谕,以免滋端。庙宇辉煌,神僧均沾。伏乞等情。

处此除稟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处寺邻及黄金钟杨元乡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尔等毋得妄生覬觎,假作公用,图收寺租,藉故滋端,倘敢故违,许该僧指名具稟,以凭唤究。如再有外来痞匪入

⁴⁰⁵ 《清代钞档》,捐输题本264,四川,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13页

⁴⁰⁶ 2005年雅安市政府维修白马泉寺时,把这通碑搬到白马泉寺门口树立。

⁴⁰⁷ 2008年12月18日拍照并抄录

寺滋扰者，亦许该僧协同约邻捆送来县，以凭惩治。但不得挟嫌妄禀妄拿，致于并究，各宜凛遵。特示。

同治五年八月廿四日 右谕通知 勒石三江寺勿损

同治年间四川地方生员有逐渐把持地方的趋势，他们在地方开始谋求私人利益，这种活动与县衙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并不协调。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五日，武生黄金钟和文生杨元乡看到三江寺有相当产业，于是打着“公用”和“义举”的招牌，跑到三江寺召集寺田的佃户，想把三江寺的租田收入分出一部分供他们征收使用。黄金钟、杨元乡的做法引起了三江寺主持僧圆满的强烈反对，圆满把这件事情告到了名山县知县处，他说：早在咸丰元年，水东乡天空寺的主持、圆满的师祖如凤⁴⁰⁸带了四百钗钱接理了名山县的三江寺，他花钱赎回了寺院原有田业，修理天王殿、东西两廊，还买了王姓的田业，一共花去了八百多钗，不够的部分，则由臻胜阁添补。三江寺的产业是由水东乡天空寺主持如凤以及臻胜阁出资添置的，与其他人无关。黄金钟、杨元乡的要求超出了“认捐”范围，自然遭到三江寺僧人极力反对，三江寺僧人上报给名山县知县李承保，请求他下文保护。知县李承保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后，就于二十四日下文勒碑，严禁黄金钟、杨元乡以及寺邻人等觊觎寺产。三江寺的申诉中还提到了“常遭痞匪入寺滋扰”的情况，这表明咸同动乱之后，水东乡周围的社会已经游荡着一批“痞匪”人群。从寺院自身的角度来讲，僧人浪败，也是寺院衰败的重要因素。

四川佛教寺院开始“认捐”以来，三江寺寺产逐渐引起各方人群的垂涎，寺院产业逐渐被觊觎。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雅安县东郊川藏交通要道旁的金凤寺也面临这样的困境。金凤寺距离水东乡中里约40里，同治九年（1870），各级官府勒石立碑于金凤寺，其文⁴⁰⁹如下：

钦赐花翎即用参府署分镇四川黎雅等处地方副总府林

钦加二品顶戴分巡四川建昌等处地方兵备道鄂

即补道特授四川雅州府正堂加五级纪录十二次徐

勒石晓谕永禁骚扰事。

⁴⁰⁸ 圆满为白马泉寺主持僧如凤的第四代徒孙，请见同治二年如凤碑文。

⁴⁰⁹ 2009年5月7日拍照

照得金凤寺古刹，乃前明正德间僧宗寿独力重建，迄今香火仍系本寺僧种植流传。初名石龙，寻更金凤，层峦叠嶂，近临蔡岭之隈，笏立屏开，遥揖蒙山之径，南吞沫水，北接马泉。东瞰瀆流，西通龙洞，又有异羽珍禽争鸣，鸟道丛林，佳木交荫，阐关意期，兰若长兴。准拟茅编常补滋。本道府登览之余，悉收其胜。

惟惜僧索绀宇，未极装严。本道府密为访察，始知附近居民冒称施主，侵占佛地，往往估伐树木，骚扰难堪。兼之长牌差徭，络绎不绝，支应纷繁，遂致补葺无资，倾颓日甚。若不严行永禁，何以培树植而重梵林。合行会衔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附近居民并往来长牌差徭等知悉，自示后尔等务安本分，不准仍前侵占佛地、估伐树木、妄索支应，俾该僧得有盈余，随时培葺，庶几慧灯不息，香火永兴。嗣后儻有刁玩之徒抗违不遵，许该寺僧扭禀来辕，以凭按法惩办。本道府明心似水，执法如山，断不肯姑息养奸，貽蠹摧残于胡底也。各宜凛遵毋违。特示遵。

右谕通知

同治九年十月廿六日告示

实镌山门晓谕勿损

金凤寺附近居民开始“冒称施主，侵占佛地，往往估伐树木”，金凤寺处于川藏要道，“往来长牌差徭，络绎不绝”向金凤寺“妄索支应”。所谓“长牌差徭”，实际就是夫马差徭。地方最高军（分镇四川黎雅等处地方副总府、分巡四川建昌等处地方兵备道）政（雅州府知府）开立碑文，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金凤寺被衙门各级差徭困扰的局面，然而金凤寺在社会上日益不妙的处境似乎并没有得到更多改善。同治十三年（1874）雅安县知县又立一通碑文⁴¹⁰：

钦加运同銜、保升同知直隶州、特授四川雅州府雅安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二次，韩
为出示严禁事。

照得县属之金凤寺即古莲华寺，肇自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五百余载。虽迭经兵燹，而庙貌巍然，毫无损坏。若非抑邀神佑，曷克臻此。

⁴¹⁰ 转引自：《清同治十三年雅安县正堂保护金凤寺碑》，曹宏、赵彤撰：《雨城古刹》（金凤寺当家真勇惠赠），（笔者注：无出版信息），第23-24页

惟迹闻附近居民及外来游民，藉行乞估食，颇不法之徒，常常在寺滋扰，无知妇女孩童在于寺所管山场田地内纵放牛马猪支，践踏粮食菜园，砍伐树竹，一经寺僧阻挡，尤敢凶横诬骗，殊属胆大妄为。亟应出示严禁。

为此示仰附近军民人等，遵照自示之后，所有一切闲杂人等，勿许前往该寺滋事扰害。至田业山场，尤为该寺僧等焚献日食所需，更不许妇女幼男任意牧放牲畜、砍伐树竹。倘有不遵，准该寺住持提名具禀来县，以凭拘唤严惩，决不宽恕。其各凛遵勿误，此示遵。

右谕通知

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一

告示

右示给金凤寺住持勒石

咸同动乱之后，雅州地区的外来游民增加，这些游民脱离本地户籍，来到雅州，他们到寺院里名为乞讨，实为估食，不法之徒滋扰，寺院附近的住户任意侵占寺产，具体表现为“妇女孩童在寺产田地中放牛马猪践踏粮食菜园、砍伐树竹”。我们有必要把这些社会新动向作为同治初年哥老会形成的社会背景来考虑⁴¹¹，目前，学界对同治年间雅州地区哥老会的活动还并不太清楚。从雅州各级官府三令五申发文勒石保护佛教大寺院来看，一方面反映官府最初重视保护，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咸同动乱之后的佛教寺院在社会中的处境日益困窘，象金凤寺这样的大寺院尚需各级官府不断发文保护，其他各处小寺庙的命运，则可以想见。水东乡天空寺与白马泉寺僧人没有参加同治五年（1866）上里的公共活动（建修藏字石库），这至少表明白马泉寺僧人与五甲口场人群关系已经没有咸丰六年（1856）那么紧密。外来游民的增加，与本地人开始不断重申自己祖籍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这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上里张氏加强坟地树木的管理

⁴¹¹ “哥老会渊源系统说法不一，是同治四年（1865）正式成立的，活动中心在长江中上游。它们虽然不是或不全是产生在近代，但在近代社会最活跃，特别显现其团体的力量，为世人所瞩目。”（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光绪二年⁴¹²

爰立宗盟勒碑垂后

原夫先王之世道，重亲亲。本支百世勿替，宗盟夷老。我宗族谱入川之祖始 自国明，落业于张家沟；二世祖张贤；三世祖志亮；传及张能，凡历四代，分居于张坪。五世祖应忠；六世祖廷春；七世祖拱学，又单传四世传。暨张乾，凡及八世，始生文举、炳两大房，分支各有碑记垂后。

慨自明末自清 三百余年，坟园内大树数十余株，至道光十八年，岁逢凶荒，被子孙肆行剪伐，至乱开垦，以□□冢放牛焉，以肆剪踏。虽前有禁约，尚不知禁。思其非仁人孝子之心所出也。今约宗族人等□□钱十余千，共买大树一根，以培风水，砌周围以固坟园，所剩余金，尽植树木，以作千年庇荫之计。

凡我后裔，俱同宗祖。念源本之有，自谁不当为体恤。今勒宗盟以垂后世。自此封山之后，如有人牛羊猪马伐树木开垦坟地，以貽祖宗不安，宜较前禁约加倍诛罚。倘再不遵许，通族人禀官究治，勿谓言之不先豫也。是为禁。（以下名单请见附录）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共有 62 人捐资，由监生张一星、张先业组织，其中生员（国学、文生、武生）共 6 名，约占捐资人的 9% 左右。这些“钱十余千”用来培修坟园，出于风水的考虑，购买了一株大树，种植在坟园里，然后又买了很多小树苗，栽在坟园里，作为公共财产。光绪二年上里张氏的这种集资行为表明，他们整体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能够出资建修祠堂的地步，他们只能在坟园墓地进行建设“族”的建设，种植树木则是他们投资的主要方式。

众姓共修中兴桥

光绪七年（1881），由中里郑氏生员领导水东乡上、中、下三里人群修建中兴桥，其碑文⁴¹³如下：

⁴¹² 2009 年 1 月 2 日拍照

⁴¹³ 2009 年 1 月 12 日拍照

正中一面：

自古溱洧之滨，民病涉乘輿之济，惠不容圉者，何？盖由河险而水深也。以所言方此，渡百年虽鳌背而而。况少经天雨，上溺马头，人伤返驾矣。幸绅耆登高，郑公等每见濡首，急欲成杠钩。贲谷始行，设庠醇饮延贤，四十几人乐捐，商议上中下里募化。兴修事成无恒功，期有渐使。灭口之忧，古今有后，步前程之效，正谓独乐不如众乐，善作又必善成也。至今完功，特志不朽。

大会首	文生 郑永升	捐贲十千文				
乐捐募化领袖	武生 郑永嘉	八千文				
胥明章	千总 郑国玺	郑大明	孙洪祖	李延楷	郑永箴	
杨全壁	文生 张必达	郑彦材	郑田氏	杨兴潮	军功 郑永辉	
胥云章	监生 杨宗汉	郑代兴	胥杨氏	郑永显	张一德	
胥□章	吏员 郑永固	胥永霖	胥玉琯	郑永皓	各四千文	
胥永顺	各五千文	各五千文	各五千文	杨福喜		
杨开福				各五千文		
各六千文						

(以下名单请见附录)
光绪七年辛巳六月初八日
(以下名单请见附录)

我们把中里修建中兴桥与咸丰六年（1856）上里修建磐安桥相比较，光绪年间，水东乡已经没有官绅了，据有可比较性的出资数字如下：

表格 10 磐安桥、中兴桥出资人数比较		
出资金额等级	磐安桥出资人数	中兴桥出资人数
10000文	1	1
8000文		1
6000文	1	6
5000文	1	17
4000文	1	3
3000文	1	2
2400文	2	1
2000文	3	6
1500文		3
1200文	10	17
1000文	38	62
800文	5	6
600文	28	10
500文	18	35
400文	35	18
合计	144	188

据不完全统计，修建中兴桥至少有 193 人捐资。中兴桥与磐安桥的建设时间

相隔 15 年，捐资人的姓名基本没有重复。这些捐资人中杨氏共有 44 人，郑氏共有 43 人（包括郑田氏），胥氏 23 人（包括胥杨氏、胥李氏、胥徐氏），张氏 9 人，李氏 8 人，陈氏 7 人。士员共 11 人（算上张先哲和九品林芝情），约占 5% 左右（如果人数统计完全，其比例应该还要小一些）。景大常则参加同治五年和光绪七年的两次公共活动，第一次他捐资 2000 文，第二次捐资 1000 文。如果我们把中兴桥石碑正中第一面的人名姓氏作一个分析的话，其结构如下：

表格 11 中兴桥出资人姓氏结构表

	人数	出资金额:文
郑姓	17	73000
杨姓	10	38500
胥姓	8	41000
张姓	2	9000
孙姓	1	5000
李姓	1	5000
林姓	1	2400
合计	40	173900

郑姓、杨姓、胥姓是出资最多的三个姓氏人群。这个结构基本决定了各姓捐资总金额的比例，郑姓最多，杨姓其次，胥姓第三。杨姓捐资人数最多，但他们捐资总金额只占第二位。这三大姓氏基本居住在今天中里镇的杨家湾、郑湾村（8 个小队姓郑，2 个小队姓胥）。这座中兴桥的位置，即在今天郑湾村的胥家湾（即胥姓人家聚落附近），它是郑湾郑姓人群经过此处去赶中里场的必经之路。张姓人群如果赶中里场，也需要穿过郑湾郑姓人群聚落，经过此处。杨家湾杨氏人群赶场的话，基本使用不到这座桥梁，因为他们处于胥家湾的下游、中里场的边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里郑氏在这次修桥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众姓合修“二郎桥”

光绪十二年（1886），通往上里法华寺道路上的桥梁再次由众姓合修，并命名为二郎桥，树立石碑。这座桥梁所在的位置，至今还立有另外两通字迹湮灭的石碑，从石碑形制来看，应为清代石碑。这显示了二郎桥所在位置经过了历次修桥。我们能够看到在乡生员阶层依然是这次公共建设活动的领导者。

其碑文⁴¹⁴如下:

二郎桥

且夫□□经前人之创造不足见后人之□修路本境法华□□
则通□□阳城近□□平五□□又非□□大道之可比□□□
而大□之□等有见□□不堪经历□□越□□□爰是□□□
□□而□即成今日之石桥较前人之木桥为愈坚□□□□□
可以利樵者□言功□是以为□□□□

第一横排	第二横排	第三横排	第四横排
武生 张维泰	黄国基	杨□□	杨□□
武生 杨万祥	黄 □	杨万□	杨□□
武生 杨全□	各上钱乙千文	王洪□	杨全□
各上八百文	杨全禄	沈全美	杨文经
杨文学	罗大文	彭作兴	主持 明 □
杨奇□	各上钱八百文	杨陈氏	石匠 杨成全
杨元钊	杨启秀	张维汉	陈□昌
杨义乐	杨万培	各上钱五百文	
各上乙千文	杨永财	陈绍□	
	各上钱五百文	上钱五百文	
光绪拾二年十一月吉日	立		

永垂不□

武生张维泰,即光绪二年(1876)上里张氏族入树立宗盟碑的“国学维泰”。尽管三位生员捐资金额不是第一等的,但是他们的名字被刊刻在众人的前面,这显示了生员阶层在水东乡依然具有身份和地位,他们是公共建设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上里杨氏重修二仙桥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里杨氏出资在文星渡福寿桥的下游约200米处重修石桥,取名为“二仙桥”。这个地方的桥梁是整个上里平原地带人群(如张家坪、庙坪、景家坝、黄家坝、杨家沟、仙人洞等处)去赶五甲口场的必经之桥。二仙桥的样式在水东乡是独一无二的,它呈弓背样式石质单拱,全长约24米,宽约6米,高约8米,内拱跨度约12米。立于桥尾的方形石碑文⁴¹⁵如下:

⁴¹⁴ 2008年12月23日拍照

⁴¹⁵ 2008年12月18日拍照

二仙桥

(以下文请见附录)

正对桥方向:

五代孙杨应朝培修

二仙礮 任运昌 石工

光绪二十六年七代孙县学生杨攀华敬书

正对下游方向:

从来此桥之建修，由于杨氏祖公在乾隆十三年修于桥之下遭水害，至乾隆十八年又修于桥之上，复遭水害。至乾隆四十壹年重修此桥，独成善果，未载碑记，书于尖石为据。

高祖文生杨毓柏建修 继嗣

蓬溪教谕 泮 胞侄南郑县知县调元

贡生 璉 乐山县训导 作舟

庠生 作 楷 族孙监察御史 祖纯

国学 鼎 堪功门桥李芳杰

这座桥是杨应朝独立出资修建的。关于“尖石”，据杨树槐老人讲：“弓背桥合桥时，要放一块尖石在合桥处的下方，只有站在桥的正下方才能看到这块尖石”⁴¹⁶。咸丰六年（1856），上里杨氏与韩氏、张氏等已经联合领导修建了磐安桥。《磐安桥碑记》中提到“远有弓背高桥”，指的就是二仙桥之前的石桥。

为什么上里杨氏要独资重修石桥呢？杨树槐老人在新编上里《杨氏宗谱》里专门手绘了一幅民国年间“太兴号 四合院 茶叶生产”画，这个茶叶加工、打包的四合院就在杨家沟。杨家沟往来五甲口场就要经过二仙桥。因此，这座桥的修建可能与清末时期上里杨氏茶叶加工、打包有关系。

另外，上里杨氏修建这座石桥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在方便于人（首先是上里杨氏族人）的同时，展示自身经济实力以及某种政治实力（祖先科举考试与做官的辉煌“历史”）。这座桥是多处人群赶五甲口场的必经之地，在这里书写祖先科举考试与做官的辉煌历史供人观看，自然就增加了当时上里杨氏人群在五甲口

⁴¹⁶ 杨树槐老人（71岁）口述，时间：2008年12月20日，地点：上里镇

场的某种文化地位和声望。杨应朝选择通过地方公共建设（独资修桥）来实现这种文化与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的背后反映了水东乡各姓人群在乡士子之间的文化竞争关系。

上里刘氏建立祠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氏经济实力增强，并且有了监生，终于有能力模仿上里韩氏宗族的祠堂制度了，他们也建修刘氏祠堂⁴¹⁷，舍田提入祠堂。刘氏还为此而树立了“建祠碑记”，其碑文⁴¹⁸如下：

光前裕后

建祠碑记

盖闻贵郡之有祖宗牌，始自第七代刘朝宾在嘉庆七年修竖，并装彩亭一座，供于家堂。传至十代发旺公字万顺，其为人贵义轻财，先贫后富，又乐于为善，造来往之桥，修崎岖之路，具利济更无穷也。及至寿过六旬，尊祖敬宗之心奋然兴起。岁在光绪丙午，即购买祠基，与胞弟发锐、发福同心创修祠堂，费用钱壹百余钏，功未告成，旺公辞世。次年丁未，厥子监生汉英继志完功，追荐先灵，重装旧主，与新雕本房宗牌，同请入祠，招人焚献。三年戊申清明节，始为祀典。英又与锐叔侄和议，均愿各出田地，界址租石详载于后，入在祠中，永为义产，以作每年祭祀之资，并给住持口食之用，只许余积添增，毋准私行压当。

则章本既立，祖上之血食，庶几可保绵长矣。后之人倘有紊乱五常、悖逆八则之男妇，无论服族内外。凡属同宗分派者，实有劣迹，没后俱不准入祠以秽乱先声。惟愿子子孙孙以孝生孝，世世代代以贤传贤，体先人之德意，又岂第春秋有所省而遂矣耶夫。所谓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月数朔必荐，新时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忌日迁主，祭于正寝，言乎其事死之礼当厚于奉生者，继世后昆诚能随时致敬，入庙告虔焉。斯有得建祠之所厚望也夫。是为序。

水田五坵坐落岩骨田每年收田租乙石四斗又熟地一股

⁴¹⁷ 目前，这座祠堂已不存在，我们无法看到其具体规模和样式。

⁴¹⁸ 2009年2月10日拍照并抄录

汉英 上 坐落□墩口每年收地租八斗整 载粮一钱在万顺户内
推出拨入新立之刘宗祠内完纳

各

水田二坵坐落张家坝每年收田租乙石四斗又熟地一股
发锐 上 坐落乾墩口每年收地租八斗整 载粮一钱在明源
户内推出拨入刘宗祠户内永远完纳矣

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春三月寒食节

石匠 周绍锦刊刻

本邑儒学生员郑廷相敬撰并书

天空寺僧人元满修建石房

宣统元年（1909），僧人元满自备钱粮在“天空庙”里修建石房一所，并刻碑一通⁴¹⁹。其碑文⁴²⁰如下：

原天空山庙始建于嘉庆二十二年，迄今百余年，风雨漂淋，庙宇朽坏。僧元满不忍前人之功一旦而倾颓淹没，僧自备资粮，重修石房，遗留后世，以彰前人之功，永垂万古。其于前功之名姓前载于高山大王背光之后，今不书碑也。

僧元满敬书

本里石匠任全荣全伦全钧同立

大清宣统元年岁在己酉秋九月上浣之吉日

僧人“元满”就是同治五年（1866）三江寺主持僧“圆满”。

八甲杨氏修建中和桥

民国五年（1916）中里八甲杨氏在中里场附近约1里路的地方修建桥梁一座。其碑文如下：

⁴¹⁹ 该石碑现保存于天空寺山脚通往天空寺的山路口。

⁴²⁰ 2009年5月5日拍照

中和桥碑记:

忆自地理一书始于晋代郭璞以来微论通都大邑名乡巨镇举凡卜宅定葬莫不以风水为最要焉我敝族聚处邈兹村落始自明末清初我先祖環公迁居此地□□□□□□□□□□繁□□□□□论□虽□陶□□□□贵虽止举贡□武生□□家□人足善香世代斯□□为胜地矣特以此□山溪实有漏泄龙脉□□宗祠与□□公之墓□□会门□代□字□祖公一□□专至正字派祖公一辈□□□□□桥□资□□□□有志未□□至于□有国字派嘉字派□清字永字派□□裔系洙□□□渐□固知人一户口日就削弱即文武功名□□逊前代□□□□□培□□□□□有裔孙国德嘉□弟叔侄四人同心相邀不量力弱敢竭囊金约同族中人等乐捐助资更得乐事劝工裔孙国辉嘉声穗□□三□□□干办数□□买□□石□□鸠工聚匠经理数月之余遂造就□洞石桥一座楼房五间并看桥歇房三间兹既告竣遂将乐捐族中人等并一切费用钱买逐一泐石著明于左以誌不朽云耳

環祖公九代孙前清文生绳锡撰

正中:

左: 中华年岁在丙辰春三月立

右: 本族中学生杨佑涂⁴²¹

Flower 判断“北路”的地方秩序崩溃始自 1883 年,但他又给一幅修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二仙桥”的照片⁴²²。在袍哥的讨论中,Flower 并没有本地的材料证明袍哥组织控制了清末的水东乡,Flower 有关雅安袍哥的印象,大多来自 1996 年的《雅安市志》。

曾为袍哥首领的人的回忆,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印象。关于四川的袍哥组织,范绍增回忆道:“参加仁字号袍哥的人,以士(包括管粮户、士绅、抓政权机关法团的首士及秀才等)为主要成分,这是民国初年的情况。在清朝时,士绅均瞧不起袍哥,袍哥则认为士绅是站在官府方面的,怕被出卖,不要他们参加。因此人数较少。”⁴²³关于雅安县的袍哥组织,杨国治回忆:“西康袍哥在清末就已

⁴²¹ 2009 年 1 月 8 日拍照

⁴²² John M. Flower: 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Aug., 2004), p657

⁴²³ 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194 页

经很盛行。……但是，那时的袍哥组织还不是很盛行。民国初年，雅安有三道仁字旗的公口，一道在宾雅堂，大爷郭金山、古华庆；一个是万同公，大爷陶树成；一个是集贤社，大爷夏鼎三。……民国 7、8 年时，雅安开始成立义字旗的会议同，大爷李辉庭；礼字旗的澄清社，大爷李贵华。”⁴²⁴我们据这些回忆可以得出大致印象，清末四川士绅与袍哥组织距离较远，还没有出现众多士绅加入袍哥组织中或者众多士绅组织袍哥的现象，清王朝覆灭前后，雅安县的前清士绅开始陆续参加和组织袍哥。

就水东乡的具体材料来看，民国五年（1916），中里八甲杨氏为了改变家族风水和运势，特地组织“乐捐族人”修建了一座通往中里场的桥楼⁴²⁵。这座桥楼比中兴桥、二仙桥规模还要大，“石桥一座、楼房五间、并看桥歇房三间”，这种带有公益性质（即 Flower 所说的“道德性建筑”）的地方公共建设活动直到民国初年依然存在，这表明地方大族依然是维系水东乡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八甲杨氏人口和功名人物日益减少，即“户口日就削弱，即文武功名□□逊前代”之语，这表明科举制的终结导致水东乡旧式读书人日益减少⁴²⁶。

关于清末水东乡的袍哥组织情况，资料太少，我们了解不多。陈熙材老人说：“韩少微是罗绳函最大的舵把子，他管整个罗绳函，他要你今天死，你就活不过明天。”⁴²⁷韩少微即上里韩氏后人，目前上里镇韩氏少有人能（或愿意）讲清楚韩少微的情况。我在《雅安地区戏曲志》里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韩少微（1888—1949），名炳字少微，雅安上里乡人，少时在‘秀才之书斋’私塾读过九年书，本人聪明伶俐，记忆力强，尤其酷爱川剧。除去读书时间，常在当地《顺宁班》出入，学得一手打小鼓的功夫，他在玩友会中既打小鼓，又能演唱。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九年，韩少微在雅安五甲口（上里乡）先后创办了‘群玉科社’和‘安庆科社’。”⁴²⁸光绪初年创办的顺宁班以及民国时期的群玉科社、安庆科社，都是在韩氏祠堂里开设的。“一八七九年，雅安‘顺宁班’赴康定演出，康定各界为

⁴²⁴ 杨国治：《西康雅属的袍哥》，同上，第 212-213 页

⁴²⁵ 这座桥梁在六十年代兴修水库公路时被拆毁，只剩下一座碑记。这座碑记能够留下来的原因是，1935 年张国焘的部队在这座石碑上刊刻了宣传标语。可见，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亦充分利用传统资源进行革命宣传。

⁴²⁶ 有关科举制终结后带来的社会后果，请参见：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 4 期

⁴²⁷ 陈熙材老人（93 岁）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6 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⁴²⁸ 《雅安地区戏曲志》，雅安地区文化局编，1987 年，第 137 页

其‘披红挂花，放鞭炮三天’。”⁴²⁹此种川剧戏班又与雅安的城市庙会密切关系。

“三月城隍会每年照例要热闹一个月左右，由地方大户轮流担任会首。头一年推选出下届会首七至八人，由他们先垫银二百两作为庙会费用开支。每年的庙会必须有川剧班子唱戏，本地没有戏班子就到外地去请，因为流传多年的习俗是‘城隍爷要看戏’，相传三月初一是城隍的生日，演戏是专为城隍菩萨祝寿的。”⁴³⁰雅安城隍庙会不单单是神的节日，也是重要的物资交流贸易会。

据这些零星的材料推测，水东乡家财最多的韩氏宗族，是水东乡地方秩序的重要维护力量之一，清末逐渐兴起的袍哥组织，最初可能由地方大族所控制。韩少微成为水东乡最大舵把子的时间，约在民国年间。

Flower 认为“晚清时代，袍哥开始填补国家权力逐渐衰弱后留下的地方真空”，“20 世纪初，袍哥被城市和乡村里的传统精英控制着”。Flower 理解的“传统精英”基本来自他看建桥碑记得来的印象，他认为这些建桥组织者就是传统精英，其中有一部分人还取得了较低的功名。就他自身的这些表述逻辑来看，也是自相矛盾的。按照他的表述理解，既然传统精英在 20 世纪初都还控制着袍哥，那么晚清时代怎么就成了“袍哥开始填补……地方真空”了，传统精英在晚清时代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晚清的传统精英等同于袍哥，为什么 Flower 只提晚清袍哥“填补……地方真空”，而不提晚清传统精英“填补……地方真空”呢？不论怎么说，Flower 很想把晚清袍哥力量在“北路”的兴起的印象强加给读者。事实上，他忽视了地方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固有地位，也忽视了地方大族势力与袍哥组织的复杂关系。

以现有收集到的材料来看，水东乡众姓参加的公共建设活动结束于民国六年（1917）⁴³¹。民国五年（1916）、六年（1917）水东乡既有以家族为纽带的单姓公共建设活动，又有以桥梁为纽带的众姓公共建设活动。可见，直到民国初年，水东乡的地方大族和前清生员，依然维持着水东乡的原有地方秩序。

⁴²⁹ 同上，第 20 页

⁴³⁰ 同上，第 106-107 页

⁴³¹ 请见第七章，第一节，福善桥碑记

第七章 乡村建筑与民间信仰

本章希望通过考察水东乡内部不同自然地理区域的桥梁、庙宇、村落之间的关系，来探讨水东乡所具有的一般特点。

水东乡四周为丛林密布的绵延高山，这种良好生态环境能够基本维持山间田头的农田用水资源。山路盘旋、沟壑众多、形态多样的自然地理，导致农作物、经济作物的不规则分布，从而影响到人群的聚居点和往来方式，这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水东乡的建筑分布。

第一节 桥梁、道教和建桥组织者

水东乡是一个以桥梁联结在一起的社会。水东乡的桥梁及其碑文非常多，特别在五甲口场范围之内。聚集在某座桥梁的人群，主要以居住在此处附近的人群为主，必须经过此处的人群则相应参加进来。分地段由地方社会人群各自承担桥梁修建任务，这是清代水东乡地方公共建设的一大特点。

Flower 认为，“北路上的桥梁揭示了一个预期的空间模式，即国家权力的消退和超出行政中心的地方自治的兴起（skinner 1977,262-63），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桥梁加强了精英地位”。⁴³²Flower 在这里把国家权力和地方自治对立起来论述。经我核对，施坚雅（Skinner）在这两页文字中一直在评论城隍爷在城市与乡村中影响大小的问题，并未提到桥梁与空间模式的关系。唯有施坚雅的这句评论似乎是 Flower 引申的依据：“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管理单位中，政府的效率在它的首都是最高的，随着与首都距离的增加，其行政效率逐渐减弱。”⁴³³然而，施坚雅所谓的行政效率，并不能等同于 Flower 所谓的国家权力，政府效率低下也不是地方自治兴起的必然原因。

Flower 由此得出一个错误结论：离衙门越远的地方，国家权力就在消退，超出行政中心的地方自治就在兴起。他在讨论水东乡城隍庙过程中也认为：“在北路，城隍的分支庙宇坐落在很远的地方，一个城隍分支庙在中里（22 公里），另一个在上里（35 公里）。在这些地方，真实的国家权力最弱，而地方自治最大。”

⁴³² John M. Flower: 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Aug., 2004), p656

⁴³³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 1995, P263

⁴³⁴事实上，距离雅安县衙门较远的五甲口场范围内，国家权力通过市场、宗族和士绅形成的影响力远比在中里场范围内强，五甲口场范围内的自治因素，正是国家权力成功渗透的表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Flower 想要通过“道路-庙宇网络”⁴³⁵来构建一个解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理论框架，似乎并不成功：他既忽视了五甲口场和通往芦山县的茶道形成的历史过程，又忽视了五甲口场具体人群的活动状况。

乾隆末期，五甲口场中小商人、茶道沿路上的佛教寺院和各段居民是桥梁的重要建设者；道光朝以后，地方生员或者庙会会首是水东乡地方建设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茶道各段居民亦有少量建设）。庙会会首既可能由地方生员充当，又可能由没有功名的人充当。磐安桥（1856）由地方耆老绅士组织修建，这是水东乡地方生员领导公共事业的代表。积福桥（1878）由没有功名的庙会会首组织修建，捐资者中不乏地方生员⁴³⁶。中兴桥（1881）由地方生员充当的庙会会首组织修建。咸丰朝以后，庙会会首作为地方公共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似乎较为普遍。咸丰年间《随身宝》有一篇《石匠包修石碾文约》标准格式，这篇范文有利于我们理解庙会（当然还有其他会）会首与修桥者之间的承包关系：

石匠包修石碾文约

立写包修石碾文约人某人，凭中包到某会首等名下修造某处石碾一座，或平、捲几洞，面宽几尺，顺长几丈，碾<石>高几尺、宽几尺，波岸石壁顺长几丈，厚几尺，海底石一并在内。至于木料，有会首自办，不得虑及工人。比日凭中议定石料工资钱几千十文，即日交钱几千十文，动工之后，又交钱多少，其余以下，碾功告竣，如数交清，不得短少。恐口无凭，立包约为据。

行善、为善、方便于人，这是水东乡兴修桥梁的核心道德价值。修建桥梁的组织者不论是寺院僧人、地方生员、庙会会首还是个人，他们都有这种道德的表达。修建桥梁的组织者、捐资者、建设者们，通过修桥而实践着“善”，宣扬着“善”。桥梁一旦修建成功，它又持久有效地承载着“善”的观念和道德价值。

⁴³⁴ John M. Flower: 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Aug., 2004), p657

⁴³⁵ 同上, p659

⁴³⁶ 请见第七章，第三节

桥梁所拥有持久影响力，与保存至今的节孝坊、众多宗支碑、坟墓墓门雕刻的二十四孝图，构成水东乡人最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善”与“孝”。

水东乡石桥的最完整结构为：桥墩、桥面、桥头土地神小庙、桥尾将军碑。多数桥则把土地神刻在将军碑上。有的桥则只有碑。众人修建的石桥，绝大多数情况是有石碑的，以记录建桥出资众姓，只出米者的名字一般不会刻在石碑之上。修桥用的巨大石头如何搬运呢？韩先府早年做过石工，他说：“再大的石头，四个人就可以搬回来了。采石场选的位置都比较好，属于二流坡（音，就是缓坡的意思），能够放石头下来。坡不能陡，（坡）太陡了放下来也没有办法搬动。石头放下（缓）坡后，先把道路铺平，用三根或四根木头，把石头撬到两根木头上，石头用绳子拴住，前面用牛拉，一个人牵牛鼻子，两个人在石头两边拗，不要让石头从木头上滚到侧面滚下来，一个人则轮番把木头放到石头的下面。这样就可以把石头搬回来了。”⁴³⁷水东乡所有的石桥桥面大石的一头都有一个直径约5厘米的圆洞，这就是当年采石后拉石头的孔。

石桥的位置和方向由堪輿来决定，修桥开工日期则由阴阳先生来决定。石桥修好后，有隆重的开桥（又叫“踩桥”）仪式。韩先府说：

先敬神，敬土地菩萨和将军碑，香、蜡、钱纸，供品有猪、阉鸡、阉鸭（即整只鸡或鸭）和羊。猪的头部旋涡的地方要留一点毛，猪尾巴尖尖上要留一点毛；鸡的头部留一点毛，尾巴上也留一点毛，还有翅膀尖尖上也留一点毛。鸭子也是这样。敬神由掌墨师（即修桥的总工头）来主持，他会念一堆话（笔者注：参见下文“将军箭”仪式中有关“吃鸡吃鸡”一段话）。然后请百岁老人（指80岁以上的，夫妻双全的）或者地方有名望的人，请他在桥上讲话，一般就讲很多好话，周围团转的人就来观看。开桥讲话结束后，送礼的人们就把礼物——红布（当地人称之为“红”）披挂在主持修桥者的身上，还有讲话者的身上。主持修桥的人身上常常披一大堆红。将军碑和土地庙也要披红。然后放鞭炮，大家就到主持修桥人家里去吃九大碗（即指筵席）。有些在建桥过程中没有捐资的人户，在开桥这天听说在开桥了，人家对他们说，开桥了，去送

⁴³⁷ 韩先府（59岁）口述，时间：2010年3月15日，地点：上里镇

个礼啊。这些人户也要来送礼的，一起吃九大碗。⁴³⁸

开桥仪式，仅是地域社会人群举行仪式的开始。从此之后，人们每次经过这座桥梁，这种经过桥梁行为本身也是一种仪式，它把经过者与捐资者、建桥者联系起来。

水东乡道教符籙派传统历史悠久，嘉靖十年（1531）《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即有道士题名纪录⁴³⁹，明代末年更有重兴迹象⁴⁴⁰。符籙派别具有招风唤雨的法术，用于天旱祷雨，并以符籙相传⁴⁴¹。

目前，水东乡各处庙宇多在二楼阁楼上单独供奉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金花庙除外），这显示了水东乡道教势力非常强大，他们亦凭借各处庙宇来构建道教的势力范围。就我接触的五位阴阳先生来看，他们用印的印文均为“道经师宝”。

表格 12 水东乡供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庙宇一览表

庙宇	二楼阁楼供奉
下里三圣宫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
上里玉皇庙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
中里弥陀寺	玉皇大帝
中里金花庙	金花太子、玉皇大帝
上里白云庵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
上里长江庙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

水东乡众多的阴阳先生有一套“三十六关，七十二煞”⁴⁴²理论。乡民家中小孩子夜哭，打针吃药都还没有医好，他们就要找阴阳先生算一算，所谓“神药两改”。阴阳先生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小孩子犯了什么关、什么煞，这就需要阴阳先生作法场“过关煞”。有的小孩只需要“掩”一个关煞，有的小孩子则需要“掩”三十六关七十二煞。阴阳先生把全套关煞做完，一般约需耗时 4—5 个小时，从晚上七八点钟到次日凌晨一两点钟。

⁴³⁸ 韩先府（59 岁）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5 日，地点：上里镇

⁴³⁹ 请见附录《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

⁴⁴⁰ 请见附录杨守宁神位碑

⁴⁴¹ 《明史》载：“雷声普化天尊者，道家以为总司五雷。又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天尊示现之日，故岁以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礼四，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307 页；《玉芝堂谈荟》：“秘传符籙，精五雷祈祷术。”（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九，祷雨之奇，《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883 册，第 235-236 页；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惟稍习五雷法，招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乾隆三十二年），卷八十，宋徽宗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338 册，第 317 页

⁴⁴² 我有幸看过水东乡某位阴阳先生“秘籍”的两页内容，后经多方搜寻，发现他们不轻易示人的“秘籍”部分内容为《百中经》。《百中经》在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里有载。民间有多种《百中经》版本流传。

在这些关煞中，有两条围绕桥梁进行。一个是将军箭，一个是断桥关。

将军箭：将军箭必须用桃树作弓，柳树作箭，即所谓“桃弓柳箭”。将军箭要用绳子悬挂一叠厚约 0.5 厘米的纸钱，纸钱最上面一张使用红纸书写文字。然后把这样的将军箭悬挂在阴阳先生指定的某座将军碑上。阴阳先生不同，将军箭悬挂的文书内容和格式也就不太相同。水东乡堪舆杨正强既懂阴阳，又算八字，经他指教⁴⁴³，现把书写文书咒语部分记录如下：



照片 16 中和桥碑记和将军箭

仪式的核心是书写文书（即画符），主人家需要准备一只活雄鸡。阴阳先生

先在红纸上画符。开始写字时，他则边写边念：

（“斩”字咒语：）

一柱信香在炉中，香烟秀渺透天空。

二柱信香在炉燃，香烟请救水河原。

当君复国人亡主，三教师爷众神仙。

请诸庙众郎贤，某某某犯三十六关七十二煞

当今

（此时，阴阳先生把主人家准备的活雄鸡抱起来，口中念词如下）

吃鸡吃鸡，不是非凡鸡。

头戴红冠子，身穿五色绿毛衣。

不说鸡来油子果（音），说起鸡来有根生。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带回三双六个蛋，抱出三双六个鸡。

第一个飞在天空去，取名叫王母鸡。

第二个飞在河里去，取名叫桥中观音鸡。

第三个飞在山中去，取名叫高山庙门鸡。

第四个飞在田中去，取名叫秧苗黄谷鸡。

⁴⁴³ 杨正强口述，时间：2009 年 2 月 14 日，地点：上里镇

第五个飞在主家去，主家拿来做个报晓鸡。

只有第六个飞得好，弟子拿来做一个掩煞鸡。

（说完这段祝语，阴阳先生用鸡冠血用力一点，点在“斩”字上，接着继续书写咒文）

（“敕”字咒语：）

一柱信香透天庭，腾空一马下凡尘。

铁押铁板拿在手，将来要拴游魂人。

两叉挡子，三元再请，三元大将军，两叉追魂童子，送魂郎君，前在十字路口九子路途，朝取犯关的孩童某某某百病永离身。

“令”字咒语：

令响一声，令响二声，三声号令透九天。

“罡”字咒语：

天地空中，万罪本根。

广修万劫，证吾神通。

体有金光，响应无声。

包罗天地，施与众生。

受敕万片，身有光明。

鬼妖丧胆，精怪亡形。

内有霹雳，内神机密。

洞慧交彻，五气腾腾。

金光速现，下吾真人。⁴⁴⁴

“云”字咒语：

一点乾坤大，一横日月长。

独卵包天下，凶煞肚内藏。

以上这些咒文都需要边写边念，写完咒文，口中的念词也要正好结束。书写文书的仪式就算完成。主人家就把可以把将军箭挂到将军碑上去。这套咒语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道教人物（阴阳先生）是沟通神灵（三教神灵众神仙、真人等

⁴⁴⁴ 关于“罡”字的咒语，还有一套更完整的咒语。请参见任宗权：《道教科仪书概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等)的关键,他通过咒语和画符的方式请神下凡,使这道符获得法力,凭以“掩”去孩童身上不洁的鬼魂,使孩童身体得以逐渐健康。

断桥关:小孩子夜哭,或者生病了,吃药打针都还没有好,就要在阴阳先生那里算一下,要是犯到“断桥关”了,就要找根竹子剖成两半,把里面的关节打通,其长度约与阴阳先生选定的桥梁相当,在竹子内侧写上诸如“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治安村七组孩童王月祥命官所犯断桥关今日奉还从今以后清吉平安 二〇〇八年九月廿五口申开日”⁴⁴⁵,把这片竹子紧靠着桥梁放,两头分别在两岸。如果不用竹子,使用整段树皮也行。

碰干爹:韩先府说:“每个娃娃都要找个干爹的。找个算命先生算一下,于某月某日在哪个将军碑的路口前,背着娃娃,提着香、蜡、钱纸和果品礼物在那里等着。从这里走过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娃娃的干爹,就要拜他为干爹,把果品礼物送给这个干爹,然后在将军碑前点香蜡、烧钱纸,敬神。这个人要给娃娃取个名字,他要是大方,则会给娃娃些钱,月月红(12元)或者四季发财(4元)。每年腊月里娃娃要去干爹家里拜年。一般连续拜三年就不去了。要是等了一天也没有人从这里经过,处理的办法就是:在将军碑前敬神,然后回家去。娃娃也有一个名字,叫‘自碑’。”⁴⁴⁶

可见,道教对于维持水东乡农业人口的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很难判断是道教传统规定了水东乡桥梁结构的发展,还是道教围绕桥梁结构形成了新传统。桥梁不光是联结地缘人群的载体,还是把同一地缘人群朝血缘关系拉拢的载体。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通过修建桥梁,也能看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些不同之处,仅以上里许家湾为例。

福善桥⁴⁴⁷

且□桥不以济世而为善必先济人□以功不成不足为善果不就不足为善□
□之未去一念之未诚者众未□莫□为善□忘岂易□哉然则乘兴之举□□
兴梁之成斯人不病于徒涉矣□□吾大湫者逼近旷野而溪深水涌乏桥济□
在□蒙艰□□□险阻□□□□浅涉涉劳□□遇头□□每□□今□□□

⁴⁴⁵ 2008年12月26日拍照

⁴⁴⁶ 韩先府(59岁)口述,时间:2010年3月15日,地点:上里镇

⁴⁴⁷ 2010年3月15日拍照

□坐者□□□□□□□□可□也□□□□□□□□□□□□□□□□□
 能以□□□□□□□□□□□□□□□□□□□□□□□□□□□□□□□□
 是以以为序□□廷各□□□□□□□□者众姓勒石□□□远

第一横排	第二横排	第三横排	第四横排	第五横排
首 杨虞□	杨万□	□正明	陈□英	韩树□
魏继堂	刘嘉成	□□和	魏□朝	景正喜
魏继□	杨□□	杨□□	杨□镛	张治□
事 刘廷华	杨 □	各上钱一千二百	刘绍达	文正武
武生 韩 柱	杨正□	杨德斋	杨俊镛	杨肇□
文生 杨攀华	刘万□	许万寅	杨正□	彭崇俊
各上钱十五千文	上钱□□□□	杨 □	杨正□	许□□
		各上钱一千五百	杨 □	□□□
			各上钱一千二百	各上钱乙千文

民国六年□月□□立

在大漩头下方，西距玉皇庙约 200 米的地方，1997 年又修建一座桥梁，这座石拱桥长约 4 米，宽约 3 米，它能够承载 2 吨重汽车通过，这是传统石桥所难以实现的功能，其花费应比传统石桥多。其碑文⁴⁴⁸如下：

开发桥碑记

此桥系白马境内大小两旋及许家湾河心头之枢纽。早于道光四年间功修一小平桥，当随其经济发展，然难于行运。乡镇政府关怀群众疾苦，重视其经济开发，倡导集资捐款，并拨款部份修建此石拱桥，独成善果，更名为开发桥。内函之白马人民开拓开明发展发达，众庶为之赞颂。且将建桥始末书碑为记。

公元一九九七丁丑年七月一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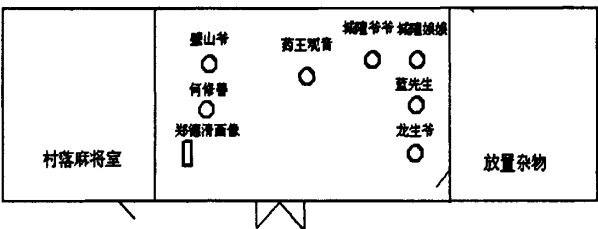
直到民国六年（1917），前清文武生员（同治年间的藏字石塔上亦有其名字）依然是地方社会公共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组织建桥的“首事”则连功名都没有，但他们能够联络相关人群出资出力进行地方建设活动。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 年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人群后代中，倡导集资捐款的主体变成了“乡镇政府”，“并拨款部份”修建石拱桥一座。

⁴⁴⁸ 2010 年 3 月 15 日拍照

第二节 金花庙、子母庙和玉皇庙

庙宇是乡村社会历史的沉淀器与存储器，它既保留有长期相对稳定的部分，又有不同历史时期叠加上去的部分。水东乡庙宇的复杂性，特别是众多不同庙宇中神灵系统的复杂性、庙宇与庙宇之间的关系、庙宇自身的历史沿革，这不光参合着每个庙宇附近人群的历史及当前关系，还继承了更大地域范围内不同知识传统竞争与妥协。围绕庙宇所形成的民间信仰成为广泛联系各处人群进行地方公共建设的重要纽带。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水东乡庙宇就进入了缓慢恢复的进程。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郑湾村五队的“山边佛堂”。这座“山边佛堂”的房子，是大队的公房，周围是梯田，芦山岗东面林地保护较好，山水基本能够供应这些梯田用水，能通大货车的机耕道一直通到房子门前。据郑守安老人讲：“邓小平上台，土地下到户，我就把公房买下来。我的孃孃一直是出家人，她叫郑德清，我请她到这里来看房子。八十年代房子里就有菩萨了。”⁴⁴⁹郑湾五队地处芦山岗的东面山腰位置，离五甲口场、中里场各约 12 里。除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外人是较少走到这样的山上来的。在自己居住的房屋里塑菩萨像，这种曲折的庙宇恢复方式，反映了水东乡民间信仰顽强的生命力。



图表 14 山边佛堂诸神格局图

郑守安老人讲：“蓝先生专门给人医病。龙生爷管庙子，每吃一顿饭，他就记帐。何修善是我孃孃生前的好朋友，她有天托梦给她的家人，让他们把自己的像塑到我孃孃的旁边，要和她在一起。”⁴⁵⁰关于“壁山爷”，杨世松说：“壁山爷的本来读音为‘壁山岩’，雅安县方言里，‘岩’读为‘爷’。壁山岩的意思就是岩石陡峭，悬崖峭壁。壁山爷是山神，他和土地神一样，只不过身居山林。山上路边有时也会有小山神像，俗称‘高山爷’。上山打猎的人要备香蜡钱纸敬他，

⁴⁴⁹ 郑守安老人（78 岁）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6 日，地点：上里镇郑湾村

⁴⁵⁰ 同上

才能平平安安地打到猎物。猎人不能太贪，否则要受到山神的惩罚。”⁴⁵¹这座房屋的一部分，目前也是村落里人群娱乐的公共活动空间。时值傍晚时分，麻将室里点了电灯，有四位本队附近的年轻男子正在麻将室里打麻将，两三位妇女在一旁观看。

1992 年是水东乡庙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这年开始，水东乡各处庙宇开始了广泛的恢复重建工作。Flower 对 1992 年太平场丁家村川主庙复建的考察，是较典型的例子。目前许多庙宇的磬文落款时间均晚于 1992 年。“山边佛堂”中的磬文如下：

雅安县中里郑湾大队庙子 弥陀寺主管人郑德清 买磬人郑显通

金火人居士名山县红星乡三大队何元渠造

公元 1993 年癸酉年仲冬月 吉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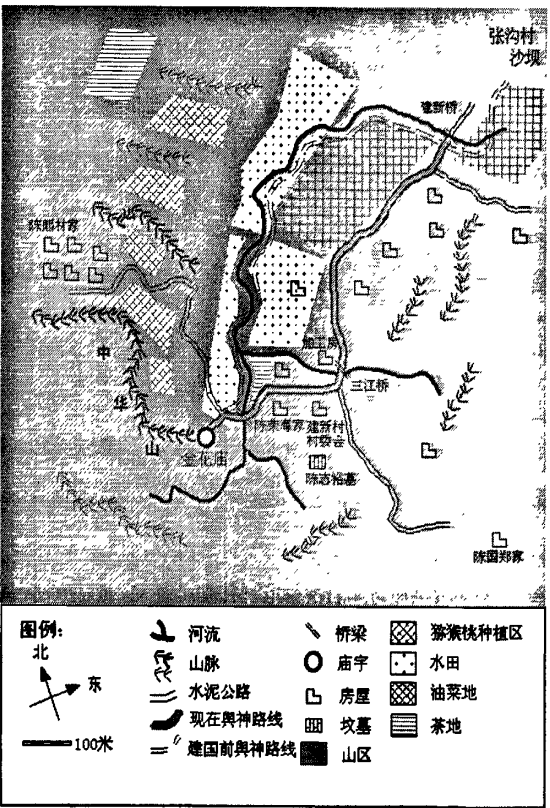
(人名略)

“山边佛堂”的会期为农历三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

金花庙的今生与前世

金花庙的地理位置：

金花庙地处中里镇建新村 5 队，周边人户多姓陈，小地名叫陈家沟。有三条小河沟在这里汇集，因此还有一个更小的地名叫三江口。金花庙坐落在中华山的收尾处。中华山是芦山岗向东伸延的一个小分支，陈家沟处于山脉向平原过渡的地带。金花庙周边的经济种类，以水田和油菜地为主，间有一些茶地。最近两三年建新村至中里场的沿路水田被当地人承包，每年 500 元的承包费，用于种植猕猴桃（当地人称之为毛梨儿），总共约计 500 亩——600 亩，今年有些已能挂果收获了。



图表 15 金花庙地理位置图

⁴⁵¹ 杨世松（37 岁）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6 日，地点：上里镇郑湾村

二〇一〇年“迎会”

金花庙老庙期为农历二月初一和七月初一。农历七月正是农忙收玉米的时候，会首陈荣海把七月初一的会期提前一个月，改为六月初一。只有二月初一的会期才有“迎会”，六月初一没有“迎会”。至于为什么，谁也说不上。此次庙会期间，有两位妇女背着背兜，在三江桥各摆一处卖香蜡钱纸。一位白须髯髯的老人，则摆出《五公经》和各种符籙，坐在建新村村委会紧闭大门的门口。

二月初一会期最核心的仪式就是“迎会”（又叫“迎神”），总共九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下殿”。上午 11 时整（即午时），会首组织年轻男子五人来到楼上。抬金花太子之前，由书写文书之人给金花太子点三柱红香，作揖，向他通告：将要抬他下殿了。烧香之人通告完毕后，手里拿着红香走在前面，金花太子的弟子和司祭（庙会承头人）则在旁侍奉，五名年轻男子则抬着金花太子（连木椅一起）下楼，放在三殿的正门屋檐下。

第二个环节“更衣”。会首让这几个年轻人把早上披到金花太子身上的一大堆红拿下来，从各处献给金花太子的新衣服中挑一件，给他穿在身上，把脚上原有的鞋和袜子脱掉，重新换上新的白布袜子和花鞋子。鞋子为小脚尖尖鞋。然后端正金花太子的帽子。之后，再把一匹红披在金花太子的肩上，并用新红轻轻擦拭金花太子的脸庞，拂去尘埃。从整个外貌衣着装束看，金花太子是一位女性形象。会首陈荣海说，金花太子是男身女相。换新衣期间，五名年轻男子轻手轻脚，不出一声，旁人则在一旁观礼。此时阳光正好照在金花太子的脸上，金花太子的微笑染上一片灿烂的金光。



照片 17 左四陈荣海、金花太子、左六陈国邦

与此同时，一部分老人（主要是老年妇女，约 30 人）则已经拿着自制的小旗帜，等候在金花庙门外。旗帜有红色、藏青色、红蓝相间横条纹色、黑色，大小不一，质地不一。还有一位老人打了一顶直径约 1 米的红布圆伞。老人们把这

些统称为“伞旗”。金花庙门前 20 米开外就是水泥马路，那里早已停了一台微型长安小货车，货车车厢打开了两面，等待金花太子的到来。

第三个环节“舆神”。过去没有汽车，则用竹竿抬，现在有汽车了，则使用汽车载。此时，打旗帜的老人们已经在汽车前面排成左右两列长长的队伍，等待出发。汽车前方，一只大红鼓由两名男性背着，一名女性来敲鼓。节奏轻快。抬金花太子的五人则站在车上，金花太子左右各站两人，身后站一人打了一把黑色的新伞，给金花太子遮阳。

第四个环节“敬神”。由书写文书之人在车头前烧纸钱，点燃红香，一个 40×50 厘米见方的木托盘上，放着两个青菜头，左右摆放，青菜头上各插三柱红香，各插一支黄烛，托盘里面再摆些纸钱。书写文书之人拿一大把青香，在车头纸钱上点燃，然后由另一名妇女分发给排列队伍的每位人，每人一只点燃的青香拿在手里。开车的司机也来车头烧纸钱，作揖。此时，车后三名老者敲起了小鼓、铜锣、铜铙，以殿后。

第五个环节“巡行”。队伍的最前面为两个年轻男子，一名男子背背兜，背兜里面放了许多鞭炮，一名男子手拿一只红香，另一只手拿一个竹夹子，专门放冲天小鞭炮。随后是打着伞旗、拿着青香的两列队列，其后是一面大鼓，其后是金花太子的弟子捧着托盘，其后是金花太子，其后为殿后的四名敲打小鼓、铜锣、铜铙、铜钹之人（书写文书者此时专司铜钹）。走在前面队列中的老人们，则隔一段距离就在马路的右边插一些香，黄烛，烧一点纸。问其缘由，老人们说：“这是在给金花太子引路，同时也是烧给沿路的土地菩萨和各路神仙，告诉他们，金花太子来了，他们不要来挡道。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他（指金花太子）的右边插香、烧纸。”

队伍人数约有 70 人左右，老人居多，其中也不乏青年男女以及儿童，他们来自上、中、下三里，建新村人居多。走出一段距离后，人们不再按照队列行走，而是把整条道路占满。在空旷的乡间田野，这些相互不完全认识的人们，在神的名义下聚集在一起，没有统一的命令和口号，然而人们行动一致，他们缓慢行走，祈祷金花太子保佑家人清吉平安。轻快的鼓乐声、劈劈啪啪的爆竹声，衬托着人们的默念善行，这的确给身临其境的人一种浩浩荡荡的震撼和无法把握的神秘感。前方的老人每往前走一段路，则回过身来，朝金花太子行注目礼，手捧青香

作揖，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和哀求，嘴里低声地念着心里的愿望，希望得到神的眷顾。迎会的路程不远，约1里多路程，到建新桥止。过去的老路是沿着河沟走的，最后到达的地点比现在的地点稍微远一点，在今天张沟村的沙坝。约走到一半的路程，会首陈荣海拿出一匹红来，开始边走边撕出1厘米宽的小布头。行进的速度很慢，一里路约走了30分钟。

第六个环节“分红”。建新桥是建新村与张沟村的村界，桥则属于建新村。前面队伍走到建新桥后，老人们坐在桥石栏上等着金花太子的车过来。金花太子的弟子也端了案板站在桥上等着。车在桥头调头之后，金花太子的弟子把案板放在车头前方的地上，向大家说：“现在大家可以丢香火钱了。丢了香火钱，保你一年顺顺利利。”于是，随行的人们则开始相继献出一元两元钱。凡是献钱之人，则有专人把会首陈荣海撕出的红带子送给他，让他（她）捆在腰间，美其名曰“金腰带”。人们看到能够得到这一条“金腰带”，于是纷纷开始捐献。一人使用塑料袋子来装钱，一人则专司分发红带子。给红带子期间，大家都是熟人，分发人则要说一些祝福的话语，诸如“带带红，代代红，子孙万代都红”，清吉平安，发财兴旺之类的话。有人还捐献好几元，索要好几条红带子，想必是给即将外出打工的家人索要的。其间，分发红带子的人还要唱佛歌，其他人则附和其最后的“南无阿弥陀佛”。旁观者，则以山歌回之。两人在人群围成的圈中开始对唱起了山歌。这样热闹的氛围持续约15分钟。

第七个环节“显灵治病”。一些老人迫不及待的请求金花太子的弟子给他们治病。金花太子的弟子则站在车头前面，明媚阳光下连连打哈欠，双眼流泪，开始捏着病人的头部、手脚，开始了金花太子显灵治病。老人们围站在金花弟子的前面，等待着神灵给他们消除折磨他们整日整夜的病痛。这种特殊的治疗方式进行时间不长，约几分钟，不过金花太子的弟子看起来已经很累了，因为他不断地打哈欠，流眼泪（当地人称之为“神上身了”）。司机则赶忙过来对人们说，回到庙子里再治吧。治病的老人们这才散去。司机让其他人端了案板，让金花太子的弟子休息一会。

第八个环节“回庙上殿”。金花太子的队伍按照原路返回，之前走在车头的二人扛大鼓，换在了车后敲打。金花太子的车走在最前面。队列中的老人在回去方向的马路右边插香、点蜡、烧纸钱。等到回到庙门时，时间已过去1个多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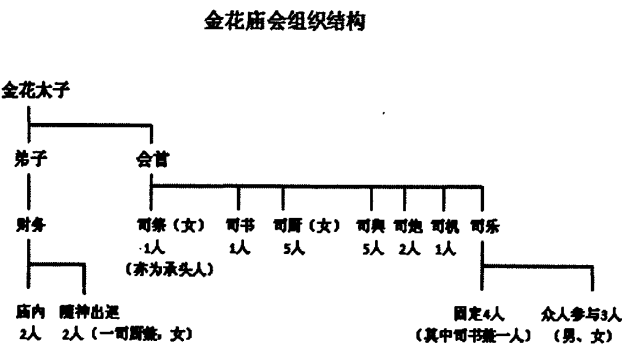
金花太子被抬回三殿二楼之后，金花太子的弟子则在三殿一楼继续给人医病。许多人身上都捆着红色的“金腰带”。一殿门口处则是捐资登记处，一人收钱，一人记账。

第九个环节“吃斋饭”。赶金花庙会的人，不一定与金花太子一起出巡一周，但是所有来的人都要吃斋饭，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幼。据说吃了斋饭，一年到头消灾免难。斋饭是素食，有烧土豆、烧菜头、煮海带、凉拌粉丝，豆腐渣菜汤，没有肉。来赶庙会的老人会带些米来，年轻人则多捐钱（有部分老人既带米，也捐钱）。头殿摆放的六张桌凳坐满了人，每张桌子坐了不下 10 人。还有约 20 人站着吃饭。二殿和三殿约有 30 人。加上一些来上香吃饭就离开的人，这次金花庙会总共约计 120 人参加，人群范围主要是水东乡上、中、下三里。

陈荣海说：“这次的庙会人不太多，原因是头天本村过世了一名老人，很多人都到这家去了，没有过来。另外，今年季节比较好，芽茶价格好，很多人忙着打茶（即采茶）去了，也没有来。金花太子见不得生死。”⁴⁵²所谓“见不得生死”，就是说，家里有丧事和生小孩子的人户，都不要来参加迎会，这是金花太子迎会时的禁忌。陈荣海说：“过去放炮是用铁炮，不是今天的鞭炮。根据老人的回忆，前几年我们重新作了一个铁炮。过去放炮时，把火药装好，一般是三个铁炮连在一起，一放就是三响。”⁴⁵³

金花庙会组织结构：

金花太子（神）是联结庙会组织的关键，人们以神的名义组织在一起。据我观察和访谈，综合起来，金花庙会组织结构如下：



图表 16 金花庙会组织结构图

⁴⁵²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6 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⁴⁵³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6 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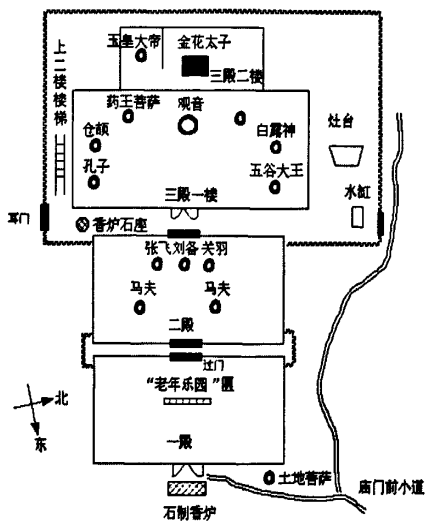
金花太子的弟子（陈国郑），是庙会组织中的灵魂人物，他是金花太子显灵治病的附体，也是庙会财务的最高管理者。陈国郑的儿子陈茂川是财务人员的总管，他坐在金花庙门登记人们的捐献金额。会首（陈荣海）是具体组织庙会各项开展的领导者，庙会前两天，他就要到陈家沟各户人家那里去布置工作，哪些人负责烧火煮饭，哪些人负责挑水，那些人负责搬桌子凳子，哪些人负责抬神。陈荣海说：“很多人都是自己说做哪样，然后我就这样定下来的。大家都是自愿的。需要提前买东西的钱，从陈茂川那里支取。陈茂川一起去采买东西，他非常严格和节省，每斤小菜多少钱，都要和别人讲半天价。我从来不管钱，只管做事。”⁴⁵⁴ 弟子和会首之间相互依赖，弟子更多的是管神事，会首更多的是管人事。没有弟子，庙会就失去灵验内核，会首失去轴心；没有会首，弟子也无法组织人员操办庙会和迎会。陈荣海说：“陈国郑小气得很，只要我一发火，说我不干了，他就要哭。”⁴⁵⁵ 陈国郑是陈荣海姨娘的儿子，岁数比陈荣海大很多。司祭的职责主要是指导来赶庙会的乡民烧香，并代乡民向神通明。司书和司乐是会首请来的。司书坐在三殿二楼金花太子的旁边，负责给乡民书写通明文书，其用印印文为“道经师宝”。据我观察，来写通明文书的人很少，我只看到一个人来写过。庙门以及三殿一楼观音像前的香火则很旺。司厨、司舆、司炮、司机，都是陈家沟的，都是自己要求作什么，陈荣海就安排什么。司机给名山县老板开车打工，他每年都自愿开车来。敲大鼓之人是参加庙会人员自愿轮流去敲，主要看技术好坏，没有严格限制谁可以敲，谁不能敲。

金花庙的建筑和诸神格局：

金花庙最早复建的是今天看到的三殿，木结构，二楼，房顶盖瓦，通过房屋旁边的木质转角楼梯上二楼。二楼楼板较薄，缝隙较大，人在上面踩着微微能感觉到上下颤动。三殿室内面积约 60 平米。其后的十年间，相继在三殿的下方位位置修建二殿和一殿。一殿、二殿室内面积分别约为 50 平米。

⁴⁵⁴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6 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⁴⁵⁵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20 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图表 17 金花庙建筑及诸神格局图

金花庙毁坏与重建：

关于金花庙的毁坏，陈熙材老人讲：“金花庙毁于 1958 年大炼钢铁期间，约在 60 年代拆完的，把房子里的木头拆去修乡政府的电影院。房子上的瓦上都还有名字——中华山。金花庙坐落的位置就是中华山。它的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戏台，过去庙会都要唱戏的。”⁴⁵⁶

金花庙重建于 1994 年。从金花庙的横梁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初建设者们的名字如下：

一根梁：“公元一九九〇年甲戌孟春月□十九日”。（字迹模糊原因是墨汁在木头上溶化了，估计与墨汁质量有关。）

二根梁：“金花弟子陈国郑 主持人 陈荣海 陈熙寿 王加坤 陈国元 陈荣禄 陈荣贵 陈国顺 □加茂 □□贵 陈茂川 杨□□ 陈茂春 □□□ □□□”。

三根梁：“设计师 陈子泰”，“木工 王嘉坤 陈清业 陈茂光 陈茂林 陈茂坤 席永忠 陈子忠 陈国庆 陈茂楷 陈文远 陈茂洪 陈茂福 杨树洪 杨树辉 杨树祥 陈□□ 吴□洪 陈茂□”。

⁴⁵⁶ 陈熙材老人（93 岁）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6 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陈熙材老人 15 岁背茶包，刚开始就能背 7 包茶。有文化，年轻时做过道士（即阴阳先生）。老人耳朵灵敏，思维清晰，表达流利。老人语音不清楚的地方以及老人听不懂我的提问时，承蒙陈荣海和杨世松转述。特此感谢。

四根梁“石工 陈明福 陈荣安 陈昌伦 张朝祯 张在林 刘世明”。⁴⁵⁷

关于它的重建经过，金花庙会当天（2010年3月16日），司厨之一的汪蒂莲就要求陈荣海再给大家讲一下他承头修庙子的故事，她说这件事情好笑得很。陈荣海就在众人前对我说：

过去开加工房，一直不太顺，打粉机老是坏。我就到金花庙的遗址去烧纸，说：“保佑我加工坊顺顺利利，我就给你修庙子。”没过几天，陈国郑来找到我，说他心里不舒服得很，身体也难受，原来是金花太子把他收为弟子了。陈国郑把我说给金花太子的许诺说了一遍，居然完全吻合，（这时汪蒂莲在旁再次哈哈大笑，说：“真是笑死人了。”）金花太子的意思就是要我出头来修庙。我对陈国郑说：“你先回去吧，过了今晚我就给你修。”陈国郑这天晚上身体就一下子好了。（众人哄笑）

第二天，我就宣布要修庙子了。从正月初一开始动工，那时什么也没有，上中下三里到处去化缘，要米、要钱，要木头，人家一听是修金花庙，大家都乐意出钱出物。房子的大木头没有哪家人能够出得起，陈家沟的人（建新五大队）出了四十几个人去芦山县买，搬回来。第一排房子（即现在的三殿）钱花得不多，但是木匠有二十几个（意指费人工），都不要钱，自愿来做的，只管伙食。正月十六就修了起来。⁴⁵⁸

3月20日，我再次拜访陈荣海，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陈荣海把前因后果讲得更明白了些：

建新村1、2、9队要建三仙庙，这是个新庙，没有老庙基。当时他们到处化缘，3、4、5、6、7、8、10这几个队基本姓陈，他们也捐木头或者米，每家捐一根木头。这些木头都堆在三仙庙那里，准备修了。

有一天，陈国郑突然开始唱四句歌，他没有文化，从来唱不来歌的，结果开始唱歌了。三天三夜不吃饭，不停地嚎，用手捶胸脯，捶得咚咚的，用手打地，打得啪啪的，他到金花庙的老庙基那里去嚎，然后又到三仙庙那里去嚎。原来是金花太子找到他，要他给金花太子修庙子，不

⁴⁵⁷ 2010年3月20日拍照

⁴⁵⁸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年3月16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修的话，他就恼火得很（即身体难受）。晚上陈国郑就回家了，第二天又这样。看着陈国郑整天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我傍晚到他家去说：“你不要闹了，我来给你修庙子。”没想到我这样一说，当天晚上陈国郑就安静了。陈国郑后来说，他的身体也好多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我就开始动员大家修金花庙。3、4、5、6、7、8、10这7队的人一听说要修金花庙，大家就跑到三仙庙那里，一声不吭，扛起自己捐的木头就走，扛到金花庙的老庙基来。这个老庙基当时还是8队的玉米地，陈国郑用自己6队的田把这块地调换了，捐出来建庙子。庙子每年给陈国郑200斤大米，5年前就改成每年给他100斤大米。⁴⁵⁹

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村内部地域间人群的竞争、重组和联结，庙宇是重要方式之一。金花庙所在的位置为建新村5队，3、4、5、6、7、8、10这7个队基本围绕在金花庙的周围，1、3、9队（陈姓较少）距离金花庙较远。陈姓又是7个队这片地域内的大姓人群，以陈姓人群为基础联络这片地域社会其他姓氏人群建设庙宇。从庙宇组织建设来说，基层市场之内的地域人群承担了主要工作，但从出资、出物来看，整个水东乡都有贡献。庙宇的复兴，从一开始又是超出基层市场范围的。村级之下的小队（小组）行政制度安排，深刻影响着今天乡民参与本地公共活动的范围。

金花庙一旦恢复，其信仰范围立即在整个水东乡甚至名山县都具影响。陈荣海讲：“金花庙重修期间，名山县的居士婆婆就来，刚开始的时候100多、200多人来，过了两三年，这边（庙会）兴起来了，就不怎么来了。‘金腰带’（即分红）就是前几年我们参加名山县的庙会学回来的。她们来参加我们的庙会，我们也要去参加她们的庙会，就象走人户（即走亲戚）一样。参加我们（金花庙）庙会的人有名山、天全、芦山、宝兴的人，很远的都要来。”⁴⁶⁰金花庙磬文如下：

雅安县中里镇陈家沟金花庙铸庆名单
主持人 郑显通 郑果平 张在芬
众居仕
（名单请见附录）
金火匠人

⁴⁵⁹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年3月20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⁴⁶⁰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年3月20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名山县红星乡罗弯村何元梁造
公元一九九四年甲戌孟夏月日铸

为了避免政府干预和阻挠，乡民制作了一道“中里镇老年协会建新村活动室”的立匾挂在房子里面⁴⁶¹。2010年一殿水泥地打好后，陈荣海就把“老年乐园”横匾树在了一殿正中的照壁上。其匾文⁴⁶²如下：

恭贺 中里镇三江口旅游区

老年乐园

(名单请见附录)

二〇〇四年二月初一日 杨在福书刻

不同地域范围的庙会组织者之间的交流学习，也不是以基层市场或者行政区划为界限了。陈荣海提到的这四个县，在历史上正是经水东乡背茶去打箭炉以及在宝兴县中转去大小金川的重要州县。“天芦宝”是人们常常联在一起说的，这显示了这三个县在历史上的某些内在联系。

关于金花太子的来历：

金花太子本来是白马泉的人，他成了神后，先落脚在马场庙（音，在金花庙的附近）。一天晚上，马场庙（音）旁边的人听到庙子里有人吵架，后来还打了起来，听到扇耳光的声音。第二天，这个人去庙子里看，金花太子的脖子歪着的。原来是庙子里的神仙在打架，金花太子被打歪了脖子。金花太子就托梦给他的弟子，说他在这里呆不下去了，要搬到陈家沟的三江口去。这个得到托梦的弟子，就把金花太子安放在了今天的三江口这个位置。⁴⁶³

关于金花太子的故事：

金花太子下江南，扯把草草熬药就救了万民，他的医术非常高。⁴⁶⁴

⁴⁶¹ 2008年我第一次到金花庙里时，在还没有修好的一殿处看到过这道立匾。2010年3月去，一殿已经修好，但没有看到这道匾了。

⁴⁶² 2010年3月16日拍照

⁴⁶³ 陈熙材老人（93岁）口述，时间：2010年3月16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⁴⁶⁴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年3月16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关于金花太子弟子的故事：

故事一：

金花太子最初找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在中里陈家沟治病救人。雅安县的知县阮太爷得知这件事，就差了一个人到陈家沟。当时，这个弟子正在犁田。阮太爷的差人说：“县太爷喊我来拿你。你以后不准在这里招摇撞骗，骗人钱财。”这个弟子说：“我没有骗人啊，你要是不信，我可以到公堂对簿，不过要县太爷派四人大轿接我去才行。”这个差人哼哼两下，说道：“你口气倒不小啊！”这个弟子一言不发，把耕田的牛抱起来，放到溪水里把牛脚洗干净，把它拴在树子上，然后回家去舀了瓢水，做玉米馍馍。阮太爷的差人看到这个情形，估计自己打也打不过，拿也拿不下，只得回去禀报阮太爷。

阮太爷为了看个究竟，就派了一顶轿子来接他。等他们走到一半路程时，这个弟子先露了一手，用弓射箭，连射三支，全都落在知县衙门里。这个知县心里想：“你有本事，那我不给你渡船，看你怎么过来。”他们一行人到羌江边的岔口庙（笔者注：今雅安旅游车站附近，羌江北面），没有渡船摆渡。这个弟子戴了青布帽子，抽出宝剑，拿出钱纸，把钱纸穿在宝剑上，丢了一张钱纸又一张，这个钱纸在羌江里居然不跟着水流走，定在水面上。这个弟子就踩着羌江上的钱纸，过了羌江，来到县衙门。

知县想：“这个人还有一点本事，让我来考考他。”知县就说：“你讲讲我的身世，要是你讲对了，我就准许你治病救人，还送你鱼骨头作的软椅子。”这个弟子说：“千脚落地流流瓦，扭转乾坤出生地”。所谓千脚，其实就是竹子编的篱笆墙，这样的墙由很多跟竹子排列组成，所以就是“千脚落地”。房子上盖的则是茅草，风一吹就跑了，所以叫做“流流瓦”。

“扭转乾坤”指的是推磨。这个弟子的意思就是，知县老爷你们家以前是个推豆腐卖的，家里很穷，不过就是考科举，考中了秀才、举人，中了进士，做了官了。知县听到这个弟子揭他的短，又气又怕，要把这个弟子赶出雅安。这个弟子就说：“你敢把我赶出雅安，我就让老天下雨，城外下一点雨，城内就下三点雨，淹死你。”这个知县听了这话，被吓坏

了，赶忙答应，让这个弟子从此行医治病救人，还给这个弟子送了一把鱼骨头制作的软椅子，以及一副方袍玉带。⁴⁶⁵

故事二：

金花太子的弟子正在背茶包，当他歇下来休息的时候，猛然想起明天就是金花太子的会期了。他赶忙把拐子往地上一柱，把茶包放在拐子上，靠在岩石边，往中华山飞奔。来回需要半个月的路程，金花太子的弟子一夜就赶回来了，及时回来主持了庙会。半个月后，等他回到放茶包的原地时，他的茶包都还好好地放在那里，没有倒！⁴⁶⁶

关于金花庙与其它庙宇的关系：

金花太子的娘家在白马泉。凡是天干不下雨，我们就要把他抬到白马泉寺庙里供起，求雨，等到下雨了，我们才把他抬回来。1997年，天干，我们用四个人把金花太子抬到白马泉寺庙里供起，结果两天后就下雨了，非常灵验，我们就把他抬回来。这么多年了，当年抬金花太子的竹竿还是没有生一点虫。⁴⁶⁷

关于金花庙的文物，金花庙现存一方香炉石座，其上有字，一面为：“景泰二年造”，另一面为：“香炉石”。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们看到了水东乡地域间人群的结合方式，是以庙宇之间的结合方式得以实现。分别地处两个基层市场的庙宇，通过两个庙宇的神灵，把两个庙宇周围的人群联系起来。金花太子具有两大灵验，一个是治病救人，一个是祈雨。金花太子的弟子为乡村中的平民（种植水稻和背茶包，这正是过去水东乡两大经济收入）；金花太子的弟子与雅安县知县的较量，反映了官府官员来自民间底层而忘本、官府权威必须承认乡民的利益和力量。金花庙会与名山县的庙会相互呼应，组织者和参与者相互参加，这是把各自联系的地域社会人群，通过两个庙会联结起来。水东乡的通婚关系与外出结伴打工，又因庙会之间的联系而

⁴⁶⁵ 陈熙材老人（93岁）口述，时间：2010年3月16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⁴⁶⁶ 陈熙材老人（93岁）口述，时间：2010年3月16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⁴⁶⁷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年3月16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得以扩大到水东乡地域范围之外。

金花庙的历史：

金花庙会與神出游是从 1997 年开始恢复的。目前，水东乡庙宇会期與神出游的，仅此一家。金花庙会过去使用的铁炮，有些象火武器——铳。老庙会期之一为农历七月初一，如果排除时代变化和气候变化因素，这种会期与农业人群的农忙农闲时间并不协调。金花庙会独特的传统里，还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呢？

金花庙周围人群多姓陈，他们有统一的排行，属于同一宗支世系，其宗支碑深处山间，惜未得见。金花庙旁 300 米处有同治四年（1865）陈志裕坟墓，其墓碑碑文⁴⁶⁸可以作为有关这支陈氏人群历史的重要参考：

陈公 讳志裕墓志

始祖 陈仕、谢氏，系胡广麻城县孝感乡，自明时入川落业本境。

二代祖陈自舟、马氏；三代祖陈（王立）、许氏；四代祖陈朝良、张氏；五代祖陈策、郑氏；六代祖陈美玉、杨氏；七代祖文生陈新凯。今陈公讳志裕者，乃陈公新凯之元孙，陈公思信之曾孙，廩生陈公思儒之侄曾孙，陈公永发之孙，陈公良造之子也。

公之生母陈氏，生公一人，妹二人；庶母刘氏，生妹一人。公秉性淳正，处世和平，持家有道，辛苦备尝，立业无间，勤俭臻至。幼而力学，虽未□□□青年，老而承恩，幸而得宠锡于白首。

公娶太学生张公讳性之二女□□□敬戒之懿范，普慈惠之和光，位正悃内，相夫子而有方，职司馈中，作母仪而无愧。公生二子三女，长子学诗，娶熊氏，生一子在宦，娶名邑武生杨氏女。次子学礼，娶景氏，生子在相，娶杨氏、景氏，卒，续娶朱氏，生一子一女，子在林，娶任氏、朱氏，又卒，再娶卢氏，生一女。公之三女俱适名门，毋容赘叙。

所书者，公之二子贤孝绕膝，公之数孙耕读成家，目今二老齐眉，一堂聚首，盖由二老之德□洋溢于无穷，二老之家政流传于不朽云。

邑庠生陈继昌拜撰并书

⁴⁶⁸ 2010 年 3 月 20 日拍照

同治四年（1865），陈志裕尚在世，他已是第十一代⁴⁶⁹，他以下还有三代。显然，这支陈氏人群明以来就居住在此。金花庙能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恢复，庙会能够复兴，这与这支明以来居住在此的陈氏人群密不可分。陈熙材老人长寿以及他对陈荣海的指导，则是金花庙会仪式能够初步复兴的重要因素。

考之民国《雅安县志》，同治四年（1865）雅安县学教谕萧鸿吉撰有《金华庙碑记》，其全文如下：

同治四年夏，农功方急，雨泽衍期。建南观察关西冯公念切民依，恭率僚属，禱于金华庙，立应。公喜甚，躬亲报谢，毕，进鸿吉而命曰：“神御灾之灵如斯，则往日捍患事必非诬。君宦雅久，备知其详，胡不实纪以贻后，使永绵祀事于勿替乎？”鸿吉唯唯，退，谨撰次复于公。

郡金华神，其详不可考。旧称金华太子太保，后乃分称曰太子，曰太保。其庙雅属多有之，唯雅安中华山最古，有雍正三年碑，言庙系故明天顺二年重修，所祀金华太子神，相传始自唐时，祈晴祷雨，其应如响。故历代崇奉焉。有上、下二院，上院即中华山，下院则白马泉是也。相去十余里。庙较宏壮，有明嘉靖三十三年碑，及景泰二年钟，所纪神事，与前碑同。是神之崇祀，相沿已久，然府志遗弗载，维载泰宁营庙，称神为十三太保之第五太保。夫十三太保，后唐太祖李克用后也。当时王建据蜀，升雅州为永平军，迨庄宗灭蜀，令任圜、张筠辈分道招讨，雅为节镇，势必受兵，岂神生在行伍间，有功德于斯民乎。虽史无明文，难以臆断，然证以明碑，始自唐时语，则志言固不可谓无征也。

第称曰太子，曰太保，犹未称为世王。称世王，则自蓝逆攻城始。贼之攻城也，在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五日，时勇单城卑，人心惶惶不自保。先是，贼未至前两月，民间忽传神言：“贼至，吾以神兵相助，尔小民勿恐”。初不知说自何起，纷纷藉藉，城乡皆遍然，而人心惶感，弗敢信也。及贼方抵城，而天府所调建昌兵四百名适至，转战入城，登陂助守，于是人心始固。家家奉金华神牌以祈佑，而贼之攻，则昼夜弥急。十一日薄暮，萧公嘴城陷数丈，城内哭声震天，以为破在顷刻矣。至夜分，贼渐退，比及天明，城外不见一贼。守城者咸疑怪，弗敢出。邑绅李赞元

⁴⁶⁹ 陈志裕的夫人为张家沟张性之女，张怀珍、张怀琨是陈志裕的妻弟兄。请见第六章第二节，张怀珍墓碑。

独驰一骑，往覘焉。第见釜甑刀匕抛掷满地，似将食而遽弃以遁者，不知何故。后有贼中逃归者言，是夜城陷，贼方率众闯入，忽见城上火光照耀如白日，旌旗密布，上皆书‘金华世王’字，且飞石如雨，贼受伤者甚众，蓝逆亦击损头颅，血淋漓被面，登时率众窜周公山，伏不敢动。于是万众欢呼，遂改为金华世王，相率醵金建庙，且上书大府，乞奏请封号以答神庥。部议不允，民心歎焉，愈恢宏庙貌，使壮丽称神威德。

夫神受职于天，犹人臣受职于君也。古名臣削平大难，尚耻言功，岂聪明正直如神者，肯以功求祝，而介介于封号有无乎。然神虽无求于人，而人之报赛，则自有不敢废者焉。故鸿吉敢承观察公命，实录其事，以昭神御灾捍患之大功。庶他日莅斯土者，得有所考，而永绵祀事于勿替也。

以此看来，金花庙应为“金华庙”。萧鸿吉所指的中华山，即今天“金花庙”所靠的山脉。陈荣海说：“金花太子是请下里的木工雕刻的，他只会雕头、手、脚，身子不会雕，身子雕得不好。使用丁木树，这种木头质地轻而柔软，不容易裂缝，多用于雕菩萨。”⁴⁷⁰金华太子的形象由男性变成今天的女性外形，是否与他的名字“金华”、“金花”混淆有关，不得而知。上世纪九十年代帮助



照片 18 金华太子的尖脚花布鞋

金华庙会复兴的名山县居士婆婆们，是否影响到金华太子的形象塑造，亦不得而知。参加金华庙会的女性约占 6-7 成，人们贡献给金华太子的衣、帽、鞋、袜，均由各地居士婆婆缝制，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到金华太子的形象塑造。

同治年间的金华庙里尚有景泰二年（1451）钟，现存香炉石上的文字与之吻合；金华庙里原有嘉靖三十三年（1554）、雍正三年（1725）碑，现已损毁无存。明代中华山、白马泉为上下二院，上院在中华山，这可能意味着水东乡这片地域最早得到开发的地方在今天中里的位置，这里良田广袤。陈荣海命人抬金华太子到白马泉去求雨，这是古以有之的传统了，他的解释则属于现代的新解释。过去

⁴⁷⁰ 陈荣海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20 日，地点：中里镇建新村

金华太子祈雨灵验，如今乡民又加入了能治病的因素。金华太子生在行伍间，为泰宁营⁴⁷¹官兵所供奉，这可能是金华庙会过去放炮用具类似于銃、会期定在农历七月初一的原因。

咸丰十年（1860）金华世王挽救雅安县城的故事（捍患），如今已没人再讲，有关金华太子弟子新故事，则已产生。金华太子搬到三江口的故事，可能是金华庙传播到中华山的路线；金华太子弟子的故事则明显带有地方化的特色，我们隐约能看到本地道教人士在金华太子信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故事一中弟子的穿着、过河法术、求雨本事），金华庙能够在水东乡复兴，与本地道教文化（主要是阴阳先生）融合有密切关系。我们通过这一地方化的过程，看到更多的是历史延续性的一面⁴⁷²。礼部没有批准“金华世王”的封号，估计是朝廷官员认为，雅州地区在这次镇压蓝李起义过程中贡献并不突出。“神虽无求于人”的说法，不过是萧鸿吉在为金华太子未能得到朝廷封号而辩护。事实上，人需要神的帮助，神也需要人的帮助。换句话说，人们在神的名义下团结互助。清政府镇压蓝李起义以后，金华庙在雅州府属州县开始广泛建立，除了军营官兵，一般乡民也开始供奉。与此相同时期还出现另一个现象：祖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传说，在水东乡开始广泛流行。这两种现象应该都与蓝李起义有关联。

庙宇与宗祠

子母庙和玉皇庙的例子，能让我们看到了水东乡产茶区域和茶道区域的乡村基本结构。

子母庙位于中里龙泉村赵家湾，距中里场约2里，属于水东乡中央平原地带。这座庙宇早已被拆毁（时间不详），其庙基已是一片耕地，只留下庙门前的一通高约2.5米，宽约1.2米，厚约30厘米的巨大石碑。石碑周围一两里范围内约有200多户人家，姓赵的人家占绝大多数。农历二月间，石碑周围约有30亩的成片油菜地，开着金黄的菜花，芬香扑鼻；约有50亩的茶树地，晴空之下的人们戴着草帽在其间打新茶；还有数十亩水田，等待节气的到来，灌水育秧插苗。一条从主干道（雅安至上里的道路）引出的支路（混凝土路），从这道石碑前方穿过，一直通向300米外的居民聚居区，沿路基本都是砖石预制板结构的平房或楼

⁴⁷¹ 泰宁营即化林坪营，雍正八年分兵打箭炉外葛达“惠远庙”保护过达赖喇嘛。

⁴⁷² 陈春声教授有关潮州地区双忠公崇拜的研究，则表明北方神明传播到南方时，神明地方化过程中的本地社会变动情况。（陈春声：《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73页）

房。

子母庙碑文主要如下：

正面：

培修子母庙建立宗支碑序

凡根本未固者，枝叶不繁昌；源头未深者，波流难以浩大。故人欲子孙之荣盛，必先广积福田，而人蒙祖泽之□遗，何容悖没先德。我起祖赵马真公，始入川而广置田原，继安居后而尊崇庙祀。爰有庙名子母，世为赵姓宗祠。且有川主神像，□随我祖之负担而来，复有柏木宗图，实与神位之森严并列。阴功积于当代，瓜瓞绵于万年。人人服畴而食德，代代采芹而掇科。何殊木之有根，奚啻水之有源。但经世远年湮，庙貌已近于颓废，所赖孝孙贤裔，规模克整于来兹。廿载以前，聚匠鳩工，既捐资以培修，而堂室如故。百年以后，宗繁族众，不标名而勒石，则世代将淆。

……（以下为宗支世系，从略）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十月初六日立

候选岁进士杨含芳书 余有四代以及原迹为首出赘姓名俱列于后

阴阳赵连泰

石匠张志道

碑阴：

再序

雅绳水东乡，予起祖赵马真公之故里也。考其始迹，原住名山县白土坎，分至雅州黄村，后至罗城中里鱼鳞坝。迄今一十余代。前人未传宗谱，而起祖入川之年，已不可考。大约父子祖孙，俱存心忠厚，为人古朴，故上天祐佑，当猷贼屠川，不遭兵火之厄。所以 明时建竖古房，至我朝嘉庆之初年，犹有瓦屋十数间，依然无恙。其创修之年代不可知，相传已三百余年。至山林田地，先代之留遗者，周围相距数十里，居住金寺坝，后人之因其貽谋□其产茶，得以衣食于 太平时者，前人之功德不容没也。

至近古房里许，有子母庙一所，旧为赵氏香火重地，中有赵氏宗支图，并供神龛，以版为之系。金刚寺僧赵可高之子名照德，书于乾隆五年二月。未经百年，字迹已近模糊。且后来宗繁族众，而版狭必不能容。又康熙二十八年岁次己巳二月二十三日，有赵耀先始为宗支图一纸遗后。近今阅之，亦多阙略。故嘉庆元年，有赵大重等邀宗人共买沙石，置庙门外，欲以宗图刊刻其上。由因募化族众，共相厥成，多寡不一，止于补修庙宇，难以工镌。近今二十四年，复邀族众出贲，建竖宗支，自起祖以至现时成丁者，知无不载，载无不详，则后人见之，而知木本水源之意也。故勒石以志不朽。

……（以下为上接石碑正面宗支世系，从略）

元年播盖宗堂，编泥、买木只板片装修、打宗碑、托工治酒，总共费去银钱拾捌两七钱三分整。

（以下名单请见附录）

这通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培修子母庙建立宗支碑”碑文，同时收录了嘉庆元年（1796）赵氏维修子母庙的出资人名。碑文中两篇宗序为同一人所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庙宇是水东乡明以来老百姓群众家族建设的“天然”场所。国家意识形态“宗族观念”得以在清代的水东乡生根发展，除了宗支碑和祠堂之外，水东乡原有的庙宇空间也成为承载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

子母庙明代已有，其中有赵氏祖先供奉的川主神像。

康熙二十八年（1689），赵氏第一次整理宗支世系，其记录材料为“纸”。乾隆五年（1740）制作的“赵氏宗支图”，这份“宗支图”质地是什么不甚清楚，但我们可以比较两篇序文来推测。第二篇宗序所谓“赵氏宗支图，并供神龛，以版为之系……未经百年，字迹已近模糊。且后来宗繁族众，而版狭必不能容”，这份宗支图应该在“版”之上；第一篇宗序提到“复有柏木宗图”，因此，乾隆五年（1740）“赵氏宗支图”可能就是“柏木宗图”。所谓“柏木宗图”，应是在一块柏树木板上刊刻宗支世系的“宗图”。这个“柏木宗图”长期放在子母庙的神龛上，烟熏火燎之下日渐模糊。关于“赵氏宗支图”为柏木板宗图的猜测还有一个实物旁证。庙坏杨氏至今保存一块嘉庆二十四年（1819）制作的楠木板。这

块高约 1.2 米、宽约 0.8 米、厚约 3 厘米的楠木板上面，刻制的正是庙坏杨氏的宗支世系（有时间落款）。

嘉庆元年（1796），赵氏把培修子母庙叫做“播盖宗堂”，组织者为“会首”。所谓“会首”自然是子母庙庙会会首。赵氏族人基本围绕着子母庙来进行家族建设活动。嘉庆二十四年（1819），赵氏再次培修子母庙，并修新的宗支碑。子母庙为赵氏族人出资培修（包括石匠、木匠均无外姓），庙宇房财自然为赵氏族人所有。这是一次重要的收族活动，当年会首之一的赵大重也是这次的“首事”之首。赵氏族人修庙活动的领导者是一群族老，有耆老，也有获得功名之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赵氏培修子母庙建立宗支碑，应为一次盛大的家族性活动，赵家湾所有赵马真的后人每户都应该参加，因此才会有“赵兆氏”、“赵杨氏”、“赵胥氏”的名字。如果每个名字算为一户（独立开火吃饭）的话，嘉庆二十四年（1819），赵家湾赵氏共有 97 户。与嘉庆元年（1796）的 39 户相比，乾隆以来赵家湾赵氏人口增长非常迅速，整体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才得以完成过去“难以工镌”树立宗碑工作。

中里赵家湾赵氏是种植茶树的农业人群（即“产茶，得以衣食于太平时”之语）。他们围绕子母庙进行的家族建设活动，并不象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上里韩氏开始修建韩氏祠堂那么“有规矩”、“合礼法”⁴⁷³。但是，中里赵氏的做法，在水东乡可能更具有一定代表性。

玉皇庙，处于上里许家湾的入口处，长柏桥及茶道上的拐子窝就在玉皇庙的旁边。许家湾处于邛州至五甲口场茶道之上。直到民国年间，上里许氏都还把玉皇庙的部分空间作为自家的祠堂使用。关于这一点，我与许家湾辈分较高的许兴隆有如下对话：

许兴隆：“现在的皇隆寺，过去叫玉皇庙，是许家的家庙。”

我问：“怎么才算是家庙呢？”

许兴隆：“许家的祠堂就在里面。”

⁴⁷³ 咸丰七年（1857），翰林院庶吉士南溪县包欣芳给上里韩氏写《建修宗祠序》中提到：“窃思宗祠之建，非小弱也，其典甚巨，非等于道观佛寺也，其制甚详，非同于春社秋赛也，且其义至深且远，亦非徒形貌克肖凭式拟也。”韩廷铎亦撰《祠堂家礼》：“祠堂曷为而设也，为报本追远也，为尊祖敬宗也。自天子达于士庶，七庙五庙三庙二庙，虽分异制殊，而展孝思必隆庙，享其情一也。所以世家门第，必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其旁亲之无后，及未立嗣者，以其班附，置祭田，具祭器，朔望必谒，遇节则荐以时食，有事告庙，生子告庙，新妇谒祖先，加冠婚娶必告庙，生辰忌辰必洁诚亲往致祭，游泮等第必祭，受官受封必祭，易世则改题神主，而遷迁之。俾先世灵爽，有所凭依，而孝子之心，有所专继也。（《韩氏宗谱》）

我问：“是不是在庙里设有许家的祠堂？”

许兴隆：“是的。神主牌供在神桌上，旁边有菩萨，有玉皇和灵官，还有其他菩萨。家族里出了不忠不孝的、偷鸡摸狗的人，就要由家族里最老的长辈来主持，把这个人押到祠堂里去，按照家规，该罚就罚，该打就打。”

我问：“现在还有文字的家规留下来吗？”

许兴隆：“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全部烧完了。”

我问：“那玉皇庙的会期是多少呢？”

许兴隆：“2月19，6月19，9月19日。”（这时旁边人补充到：“以前那个灵官是泥塑的。”）⁴⁷⁴

目前，水东乡的庙宇复兴非常快，村村有庙。据本地老人讲，过去整个罗绳幽有108个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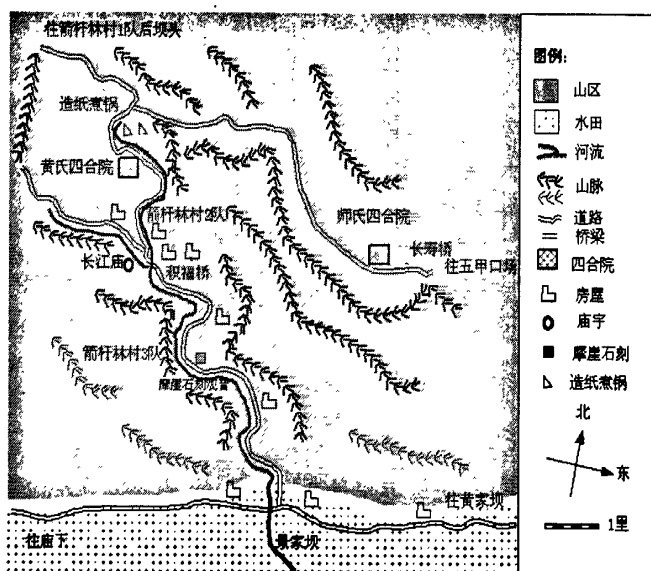
第三节 箭杆林村的一般结构特点

水东乡的老姓，多居住在各条山沟里，如上里许氏最早居住许家湾、上里庙坏杨氏最早居住月儿坝，上里杨氏最早居住杨家沟，上里任氏最早居住任家沟，中里郑氏最早居住郑湾，中里陈氏居住于陈家沟。随着子孙繁衍，因分家而向附近地方搬迁，逐渐形成同姓聚落。因有招赘（三代后就可改回本姓）情况，同姓聚落又逐渐出现异姓。建国土改时期以及上世纪60年代粮食关（即“三年自然灾害”），各姓在水东乡范围内搬迁的情况时有发生。上里庙坏村共7个队，同一支杨氏约占97%，这是上、中、下三里同村同姓最多的例子。庙坏杨氏重建白云庵（2004），庙坏村共7个小队的人户全都捐木头并出力，募资范围则在上、中、下三里。目前整个水东乡的村落，从姓氏人群来看，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状态。水东乡各姓氏人群之间具有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加之“碰干爹”形成的人际关系，水东乡俨然是一个亲戚社会。走在水东乡各处，不论认识与否，第一句话称对方为“亲戚”，人们多会很热情地应答。

⁴⁷⁴ 许兴隆（53岁）口述，时间：2009年2月8日，地点：上里镇许家湾

本节尝试考察五甲口场通往芦山县茶道附近的另一种经济形态村落，来观察水东乡村落所具有的一般结构和特点。

箭杆林村地处芦山岗。从芦山岗分水岭往东面一路下山，依次为1队、2队、3队范围。从景家坝上山，则依次为箭杆林3队、2队、1队范围。这些小队基本在崇山之中，人户之间常常相隔一两座树林密布的山梁，沿路人户基本姓黄，其地理格局如右图。



图表 18 箭杆林村 1、2、3 队地理位置图

在箭杆林村 2 队的位置，一座庙名叫做“长江庙”（其重修时间不详）的石碑文如下：

广种福田

发心施地人黄天嗣因有地一垧坐落庙后其界庙

基角直上上乾沟直上底明元地脚土坎还过抵施主明慧

土坎直下子崗石包白蜡直下抵廟基角合界施舍□

潮江祠合殿位下耕种焚献之费祈保子孙发达兰桂腾芳之兆

石匠任贵昌

施地人黃天嗣李羅氏男明慧妻楊氏孫文鎮□

本邑庠生黃文通書

大清嘉庆十五年孟冬月中浣日立

庙门尚有一石狮座，其文字如下：

狮子正座此地

奉

圣 发心刊刻金狮

子一对 敬献

潮江

川

左右

主大王门首
土 安座
井术□ 保境 清泰
佑四方 安宁
在此赐下 家宅清
□ 人眷平安之兆
付狮虎豹他方

这座“长江庙”过去的名字为“潮江祠”。嘉庆十五年（1810）黄天嗣施舍一块土地给潮江祠，以为祠中日常“焚献之费”。潮江祠内供奉川主神和土主神。

咸丰四年（1854），黄文广在通往五甲口场的道路上请人雕刻一方精美的摩崖观音像，高约 1.2 米，宽约 0.6 米，其旁文字如下：

奉
圣下民黄文广妻杨氏子德乙
发心雕刊
救苦观音一尊系父存日所许自今
功德圆满祈保家门清吉人眷平
安之兆
咸丰四年四月廿二日敬刊



照片 19 摩崖观音像

黄文广的名字最早出现于乾隆五十年（1785）其祖父黄天照的墓碑之上⁴⁷⁵。该墓碑记载，黄文广兄弟俩，其兄为黄文彬。道光十二年（1832）黄明映的墓碑上，“祀男”也只有黄文彬、黄文广。

光绪四年（1878），潮江祠前约 30 米处修建石桥，取名“积福桥”，其碑文如下：

积福桥
出资众姓共结善缘
黄文广 闵元华 周存仁 会首 石匠

⁴⁷⁵ 请见第四章，第一节，“黄氏迁徙定居史”。黄德乙的名字也在上面，但是这并不表明黄德乙出生了，这是先把名字刻上去。目前上、中、下里仍有这种提前把没有出生的“儿子”名字先刻上墓碑的习惯。

黄德昌	闲仕兴	刘正宇	蓝国秀
黄德隅	黄德彩	卢天光	彭启口
黄德镐	黄国材		刘仕德
文生	黄 坤	黄国安	
	黄德盛	黄国光	
	黄德扬	黄国彦	

光绪四年全月十八日

“善缘”、“缘”是水东乡地方公共建设活动中众姓人群参与的重要核心伦理价值。建庙、建桥的组织者“化缘”，众姓出钱、出力、出物，这些都是在“共结善缘”。就水东乡的例子来看，“缘”最早出现于佛教寺院的《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其后出现于《平水桥碑记》和藏字石库壁文。结缘的另一种说法即是“募化”。“募化”一词亦最早出现于白马泉僧人主持修建的复兴桥碑记之中，其后中里赵氏《培修子母庙树立宗支碑序》、三多桥碑记、中兴桥碑记，均用“化募”一词来组织各自的公共建设活动。此种“善缘”，即可重组地缘人群关系，又可加强血缘人群关系。

目前，沿着长江庙前河沟依次修建房屋的聚落约有 30 户，都姓黄，黄氏四合院（今已毁坏部分，人居住的房屋则还存在）在河沟的较北面。如今这个四合院已经只剩下正房，其他耳房已被拆掉，院内宽大石板院坝还保留着。据居住者之一黄永财说：“这个房屋基的祖先以前的家业很大，都是四合院，三兄弟住，长房黄文选，二房黄文彬，三房黄文广。三家人有三个龙门子，各进各的。一共有 20 几间房子。”⁴⁷⁶

关于黄文广，黄永财说：“黄文广的儿子吃鸦片。中间的堂屋大得很。（儿子）吃鸦片败家务。黄文广有 8 个子女，前面 7 个都是女。黄德乙是幺儿，娇生惯养。以前封建迷信，（黄文广？）请阴阳先生来，在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银珠宝，把黄德乙拉到神龛前跪着，问黄德乙：‘你是愿意要桌子上的金银珠宝，还是想吃鸦片？’黄德乙还是想吃鸦片。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埋在后花园的牡丹花下。解放后，四合院分给大家住，大家去挖，结果没有挖到。（原来）阴阳先生作了文书，

⁴⁷⁶ 黄永财（45 岁）口述，时间：2010 年 3 月 17 日，地点：上里镇箭杆林村。黄永财关于“三兄弟”的说法与过去墓碑的纪录不一致，不清楚原因何在。关于黄永财的个人经历，他说：“爷爷叫黄富沛（音），号子树（音），解放前是舵把子，后来被镇压了。我没看到过爷爷。父亲叫黄先贵（音）。我 9 岁才读书，地主成分，是被打击的对象，受人歧视。中学没有读完，土地下到户，那时抓农业，树林林里都种庄稼。家务重，有 5 个弟兄姊妹，我是老大。路太远，每天走这么远的路去读书。最后就放弃了，中学没读完就不去了。”

（向神灵）通明告白，这些金银珠宝就找不到了。家业败完了。”⁴⁷⁷

关于重修长江庙，黄永财说：“长江庙修的时候，毛泽东时代不在了，封建活动就多了起来。居士婆婆多，一户捐一根木头，花点钱，请匠人来修，简单地修起来。以前的长江庙在下面一点的老庙基。都是自愿出木头，烧香，大家出力，或出钱。大家都在兴起来，这里也就兴起来。后坝头1队没有捐。2队、3队有人承头。1队姓黄的和我们不是一个家族的。2队、3队是一个祖先发下来的。我们的祖先本姓李，不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是皇犯逃到这里，定居到这里。祖先是朝廷通缉的人犯。逃出来几个人，一起来到这里隐居的。2队有杂姓，3队全姓黄。但后来有招女婿的，就开始杂姓了。”⁴⁷⁸

长江庙周围的黄氏人群，过去主要以造纸为业。箭杆林村2队现在还存在三个大土坑，长约12米，宽约5米，还有两口高耸的大煮锅。过去这些土坑用来泡竹子，煮锅则把这些长时间浸泡过的竹子煮熟（放碱）。捞出来后，再用脚碓窝舂，舂碎成绒之后再用水淘，最后制成一张张的纸（即烧纸钱的火纸），拿到五甲口场上卖。据说从砍竹子到制出纸张，一共有72道工序。

箭杆林黄氏村落形态，是水东乡茶道附近、五甲口场范围内以造纸为业的村落形态。庙宇是这片村落的中心，庙宇有一定庙产，有庙即有会，有会即有会首。本村落内的公共事业——桥梁，则由会首组织修建。川主、土主、观音是村落里的主要信仰。箭杆林黄氏村落形态，是水东乡村落中结构要素较完整的村落形态，可以作为水东乡一般村落结构的参考。

⁴⁷⁷ 同上

⁴⁷⁸ 同上，这段话中有关黄氏的家史，与过去墓碑宗支记载不一致，不知原因何在。

结 论

从方法上讲,本文相对重视墓地材料。本文在讨论有关“祖籍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记忆和宗支世系重构的时候,采用了墓碑与宗谱互证的方法。

本文也尝试把“道路——市场”放入到具体地域社会中去考察。寺院、基层市场众多小商人、道路沿线人户分段自发组织修建茶道和桥梁(出资、出物、出力),是把基层市场联结到遥远的打箭炉的重要社会机制。围绕基层市场形成的四合院是收集、加工和包装输藏茶叶的重要手工作坊,这些四合院分布于茶道沿线,它们与茶道沿线的寺院一起构成了运输茶叶的中继点。基层市场也孕育了茶叶商人,这些茶叶商人出资、周围农业人群出力(充当背夫),沿着漫长的茶道把这些茶叶背进了打箭炉。茶道上人员流动性加大,使得居住在分水岭上的人群与分水岭两边的人群联姻,从而长久地维持着茶道的畅通无阻。

如果我们把川藏贸易格局的形成放在历史脉络里来考察,明清四川雅安水东乡的情况能够部分地呈现这个形成过程。川藏贸易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活动的结果,它还是清王朝历次西南地区用兵的结果。茶叶也不仅是单纯的商品,它还是清王朝政府在藏区军政活动中的重要货币支付手段。小金川战役给内陆西部的四川省带来了数千万两的白银,这些白银通过省府成都散发到四川各地,其中经雅安县的南路和中路沿线地区也是清政府白银投放地。这些白银进入市场网络之后,开始与四川相关产茶地区的茶叶生产、加工、运输相结合,促进了四川相关产茶地区的茶叶生产和输藏茶叶贸易。在雅州地区地位凸显的时期里,五甲口场范围内的茶园经济迅速成长,五甲口场周围山头的佛教寺院也得到了复兴,成为茶园经济茶地拥有者和茶叶生产者之一。雅安水东乡上里五甲口场的茶布商人韩氏和茶叶商人陈氏,开始了逐渐积累资本的过程。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五甲口场翻箭杆林经芦山县至打箭炉的茶道形成,五甲口场逐渐被纳入到川藏贸易格局之中,乾隆中后期五甲口场开始崛起,白银流动于邛州、名山县至五甲口场。随后清王朝对廓尔喀(今尼泊尔)进行了数年的战争准备,孙士毅担任四川总督期间,负责组织军事物资的后勤供给工作。茶叶商人陈家山陈氏因为积极支持了孙士毅的工作,获得了孙士毅的一幅题字。

水东乡地方大族地位升降的现象,也让我们看到了川藏贸易与四川相关产茶

地区的密切关系。水东乡原有的士家大族本是中里八甲杨氏，他们在明末清初获得了大量无主土地，他们是清初水东乡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茶叶生产者。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上里陈家山陈氏率先超过了中里八甲杨氏，成为了水东乡新兴的士家大族。嘉庆末年道光初年，五甲口场韩氏又超过了陈家山陈氏，他们成功地走上了商宦之路，并与时任兵部汉尚书的王宗诚联姻。

水东乡有关“族”的建设历程，则也反映了川藏贸易格局对四川相关产茶地区的深刻影响。水东乡早期各老姓族人活动主要依托于寺庙（以中里八甲杨氏、中里赵氏和上里杨氏为代表），其他经济条件较差的姓氏人群则停留在世系整理与树立宗支碑的层面，墓地是这些农业人群族人公共活动的主要地点，墓地中的树木是农业人群族人的公共财产和资金来源，通过公卖墓地树木来树立宗支碑和清明祭祀，这种公共活动因为树木生长周期长（至少 15 至 20 年）而间隔时间也相当长。随着五甲口场的崛起，新兴茶布商韩氏形成了宗族，他们率先在水东乡进行祠堂建设。韩氏宗族的形成轨迹，与水东乡原有农业人群“族”的建设轨迹基本不同。韩氏具有了规范的宗族组织，管理族人的能力更强，共同祭祀祖先的间隔时间缩短，族人间的关系更为紧密。韩氏宗族形态并不是水东乡家族建设的代表，反而是一种特例。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水东乡也少有祠堂出现。

咸同以来水东乡的社会状况，是我们从四川相关产茶地区的角度去理解川藏贸易长期较稳定进行的侧面。水东乡的经济主要面向西藏，它在对藏茶叶贸易的长期相对繁荣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各姓人群开始重构祖先世系和祖先历史。宗族是培育生员阶层的重要组织。在乡士子通过互通婚姻以及共同参与地方公共建设（桥梁）形成了生员阶层。印刷品人生礼仪文书《随身宝》通过市场传入水东乡后，在水东乡基层市场间流动，进一步加强了在乡文人的祭祀权，巩固了在乡生员的文化统治地位，规范了水东乡乡村生活的种种社会秩序，有效整合了水东乡社会。蓝大顺、李永和起义并没有打破水东乡的四民社会结构，完整的四民社会结构、在乡文人《随身宝》的再创作，使得水东乡社会秩序井然，社会整合度加强，文风长盛不衰。同治、光绪年间，祖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传说在水东乡进一步扩散，那些与生员有亲戚关系的姓氏人群获得了祖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生根于墓碑的机会。这种同一祖籍来源成为水东乡地域文化认同方式和社会共同性显著特征之一，这也是四川咸同动

乱之后清王朝在水东乡重新巩固其正统地位的标志之一。水东乡众人集资修建桥梁的公共活动一直持续到民国六年，这表明水东乡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一直维持到民国初年。

如果我们把明清水东乡作为四川地区本地人群并未中断的社会样态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清初“湖广填四川”对这里人群的影响。水东乡人群在此影响下进行的历史记忆重构工作，是四川地区社会整合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对水东乡的这些认识作为理解清代四川相关产茶地区（茶引打箭炉的雅安县、名山县、荣经县、天全、直隶邛州）社会状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正是“道路——市场网络”把川西相关产茶地区各处地域社会纳入到川藏贸易的基本格局之中，通过这些地域社会人群类似于水东乡的社会运动过程而源源不断地把茶叶输送到打箭炉。清王朝政府基于这种地域社会运动、通过对藏茶叶贸易和控制茶叶市场而对西藏进行有效统治。

论文参考资料

1. 民间文献类

① 家谱

上里《韩氏宗谱》(咸丰六年版)

中里《杨氏宗谱》(民国2年抄录本)

下里《杨氏宗谱》(民国2年修)

中里《胥氏宗谱》(1951年抄录)

上里《杨氏宗谱》(1970年代抄录本)

中里《郑氏总宗谱》(1988年抄录本)

中里《杨氏宗谱》(1992年抄录本)

上里《陈氏宗谱》(2007年编修)

② 碑刻

墓地碣、碑约40通

寺院、庙庵内碑刻及摩崖石刻,20通

建修桥梁石碑,15通

③ 民间文书

民间礼仪文书,5册

袱簿子,4份

2. 档案类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全七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②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四川省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

③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④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上、中、下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

档案史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89年

⑤《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康藏区档案资料》（第二分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1959年

⑥《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合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⑦《康藏纠纷档案选编》，李鹏年、涂克明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3. 志书类

①方志类

《四川总志》（36卷），（清）蔡毓荣修，钱受祺纂，康熙12年（1673）版

《四川通志》（47卷），（清）黄廷桂修，张晋生纂，雍正11年（1733）版

《西藏志》，（33卷），（清）允礼撰，乾隆57年刻本

《雅州府志》（16卷），（清）曹抡彬修 曹抡翰纂，乾隆4年刻，嘉庆16年补刻

《西藏志》（不分卷），佚名，吴丰培校订油印本

《打箭炉志略》（不分卷）

《西藏记》（2卷），乾隆59年本

《卫藏通志》，松筠撰，乾隆60年

《四川通志》（204卷），（清）常明修、杨芳灿纂，嘉庆21年（1816）刻本

《里塘志略》（2卷），陈登龙著，嘉庆12年

《拉萨厅志》，道光25年

《巴塘志略》（2卷），钱召棠纂，道光23年

（咸丰）《天全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5册

《打箭炉志》（2卷）（清）刘廷恕纂，光绪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第66册

民国《雅安县志》，《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94册

民国《名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4册

民国《芦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4册

民国《荣经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4册

《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方志汇编》，张羽新主编，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记事类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上、下册），巴蜀书社，1987 年

（清）傅嵩林编：《西康建省记》，中国西南稀有文献丛书，第 94 册

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印行

胡吉庐编：《西康疆域溯古录》，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28 年出版，1987 年影印

翁之藏编：《西康之实况》，民智书局，1930 年

陈重为：《西康问题》，中华书局，1930 年

任乃强：《西康札记》，新亚细亚月刊社，1931 年

贺觉非著，林超校：《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陈志明：《西康沿革考》，拔提书店，1933 年

刘曼卿：《康藏轺征》，商务印书馆，1933 年

梅心如编：《西康》，正中书局，1934 年

杨仲华：《西康纪要》，中国西南稀有文献丛书，第 96 册

李亦人：《西康综览》，中正书局，1947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亚东部队政治部编：《进军康藏纪实》，1951 年

吴传钧：《西康省藏族自治州》，三联书店，1955 年

③地理类

《大清一统志》（500 卷），四库全书，第 474—483 册

《卫藏图识》四卷，附蛮语一卷，乾隆 57 年刻本

刘赞廷编：《康定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 67 册

杨图南编译：《西康之神秘水道记》，蒙藏委员会，1934 年

任乃强：《西康图经》，新亚细亚学会，1935 年

洪涤尘编著：《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6 年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健康日报社，1942 年

郑励俭纂：《四川新地志》，1947 年，铅印本

刘赞廷：《康藏交通择要》（2 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2 年版

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

马大正、吴锡祺、叶于敏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 调查传记类

王文蒙、葛维汉、白雪娇：《川西调查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3 年

朱契：《康昌考察记》，中国西南稀有文献丛书，第 127 册

徐仁常：《康人的日常生活与生计》，中国西南稀有文献丛书，第 128 册

5. 史抄类

徐珂：《清稗类钞》，第 11 册，商务印书馆

陈宗棠编：《四川乡土常识》，建设日报社，1949 年

刘赞廷：《康藏资料》，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2 年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 年

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

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

6. 研究专著

①中文类

（美）安沃特纳著、曹南来译：《烟火接续——明清的收继与亲族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陈支平、陈春声：《中国通史教程》第三卷，元明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冯承聪等编译：《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华德英教授论文集》，大学出版印务公司，1985 年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华书局，2007 年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 年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 年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 年

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论文集》，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 年

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 年

贾大全、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 年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梁方仲：《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中华书局，2008 年

梁方仲：《中国经济史讲稿》，中华书局，2008 年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林耀华：《金翼》，三联书店，2007 年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

刘复生主编：《川大史学·中国古代史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年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刘志伟、陈春声主编：《珠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文化认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 年

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和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7 年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 年

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 年

蒙文通：《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 年

（美）孟泽思著、赵珍译：《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

（加）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黄山书社，2009 年

（加）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

任乃强：《川大史学·任乃强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2002 年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年

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日）

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陶希圣：《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食货出版社，1976 年

（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

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美）王业键著、高风等译：《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人民出版社，2008年

（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年

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商务出版社，2009年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杨瑞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

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编，《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研究》讲义草稿，2008年

②英文类

Arthur P. Wolf (eds),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1978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James L. Watson Evelyn S. Rawski (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1988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s),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Stephan Feuchtwang,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The Imperial Metaphor*, Curzon Press, 2001

Susan Naquin &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ao Tao Liu & David Faure (eds), *Unity and Diversity—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论文类

①中文类

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5期

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2期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8期

陈春声、刘志伟:《理解传统中国“经济”应重视典章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

陈明光、郑学檬:《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1期

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麻城孝感乡》,《寻根》,1997年1期

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1期

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历史研究》，2000 年 3 期

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清史研究》，1999 年 2 期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历史研究》，2003 年 1 期

刘志伟：《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1988 年 3 期

刘志伟：《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 2 期

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王鹤鸣等主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年

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 4 期

南炳文：《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 年 2 期

叶显恩、陈春声：《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 1 期

②英文类

Evelyn S. Rawski, *Research Themes in Ming-Qing Socioeconomic History—The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0, No.1(Feb.,1991),84-111

附 录

敕渊泽侯庙记	2
雅州罗绳白马泉渊泽侯碑文	2
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	3
万历三十三年碑记	5
白云庵碑记	6
许应权墓碑	7
崇祯壬午神位碑（崇祯十五年，1642）	8
康熙四十一年至雍正九年各州县边引、土引增加一览表	8
康熙四十一年至雍正九年边引打箭炉增加一览表	9
雍正十三年茶叶边引、土引打箭炉一览表	9
雍正十三年茶叶边引松潘一览表	10
乾隆二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相关文字材料	10
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三年历年茶引增加一览表	11
乾隆五十二年平水桥碑记出资名单	11
嘉庆十五年长寿桥出资名单	13
嘉庆十五年复兴桥碑记出资名单	13
嘉庆十七年永宁桥出资名单	14
嘉庆二十四年培修子母庙建立宗支碑序名单	15
道光二十七年白马泉潮记	17
咸丰六年磐安桥出资名单	17
同治五年藏字石库出资名单	19
光绪二年张氏盟碑出资名单	20
光绪七年中兴桥名单	20
光绪二十六年二仙桥文字	21
民国六年福善桥名单	22
1994 年金花庙磐文名单	22
2004 年金花庙老年乐园匾名单	23

敕渊泽侯庙记

敕渊泽侯庙记

乾道元年夏五月至于六月雅州旱太守何朝请□李公□□□□□□
神求雨禳于老佛之宫又不雨乃属其耆老□所以敕□之方一心□首
前进言曰雨不难至也州北四十里曰名山县县北四十里白马□□□
山龙□□宅乞杯水掬焉则雨矣公用其言北向□□□□□□□□
从北方兴水俱至吏民欢譟兴雨俱入公拜□之□□□□□□□□
然三日乃止燭旱以解□草□以敦者老又□雨□□□□□□□□
旱三日之雨不可思也公于是拜送于郊俾取水□乾□□□□□□
盍记诸时谨按写经古有龙马出入岩洞因知白马泉山名山以□□□
马名以龙故也时未尝至泉上闻之泉上僧了派□□山□□□□□□
流自亢渟瀹为溪泄于尾闾可□可溉又言泉之□□□□□□□□
祥光夜见林□谷明□祈丰者往焉动应如響此又以□□□□□□
沱朝□郎何援为令始□异灵迹绍兴初部使者以□□□□□□□□
平□以问遂赐爵曰渊泽侯又天公院废已久后□邑□□□□□□□□
竹居□□□于今果未有载其事者夫虽号□雨□□□□□□□□□□
诚所是龙也不远八十里赴之诚不可无□时□□□□□□□□□□
□以□□□□□慈祥岂□之德□□之于上龙又变化□□□□□□
□助其为政于邑二者无以报恩德公命作记尚可□□□□□□□□
宜又成化其乡人增□祠宇时以暇日约□尉□□□□□□□□□□
谒庙□□记本末没德重刻石留庙中李公名□□□□□□□□□□
郡有德□二里□之其切上闻而得其一事也八月廿三日□□□□□
州名山知事温江何龙时记进士洪雅孙褒书

地 点：白马泉池旁，碑座竖立。

抄录时间：2008年12月26日；2009年5月5日再次核对原碑文

雅州罗绳白马泉渊泽侯碑文

雅州罗绳白马泉渊泽侯碑文

雅安治东北里许地名罗绳，峰峦叠出，耸翠层霄，迤邐东走，邛界也，南逾莲华，名山治也，西北延迂黄牛，芦山脉络相属也。树木掩映，草卉茂深，竹篱间瓦房而扑地，村落可里许而疏稀，山径隘小而坡险，居民鄙朴而质实，茶棕杭梁，独倍三乡而擅地利，此罗绳风土之大概也。若夫白马一泉，则又罗绳特异胜景，出于石罅，盈而虚，溢而退，其清可掬，观者不忍舍去。且夫泉本于山灵，积以土膏，润以地脉，蒸以阴气，浚以下湿，山有泉犹身有血脉也。未闻泉而潮也。潮本于海，海者，百川归宿之地，众流之所聚，天地嘘吸之气，阴阳进退之机，一消一长，一缩一盈，随日月以升降，週昼夜而长流，通古今而竟逝。彼有土焦而竭，气燥而枯，干涸断绝者有之，未有盈而复虚，溢而复退，有如海者耶，

当元阳肆虐，旱魃为妖之时，凡有祷即应，其异不在彼，而尤在此矣。弘治乙丑孟夏四月，弥旬不雨，农夫用事，云霓日在望也。于时争堰水而分溉不均者，奋袂攘臂之悍夫多于南亩矣，力不足者，讼于庭矣。予始忧之。辛未祷于山川群祠，三日不弗雨，愈忧之无何。州人金曰，罗绳白马泉有祈焉无弗应，试往求焉。又三日，丙子，予戒行至，期潮，适至，告以文而祷焉，事竣，又至，命盛之以筒，如礼，□我故道，妥于岱宗神灵之位，朝夕礼拜而祈祈而愿焉。次日己卯，果阴翳，四云顷焉，而雨果降少之，次日又降，犹少之。如是或降或歇，已时而焦者以荣，未布而干者以蒔，忻忻然无病，夏畦而望有秋矣。向之讼者自息，斗者自平，忧者自解。若是者，皆神之赐，潮之惠也，岂少补哉！呜呼，取潮之异，而不知取其庇我黎民，尤大功施者，詠人墨客者所为也，吾弗敢也。故吾书此，庸以告继我莅政之君子。若夫寺之建置，与夫潮之知遇，事之颠末，吾固未有所考也。

地 点：白马泉池旁
抄录时间：2008年12月26日

大明按古重修白马灵泉梵刹碑记¹

伏以天地初分混沌一气，三教家风，本为一气。儒夫子删诗书礼乐，君臣父子长幼有序，道教老君长生不灭，乃是修真养性也，释迦教主乃有大通，大圣说法度人，乃是明心见性也。

[illegible]

¹ 2008年12月16日拍照抄录,2009年5月5日再次核对原碑

理塔院，师弟如林，近寺一里修理关房。朝□□礼□今过僧三□八十八王殿宇□
朽。今正德十四年主持僧了禅，除旧鼎新，修理□引□姓，重塑如来各殿圣像。
龙池者，在古开耀元年龙马显然变化，出于岩洞。罗绳邛邑□□白马大王追入泉
洞，圣朝奉之。今弘治元年天地亢阳，本司开神有灵，蒙感四川提刑按察司连观
睹灵感，富国扬民，修彻龙池，竖立大殿至今。嘉靖十年率首杨景茂并本寺僧□
果□工僧□正□议性□性□性魁募□僧昌林妙池，切见龙王殿宇朽填，语引二里
檀性各备资财，竖立石柱，重修皆完。亘古亘今，体前朝今代，永贻世代之吉作、
后期之榜样。按古立碑，镌石为记。

伏愿释迦如来有般若之金船，音度有缘泉生而登后峰，祈皇上陛下寿□千秋，
蜀府寿万岁，君和臣□，年丰岁稔，八方宁静，干戈息四海，民欢贺太平，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保境清吉，岚瘴蠲除，官非不梁，火□无侵。僧□□和承□□
续几所祈求庇护 谨题

时大明嘉靖十年太岁辛卯十二月季冬朔十一日庚寅吉旦本乡里正杨景茂撰
首书滕写乡民杨俸仝

四川提刑按察司 连事 张淮

本州奉直大夫知州 裴

判官刘

本寺历代开山祖师 惠明

体督指挥行事守备黎雅等处指挥田大有

掌印指挥刘昱

指挥金事赵伦

巡捕正千户阮□

本州僧正司官缺

本寺历代开山师祖惠明

如朝 了新

住持僧 □□

如春 了照

如受 了能

如清 了怀

如吉 了松

桂定道人 明月光 侍神□童□□□

正殿塑粧功德□姓 僧了端 竟睿 竟仁 竟坚 杨铎 男杨友庆 杨友金 孙

杨廷礼 杨廷□ 杨廷权 性廷

□□□塑粧信士 杨如安 男杨景茂 女杨妙福 孙杨尚仁 杨尚德 杨尚昱

孙婿胥尚才

塑粧功德信士 杨永付 赵勇 赵子俊

捨财信 杨万财 杨丰阳 杨□□ 杨珪全 刘经才 邛州民张伏厚 任□ 任

海 任荣 任贵 任景

杨荣 杨春 杨惠 杨景现 杨泰 杨统 杨甫 骆彦林 骆彦章 骆汉

罗柱 罗董 罗万付 许仁厚 萧中 杨茂枝 杨贵枝 杨政 杨怀 任甫 任隆

任□

刘彦通 郑万中 杨进 任万文 乐惠全 杨友聪 杨实 杨琰 杨廷相 杨□

□ 胡大成 □□□

新津县民 范洪文 范洪阳 丁万常 丁万秀 党交才 李月明 陈天银 □□

杜祥 熊一 □□□ 李相

本乡耆老 赵万伦 杨永汉 石匠 杨竟聪 杨胜春 木匠 徐端 史臣 徐付
徐廷用

捨财坚俾信士 朱□海 妻曾氏 男性中 母妻余氏 系名山人氏 邛州高椎
杨法惠

修路人 □祖□ □厚中 妻杨氏李氏

本乡道士门羽士 郑道 杨甫静 平乐福田寺关主智镜简州人

地 点：白马泉池旁

抄录时间：2008年12月26日；2009年5月5日再次核对原碑文

万历三十三年碑记

四川雅州水东乡上里天空寺□

佛施皆重修塑粧功德什子明受原系邛州大

邑县水德乡白庙子主宅人氏在寺□立先规

□山祖惠明和尚于永乐八年开建亘古至今

七代不幸万历二十九年三月回禄殿庥俱□

□疏诱檀鼎新什子明受三人协心于癸卯重

修□殿乙巳戌月良期修砌佛台塑粧

中尊毘卢佛一位后壁西方漂海诸佛胜景二

图比协 法徒 悟东悟胜悟泰悟□

孙 本和本法本惟

□圆清明祖系资阳县资德乡金安寺高村□□□

之子发心具贲□诚塑粧

王尊圆满报身佛一位 法徒悟远悟春悟修悟□

侄王朝江 本李

□切 悟旋于名山县上乡清深溪高坎头杨宅人氏

在寺同建同诚竭至出贲塑粧

右尊三类化身释迦交佛一位

法徒 本曜本思本山孙宗启

明受明祖悟旋悟荣四人具贲满椶四□

后天井克毕达佛□见悟最上乘□此□

恩同缘种智 诱化僧 圆方 本山

于 殿 塑粧八佛僧俗 明仲 悟荣

元方 明光 悟银 徒□□

悟远徒本楫 夫立王世□□□

街氏 李继合 王门信女童氏男□□

大佛三□□□□□ 具匠□正实□

时明万历叁拾三年十月初六日立

地 点：白马泉池旁

抄录时间：2008年12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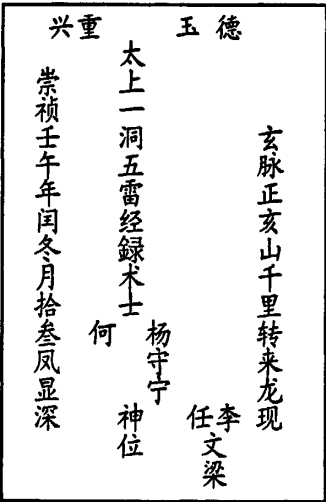
□□□ 杨□□ □ 文 □□□ □□□ □□□ □□□
□□□ 杨□□ □□□ □□□ □□□ □□□ □□□
□□□ 杨 □ □□□ □□□ □□□ □□□ □□□
□□□ 张 □ □□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点：上里镇庙坏村白云庵
抄录时间：2009 年 12 月 15 日

许应权墓碑

向午 加 丁癸
癸卯岁次六月十三日丁未日未时竖立
明故显考许应权之墓位
号世衡
妣杨氏
祀男婿许朝得
朱氏孙男许登发登富
许任铉氏

地 点：上里镇许家湾
抄录时间：2009 年 2 月 8 日



崇祯壬午神位碑（崇祯十五年，1642）

地 点：上里镇庙坪村
抄录时间：2008 年 12 月 28 日

康熙四十一年至雍正九年各州县边引、土引增加一览表

	年份	州县	土引	边引	腹引	引
康熙	四十一年（1702）	天全土司	5,600			
		雅州				2,079
		邛州				300
		荣经县				3,504
		名山县		3,310		
	四十四年（1705）	新繁、大邑、灌县				1,900
	四十五年（1706）	天全土司	1,030			
	四十八年（1709）	雅州		1,980		
	四十九年（1710）	邛州		1,304		
雍正	三年（1725）	雅州、成都、大邑、荣经、灌县		8,635		
		天全土司	770			
		安县		250		
	七年（1729）	邛州		1,100		
		洪雅、嘉定			300	
		天全土司	6,345			
		又以雅州荣经引拨新繁峨眉等招商认销				
	九年（1731）	成都等六州县				369
		通江县				768
		灌县等九县			652	
		罗江等四州县			51	
		新都等四县				220
		邛州		1,100		

注：文中直接以“引”书写的，即按“引”单独一栏
资料来源：《大清五朝会典》，第四册，雍正《大清会典》二，卷五一三，户部，线装书局，第 806—808 页

康熙四十一年至雍正九年边引打箭炉增加一览表

年份	边引打箭炉增加引数（单位：张）	边引打箭炉增加茶叶量（单位：斤）
康熙	四十一年（1702）	11,483
	四十四年（1705）	3,310
	四十八年（1709）	1,030
	四十九年（1710）	1,980
雍正	三年（1725）	12,494
	七年（1729）	6,345
	九年（1731）	1,100

雍正十三年茶叶边引、土引打箭炉一览表

州县	采买地	原额边引	新增边引	原额土引	新增土引	总斤数	总税两数	总课两数	发卖地
雅安县	本地	24,926				2,841,564	11,765.072	3,115.750	打箭炉
荊经县	本地	19,514				2,224,596	9,210.608	2,439.250	打箭炉
名山县	本地	663				75,582	312.936	82.875	打箭炉
天全州	本地			17,840	700	2,113,560	6,692.940	2,317.500	打箭炉
直隶邛州属	本地	10,200	1,100			1,288,200	5,333.600	1,412.500	打箭炉
小计		55,303	1,100	17,840	700	8,543,502	33,315.156	9,367.875	

注：茶引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茶引每张带茶 100 斤，随带附茶 14 斤，共计 114 斤，边引，每引茶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土引，每引茶征税银三钱六分一厘

资料来源：黄廷桂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雍正七年始修，雍正十三年完成），卷十五上，茶法，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559 册，第 638-641 页

雍正十三年茶叶边引松潘一览表

州县	采买地	原额边引	总斤数	总税两数	总课两数	发卖地
成都县	灌县、彭县、汶川	2,260	257,640	1,066.720	282.500	松潘
华阳县	灌县、彭县	750	85,500	354.000	93.750	松潘
新津县	大邑	60	6,840	28.320	7.500	松潘
灌县	灌县	2,128	242,592	1,004.416	266.000	松潘
灌县代销通江县	灌县	50	5,700	23.600	6.250	松潘
灌县代销巴州	灌县	100	11,400	47.200	12.500	松潘
灌县代销南江县	灌县	50	5,700	23.600	6.250	松潘
彭县	彭县	2,226	253,764	1,050.672	278.250	松潘
什邡县	什邡县	99	11,286	46.728	12.375	松潘
江津县	江津	100	11,400	47.200	12.500	松潘
彭水县	彭水县	100	11,400	47.200	12.500	松潘
平武县	平武县	37	4,218	17.464	4.625	松潘
石泉县	石泉县	220	25,080	103.840	27.500	松潘
直隶嘉定属（雍正12年升为府）	直隶嘉定属	100	11,400	47.200	12.500	松潘
峨眉县	峨眉县	50	5,700	23.600	6.250	松潘
丹棱县	丹棱县	100	11,400	47.200	12.500	松潘
大邑县	大邑县	1,800	205,200	849.600	225.000	松潘
合江县	合江县	200	22,800	94.400	25.000	松潘
安县	安县	1,400	159,600	660.800	175.000	松潘
绵竹县	绵竹县	146	16,644	68.912	18.250	松潘
直隶茂州属	直隶茂州属	791	90,174	373.352	98.875	松潘
汶川县	汶川县	223	25,422	105.256	27.875	松潘
合计		12,990	1,480,860	6,131.280	1,623.750	

注：茶引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茶引每张带茶 100 斤，随带附茶 14 斤，共计 114 斤，边引，每引茶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土引，每引茶征税银三钱六分一厘

资料来源：黄廷桂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雍正七年始修，雍正十三年完成），卷十五上，茶法，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559 册，第 633-644 页

乾隆二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相关文字材料

乾隆二十七年

四川总督开泰奏，邛、雅、灌、汶等处，每年额办茶一十一万余引，给商配运，于松潘、打箭炉行销。近各园户因茶产日滋，额引外每有余积。而口外生齿渐繁，销茶愈广。现在茶商殷实者少，未便遽增引目。但园户余茶亦应调剂。查川省城多坍塌，前奏准于宝川局旧炉外，添炉铸钱出易，以余息为修城之用。自乾隆二十年迄今，收银二十三万余两。第通省各城工，需费不貲，专待此项，未

免稽缓。请将园户存茶，于节年鼓铸余息项下借支银二万两，交盐茶道查明，按价购买，填给印照，会同松茂、建昌各道，督率行销，所获余利，与鼓铸余息俱充城垣修理之费。得旨，如所议行。³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

又谕：户部议打箭炉徵收税银，比较上三届，均属短少，应照亏短最多之数赔补。数年来核办各关应赔款项，俱系如此。何以文绶遽请酌中赔补，致启向后递行短绌，避多就少之弊，殊属非是。文绶之意，不过欲令该监督少赔千余金，以图知感。封疆大臣岂宜如此存心。文绶既有此奏，即著照伊酌中所定之二千七百二十二两零，令监督满禄赔补。其比较不足银一千五十三两零，著文绶五倍罚出，以为市恩邀誉者戒。⁴

乾隆四十七年奉旨停差监督，经总督文（绶）奏明改委同知征收。每年茶引邛州各商运销茶二万零三百引。荥经县各商运销茶二万三千三百十四引。雅安各县商运销茶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引。天全州各商运销茶二万七千零二十引。□名山县引一千八百三十张内邛州代销□□五十张。天全州代销一千二百七十五张。以上四州县各商共运销边茶引□部茶十万零三百四道，应征茶税一万八千零五十八两五钱，其杂货税银尽收尽解，并无足额。⁵

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三年历年茶引增加一览表

年份		各州县增加引数			
		灌县	天全	荥经	邛州
乾隆	五十二年（1787）	1,000			
	五十四年（1789）		2,500		
	五十五年（1790）		2,000		
	五十六年（1791）		3,500		
	五十七年（1792）			2,500	3,500
	五十八年（1793）		700		2,500
	六十年（1795）		826	800	
嘉庆	三年（1798）		4,100		

资料来源：鲁子健：《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1990年3期，第53页

乾隆五十二年平水桥碑记出资名单

出资众姓

第一横排 第二横排 第三横排 第四横排 第五横排 第六横排

³ 《清实录》一七，高宗纯皇帝实录（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355页

⁴ 《清实录》二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8—619页

⁵ 吴丰培辑：《打箭炉志略》（乾隆末年），关榘，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十三，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第16页

□□□	□□	□□□	□□□	□文□	
□□□	□□	□□□	□□□	陈□□	注
□□□	□□	□□□	以何□□	以杨彦□	:
□□□	□□	□□□	上任□□	上杨全祐	以
陆□□	□□	□□□	各□□□	十□□□	下
杨□清	□□	景□德	出□□	三□□□	文
□光明	八百	王武□	杨□□	人□□□	字
李□□	六百	师万银	二□□□	各□□□	湮
□□□	三百	杨盛□	百胡□□	出□如□	灭
□□□	三百	邓继□	文李纯□	钱杨若柱	
□□□	三百	刘□□	杨洪道	二杨□□	
□□□	□□	□□□	□□□	百陈文启	
□□□	□□	□□□	□□□	文□□□	

(上接第六横排)

第七横排 第八横排 第九横排 第十横排 (据石碑空间估计, 以下还有两排)

		杨□	□□□	
		何洪发	□□□	
		李思益	□□□	注
		杨□智	□□□	:
		杨□□	□□□	以
□□□	□□□	杨□□	□□□	下
□□□	任□□	沈□□	朱□□	文
□洪□	□□□□	杨□□	□□□	字
魏在□	□□□□	各徐天□	各杨□	湮
黄□□	出□□□	出□□□	出杨□□	灭
余□□	一□太礼	一王涛	一王□□	
朱朝□	□□□□	百□□□	百杨□□	
□□□	□□□□	二杨全□	二□荣□	
□□□	廿□□□	十胡世安	十黄天星	
余祖兴	文□□□	文黄明□	文杨尚□	
黄安德	杨□	李友□	□□□	
□□□	□□□	杨启先	□□□	
□□□	□□□	□□□	□□□	

(后世叠加所刻大字)

红军是反帝抗日主力军!

德成政治部

嘉庆十五年长寿桥出资名单

面之二：

黄久中 黄正中 黄学海 黄廷用 黄学孟

各出银一两

师肇建 师肇武 文元师肇宣 师徐氏

各出银一两

黄仕□ 马玉珊 师玉龙 马玉凤

(以下被石墙所遮挡)

面之三：

长寿桥

请匠 陈维主

堪輿黄天星

桥功造成垂□□

與梁普济亿万年

嘉庆十五年复兴桥碑记出资名单

□□□□

福彩 杨全义

慧□ 许悌忠

慧禄 □□□

地主

□□□

石工

陈惟柱 邵□□

书碑僧祖盛

四面之二：

出资众善

第一横排：

定□，上银三两二

第二横排：

高璋，四钱

(以下五排，名字风化不清，略)

慧泽，上银九两	杨元□，四钱
祖□，上银二两四	赵友松，四钱
智彩，上银二两	骆通先，四钱
慧禄，上银四两	杨应寿，六钱
慧义，上银一两四	谢道现，五钱
慧星，上银一两五	□□□，五钱
慧元，上银一两二	杨全实，四钱
杨全义，上银一两七	
许悌忠，上银一两七	
尤占坤，上钱三百文	
安宙，上银一两二	
韩遇春，上银七钱	
定玖，上银六钱五	
智泉，上银六钱	
李成志，上银四钱八	

四面之三：

上两排风化不清	第三横排	第四横排	第五横排	下三排风化不清
	卢文周	樊思德	张怀亮	
	刘步云	陈□仁	□□□	
	□益美	张廷富	田登□	
	陈应明	刘文□	田恒瑜	
	高世叶	□□□	祝开容	
	□□□	杨曰祥	石存周	
	樊思华	邓一心	□□□	
	樊思益	陈□□	龚廷□	
	□□□	樊□□	杨天奇	
	□□□	□□□	□□富	
	各上钱二百文	□□□	□□□	
		□□□	王连玖	
		各上钱二百文	各上钱二百文	

嘉庆十七年永宁桥出资名单

左面：

出赏众姓			
第一横排	第二横排	第三横排	第四横排
丙寅年 还阳僧 慧泽	宋国珣	智 宣	李登贤
助银三两二钱	智 光	石金倾	杨文炳
李自宴	延崇美	慧 星	周连泰

助银一两二钱五分	各银一两	各上时银四钱	唐文进
智 纲	智 彩	李自宿	马怀荣
陈永旸	许悌忠	上银三钱六分	张国龙
慧 见	牟奇祥	吉运阡	已上各助时银二钱
四分			
刘文恭	各银五钱	智 泉	
定 魁		各银三钱	
杨世德			
已上各助时银一两二钱			

右面:

出资众□			
第一横排	第二横排	第三横排	第四横排
祖□	定人	张□□	陈□□
杨生贵	胡文灿	张文玉	李□贵
慧禄	各助时银一两	各银二钱五分	陈文义
李自密	慧启	胡文安	尤占坤
慧义	何昌荣	杨永华	李文魁
各助时银一两二钱	余德凤	朱永崢	尤思乾
宋德麟	杨应寿	李光益	(以下剥蚀不清)
慧元	各助时银五钱	各银二钱四分	
各银一两一钱			

单列一竖排

为首释子祖向捐银二十四两五钱

嘉庆二十四年培修子母庙建立宗支碑序名单

第一横排:

会首

赵之喜出银一两四钱

赵大重出银一两四钱

赵文开出银一两四钱

赵连永出银一两四钱

赵连彩出银九钱

赵大定出银六钱

出资

赵之珊上银一两二钱二分

赵之庆上银一两二钱

第二横排:

出资

之域一钱六分

之瓚二百文

之魁二百六十文

连珏一千二十文

连应六钱

连级四钱一分

连忠四钱一分

连栋三百文

连选二钱四分

连坤一百八十

连准一百七十

连斌一钱九分

第三横排:

国栋五钱五分

大顺二钱二分

大万二钱四分

大朋二百文

大富一钱三分

大纲一钱三分

大明八十文

元斌钱二分

文富二钱四分

全鉴二钱

文仲二百七十

文应一钱二分

连除一百六十
连训□□□

文灿一钱二分
元彦一百廿文
元珍一百文
启富一百七十
僧元顺一两五钱

二十四年竖宗支碑出资人等

第一横排:

第二横排:

第三横排:

第四横排:

为首

赵大重出银四钱	连绪上钱三百三十	大昌上钱一百廿	大茂一百廿文
赵连壁出银四钱	连经上钱三百三十	启栋上钱二百	大林一百六十
赵连钊出银四钱	连钦上钱二百廿	大信上钱二百	文珩一百六十
赵文开出银四钱	大相上钱三百三十	大国一百文	文宣一百六十
赵大用出银四钱	大具上钱三百三十	大学上钱二百	赵兆氏一百十
赵大祥出银四钱	大武上钱三百三十	启美上钱一百廿文	大纯一百六十文
赵廷升出银四钱	连达上钱三百廿文	连选上钱二百廿文	永长一百廿文
赵大鉴出银四钱	大凤上钱二百文	启盛	文宏一百廿文
赵连坤出银四钱	邦贤上钱四百文	启泰共钱三百文	文学一百廿文
赵国栋出银四钱	元斌上钱三百三十文	启贤上钱一百六十	大锐三百廿文
赵维新出银四钱	启贵上钱三百三十	大伸上钱一百廿	大刚上钱二百
	象贤上钱二百十四文	大维上钱一百廿	大川上钱一百廿
	廷昭上钱乙百六十文	文理上钱一百文	大江上钱一百廿
	文升上钱一百廿文	文佑上钱一百廿文	大启上钱一百廿
	廷昌上钱一百四十文	文柄一百六十文	赵杨氏上钱九十文
		文杨上钱二百廿	大邦上钱一百文
			文材上钱一百廿文
			文坤上钱一百六十文
			文良上钱一百文

第五横排:

有仪上钱八十文
启梁上钱一百六十文
启枝上钱一百四十文
启柱上钱一百廿文
启尚上钱一百廿文
启模上钱一百六十文
连和上钱一百六十文
赵胥氏上钱一百六十文
启元上钱一百廿文
启祥上钱一百六十文
启寿上钱一百六十文
文星上钱一百一十文
启富上钱一百六十文
文长上钱一百廿文

第六横排:

大福上钱一百文
应安上钱一百廿
一支赵可先子思儒子之永子
连位连珠连升子大宏大应
大柱大川大海大儒子文忠
文贵文富文华文耀
大儒上钱二百四十文
大勋上钱二百四十文
题名万历初年文生赵献忠
明时生员赵蕃赵凤先
清秀士赵恩禹廩生赵全鉴
己酉恩科武经魁赵国栋
廩生赵维新撰宗谱一卷宗序二章
赵连壁、启梁书

永祥上钱一百文
启林上钱一□□□

石
木匠 赵洪桂
赵大逢
赵大齐

道光二十七年白马泉潮记

白马泉潮记

闵一德，字咸有，号吉庵，住百丈驿

说卦传载，山泽通气数语。解之曰：泽气升于山，为云为雨，是山通泽之气；山之泉脉流于泽，为泉为水，是泽通山之气。顾人第知水潮之有信，多疑山潮之无端也。窃忆雷在地中，于卦为复，地势重阴之中，忽有阳动，斯造化之枢纽乎。宣尼玩易，叹其见天地之心，毋亦以造化交感，虽未絪縕，其机已动，方其不动而动，动而不动之时，是谓先天真一之气。知雷在地中而成复，则知泽在山中而为潮矣。况此山分脉于岷右，蜿蜒于天台，盘桓于古佛之间者，已踰千里。而其隐辘郁垒，其蓄积之盛，自有迈于他山者。宜乎气之乘，时而通也，睹斯潮者，深思而有得焉，必能会通于常静常应之旨。孔子曰：先天而天弗违，茫乎无朕，潮之退也，后天而乘天时，露出端倪，潮之通也。寂然不动，返本复静，坤之时也，潮则静以待之。静极而动，阳气潜萌，复之候也，潮则动以应之。盖阴阳之妙，循环无端，其至妙处，在坤复之交、动静之间，天根月窟间来往。当前即是学道之君子所以慎戒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乎，至若白马呈祥，龙渊起端，山灵之常，其理可信，不必疑也。

余卜葬亡妻于山麓，尝低徊留之，因为之记，时则道光之丁酉仲秋也。

名山县乾隆己酉选拔，嘉庆甲子举人，保宁府阆中县教谕，截取知县闵一德撰，次孙堃敬书。

吉庵公葬于青龙山大石包之前，与王孺人合墓。男廩生焘、增生易（注：下有四点水）燕谨志

大清道光二十七年疆圉协洽日缠梁之次

地 点：白马泉池旁

抄录时间：2008年12月26日

咸丰六年磐安桥出资名单

杨在位 杨文明
各上钱五百文
黄国太 杨栢春
杨程氏 杨金寿
杨世彩 蒋丰起

各上钱三百文

第一横排

师元富
黄学义
胥文英
杨文星
杨万荣
郑马氏
周廷良
邓曰口
张鸿仪
张怀琨
以上各出钱
乙千二百文

第二横排

邛邑 全洪盛 杨大新
蓝廷仁 郑安邦
胥子盛 何茂斋
黄仕明 梁大弟
蓝廷礼 林明宣
何廷俊 王汝珊
昌 慈 杨奇瑜
师元善 住澄贵
黄玉堂 杨全弟
许永发 黄学口
如 俸 韩廷杨
闵联忠 何茂宗
韩廷俊 韩任氏
刘光明 杨文藻
黄文昭 杨玉兴
黄文德 韩廷琳
韩 潮 杨文焕
王汝珍 张 溥
杨太训 杨文有
以上各出钱乙千文

第三横排

邛邑 杨玉盛
师肇传
陈登焕
李作连
李向阳
各出钱八百文
文生 陈绍基 刘永盛
金大明 杨大荣
景银魁 任登福
黄文化 杨全体
杨全箴 杨彦禄
杨金盛 杨守魁
董开来 妙 湛
杨大成 杨奇珊
李廷校 赵廷英
景全珠 何正兴
沈全才 陈藻芳
杨奇遇 杨全文
杨全辉 杨全用
杨长申 杨肇邦
以上各出钱六百文

第四横排

邛邑 高启宗 邓为先
宋元宗 杨正行
郑天祥 梁大成
杨永畅 杨仁义
何汝才 高学伸
陈万贤 黄子栋
杨文现 何相廷
李作槐 邹启文
杨洪兴 姜先立
以上各出钱五百文
万德兴 黄德贵
李天惠 刘坤顺
齐青云 李世富
出钱四百文

(接上)

第五横排

张斗亭 张先衣
杨奇芳 李文光
杨亭勋 杨文宗
肖连奉 肖荣癸
杨口明 刘相品
邓 洪 李文恒
杨文清 黄文广
王述公 李元隆
杨元钊 肖廷贵
黄永德 张鸿翮
张李诗 张问仕
林明珏 刘洪登
林明昆 杨万春
林时芳 杨存仁
杨奇章
以上各出钱四百文

(以下还有四排，字迹模糊)

面之四:

廩生	陈光耀	韩 锦	杨玉桂
	任怀珍	杨玉荣	杨玉兴
	赵廷英	韩廷琯	徐占魁
	金光绶	三人各上钱三百文	梁友授
国学	韩廷鼎	杨程氏	唐智和
	杨攀华	上钱五百文	刘光前
	杨守魁	韩罗氏	李廷校
	罗东辉	上钱五百文	杨三启
	李天惠	杨 万	曾孔传
	任怀有	武生 韩振林	杨正宗
各上钱五百文		韩 鹏	八人各上钱二百文(原文如此)
	蓝廷义	沈尚宣	曾孔传
	邓永清	刘家禄	杨正宗
	梁大兴	蔡有容	杨存仁
吏员	杨永昌	五人(原文如此)	杨思瑞
上钱五百		黄德镐	任运昌
		陈太兴	上钱二百
文			

三人各上钱二百四十文(原文如此)

同治五年藏字石库出资名单

面之五:

	韩廷铸	杨太兴	高启济
	陈定芳	周尚文	杨纯茂
武生	韩定邦	胡永成	刘万宏
	韩廷瑶	高启福	文青云
	韩 淳	李元农	杨连芳
文生	杨含章	水济川	殷万和
文生	邓为林	李俸阳	任怀珠
	殷子芳	萧捷荣	林运寿
	陈万富	韩廷铠	李大有
	陆恒发	韩 奇	韩廷舆
	赵开武	陈芝芳	陈义芳
	赵开启	文清鲜	邹明福
	杨应魁	杨祝宗	赵闭友
堪輿	杨廷魁	杨定宗	万载兴
	杨文福	杨怀志	程至章
石匠	刘以义	朱水烟	陆绍陵
领袖	王天川	许汤明	赵洪盛

何廷俊 余双和 杨喜宗
 杨文有 各上钱二百文
 各上钱三百文

光绪二年张氏盟碑出资名单

出资后裔 树扬一百曰荣壹百
 怀琨伍佰维钊壹百五全孝壹百荣喜乙百 学圣八十子敬肆百
 国学维泰壹千先遇二百先义壹百先刚乙百文生必达肆百 荣富二百世启四百武生树声四百
 汉四百 烺一百 隆二百 钟五百文生先哲 学壹百 灿 武生树良五百
 源 斗四百 衢一百四理壹百 顺乙百四武生腾蛟六百国政五百应宗壹百 刚壹百
 远 金德叁百 裔二百 茂壹百二 荣德壹百 定壹百 松乙百 欣乙百
 流 度亨二百 福壹百五聪 会一百 贵壹百 林壹百凤刚壹百四 云二百
 长 金洪叁百 泰壹百五礼二百 铭五百 体一百 龄壹百一荣以百 周乙百
 文耀壹百 通壹百 升一百 华壹百 世珍壹百先隆出碑帽 启壹百

光绪二年清和日 吉 为首国学一星壹千先业五百 石工林世安
 (最一排人名不清, 约 3 到 4 个人名)

光绪七年中兴桥名单

杨金条 九品 林芝情	胥华章	杨全荣
杨金富 二千四百文	郑永学	郑永太
各三千文	杨洪发	郑永光
	郑永嗣	各一千五百文
	郑代隆	
	杨兴嘉	
	各二千文	

左面:

第一排风化看不清, 略

杨荣翼	陈尚举	陈志烈	徐显德	胥永启	陈嘉□
杨绍美 战弁	李华堂	郑代恭	郑代明	胥登祥	郑春毓
杨荣治	魏开林	陈永太	文生 康兰薰	胥荣禄	胥洪德
杨明哲	罗文斌	徐洪亮	李登庸	胥桂枝	杨文新
杨应宾	景大常	郭永通	罗尚□	胥自启	杨德盛
郑永扬	刘登铭	胥春贵	卢汝钦	胥自洪	袁双和
□公辅	杨远钊	杨文珊	陈嘉镛	杨学成	戴宗正
李常青	张先哲	胥树秀	吴广太	刘贞清	廖志明
杨简氏	王仲甫	杨全耀	席荣明	郑代明	郑天成
赵大绪	郑代贤	杨兴贞	陈光斗	杨全溶	郑永芳

王绳先	郑永嘉	各出六百文	叶光□	杨全仁	郑代福
杨永和	郑玉青		李心一	胥李氏	郑代升
吴程氏	沈全坤		杨全栋	胥许氏	郑代禄
郭世熙	张世启		魏卢氏	胥淳章	郑嘉荣
郑天斌	杨金述		魏陈氏	李延林	郑代敬
乙千文	各出乙千文		朱闵氏	郑代清	杨□□
			朱杨氏	各出五百文	□□□
			杨万镒		陈□□
			彭贞坚		各出四百文
			各出五百文		

最下一排看不清楚，略

右边一块：

第一排风化看不清，略

李春□	黄贞金	杨□□	袁启□	郑代万	杨奇遇
卢□□	黄贞善	杨魏氏	席□□	卢槐圃	杨□□
□□□	郑永年	杨□氏	程希箴	吴树楠	王□□
袁绍恺	杨□□	郑代翰	王□义	蓝尚华	郑□□
杨其青	郑代钊	李延珍	杨元凤	何胥氏	郑□□
彭正才	郑永端	胥永祥	张维垣	罗尚忠	各□□□
彭世璉	杨春元	□□盛	张□汉	各八百文	
杨维寿	各一□□□	叶全才	张□泽		
胥天寿		程深□	张□□		
各出钱		郑永修	□□安	以下两排风化严重，略	
一千二百文		□□□	赵文辉		
		杨□□	杨兴青		
		杨全□	胥长兴		
		杨绍宇	张荣富		
		杨陈氏	蔡□□		
		王国有	郑代衡		
		各出钱一千文	各出钱一千文		

光绪二十六年二仙桥文字

正对上游方向：

右：足使沙明水秀

左：直教虎踞龙盘

上层

普陀山

右：金莲开法界

左：玉树霭悲云

民国六年福善桥名单

第六横排	第七横排
□长泰	杨□礼
杨□廷	上钱八百文
许万松	刘汉三
郑存龙	上钱五百文
杨□□	胡荣山
杨□□	上钱四百文
杨□□	魏洪基
杨攀□	孔宪□
各上钱乙千文	各上钱三百文
石匠 任茂廷	
□□□	

1994 年金花庙磬文名单

郑焕周	何光用	郑善珍	张朝品	杨元贞	陈秀英
汪朝仲	汪志□	杨永芬	罗朝英	张在福	
张世杰	杨永珍	□树云	郑□朋	杨永贞	
李世蔡	吴肇成	郑守龙	刘怀贞	□□□	
	郑加红	张在斌	杨东义	刘志贵	
	杨元丰	郑存□	郑存云	王光福	
	吴玉银	郑 敏	吴国贞	陈志忠	
	罗秀英	李红彪	袁子高	郑守安	
	杨永福	陈国洞	郑守叔	刘世秀	
	陈国林	杨莲玉	杨世德	邓善珍	
	罗明选	胥绍兰	熊叔英	郑本云	
	兰芝莲	郑守贵	陈进珍	胥维品	
	杨世英	李成叔	陈良贵	陈茂清	
	刘绍贞	张在钺	袁定珍	许新莲	
	仇 勇	刘明贞	张在针	杨定远	

2004 年金花庙老年乐园匾名单

杨国英	吴学莲	兰芝莲	吴正明	任成强	王朝忠	张 军
胥怀珍	兰兴英	杨清秀	陈茂清	陈茂强	罗绍芳	张世军
胥绍英	罗克珍	陈子兰	陈茂强	蔡大贞	杨世健	任年卜
王显来	杨绪固	杨怀璞	陈茂楷	郑守强	彭在秀	陈茂祥
李原来	杨年秀	王成蓉	陈国林	彭怀强	余永强	陈昌荣
马全英	郑显蓉	李原光	陈荣健	陈荣清	杨国龙	陈荣信
胥成蓉			陈昌斌	陈荣全	陈清品	韩老三
			赵进明	陈荣博	陈国显	陈荣豪
			胡传和	陈荣侨	刘思霞	陈荣肖
			郑显君	陈荣洲	陈 斌	陈荣坤
			杨才淑	陈昌强	杨术先	陈荣超
			陈茂福	邓廷辉	张登蓉	张敦全
			王朝华	罗良君	陈子秀	罗明显
			陈清平	杨定全	李加秀	罗朝富
			陈昌军	王秀贞	肖月贞	杨白林
			陈茂武	李加富	郭绍军	卢连珍
			吴学洪	王允佐	陈 刚	李成惠
			张在艳	杨清烈	席定兵	罗朝珍
			刘大文	杨清璞	陈清兰	杨世强
			罗朝富	杨清张	陈清泽	彭正英
			郭明秀	张世刚	杨荣彪	杨永珍
			杨永香	杨 山	卢老五	金绍芳
			张艳平	余龙英	杨 帅	赵有英
			张 义	胥朝光	杨国秀	王宗海
			张志军	王家伦	张 伟	

后 记

乙酉年春，由蜀负笈岭南。蒙景师蜀慧恩荐，幸从陈师春声、刘师志伟，忝列门墙。五年荏苒，弟子小学而大遗，论文疏漏之处不忍足数，惟学习之点滴历存心上，始为慰焉！

硕士生阶段，黄国信师、温春来老师、吴滔老师会讲，金针度人。博士生阶段，陈春声师授课纵横捭阖、融汇通达；刘志伟师授课见微知著、意深高远；科大卫师授课妙语警言、洞彻人事。受教于众多名师，如果说是知识的精进，莫若说是学养的陶冶与行事做人的言传身教。感谢诸位老师多年来在不同场合给我的耐心指点，令我身心受益，惠及绵长！

戊子年冬，我沿康定回溯至雅安，为田野之地徘徊时，得到市方志办危素云主任的引荐，与“水墨上里”之地结缘。在雅安市雨城区档案局赵志雷局长的陪同下，我进入上里古镇。之后每次途经雅安，与危主任、赵局长多有接触，得到两位前辈的无私帮助，使我田野之路走得较为平稳与顺畅。上里镇政府武装部唐富良部长、办公室肖敏主任为我的田野访谈提供了诸多方便，若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我在上里镇的研究工作不会如此顺利。

在水东乡（今上里镇、中里镇、碧峰峡镇）田野工作期间，适逢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我和雅安市雨城区文物管理所的王喻、姜萍、刘勇、朱墨、耿忠慧幸会，一起跋山涉水，探幽访古，一起走过长长的、已被荒弃的茶道。茶道的艰险与泥泞，让我体会到文物工作者的辛劳，同时也被他们的探索精神所鼓舞。很怀念和他们在一起互相陪伴的时光。

上里镇的韩先府总是让我叫他“韩四哥”。韩四哥是一位古道热肠的汉子，他让我看到了上里韩氏言而有信、行而必果的家族传统品质。上里庙坝村的杨世松长我几岁，我们互称兄弟。杨兄爱好文学，能做诗和写祭文，是当地热心于公共事业的乡间文人。论文里对庙迹的考察与访谈，得到了韩四哥和杨兄的鼎力相助。水东乡人勤劳、善良、纯朴，这是我的田野能够持续和深入的源泉所在。他们的名字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期望还有机会向他们面呈论文，恭听他们的意见。

读书期间，我有幸多次参加了由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办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及讲座、三期“民间历史文

献研讨班”和多次“华南年会”。在这些活动中，感谢赵世瑜、郑振满两位教授的传授与指教。期间，程美宝教授、蔡志祥教授、黄永豪教授、张兆和教授、廖迪生教授、马健雄教授虽然没有直接对我有所指教，但他们在研讨班和华南年会上的诸多精彩发言让我受益良多，在此一并感谢他们无私地让我分享他们的思想结晶。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要感谢我的本科学长辛旭、同学李长春、许丽梅、覃江、石丽敏给予我的帮助与建议。在使用中山大学图书馆资料过程中，我麻烦过很多我并不知道名字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他们优良的工作作风令我印象深刻。

同学时光总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我要感谢吴中明、安东强、张林、杨思机同学对我的帮助，感谢同年陈景熙、黄伟英、黄天娥、邓刚、周华、陈志国、腰蓝、陈玥、唐金英、曹善玉同窗之谊。

行文至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含辛茹苦养育我。别无它报，希望我在今后更加努力地学习与研究中让他们心存安慰！感谢我的妻子，有她的支持，我始终有一份平静恬淡的心情沉浸在论文的田野与写作之中。

可能要于心怡的康乐园说再见了。我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时常会想念康乐园，这里有一段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会想念学生期间接受的师长教诲和同学情谊，想念每年四、五月黄桷兰的丝缕清香，想念十月、十一月紫荆花的绚烂夺目，想念常年散发着幽幽芬芳的细叶榕……康乐园，你好！